

侨之夢

(第二輯)

◎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编

QIAO ZHI MENG

侨之夢

QIAO ZHI MENG

(第二辑) ©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编

谨以此书

献给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建会 70 周年！

献给生活工作在北京的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和心系
故土的海外侨胞！

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2020 年 10 月

《侨之梦》（第二辑）编辑委员会

主 任：赵宏生 荣 洋
副 主 任：李冬娟 苏 泳 李登新
 周作宇 刘 峰
委 员：王立军 常荣富 刘金凤
 曹江河 赵 勤 陈赞兴
 孙济民 邵红英 门 毅
 祁雪晶

编 辑 部

主 编：李登新
副 主 编：刘 峰
执行主编：赵 勤
责任编辑：祁雪晶 李艳琴
校 对：张永存 李静怡

序 言

1950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下，北京归国华侨联谊会诞生了！70年来，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从“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解放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北京归国华侨联谊会”一步步走来。70年来，北京市侨联团结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谱写了一首首爱国之歌、奉献之歌、奋斗之歌，为侨联事业发展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纪念北京市侨联成立70周年，我们从各条战线上选取了70位侨的故事编辑成册。他们有的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有的是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有的获得了院士荣誉称号……尽管身份不同，但相同的却是爱国的那颗心，报国的那份志！

在这本书中，你能看到他们在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感人事迹，生动记录了他们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故事；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呕心沥血，奋斗不息的故事；在国外的优厚待遇面前，不惜一切代价回到祖国做贡献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一代代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坚韧奋斗、勇于奉献伟大精神的缩影。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侨联工作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侨联组织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创造了良好条件，寄予了殷切希望。

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北京市侨联将在北京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对北京的重要讲话精神，抓住机

遇，乘势而上，开拓进取，广泛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做到党有号召、侨有行动，在推动侨联事业发展、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不断开创新局面、展现新作为、贡献新力量。

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2020年10月

目 录

致敬功勋

(以姓氏拼音为序)

| | |
|---------------------------|----|
| 热血铸军魂 雄鹰傲苍穹 | 1 |
| ——记原中央首长飞行队大队长蔡演威 | |
| 忘我投身祖国建设 勇做归侨避风港守护人 | 7 |
| ——记中旅集团原副董事长陈德鸿 | |
| 一生为党 初心不改 | 12 |
| ——记中国驻毛里求斯原大使陈端 | |
| 传播中国声音 讲述中国故事 | 18 |
| ——记原广电部菲律宾语组组员陈金銮 | |
| 救亡图存 丹心向阳 | 22 |
| ——记中国科学院离休干部陈凯瑞 | |

- 有恒七分 达观三分26
——记新华社外事局离休干部陈萍
- 异乡不忘赤子心 归侨永记华夏情32
——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离休干部陈秋云
- 以笔为戎绽芳华 心系侨联献真情38
——记北大医学部图书馆原馆长陈淑华
- 为中外友谊搭桥筑梁 以款款深情奉献祖国43
——记中国侨联原生产福利部负责人陈怡祥
- 花开不败 革命者永远年轻49
——记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原三等秘书杜娟
- 平生五色线 愿补舜衣裳54
——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何访拔
- 倾心舞台服装设计 我将一生献给幕后59
——记中国歌剧舞剧院离休干部胡青
- 倾注半生心与力 中国声音传他乡65
——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缅甸语原播音员黄明生
- 天地有正气 杂然赋流形71
——记国家安全部离休干部黄荣华

| | |
|-------------------------|-----|
| 舍身抗日巾帼志 丹心报国赤子情 | 77 |
| ——记通州区图书馆原副馆长黄淑英 | |
| 一生结缘艺术 鲐背初心未改 | 83 |
| ——记北京市文化局艺术处原处长江雪 | |
| 雨打飘萍少年勇 风雨不变赤子心 | 89 |
| ——记北京市建工局第一构件厂高级工程师蒋文雄 | |
| 一片丹心与国同梦 光阴不改赤子本色 | 94 |
| ——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离休干部李林 | |
| 心系下一代 我们身边的“活雷锋” | 100 |
| ——记国家发改委离休干部李越果 | |
| 岗位平凡 境界不凡 | 106 |
| ——记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离休干部林玉香 | |
| 超声世界 毕生耕耘 | 110 |
| ——记中国科学院声学所教授林仲茂 | |
| 何须浅碧轻红色 自是花中第一流 | 115 |
| ——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离休干部吕青 | |
| 勇入革命烽火 潜心化工事业 | 119 |
| ——记北京理工大学化工系实验室原主任马梦亭 | |

- 漫漫人生路 唯务实而已124
——记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公司离休干部孟惠芳
- 踏遍青山人未老 赤子之心寄“山水”129
——记原地质部水文工程司副司长农开清
- 胜利来之不易 和平更应珍惜135
——记原文化部离休干部舒曦
- 孜孜不倦 促进中缅友谊139
——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粟秀玉
- 大医精诚 在生命的天平上寻找平衡145
——记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孙立华
- 赤诚爱国 致力侨务事业149
——记国侨办宣传司原司长王澄枢
- 追求真理洒热血 爱我中华心不改155
——记国侨办离休干部王明爱
- 老骥伏枥志犹壮 铁血丹心卫和平161
——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原武官巫志远
- 兢兢业业 一心为党发光发热167
——记国侨办办公室原调研员吴彩本

| | |
|----------------------------|-----|
| 致力机械振兴 传承血脉情深 | 171 |
| ——记原机械电子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肖增效 | |
| 心系高等教育 彰显报国之志 | 176 |
| ——记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教授谢衷洁 | |
| 献身艺术以明行 秋风歌咏以明志 | 181 |
| ——记中国电影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许南明 | |
| 心向艺术 一生相随 | 187 |
| ——记中影公司国外处亚非科原科长许蔚文 | |
| 我用一生证明 保证完成任务 | 193 |
| ——记中国旅行社接待部离休干部杨金 | |
| 信仰不灭 初心不忘 | 199 |
| ——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原宣传资料部经理叶瑞福 | |
| 中越联络的桥梁 中越关系的见证者 | 204 |
| ——记外交部亚洲司原副司长张德维 | |
| 平凡如斯 一心为党 | 210 |
| ——记国侨办离休干部张淑英 | |
| 赤子心系祖国 一生投身水土 | 215 |
| ——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文正 | |

一生奋斗 做祖国的螺丝钉220

——记北京市无线电元件六厂离休干部张衣霞

终生奉献全无悔 夕阳余晖别样红226

——记国务院侨办离休干部庄钦华

时代先锋

(以姓氏拼音为序)

退思静品得失处 仁心精术为良医232

——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安友仲

深耕学术之师长 建言献策之大家238

——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

迎接新时代 播种新希望243

——记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心主任曹晓风

立足科技 圆“医疗强国”梦248

——记北京推想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宽

志存高远 长风破浪254

——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

燕园情 中国梦259

——记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龚旗煌

| | |
|-----------------------------|-----|
| 精准测绘天下图 心中不忘桑梓情 | 264 |
| ——记天下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关鸿亮 | |
| 国土之才 君子之德 | 270 |
| ——记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黄锡璆 | |
| 坦然面对意外 不断超越自我 | 275 |
| ——记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黄岩谊 | |
| 大医精诚 一生守护中国“心” | 281 |
| ——记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磊 | |
| 风雨兼程 不忘初心 | 286 |
| ——记鑫桥联合金融服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然 | |
| 汇聚海归精英 打造物联网数据“托管地” | 291 |
| ——记罗克佳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玮 | |
| 致力中国智造 助力健康中国 | 297 |
| ——记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廖洪恩 | |
| 揽天下英才 展报国之志 | 302 |
| ——记华夏国际人才研究院院长陶庆华 | |
| 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 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 | 308 |
| ——记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 | |

- 三重身份 一颗红心314
——记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琳达
- 玉汝于成 激流逐光320
——记北京工业大学激光工程研究院博导王璞
- 赤子之心 回国立业326
——记北京睿诚海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跃驹
- 在人为英杰 与国作祲符331
——记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研究员魏英杰
- 孜孜不倦科研报国 点点心血勇攀高峰336
——记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吴德胜
- 博学慎思 明辨笃行342
——记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医院研究中心主任肖蓓
- 创造中国一流晶体 承载国人复明事业347
——记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解江冰
- 百舸争流 奋楫者先353
——记格物致和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许俊泉
- 习于智长 优与心成358
——记国科物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易卫东

| | |
|-------------------------|-----|
| 攻科研硕果累累 育英才桃李芬芳 | 363 |
| ——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学教授张涛 | |
|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赤子丹心终报国情 | 368 |
| ——记新博医疗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磊 | |
| 留学报国情 十年苦创业 | 373 |
| ——记安进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伟 | |
| 后 记 | 379 |



蔡演威，男，1926年生，泰国归侨，曾任中央首长专机飞行队大队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热血铸军魂 雄鹰傲苍穹

——记原中央首长飞行队大队长蔡演威

毛泽东主席一生大概坐过60次飞机，第一次坐飞机是1945年从延安到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最后一次是1967年离开武汉。为毛主席开过专机的机长有三位，而其中开过最多次、时间最长、信任度最高的专机长，便是广东丰顺籍客家人、泰国归国华侨蔡演威先生。

求学路坎坷

蔡演威，1926年出生于丰顺县汤坑镇屋场村。因为父亲、叔父在曼谷开设医院药房，5岁时随母亲远赴泰国定居。此时蔡家已是当地望族。蔡演威的大哥蔡演强是留德医学博士，在曼谷开设药房和诊所，后来在一位经营有方的德国医生支持下，也开了医院，其医德深孚众望，事业上颇有建树。



青年时期的蔡演威

蔡演威在曼谷一所华文学校读书。大哥蔡演强十分重视他的学业，家中有小轿车，却要求他每天走路上学。大哥跟他讲：从小就要读好书，有文化才有本事；要锻炼好身体，能吃苦方能做事。蔡演威也自觉自勉，不仅各科成绩优异，而且身体强健，

参加球类比赛常获全校冠军。他热爱运动的习惯，一直保持至今，80多岁时还参加篮球比赛。

抗日战争爆发后，泰国的华文学校被查封、停办，蔡演威被迫离开了学校。为了让蔡演威有继续读书的机会，蔡演威的堂兄蔡演雄把当时年仅13岁的他送回国，并在上海读中学。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中泰交通受阻，蔡演威和泰国的亲人失去了联系，由于经济拮据，无力支付学费，1942年，蔡演威辍学了。1944年，蔡演威一位同学的兄长介绍他去一个地方，在几位朋友的引荐和推动下，蔡演威辗转来到解放区。

1945年5月，蔡演威到了安徽解放区的新四军第七师，成了抗日军

政大学第十分校第三队的一员，继续上学。在那里，他看到共产党“这么大的官竟然没有架子”。在党的宣传教育下，蔡演威参加了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由于其在历次战斗中表现勇敢、机智，又有一定的文化，蔡演威很快就由新四军的普通士兵，变成了首长的得力文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解放军部队要建立航空学校，蔡演威所在的师部要推荐10个名额，参加航校学员的选拔，蔡演威在严格选拔中脱颖而出，进入了解放军在东北的一所老航空学校，学习修理飞机技术，经过四年的努力学习，他顺利拿到了飞机机械师资格证书。

热血铸军魂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要培养一批自己的飞行员。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迅速组建了六所航空学校。因为志向是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在得知部队要招收飞行员的消息后，蔡演威非常兴奋，想尽办法到北京找老首长请求批准。经过不懈的努力，1950年初，他如愿参加了位于济南的解放军第五航空学校第一期飞行员的培训。当时执教的是来自苏联的教官，名叫鲁泰，他十分赏识聪明好学的蔡演威，而蔡演威也没有令他失望，在从初级教练机到中级教练机的系统学习中，有飞机机械师知识的蔡演威成绩特别优秀，一般学员要训练200多个起落才能放单飞，而他只训练了72个起落就第一个放单飞。鲁泰曾赞叹道：“我从未见过学飞这么快的人！”

1950年10月底，蔡演威以全优的成绩从航校毕业，开始不断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多年的飞行梦终于实现了！

通过几年的飞行考验，蔡演威高超的飞行技术引起了空军首长的注意，1956年，空军为组建中央领导的专机大队，举行了一次数十名优秀飞行员的飞行考试，考官是刘善本（原国民党空军的优秀飞行员，为反内战促解放，驾机投奔了延安，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也

是新中国空军的奠基者)。刘善本对航校每个学员的情况都了如指掌。蔡演威凭借过硬的技术、稳定的心态和应变能力，综合成绩排在第一。很快，蔡演威被确定为中央领导专机大队飞行员的首选。然而，在看重政治背景的二十世纪50年代，出身地主兼资本家，又是泰国华侨的蔡演威，政审结果是“待查”。考核成绩和政审结果报到空军司令刘亚楼处。

为保证领导人安全，空军司令刘亚楼亲自试飞领导专机。蔡演威是刘亚楼试飞的美制C-47客机的专机长，曾陪他到部队去检查各种飞机事故，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所以，刘亚楼对蔡演威的飞行技术、心理素质和作风为人都非常清楚，坚决选用了他，很快又破格将他提升为中央首长专机飞行大队的大队长。

因为高超的技术、过硬的素质和正派的作风，蔡演威常被委派负责当时最艰难的任务，包括主席专机、首长专机、赈灾、投粮……他全部安全、正点、正地、准时完成任务，没有出过任何事故。1960年，轰动全国的“抢救61个阶级弟兄”大救援行动，就是蔡演威指挥的；共和国第一位女专机机长汪云也是他手把手培养出来的。

作为专机大队的飞行大队长，首长的情况也是必须实时掌握的。蔡演威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坐飞机，有三种表情：第一种是一手拿烟，一手拿笔，专注地批阅文件，如置身平地的办公室中，很沉静，有时也会凝神地望着飞机窗外，久久沉思。第二种是一上飞机，就在睡眠专用床上休息。他喜欢睡硬板床，所以上面会铺一张合成的木板。第三种是和负责不同领域的机要秘书分别持续交谈、说事。

蔡演威对一次化险为夷的飞行印象深刻。那是1957年7月1日上午，党的36岁生日那天，当时坐专机的是毛泽东，刘亚楼陪同。8点半左右，4202号飞机由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到了徐州，飞机完全进入云中飞行，下起了小雨，快到南京时开始下起了大雨。到杭州时大雨滂沱，窗外能见度极差。在杭州开始下降时飞机有一点颠簸，因飞机正处在积雨云和雨层云中。在高度60米时，机场雨下得非常大，地面能见

度不到1公里。高度表报30米的时候，勉强看清地面，跑道这才可见。蔡演威沉着应对，精准判断和处置，飞机着陆接地很轻、很平稳，顺利完成此次飞行任务。

刘亚楼来到前舱，高兴地挽着蔡演威的手臂向客舱走去。毛泽东站起来，高兴地说：“今天很舒服，就是看不见外景。”刘亚楼向他介绍：“今天给您开飞机的机长是我们的专机大队长蔡演威，是一名归国华侨。”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和蔡演威合影

亲切地跟蔡演威握手，说：“啊，华侨，他们很爱国的！很多华侨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到了延安，他们都很爱国。”两个“爱国”让蔡演威心中温暖。

蔡演威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开飞机时的一次经历。“刘少奇主席每次下飞机后总要亲切地与全体机组人员握手致谢。有一次较匆忙，与几个机组人员握手后欲离去，细心的王光美及时发觉未与机长蔡演威握手，立即招呼刘少奇主席回来，刘主席马上回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致以谢意和歉意。”

寸心寄华夏

从1961年始，蔡演威不再开领导人专机，主要负责空军飞行组的指挥和教学工作。他曾指挥机组出色地完成了很多危、难、紧、急的飞行任务，并为中国空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飞行人才。

作为领导人的专机长，蔡演威为飞行事业奉献了青春，而十几年的

绝密飞行，让他根本无法顾及远在泰国的双亲和家人。1997年，蔡演威和家人回泰国祭祖、探亲，念及父母，感慨万千。富甲一方的亲戚希望他留在泰国生活，他婉拒道：“我在中国挺好的。”

回首往事，蔡演威最愧疚的是无法守在父母身边，对他们尽孝。在父母坟前拜祭时，80多岁高龄的蔡演威长跪在墓前，悲恸不已，口中呜咽着说：“爸爸、妈妈，二老在世时，不孝儿未能在左右侍奉，二老离世时，孩儿都不在身边，深负养育之恩，真愧对二老，但忠孝难两全，请二老宽恕。爸爸、妈妈，现在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请二老放心安息。今后，儿子还会常回来看望二老……”在场的陪同人员无不为之动容。



蔡演威的飞行特级证章

2015年3月25日，蔡演威第四次回到老家丰顺，拜祭蔡家祠堂。他来到已经荒废的老家大门前，指着门口的池塘说：“这里原来有一棵番石榴树，我小时候喜欢上去玩耍，现在没了。”言语间虽轻描淡写，却仍透露着对过往的追忆与怀念。

红光满面、齐整庄严、腰杆笔直，一身绿军装，胸前佩戴闪亮的金翼徽章，上面有一个“T”字（特级飞行员的标志），一派昂然的军人气质，从不后悔回国，从不后悔参军，最骄傲地是加入新四军，抗日救国；最得意地便是如愿成为空军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在天空翱翔。这，便是如今已鲐背之年的蔡演威，虽不曾用言语表达爱国之情，却一举一动都诠释着对祖国的眷恋与热爱。

（作者：张鉴之）



陈德鸿，男，1928年生，印尼归侨，曾任中旅集团副董事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忘我投身祖国建设 勇做归侨避风港守护人

——记中旅集团原副董事长陈德鸿

陈德鸿，他将毕生奉献给了祖国的侨务事业，曾赴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日本等国生活工作，在配合国家安置归侨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是改革开放后制定和落实涉侨相关政策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一代又一代侨胞无比熟悉的避风港守护人。

颠沛年代 归国搭起华侨之家

陈德鸿七岁时，尚没有读小学的他因时局动荡，跟着家里的姑丈去了印度尼西亚巨港。在那里受华侨资助的巨港第八小学完成了最初的学业。

日本入侵印度尼西亚后，为了求生，陈德鸿一家又流离去了新加坡，在那里同样是华侨资助的新加坡华侨中学（也就是现在的新加坡华中）读完了初中与高中。中学时期，朝气蓬勃、思想逐步丰满的陈德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外围组织，积极投身革命，参与共产党的一些地下进步活动，开始把爱国主义思想付诸实践。

日本投降之后，印度尼西亚当地生活状况开始逐步好转，陈德鸿便在高中毕业的暑假回到了印尼巨港。不出多时，1952年，陈德鸿听从国家安排，途径香港回到大陆广州。当时被安置在一个广州华侨招待所“水母弯”，现在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华侨招待所。陈德鸿奉命开始在这里工作，主要负责接待从世界各地归国的华侨。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艰难的环境下工资并没有着落，但陈德鸿丝毫没有介意，反而乐在其中，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单纯的他总是没有什么复杂的个人想法，国家需要自己去哪里他就义无反顾上前，他认为在那样的时代，个人的一生投身国家的集体事业是光荣又应当的。

1953年，组织安排陈德鸿等人从广州前往北京。于是他带着一些从缅甸、泰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归国的华侨，从广州坐船上到武汉，再辗转坐火车去到北京，开始进入祖国的核心。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侨生”，组织安排他们到各个地方读书，中文比较好的，被安排到国际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工作，在国外工作比较好的，分到侨委，有的还被安排到著名的华侨农场。全国现有华侨农场84个，其中广东23个、广西22个、福建17个、云南13个、海南5个、江西3个、吉林1个。全国84个华侨农场中，有41个系五六十年代为安置马来西亚、越

南、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等国8万多归侨而设立的，有43个系七十年代末为安置越南难侨而设立（越南难侨共约26.3万人，其中华侨农场安置16万人，农垦、林场安置7万人，其余为社会分散安置）。华侨农场具体有自己特点，一是归侨侨眷集中，他们来自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社会制度生活体验；二是绝大多数归侨是被迫离开异国的，在原居留地还有亲戚、朋友，他们与海外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是华侨农场由于政策性、社会性负担较重，发展的步伐不快；四是广大归侨的生产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他们迫切希望加快华侨农场的改革和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对华侨农场的改革和发展十分关心，1985年在《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了华侨农场要走我国农村改革的道路，彻底改变现行农场的管理体制，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切实扩大生产经营者的自主权，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特别是归侨的积极性，促进华侨农场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能力，确实提高归侨的生活水平。

一直到1969年，陈德鸿基本上做的都是接待华侨组织、带领国庆看展的工作。1969年到1977年，他被安排至江西省进贤县的中央侨务委员会五七干校学习生活。回忆起五七干校的时光，老先生总是觉得十分快乐，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学校，还不止一个学校，涵盖中小学，通常华侨和家属担任学校老师。陈德鸿先生在那里主要负责管理学校仓库。每年春节得到休息回北京探亲。

改革关头 奋争国际来注权益

从五七干校回来以后，他被分配到北京中国旅行社。在这里，是陈德鸿老先生为国家贡献最集中的时期。1959年，中印关系恶化，印度尼西亚发生严重排华事件，华人财产被掠夺，流离失所。“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中国成了他们的向往之地，很多印尼华侨要求回国。中方经与印尼协商，派轮船到印尼接回一批华侨，让他们参与国家建设。陈德

鸿便在这一关键时期挑起了接待东南亚排侨的重任。

1979年，由于国家的发展、政策的慢慢宽松，大批华侨开始回国探亲。八十年代，沐浴了改革开放春雨的内地民众也开始建设自己的幸福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收入的明显增加，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这些曾经让一代人为拥有他们而倍感骄傲的三大件早已变得不再稀奇。在家庭建设上，开始向电气化迈进，追求的“三大件”又变成了冰箱、彩电、洗衣机。政策规定可以带三大件回国。与此同时，1978年6月，邓小平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提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由此开启了新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翻开了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新篇章。国家委托中国旅行社办好新政策规定下的出入境事宜。这些时代的革新，落到陈德鸿肩上，成为他热血投身圆满完成的事业。

后来，国务院委派中旅负责接待日侨，陈先生依然成为主要负责人。当时的菲律宾归侨高音先生，被任命为中旅集团总经理，陈德鸿是他的得力干将。这一次，为了改革开放三大件的采购工作更加顺利，他多次代表中国去到日本，跟松下、日立、索尼等公司谈判免税、订货的事宜，对于中国日后的进出口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逐步恢复了和各个国家的外交关系，陈德鸿作为中旅负责人，又是年少时曾旅居新加坡的华侨，见证了历史性的中国与新加坡首航仪式。

世纪更迭 坚守经营生涯事业

改革开放以后，中旅集团成立，陈德鸿担任总经理和副董事长。除了已有的进出口工作外，还成立了中旅汽车公司、遍布全国的中旅饭店、华侨大厦、丽都饭店等等。陈先生开始主抓公司经营，建立起各省的华侨饭店，并带领翻新。比如现在矗立在三元桥的中旅大厦，就是陈先生负责统筹建立的。

尽管当年陈德鸿先生曾多次参与其会议讨论的香港中旅社现已和中旅集团各为一个组织，但陈先生的贡献却给香港中旅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今日，香港中旅社仍然坚持将每期《中旅月刊》赠予寄送给陈老先生，感谢他做出的贡献。



陈德鸿工作照

1994年前后，陈先生退休。如今已入鲐背之年，陈德鸿老先生回忆起自己的人生充满感激。出生在动荡的年代，但因为心中始终牵挂祖国，坚信国家坚信党，把时代和国家赋予的使命作为人生追求，忘我投身归国建设，才能让他在时代的浪潮中成就了自己、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他也更加清楚地体会到，无论在哪个时代，祖国对华侨的关心和支持都是不变的，新时代的华侨们，更应该保留赤子之心，将侨之梦融入中国梦，随着新时代的风向继续前进。

（作者：冉乔月）



陈端，男，1927年生，泰国归侨，曾任外交部副司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一生为党 初心不改

——记中国驻毛里求斯原大使陈端

陈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次负重伤，每每回忆起抗战岁月，陈端眼里依然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常说：“我这一生做得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加入抗日队伍，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

少年壮志不可挡

陈端于1927年出生于泰国罗勇一个华侨工人家庭。其祖父、父亲、叔父在国内战乱饥荒年代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父亲陈记春同泰籍华裔刘亚花结婚，生5男1女，陈端为长子。

1934年，8岁的陈端随祖父回到故乡。翌年，在本村读小学，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教师中许多人是爱国进步青年，学校经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小学六年期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从沿海踏进内陆山区，轰炸、枪杀、掠夺，无恶不作。人民群众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由于海外侨汇中断，祖父母相继逝世，陈端由婶母照顾，当时家庭经济处在最困难的阶段，少年陈端只得协助婶母耕田种地、拾柴、捡粪、当临时工人以维持生计。

1943年，陈端高小毕业后，考进普宁县立师范学校。1944年年底，日军入侵内地，对潮汕腹地大举进犯，学校停课。早年便面对饥荒与战乱的他已懂得生活的不易，这些经历也在他心中埋下了爱国救国的种子，他立志要加入共产党，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1945年3月9日，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刚满18岁的陈端瞒着婶母偷偷申请加入游击队。入队之前，中队指导陈欣丰找他谈话：“抗日游击队需要日夜行军，经常吃不饱也穿不暖，还要上前线打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能扛得住吗？”

陈端坚定地回答：“指导员，我不怕苦，也不怕牺牲！现在家乡被日本占领了，到处杀人放火，老百姓只能提心吊胆过日子。我不愿过这种惨无天日的生活，眼下只有一条路，就是成为一名战士，把日军赶出中国！”

“如果婶母来部队要你回去，你会怎么办？”指导员进一步抛出难题。

“我决心已定，不回去，拖着我也不回去！”陈端斩钉截铁地回答。

指导员看到了陈端“天不怕地不怕”的决心与勇气，当即将他编入游击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第二班。自此，陈端正式成为抗日游击队的一员。

1945年6月14日，成为抗日游击队员才几个月的陈端，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战役——西陇之战。彼时，国民党军向游击队第三大队进攻未果，随即窜入赤水乡打家劫舍。他所在的第二中队埋伏在西陇伺机突击。当时，战士们拿的是马枪，火力分散根本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于是，班长命令战士们听命令后齐发“排头火”。从未上过战场的陈端，没有露出丝毫胆怯，他荷枪实弹伏在地上，听从指令沉稳应战。因在数次战役中沉着冷静、表现突出，陈端被任命为第二支队第一大队第二班副班长。不久，他在里湖战役再次立功，升任第二班班长……由于陈端的出色表现，1945年8月15日，陈端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韩江纵队主要骨干奉命北撤到山东烟台，组织决定陈端与张希国留在当地，安排到惠来县梅林中学（今属普宁市）读书，秘密从事党建工作。由于当时潮汕形势恶化，为防止身份暴露，陈端两人离开学校，于1946年中秋前后南撤泰国。



陈端旧照

意志坚定，献身革命终不悔

1947年，国内解放战争形势大好。刘、邓等三路大军千里挺进中原，战争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1948年春，陈端等人接到指示，动身回国参战，协助推动全国解放。

归国后，陈端奉调进入大北山区，参加由中共领导建立的武装部队——潮汕人民抗征队。历任长林武装连队副中队长、北山区第8大队第2中队队长。

从1948年4月回国参战，到1949

年10月汕头解放，整整18个月里，陈端带头冲锋陷阵，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斗达12次，为潮汕人民的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12次战斗中，大溪乡坎头圩战役和第二次围攻普宁县城洪阳之战尤为激烈。他在这两次战役中也身负重伤，险些丧命沙场。

1948年12月5日，敌军广东省保安16团800多人，企图向游击区揭阳河婆进犯。其中一个营已进驻坎头圩，指战员决定以第八大队四个中队300多人兵力在坎头阻击围歼敌人。陈端负责率第二中队占领坎头西北侧小山，攻击圩内之敌。

战斗于上午11时打响。当时，第一中队正在抢占坎头圩口的一个山头，不料圩外的大股敌人已抢先占领了制高点，正集中火力向第一中队阵地轰击。在危急关头，第二中队迅速抢占了另一个小山头，用火力掩护第一中队撤退。此刻，敌人疯狂掉头集中全部火力轰击第二中队阵地，一时之间，枪炮声天震地骇，满目只见硝烟和尘土。

突然，中队长陈端转身大声喊道：“张达牺牲了，你赶快去接过他的枪！”话音刚落，他也被敌人的重机枪射中了，子弹穿过臀部打断了他的大腿骨，陈端就倒在了血泊之中……马戎迅速上去用绑带为他扎紧伤口，随后，接过他的枪，加上自己和战士张达的枪，一人背三支枪，背不动，就叫战士郑明一起轮流背陈端撤退。当时步履艰难，每走动几步，陈端的大腿就悬空扭动起来，他一边痛苦的呻吟，一边还不停安慰战友：“不要紧不要紧，共产党员负伤是光荣的，牺牲是光荣的……”直说得战友热泪滚滚而下。

在民兵的协助下，陈端被送往榕树楼北山战地医院。医生诊断，子弹从左臀部贯通、右股骨折，若伤口化脓，恐有生命危险，必要时须“断腿保命”。陈端听后，坚决表示：“军人靠的就是这双腿打仗，我宁死不断腿！”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力，加上一身好体魄，陈端的伤势渐渐好转，这才保住了双腿。

为了鼓舞广大战士的斗志，《团结报》随军记者马戎特地写了一篇报道《比号角还响亮的名字——陈端》，发表在《团结报》上。陈端的

英雄事迹很快传遍了整个游击区。民兵们无不知道陈端这个名字，每每提及，总是竖起大拇指：“陈端是人民的好儿女，革命的好战士！”。

陈端直至1949年春伤愈申请归队，调任闽粤赣边纵队第2支队司令部人事参谋、军政训练班政治指导员、2支队3团营营长。

同年7月，陈端率部在围攻普宁洪阳镇时，不幸再次受伤，子弹从右胛骨骨穿至肺部锁骨下，险些丧命。当时正下着大雨，两位战士用雨衣将陈端裹好，准备将他抬走。看到战况激烈，陈端使出全身力气推开扶他的战士，大声道：“别管我，继续进攻！”战士们在连长的命令中，再次向敌军发起进攻……

经过十天的治疗，陈端伤愈归队后，1949年10月9日，又参加了涂洋之战。

从1945年春到1949年潮汕解放，这五年间，陈端前前后后参加了21场战役。期间，陈端两次身负重伤，身上留下6处弹孔痕迹，右腿因骨折短了一寸二成跛足。涂洋一战后，陈端的抗战生涯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70多年后，陈端身上的那6处弹痕仍然触目惊心。那是战争留给他的印记，也是他爱国之心的证明。

怀揣使命，初心不忘

陈端两次光荣负伤，不得不离开战斗第一线。每每回忆起抗战岁月，陈端眼里依然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常说：“我这一生做得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加入抗日队伍，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

离开战场后，陈端没有忘记报国的初心选择安逸的生活，他接受派遣，四处奔波，在历任岗位上都尽职尽责。

1950年3月，陈端转业到潮汕专员公署领导的潮汕农林干部学校。1953年春，到粤东第一师范农场任场长。1955年到国营葵潭农场，任副场长、场长兼党委书记。1960年夏，调任中共普宁县委副书记。1962

年春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农林水办公室生产处副处长。

1964年夏调到北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外司专员。同年10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一等秘书兼领事部主任。1968年回国后，到江西省进贤县中侨委“五七”干校任生产组长。1970年调外交部“五七”干校办公室工作。1971年调任外交部总务司行政处长、行政司副司长。

1975年冬，陈端调任驻上沃尔特（现改称布基那法索）大使馆政务参赞。1982年春，奉调回国任外交部行政司副司长。1983年3月又被派任驻缅甸大使馆政务参赞。1985年5月，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毛里求斯特命全权大使。1988年5月，任期满回国。

1990年12月，陈端在北京办理离休，被聘为汕头经济特区顾问。1993年，被选为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副理事长，被聘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高级顾问。陈端常说，“我关注家乡发展”，被聘为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后，陈端更关注家乡的动态和发展变化。

如今已经九十三岁的陈端每天笔耕不辍，他想将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他总是说，欣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中华盛世，就要健健康康地永远做党的人。

离休30年来，陈端从不居功自傲，“离而不休”是他离休后的真实写照。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为党工作一辈子。

（作者：王楠）



陈金銮，女，1928年生，菲律宾归侨，曾任原广电部菲津宾语组组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传播中国声音 讲述中国故事

——记原广电部菲律宾语组组员陈金銮

上世纪50年代末，广电部要组建对菲律宾的国际广播，当时国内精通菲律宾语的专家极为短缺，从小生活在菲律宾马尼拉的陈金銮被选中，从建工部抽调到广电部菲律宾语组，开始了长达30年对菲律宾的国际广播事业。由于菲律宾语发音十分地道，陈金銮曾被菲律宾参议员点名接见。

书山坎坷，积极进取，求学路漫漫

陈金銓 1928 年出生于菲律宾马尼拉。早年菲律宾比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自然资源优越，陈金銓的爷爷遂带着她的父辈从福建前往菲律宾生活。她的父亲是商人，在马尼拉经营大米，母亲是全职太太。由于祖上遗产丰厚，陈金銓家的生活较为优越，在 11 个兄弟姐妹中，陈金銓排行老三，也是大姐。

在菲律宾成长的陈金銓从小就学会了菲律宾马尼拉的方言，后来由于菲律宾的方言众多，为了统一语言，马尼拉附近八个省份的方言成为了菲律宾的通用语言，这也为后来她回国从事对菲律宾的广播工作提供了先决条件。

当时生活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主要受到两股势力的影响，一种是从事进步事业的组织的影响，另一种是国民党当局派驻的大使馆的影响。1934 年，6 岁的陈金銓进入国民党办的小学，主要学习中文课本，后转到左派设立的联合中学接受进步思想。然而好景不长，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日军侵略菲律宾，陈金銓被迫辍学。为保周全，陈金銓全家离开马尼拉，到父亲的朋友家中避难 3 年。

抗战期间，陈金銓参加了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斗争和国内的进步活动，同时还参与唱歌、演话剧等文艺活动激励抗战。也是在这个时候，她结识了她后来的丈夫王澄枢。

1945 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菲律宾国内形势好转，陈金銓回到马尼拉，到进步派设立的华侨中学复学，从事进步活动。有一次，她在街上和朋友们讲述进步活动时，被菲律宾的特务跟踪偷听，但她们讲的是闽南语，菲律宾特务听不懂，便对陈金銓无可奈何。

后来，陈金銓进入菲律宾马布亚工程学院学习建筑工程，上午学习专业课，下午兼职做家教，帮助一些只会讲菲语的华人小朋友和学历低的老人学习汉语，补习文化知识，以赚取生活费，同时还积极从事进

步活动。6年后，陈金銓大学毕业，顺利进入一家建筑公司从事房屋设计工作，主要通过一些私人的建筑工程设计项目以维持收入。那时，陈金銓吃住在家，同时拥有固定的收入，生活还算不错。

1956年，陈金銓夫妇经香港中转，最终回到祖国大陆。

发挥优势，勤勉工作，致力对菲广播事业

1956年11月，陈金銓和丈夫从马尼拉搭乘飞机去往香港，经深圳来到北京。回国后，她的第一份工作被安排到了建工部技术情报局，从事建筑工程项目翻译、建筑工程图纸设计等工作，并参与设计了建工部的办公大楼。

当时，因广电部要组建对菲律宾的国际广播，需要从各单位抽调菲律宾语专家，但国内会讲菲律宾语的人才十分稀少，陈金銓出生于马尼拉精通菲律宾语，于是1958年，她被调入广电部菲律宾语组。

陈金銓的工作有三项：一是音乐编辑，挑选包括当时流行的《五朵金花》在内的许多优秀歌曲向菲律宾人民进行广播；二是整理国内重要的时事新闻和成就信息等，撰写中文播音稿，提供给印尼语组、缅甸语组和泰语组等进行翻译，进而向世界各地人民进行广播；三是将自己撰写的播音稿翻译成菲律宾语，然后向菲律宾人民进行广播，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宣扬中国文化。



陈金銓夫妻参加“金婚庆典”

由于对菲律宾的国际广播信号质量很高，声音很清晰，发音很地道，很多菲律宾人不相信电台是在北京播音，甚至一度怀疑播音地点隐匿菲律宾之中。一次，一位菲律宾女参议

员到北京出差，期间专门点名要见陈金銓等广电部菲律宾语组的成员，看看播音员的菲律宾语水平是否地道。由于工作十分认真，陈金銓多次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与肯定。

直到1987年，陈金銓因病离休，结束了长达30年的广电部菲律宾语组组员的工作。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陈金銓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陈金銓再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对此，陈金銓说到：“这是国家荣誉，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能够获得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我感到很高兴，很光荣！”

（作者：信德源）



陈凯瑞，女，1924年生，缅甸归侨，曾任职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救亡图存 丹心向阳

——记中国科学院离休干部陈凯瑞

她是缅甸华侨战工队的一员，心系家国，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活动；她翻山越江，历经万险回到祖国怀抱；她满腔爱国热忱，情系缅甸归侨，一片丹心向阳。原缅甸华侨战工队队员、中国科学院离休干部陈凯瑞在祖国内外的砥砺前行中彰显出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勇于奉献、不屈不挠的精神缩影。

情系家国 抗日宣传勇担当

抗战爆发后，陈凯瑞随父母辗转去到武汉，宜昌，最后到达重庆。从中学时期开始，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陈凯瑞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去医院慰问演出、参加示威游行、参与募捐活动等。这期间结识了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如李凌，赵汎等。

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中，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不得不转移到其它各地继续参加工作。当时的云南省由龙云主政，国民党的势力尚不能完全控制云南，因此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就转移至此。陈凯瑞便跟随他们转移到昆明，先后在云南大学附属中学，路南中学教书，而后又转战到缅甸继续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1942年，缅甸华侨战工队成立，陈凯瑞成为了其中一员。

陈凯瑞说：“对我来说，战工队是革命的摇篮，我是从这里起步，接受教育，走向革命之路的。”

在回忆缅甸的抗日宣传活动时，陈凯瑞表示：“在缅甸，我们是异国人，来自五湖四海。演出前我曾怀疑是否会因语言的隔阂而影响演出的效果。后来我确信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民族之间的感情是可以彼此理解和沟通的。我们在曼德勒的演出就证明了这一点。”

缅甸气候炎热，那里没有像样的剧场，只能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演出。战工队经常要忍着酷热上台上表演，但在全体队员的辛勤努力和付出下，演出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陈凯瑞印象深刻的演出是《黄河大合唱》和一台自编自导的话剧《团结起来》。《黄河大合唱》以其磅礴的气势，充满革命激情的歌词和雄壮优美的曲调，博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巨大地鼓舞了缅甸华侨和当地人民的抗战士气，演出不仅在当时轰动了曼德勒，也对缅甸华侨爱国歌咏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

话剧《团结起来》则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占领区的残酷暴行。

当演到各种不同肤色的妇女都遭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忍的蹂躏侮辱时，台下响起了一片愤怒之声，台上表演者和台下观众的情绪顿时交融在一起。陈凯瑞说：“我当时还真担心台下的缅甸观众和华侨观众要上台来揍扮演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演员呢。我们战工队有一些同志经历过南京大屠杀和重庆的大轰炸，有的还经历过沦陷区的悲惨生活，所以演出时演员们的感情真实，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感动了数以千计的观众，许多妇女都哭了。”最后，全剧号召不同肤色和不同民族的人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观众的情绪引向了团结抗日的高潮。

翻山越江 历尽艰险回祖国

后来缅甸战局恶化，领导根据当时形势作出了分析，决定撤退回国，从缅甸回云南的路程是艰苦而危险的。

战工队到达云南边境时，日本已占领了我国西南的部分城镇。为了绕过敌人的封锁，不得不翻山越岭，其中包括白雪皑皑的高黎贡山和大雪山。陈凯瑞表示翻越雪山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是初春季节，在祖国的西南边陲，气候异常炎热，但可以看到远处的高山覆盖着积雪，战



陈凯瑞生活照

工队只有越过巍峨的雪山从才能到达怒江畔。

一大早，陈凯瑞一行人就向雪山攀登，越往前走路途越崎岖难行，看着茫茫路途，大家归乡心切，雪山似乎离得很近，但是要走近它却又那么遥远，可望而不可及。随着海拔不断升高，气候也变得寒冷了。直到暮色苍茫，陈凯瑞一行人才爬到山峰，这时雨雪纷飞，寒风凛冽，战工队的衣服都很单薄，不久就湿透了。一路上没有足够的食物，饥寒交迫之下，战

工队没有停止步伐，在黑夜里，毅然前行。由于之前下了雨，道路泥泞，下坡远比上坡危险多了，加上夜深视野受阻，有时只能手攀枝条坐在地上向下慢慢滑行。陈凯瑞心想：这时多么希望能看见农舍的一缕炊烟和一星灯火，多么希望能找到一处避风挡雪的地方，可以暖和一下冻僵的身体，把湿透的衣服烤干，如果还有一碗热汤面充饥那该有多美啊。可是山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黑暗和荒凉。

正在失望之际，战工队似乎听见了一个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难道是山涧的急流吗？不，这是奔腾的怒江在呼啸。陈凯瑞顿时精神振奋，疲劳消失，陈凯瑞相信只要下了山，就能到达怒江畔，等渡过怒江，最艰苦的一段行程就算结束了。

陈凯瑞说：“正因为有了坚强团结的集体，整个行程中，才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胜利回到祖国。”

归国之后，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将陈凯瑞一行人安排到各个学校去工作。陈凯瑞回到云南，在路南中学教书。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又回到重庆，在民生公司学校教书。1948年去到香港，在“女青年会劳工部”工作一年后，到华北大学学习，学习尚未结束又奉命调到了中南海搞人事工作。1953年开始，到中国人民大学俄语专业学习四年，毕业后在北京理工大学任教两年。之后，随丈夫去苏联工作两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从事秘书工作，1984年离休。

陈凯瑞多次参加缅甸归侨联谊会的活动，多次在家中接待在京及外地战工队员和老朋友。2015年7月15日，虽已年过九旬，仍前来参加北京市侨联所属13个归侨社团联合举办的抗战70周年大会的纪念活动。

归国华侨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爱国群体，自辛亥革命至今，归国华侨奏响了爱国主义的嘹亮凯歌，一位位如陈凯瑞一般的归侨，在祖国内外的砥砺前行中彰显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勇于奉献、不屈不挠的精神缩影。

（作者：许馨丹）



陈萍，女，1925年生，菲律宾侨眷，曾任职于新华社外事部（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有恒七分 达观三分

——记新华社外事局离休干部陈萍

青少年时期的陈萍，曾在延安中央军委三局学习、工作，后调至新华社。1952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学习，1956年派驻越南新华社河内分社，回国后在新华社外训班工作；1960年学习西班牙文，毕业后调总社外事部（局）工作至离休。一生的时间都与革命、新闻和华侨紧紧

相连，在这背后，作为新华通讯社原代理社长王唯真的妻子，陈萍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故事，见证了怎样的历史时刻，如何在风雨飘摇中坚定不移，又如何与归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让我们走近这位千帆过尽的革命前辈，聆听那些沉淀在岁月中的艰险与荣光。

激情燃烧的红色青春

陈萍出生于河南沁阳，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依靠做手工和打零工赚钱补贴家用。陈萍在家中行七，因兄弟姊妹多，即便父母整日劳作，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她出生那年家乡闹水灾，全家逃难到山西晋城投靠亲戚，一路上颠沛流离，她染上恶疾，险些丧命。陈萍六岁时母亲病故，以至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从那时起，她与哥哥姐姐们分工，协助父亲共同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彼时的旧中国暗无天日、侵略者横行，哥哥姐姐们相继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在他们的影响下，父亲带着最小的两个孩子——陈萍和妹妹，经历艰难曲折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也融入到革命队伍中。

不久，陈萍与一批干部和烈士的子女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到延安。那时年仅12岁的她，上边区中学，去通信学校，毕业后在军委三局工作，后又响应新华社补充专业人员之需被抽调到新华社。战争期间，医务人员奇缺，延安号召女青年转行到医疗战线工作，陈萍立即听从召唤，和不少女青年先后到延安中央医院学习，并担任了妇产科助产士，直到胡宗南进犯延安，医院缩编，



王唯真和陈萍在延安唯一的合影
(前边的小八路是陈萍大姐的孩子)

才回到新华社，跟随大队人马撤离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开展工作。

时刻准备着的革命伉俪

延安时期的陈萍正当花季，青春在学习和工作中匆匆走着，生活过得艰苦、紧张而快乐。她怎么也没想到，爱神会悄悄地降临到头上。从那时开始，她和王唯真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六十多个春秋。

得知王唯真是为参加抗战从菲律宾漂洋过海辗转数月来到延安的华侨，陈萍心里充满了敬佩和喜爱。自此，命运的红线将陈萍的爱情和事业与王唯真紧密相连。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全国人民都在为来之不易的和平欢呼，蒋介石却开始打内战，命令胡宗南率部进攻延安。中央机关各部门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有组织地分批撤出延安。1947年初，陈萍夫妇跟随新华社从延安转移到了晋察冀。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新华社的大队人马又随中央从晋察冀经西柏坡到了北平。

1956年，王唯真被派往越南民主共和国，担任新华社驻河内分社



王唯真与陈萍在越南工作期间

首席记者、分社社长兼人民日报驻越南记者。当时越南刚刚打败法国殖民者，建立了人民政权，面对敌人的伺机反扑和北方的建设，工作千头万绪。几个月后，陈萍也被派到河内新华分社，负责每天向总社传送分社记者们采访的新闻稿件，工作紧张而忙碌。那时越南南方还未解放，北方百废待兴，已经建交的中越两国处于相互了解和支援的密切合作时期。王唯真带领河内分社的记者们以超乎常人的努力，采写了许多精彩的通讯、特写和

消息，由陈萍发回北京。这些努力在促进我国人民更多地了解越南，促进中越两国更好地团结协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女儿王枫的记忆里，童年时耳边总是日日萦绕着母亲陈萍“‘新华社河内X月X日电’、‘逗点’、‘句点’”的朗读声，声声入耳，也点亮了女儿的新闻之路。

远赴巴西

1961年，中巴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巴西作为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由于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被超级大国觊觎并插手，国内各派力量之间的明争暗斗，渗透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政局十分动荡。巴西政权在摆脱各方困境的努力中派代表团来华表示，非常希望能与中国大陆往来，为巴西经济的健康发展寻求新的突破。王唯真随即作为特派记者前往里约热内卢，开辟新华社在巴西的新闻报道，为中巴建交开路。与此同时，陈萍开始学习西班牙文，准备到巴西配合王唯真工作。

两年的时间里，陈萍时刻关注着王唯真从巴西发回的大量消息、通讯和随笔，从中了解了巴西为反对大国政治干涉、军事渗透、经济掠夺和干预所进行的反政变、反控制，为保卫民族利益、维护国家经济自主和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等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也认识到我国记者在巴西开辟工作的危险性和深远意义。

1964年4月初，美国策动巴西政变的阴谋在几经挫败后还是得逞了，王唯真一行和中国派去巴西搞贸易、办展览的工作人员，被扣上“颠覆”和“间谍”的罪名遭逮捕入狱。经过中国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多方努力，陈萍连同其他被捕人员家属终于可以分批赴巴西探监。在狱中，陈萍避开特务，将新华社关于巴西事件的国际新闻简报和国内营救情况的信息交给王唯真，使狱中九人及时了解了祖国的营救措施和国际舆论，备受鼓舞，为里应外合地赢得这场外交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普通人”的一生

陈萍的革命生涯得益于全民抗战的大时代。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她走进了延安这个充满艰难而又光明的新世界，从此，在延安精神的熏陶下，她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仰。这种信仰成就了她后半生的坚定、顽强和不屈不挠。

不仅如此，革命洪流也将她一生的经历与爱人王唯真紧密相连在一起：参与新华社外事工作、配合爱人国外工作之外，还全力以赴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她的言传身教，传递着革命者的精神品质，也潜移默化地濡染、培养着孩子。女儿王枫评价母亲，“她是一个性情温婉，有耐心，且坚守信仰、不屈不挠的人，从未因困难退缩，从未动摇过理想和信念。”即使在那段黑白颠倒的日子里，王唯真被下放干校经受劳改和批斗，陈萍背负着流言蜚语、构陷、谩骂，直面着挑拨离间，也坚定地与爱人并肩，她说过：“我们在延安时期就相识了，我深知他的为人、他的信仰、他的坚持，他是好人，我决不会离开他。”

陈萍倾尽一生的心血，始终不渝地支持、信任和维护着王唯真，这种执着的信念不仅仅源自于爱情，更源自于她对与王唯真共同坚守的革命理想和对革命前途的期许。陈萍自认为“普通人”，然而伟大正是出自平凡。女儿王枫说，“我的母亲是老百姓中的一员和八路军序列中的普通一兵，她从延安走来，并没有那么高的职务，也没有那么显赫而辉煌的历史，但她经历了大时代的陶冶，绿叶般地融入了祖国的春天。她的普通正是千百万人求解放的缩影，她的平凡正如共和国大厦的基石那样无声与厚重。”

人立于世，便是由方方面面的社会角色构成，不同角色之间相互依存、互相补充，才得以完整。英雄也好，平凡人也罢，都是陈萍生命中不可缺失的部分，她坚定的信仰不仅支撑着自己经历了诸多艰难困苦的磨练，也深刻影响了后代的精神品位、观念和追求。

“不远万里从海外归来参加抗战、抵御外侮，为使积贫积弱的祖国强盛起来和国人一起奋斗、一起迎接光明。”这是陈萍对归侨群体的整体印象。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爱人王唯真多年来一直贴身保存的父亲的临别赠言，“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盖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老一辈华侨对后代的这番殷殷嘱托，成为陈萍和王唯真对华侨使命和责任的共同认知、信念与行动。如今，这振聋发聩的留言，已成为了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期许和叮咛，“为了祖国团结起来，不受任何外族的侵略和压迫，把美丽的中国建设得更加富饶，让中华民族更加强盛！”

（作者：普文越）



陈秋云，女，1924年生，缅甸归侨，曾任职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异乡不忘赤子心 归侨永记华夏情

——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离休干部陈秋云

华夏儿女血脉同根，救亡图存敌忾同仇。时光荏苒，岁月无情，正是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如今所在的祖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受尽外国列强欺凌的国家，成长为一个能为人民遮风挡雨的东方大国。正如原缅甸华侨战工队队员陈秋云所说，加入支援抗战的队伍，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从仰光到曼德勒 同仇敌忾救中华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不少值得回忆并引以为荣的往事。而最令我刻骨铭心的就是在缅甸华侨战工队的那段经历。”提到自己当年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奋斗的难忘岁月，鲐背之年的陈秋云老人不免深情追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侨胞们都在为民族解放而努力着。缅甸各地的华侨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立即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纷纷成立文协、妇联、歌联、学联等群众组织，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团结广大侨胞支援祖国抗战。陈秋云也没有例外。

“当时我在华侨女中读书，有幸和一些进步人士相识，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和同学们参加了学校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以及募捐、抵制日货等活动。”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先后占领越南和泰国，开始把魔爪伸向缅甸，仰光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冲击——学校停课，华侨群众组织也停止了活动。在此非常时刻，在缅华党组织的领导下，仰光华侨群众组织的骨干和国内来的进步人士，开始酝酿筹建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

1942年1月，陈秋云的二哥陈杰夫带领她到曼德勒参加了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成立大会，从此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这是兄妹俩第一次离家远行，那一年，陈秋云只有18岁。陈秋云祖籍福建，出生于仰光，对中国的理解和憧憬都来自父辈的讲述。然而，华夏儿女同根血脉——“加入支援抗战的队伍，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在战工队里，不管是领导还是队员，相互之间均称“同志”。当陈秋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呼时，感到既新鲜又亲切，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让她感受到了群体中的温暖，让互不相识的一群人因为共同的信念和目标走到一起，亲如一家人。

每天早晨，迎着初升的太阳，陈秋云便随同志们活跃在云南会馆的广场上，为掌握杀敌本领刻苦操练。睡的是通铺，吃的是大锅饭。回忆

起大家当时常做的什锦烩菜，这道菜至今都是她家中的保留菜品。

陈秋云所在的战工队并非武装部队，主要任务是深入缅甸城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除了学习国际时事和政治理论外，我们印发中、英、缅文的战工队宣言和抗日标语传单，绘制海报，准备大量宣传材料和展览图片，自制舞台道具，排练演出节目等。”

战工队的队员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有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还有造诣颇深的音乐专家；有文笔出众的新闻工作者，还有多才多艺的文艺骨干；以及精通各门语言的翻译人才……站工队队员们排练的《黄河大合唱》气势磅礴、豪情万丈，是当时演出最多也是最主要的压轴节目。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战工队克服重重困难，团结一致，不被少数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干扰和捣乱所影响，通过上街宣传和文艺演出，在曼德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

“1942年春节期间，我们在曼德勒连续3天公演，这是《黄河大合唱》首次在海外演出。张光年亲自上台领诵——‘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吗？……’”

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仿佛还在陈秋云老人耳边萦绕：“现场掌声经久不息，即便很多观众听不懂歌词，但激昂的歌曲充满着坚贞不屈的情感，感动了大家，也振奋了民心。”《黄河大合唱》不仅在当时轰动曼德勒，也对战后缅甸华侨爱国歌咏运动的广泛开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彻底在伊洛瓦底江激荡起层层波澜。

云南会馆遇袭 撤离曼德勒

1942年4月3日是一个令人悲愤和难忘的日子。

这天上午，战工队正在举行工作总结大会，一批日军飞机突然飞临曼德勒上空，对市中心等地狂轰滥炸。大地在颤抖，空气中尘土飞扬。

战工队所在地云南会馆也成为敌机袭击目标，在大火中变成废墟。尽管经过训练的队员们纷纷跳入防空壕躲避，但还是有几位朝夕相处的同志不幸遇难，令众人都悲痛不已。

这次空袭标志着缅甸战局的进一步恶化。形势的突变迫使战工队做出撤离曼德勒的决定，支援抗战活动也被迫中断。大家在紧张、悲伤的气氛中一面抢救伤员，一面抢运物资，一直忙碌到傍晚。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次空袭中，战工队所有演出道具、服装、乐器全部被烧毁，损失十分惨重。

但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战工队这支由缅甸侨党领导、以缅甸华侨进步青年为骨干的文艺宣传队伍，高举反法西斯大旗，先后在曼德勒和缅北部分城镇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海外华侨华人抗日救亡斗争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日军的空袭让曼德勒瞬间变成一片火海：废墟、瘟疫、动荡，令整座城市混乱起来，当地居民和侨胞人心惶惶，战工队也因此作出转移的决定。正当陈秋云准备随大家撤离的时候，家中传来噩耗——她的父亲和三哥相继被霍乱夺去生命，大嫂和两个侄子也命悬一线。“小”家面临如此灭顶之灾，可在“大”家面前，陈秋云顾不得悲痛，继续带着母亲与四姐随大队人马继续撤离，后事则交给主动要求留下的二哥和队长负责料理。

经过昼伏夜行的艰苦旅程，终于到达密支那，但坏消息仍不停传来——日军还在快速逼近。陈秋云和队员们任务非常紧迫，必须要和日军骑兵赛跑，抢在他们前面渡过伊洛瓦底江。只有如此，同志们才能顺利踏上归国的旅途。

翻雪山过怒江 归国路漫漫

胆战心惊的行进开始了。队员们与归国侨胞们组成的逃难队伍一起，迈着沉重的步伐，躲避着敌机的扫射，一路艰难前行。

面对路上经常见到的同胞难民尸体，陈秋云痛苦到麻木。在这条漫漫回国路途中，饥饿、困苦、疾病甚至死亡时刻伴随着他们。同行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战工队的队员们在这条征途上“孤军奋战”，相互搀扶、步履蹒跚地缓慢前行。

翻越雪山（尖高山）的经历让她永生难忘。大雪山是滇西高黎贡山脉的主峰，海拔五千米左右，初夏时节，山下烈日炎炎、湿热多雨；山上则常年积雪、银装素裹。队员们从清晨爬到黄昏，终于到达山顶，没有一个人掉队。雪山顶上看不到迷人的风光，只有一片荒凉、一片昏暗。这时，有人似乎听见了流水的声音，因此，大家断定：那一定是日夜奔腾咆哮的怒江。透过山上的薄雾，她仿佛看到怒江长龙般滚动的身影，顿时精神振奋，疲劳感一扫而空——“我们都清楚，只要下了山，就能到达怒江江畔。渡过怒江，最艰苦的行程就会结束。”陈秋云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陈秋云和同志们对此深有体会。下山的路被冰层覆盖，坡陡湿滑。大家小心翼翼地用手攀着枝条坐在地上向下慢慢滑行，如果一不小心用力过猛，就会有滑向万丈深渊失去生命的危险。队员们在黑暗中相互照应着、呼唤着、搀扶着，最终有惊无险地滑行到山下，此时已是深夜。他们终于翻越高黎贡山、大雪山进入云南边境。

几经周折，大家终于回到祖国。一路上跋山涉水、挨饿受冻，有些同志还不幸染上了痢疾或疟疾，不过最终还是化险为夷。从离开密支那到平安抵达昆明，陈秋云和队员们总共经历了将近一个月的艰苦行程，这段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归国征途让她更加珍视这个团结友爱且有着坚强意志的集体，也让她更加明白了祖国的意义。

白驹过隙，如今建国已七十余载，祖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受尽外国列强欺凌的国家，而是成长为一个能为人民遮风挡雨的世界大国。时间一去不复返，但中华人民英勇抗争的精神永远停留在陈秋云和广大爱国侨胞、志士的记忆中。

时光荏苒，岁月无情。当年平安撤回国内的战工队成员，如今大部分已经离世。几十年来，陈秋云深深怀念着曾与之并肩奋斗过的战友们，时刻不忘向曾经同甘苦、共患难，已经长眠地下的亲人们、战友们表达自己深切的哀悼和怀念之情。

萧岗同志曾经在《这段历史是值得纪念的》一文中写到：“关于缅甸华侨战工队的事迹，在已有的史料中很少见到。但它不应该是被湮没的。为了寄托我们对死难同志的哀思，也为了保存这一史料，哪怕它只是海外华侨抗日洪流中的一滴，也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尽管现在的中国处于和平年代，时刻铭记历史，居安思危，才能让祖国继续繁荣富强。“我虽年事已高，仍愿尽微薄之力，把缅甸华侨战工队的这段光荣历史流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希望他们都能够铭记。”陈秋云如是说道。



陈秋云生活照

（作者：李倩雨）



陈淑华，女，1934年生，菲律宾侨眷，曾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图书馆馆长、北大医学部侨联常务副主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以笔为戎绽芳华 心系侨联献真情

——记北大医学部图书馆原馆长陈淑华

她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还是复旦新闻系的高材生，更是北大医学部侨联的好干部。尽心、好学、上进、有爱，与祖国民族复兴一起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她对祖国满腔热爱的真实写照。从峥嵘岁月步入耄耋之年，陈淑华还在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峥嵘岁月绽芳华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攻回一座座城池，国民党的统治走向尽头。这一年，15岁的陈淑华即将初中毕业，与许多青年一样，她的中心同样有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面对社会的种种弊端与不公，她迫切地希望投身变革的洪流。正当此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诞生，陈淑华所在的家乡紧跟党的步伐，成立了泉州地区第一个团组织，开展了许多引导青年们投身到斗争中去的活动。在党员的帮助下，她和几位同学加入读书会，读《社会发展简史》时，她明白穷人是如何受到压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如何深入人心；读《穷人的故事》时，她理解到原来人民可以拥有当家作主的天地；读《白毛女》这样的剧本，通俗易接受又富有吸引力……新鲜的阅读慢慢在年轻的心灵里发酵，她的思想逐渐进步，革命的信念也逐步萌发。同年6月，经党员苏淑琼（现厦门大学离休干部）介绍，陈淑华光荣地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勇敢者，不怕死，不怕牺牲。

入团后，生活变得更加多彩难忘。作为团里的女同志，缝制游击队的服装、排练解放军的歌曲，许多活动都有陈淑华年轻的身影。1949年9月1日，泉州终于迎了解放，这位充满青春活力的中学生，迎着灿烂的阳光，高歌新生活的到来。她一边在学校带头学好功课，一边积极参加街头宣传，投身民主建设，土地改革……冬去春来，她度过金色的青春岁月，在学习中开阔眼界，在活动里不断长进。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号召人民抗美援朝，一批又一批的志愿军唱着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奔赴朝鲜战场。陈淑华就读的学校里有一批青年团员带头报名参军，并服从分配到遥远的地方接受军事教育。当时，女孩子当兵需要克服难以想象的世俗偏见，说服自己的母亲



陈淑华（戴帽子者）与家人合照

就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程”。她是家里的大女儿，母亲心中的好帮手，家里一直希望她在附近乡下当一个小学老师，同时帮助弟弟妹妹学习。听到她报名参军，母亲表现出了强烈反对，陈淑华反复说明和同学的“现身说法”耐心解释都无济于事。于是，只好请来父亲的同乡陈文老师进行劝说，老师曾在马来参加抗日活动，解放战争去往延安，担任过国民党起义部队325师政治代表，又是父亲自小的结拜兄弟，最终在老师的耐心说明下，母亲得以被说服。就这样，她带着师

长的关怀，慈母的期望，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在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学习时，陈淑华按照指示给抗美援朝凯旋而归的战士们当文化教员。他们中有不少都是文盲，她便从拼音、标点开始教起。陈淑华备课极为认真，凭着一股闯劲边学边教，战士们对她的好评颇多。因为这份尽心，她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荣立两次“三等功”。参军离开家乡来到部队经历都是严格的生活，坚毅的陈淑华认为，服役是一种考验，人这一生会经历种种难关考验，都需要正面积极地面对。这也成为了影响她一生的处事态度，处理什么问题总是能不慌不忙，在淡定中带着一份军人的沉静。

丰富经历显品性

两年后，内地与台湾的关系变得紧张，福州江边的房子甚至遭到台湾飞机的轰炸，军队要求女兵尽快复员转业。因此，陈淑华只能“被

迫”从部队转业，先在福建师范学院（现福建师范大学）团委和附中待了半年，在此进行数理化的补充学习。1955年，出于对做一名人民教师的渴望，陈淑华最终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继续学习。大学时，每年都有社会工作，从团总支、班委到党支部，她和同学们找机会给苏联来华交流的足球队员当翻译，提升自己的俄语水平，并学会了《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很多经典的俄语歌曲。

从新闻系毕业以后，陈淑华进入了北京新华社。初到新华社，她便被派到河北徐水县劳动改造，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她们一群人三餐都是白薯叶煮水配窝窝头，大量劳动后每次饿得都能喝上五六碗，从徐水回来后身上长了一身虱子……下放这一年对年轻人是一种特别的考验，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让她接触到了真实的社会，也让她开始学会对问题进行辩证地思考。在她眼里，当记者和下乡劳动都是铭记一生的宝贵经历。

196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医学背景的陈淑华来到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任教与工作。曾先后担任基础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北大医学部图书馆馆长。1987—1991年间，她和先生一起在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馆教育处工作。这是一个负责留学生工作的机构，有时他们需要前往瑞典有中国留学生的城市放映电影，扛着16mm电影放映机，还要组织中秋春节的联欢会。回忆起在异国度过的一千余个日日夜夜，总是充满了难以忘怀的浪漫色彩。

侨联工作奏乐章

进入新世纪后，陈淑华开始基层侨联工作生涯，这份工作就像一道曙光让她心里亮堂，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新希望。因为从小生活在福建“侨乡”，那里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和亲朋好友中的归侨侨眷，在港澳台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乡——都使她难以忘却、为“侨”做实事，为“侨”的工作进行拼搏奋斗也一直是她的心愿。在几年的工作过程中，

陈淑华撰写的五十多篇简报、信息通报、纪念性文章、参加征文、工作日志、侨联工作大事记以及在中国侨联主办的刊物《海内与海外》发表的文章，都见证着她做侨联工作的点滴心路历程。

在《我的“华彩乐章”，离休后的侨联工作》一文中，她写到“我很幸运，能在离休后宝贵的时间里努力耕耘，干自己喜欢做的事。此时，我的幸福感油然而生，我的心就像雨后天空，无限的明净和开阔。”

北京大学医学院党委统战部和各级侨联曾给予许许多多的雨露滋润与支持帮助，让她感动；侨联工作过程中见到、听到、学习到的“华彩乐章”，让她难忘。“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高人为伍，你能登上顶峰。”归侨侨眷中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人，他们的学识、创见和功业、风范、人格和精神滋养了无数人，也让她铭记在心。

侨联是个和谐、幽默、有说有笑的大集体，同事间的幽默的话语常常让生活变得十分有趣。刚开始做侨联工作时，陈淑华就收到侨联李惠民老师寄来的诗：“不论男与女，皆为侨之旌。团结与民主，主题不放松。多位侨胞言，齐向小康奔。有事打招呼，努力随后跟。”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对于陈淑华而言，侨联有趣与生动的生活，侨联工作中遇到的人和事都被她装入“记忆百宝箱”，每当提及，总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回首从青葱到耄耋的八十余载岁月，陈淑华与家国命运、侨缘侨联的故事还有许多，一章又一章，一节又一节。侨联工作这一章，成了她心中的华彩章节。她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赞赏，系统先进个人奖、北京大学统战系统特殊贡献奖等一系列荣誉奖励也是回报她最好的鼓励。她很满足、很感动，也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作者：唐佳一）



陈怡祥，男，1933年生，缅甸归侨，曾任中国侨联原生产福利部负责人，中国侨联直属机关侨联副主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为中外友谊搭桥筑梁 以款款深情奉献祖国

——记中国侨联原生产福利部负责人陈怡祥

1933年12月，陈怡祥出生于缅甸。1949年初，他到仰光南洋中学半工半读，加入了进步组织。在校3年期间，他曾担任学生会主席、缅甸学联副主席等职。1952年6月间，陈怡祥在老师、同学的资助下，与20多个缅华青年学生搭上了向新中国航行的“胜哥拉”号轮船。月底，

他们从罗湖桥走进深圳，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受邀到深圳广场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对边防军民的慰问演出。

1952年7月1日，陈怡祥抵达广州市，向有关组织报到，被分配到南方大学侨青班学习。其后，他参加广东省侨乡土改复查工作。1953年后，陈怡祥被组织送到武汉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后被国家派去越南民主共和国做海防市华侨中学的教学工作。1959年9月，陈怡祥回国，被分配到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先后在文教司、国外司工作。1960年底，陈怡祥接到上级通知，参加中缅边界联合勘察的翻译工作。1963年多次赴印度配合外交部接我难侨回国。

履职尽责 参与中缅联合勘察

中缅边界的谈判和划定，不仅是中缅两国关系中的大事，而且是新中国对外关系中必须处理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修睦四邻，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搞好国家建设，周恩来总理倾注大量心血，亲自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1954年6月，周总理首次访缅，两国总理共同倡导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1年，两国总理正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从1960年底到1961年底，中缅边界联合勘察整整进行了一年，最后达成协议、圆满解决了边界问题，在世界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1960年底，陈怡祥接到上级通知，参加中缅边界联合勘察的翻译工作。到外交部报到后，他跟随驻缅第一任大使姚仲明等到云南，先在昆明翠湖宾馆集中学习，之后就下到边境前线开展工作。初期，他被分配到南段边界工作，后又随队去了中段，先后在沧源、耿马、勐海、潞西(芒市)、畹町、瑞丽、陇川、盈江等地开展工作。

中缅边界线共2000多公里。中缅边界联合勘察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是姚仲明，缅方首席代表是昂季准将。陈怡祥回忆，联合勘察委员会

下设4个队，每队各有3到4个组。中方组长一般是边防军的团级干部或县委书记，技术副组长由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国家测绘总局委派。除此之外，各组均配备一定数量的负责安全保卫的边防军和一名联络官。组内有发报员、译电员和缅、英语翻译，另根据地段民族情况加傣或佤或景颇族等翻译，钢筋水泥工负责树立界桩。

克服艰难 圆满完成任务

深山老林里人迹罕至，没有道路。遇到雨天，很多地方则全是泥泞，湿滑难行。虫蚁杂生，吸血的山蚂蝗时常从树上掉落，需要小心防范。在这样的条件下，勘察工作仍然有序地推进着，在泥泞路上勘察小组经常是“扭秧歌”式地前进。人行走艰难，马帮驮运队更是不容易，行进中，马脖子上的铃一直叮当作响，马帮领头人则不断发出枯燥单调的吆喝声。过了泥泞地踩上草地，勘察队员们才能松一口气。行军路上也有奇遇，一次，他们突然间闻到浓烈的果香，抬头一看，树上挂满了熟透的野菠萝蜜，他们便趁此机会大快朵颐。他们时常还会遇上旱獭、野猪、蟒蛇等动物，逮着就交给炊事班，给战士们改善伙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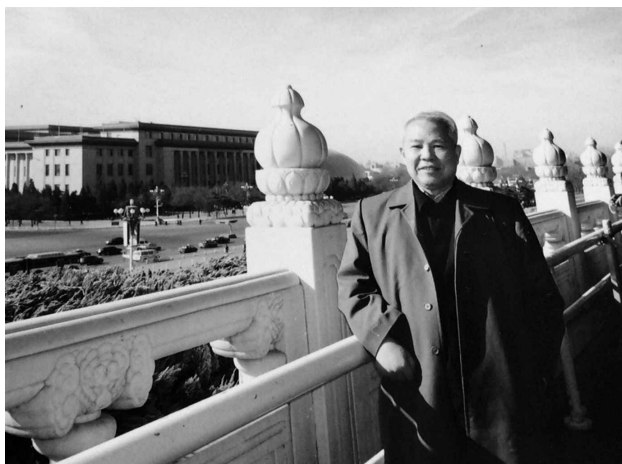
中缅边界联合勘察划界，山岭地段一般以分水岭的中心线为界；其次是以江河流域的中心线为界；再次是以沟渠的中心线为界；平坝地区划界也有，但划直线的少，特殊情况则经友好协商，采取互谅互让的原则予以解决。1961年下半年，双方联合勘察工作遇到一个难题，即陇川大盈江对岸悬崖峭壁上有个界限走向说明，中文42个字，同样内容也有缅文，都已用红漆写好，需要刻字。当时，大盈江的水面宽约40米，洪水未退，水流十分湍急。由于横渡过长江，陈怡祥得到领导允许后，和一位缅甸刻字工人紧拉着事先横拉在江面的绳子进入激流中，左右手交替向目的地移动。但水流太急，两人先后掉入激流中，但还是拼命往前游，终于游到对岸。他们慢慢爬到悬崖下，将42个字在天黑前刻完。正要往回走，突然一群野猴从山上跑下来向他俩进攻。陈

怡祥抓起一根树枝抵抗，一番搏斗后终于击退了野猴群。等两人回到绳子顶端处时，已经完全没有体力，天也黑了下来。幸运的是，陈怡祥发现过去留下的一个滑轮，他们用这个滑轮滑回了对岸。

坪坝耕地的界限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心思才能立好。德宏州的瑞丽县境内有一段边界线是从平坝耕地上穿过。双方谈判决定设立多少根界桩之后，在讨论界桩与界桩之间以什么地物标明界线时，颇费了些时间：垒成水泥墙感到不妥，架起铁丝网也不好，筑成竹篱笆不牢靠也不雅观，后来双方认为种树比较合适。但是，种什么树呢？有人提出种果树或木棉树，结果都觉得不可取，这些树等到开花结果时都会引起双方边民的纠纷。如种上阔叶树，遮阳面积大，影响庄稼的成长，也不予采纳。堪察地经多次讨论，并走访群众，才确定一种带刺的、叶子细小而且比较坚韧的矮树，这样此地段平坝上的界线标志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协商互助 促进边境友好

有一次，边民反映某深山野林处某号界桩被毁坏了。勘察队一开始以为是国民党残余军队干的，因为用钢筋水泥建起来的界桩是很牢固的，何况界桩立的时间不久。经联络，双方一齐直奔到事故现场。到了



陈怡祥生活照

地方，大家发现倒在地上的界桩钢筋扭曲，水泥破裂。经查，没有任何炸药的痕迹，也没有其他人为破坏的痕迹。经过仔细排查，最后终于发现该界桩旁边有野象的粪便和很多象的脚印。旁边界河沙滩有大坑，从大坑到界桩的地

上依然发现了野象的脚印。这样双方人员一致断定：作案者是野象群，野象为了解痒，用它们硕大的身躯在界桩蹭来蹭去，以致把界桩拱倒。在原地重树新界桩后，双方在此地段没有什么谈判，更无什么争议，很顺利地测绘图上标上了界线，并在纪要上签字换文。

在工作中，双方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路过哪家的城镇，谁就邀请对方过去作客、游览市容、看文艺节目。走到边远地段，后勤供应原则上自理。有的地段一方供应条件好，则给对方予以支援，共同克服困难。靠近北段尖高山地带后勤供应困难很大，吃不到新鲜蔬菜，主要吃干粮和罐头食品，这种地段靠飞机空投。安全保卫工作主要靠双方军队，一般以中方的边防军为主。我方年轻战士个个精神抖擞，能吃苦能战斗，武器装备也精良，行动起来像猛虎，每日上岗的巡逻兵出发执行任务前都要有个简单仪式，其中每人所带武器子弹上膛时，枪口务必朝北，不准朝南，以防走火射向缅甸境内，这些做法获得两国边民的一致好评。

1961年底，中缅双方联合勘察划界工作结束了，由于贡献突出，上级领导给陈怡祥颁发奖状。

谈及对侨联工作的经历和感触，陈怡祥感慨颇多。1980年10月调入中国侨联，曾任生产福利部负责人。1981年兼任菲华联谊会驻京办事处主任，配合中国青年旅行社开展旅游活动。1985年，应缅甸华侨吴庆星先生要求，被中国侨联派去协助吴在福建泉州家乡创办仰恩大学。1996年后，在该校任训导部主任、副校长、代理校长等职。期间还担任中国侨联直属机关侨联副主席、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中直机关侨联委员，直至1994年11月离休。1996年，离休后的陈怡祥赴福建仰恩大学任副校长，代理校长职务。

陈怡祥对于华人华侨与祖国深厚的感情，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他指出，在海外的众多华侨华人，经常给国内亲人汇款，侨汇达到每年数亿美元，华侨华人与祖国或祖籍国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也是华侨华人爱国(祖籍国)爱乡的一种表现。他在书里写道，“曾有波兰、匈牙利的驻华

使馆官员分别前来中侨委、中国侨联拜访，要求介绍我国是如何做好侨民工作的。他们总感觉自己的侨民与祖国关系交往甚少，感情也不深，没有像中国的侨民对自己的祖国有那么深厚的感情。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差异。这一点，很多国家很难与中国比，不容易学啊。”

在陈怡祥心里，华侨华人对祖国或祖籍国的情感是永存的，不管他们走多远，年代多久，华侨华人总忘不了自己的祖（籍）国和家乡。

（作者：吴悦）



杜娟，女，1924年生，泰国侨眷，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三秘，北京市侨联泰国归侨联谊会理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花开不败 革命者永远年轻

——记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原三等秘书杜娟

她生于广东的一个富商家庭，6岁开始上女权运动会小学，受到要做新女性、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后在恩师黄树楷的教导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她在抗战初期就投身到了革命工作中，抗战结束后开始从事侨务工作，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鞠躬尽瘁。

她的寓所里挂着一幅她亲笔书写的自勉条幅：“深感党的关怀教育，人老心红奉献至终”。

投身抗战烽火

1924年6月，杜娟出生于广东东莞城的一个富商家庭中。父亲杜求曾在东莞、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开有海味杂货连锁店和钱庄。母亲共生了八个儿女，其他七个兄弟姐妹都夭折，最终只有杜娟一个孩子健康的存活了下来。因此，从小杜娟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杜娟六岁开始上女权运动会小学，收到了要做新女性、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后在城南小学和鼎立小学读书，遇到了恩师黄树楷（原名黄佳，中共党员），并在恩师的教导下认识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1938年，日寇南侵，父亲杜求病逝，面临着家破与国难的杜娟，在恩师黄树楷的指引下，开始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1941年，杜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杜娟被派到东莞中堂区新鹤田村女校，以教书作为掩护，开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年仅17岁的杜娟一边备课、教书，一边培养青年骨干，先后发展了不少新党员，并出任支部书记，带领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开辟新区、照顾部队伤员、收集情报、发动年轻人参军参战等工作。1942年，杜娟在中共东莞县委委员黄树楷老师的介绍下，与当时在水乡担任区委书记的钟育民同志相识相爱，结为连理。1943年夏，杜娟与钟育民一同在博罗县一带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与统战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杜娟夫妇二人所在的东江纵队北撤。当时，地方的反动武装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对群众进行残酷的迫害并杀害我党党员和进步群众。在党的指示下，身为党组织书记的杜娟和部分党员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她们不畏强敌，与敌人巧妙地周旋，成功的完成了党组织所派的任务。之后，杜娟随钟育民到增龙工作。1947年，杜娟出任中共派潭区特派员兼任武工队指导员，在当

地整党建党、动员群众参军、开展对敌斗争。1948年，又接任增城平原区特派员一职，进行策反等活动，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增城。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杜娟奉调到博罗县任中共博罗县委组织部部长，在当地进行抗美援朝、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等活动，配合当地有关部门发动地方党组织和民兵参加战斗。在革命的战火中，杜娟逐渐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女干部。

参加革命的这十多年中，杜娟曾多次受到党的亲切关怀与人民群众的热心帮助。这也让她立志永葆革命青春，深感党的关切教育，为党和人民奉献至终。

从事侨务工作

1952年秋，杜娟奉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开始从事侨务工作。1954年，越南北方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获得解放。中越是“同志加兄弟”一样的友好关系，因此中国很快就在越南的首都河内建立了大使馆，并派遣钟育民和杜娟夫妇前往越南大使馆工作，钟育民任二等秘书，杜娟任随员，在领事部负责人事、秘书和华侨文教工作。

当时越南北方刚刚解放，当地的华侨对祖国并不是太了解，有的被迫迁到越南南方，有的被拉去台湾，有的去往香港。因此，在解放初期，越南北方的华侨和社会处于比较动荡的状态下。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工厂倒闭……大批的华侨面临着失业、失学。

在我国驻越南大使馆的领导下，杜娟和其他同志一起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初步稳定了越南北方华侨的成绩。他们依靠华侨中的积极分子，建立了河内华侨联合会，积极帮助当地恢复生产，发放救灾物资，安定华侨生活。同时他们还筹建华侨医院，筹办学校，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使得华侨能够正常的就业、就医、上学。此外，他们还创办了《新越华报》，通过报纸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得华侨能够更加了解祖国、热爱祖国。在使馆党委的领导下，杜娟也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利

用粤语与当地华侨进行情真意切的交流，组织当地华侨回国观光，派骨干分子回国培训，以期培训后能够更好地为越南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的过程中，最令杜娟印象深刻的是周恩来总理、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越南访问期间对杜娟的谆谆教诲。1956年，周总理与贺龙副总理访问越南，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指示杜娟等同志要做好华侨工作、防止大国主义思想，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要教育华侨发扬国际主义精神，“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要鼓励华侨积极参加越南当地的建设并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

1963年，杜娟奉调到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出任三等秘书，在领事馆工作。1965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缅甸，接见驻缅使馆部分外交官员。时隔十年，周总理仍记得杜娟的名字，并指示他们要做好华侨工作、保护华侨正当利益，教育华侨遵守当地政府法令，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周总理还教导杜娟要努力工作争做一个模范共产党员。总理的教诲让杜娟受益终身。

长期从事侨务工作让杜娟对华侨和华人感情至深。在离休之后，杜娟在北京筹划成立了越老柬归侨联谊会，并任北京泰国归侨联谊会理事。

革命者永远年轻

1983年，杜娟响应党的号召离休。离休后，杜娟仍牢记周恩来总理的教导：“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改造思想到老，做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她反复告诫自己：“我是服务群众一辈子的老战士，我一定要好好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她认为，自己虽然离休了，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安度晚年，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行动不能终止。离休后，杜娟参加了老年大学，经常听一些健康讲座，有着良好的身体素质，从而为继续从事侨务工作提供“本钱”。

在离休后，除了筹划建立越老柬归侨联谊会外，杜娟还为东莞、增城、博罗、龙门等党史研究部门撰写烈士传和革命回忆文章，出资并编

纂了《赤子丹心》《珍贵的记忆》《百炼成钢的革命战士——钟育民》《放飞和平》《花开不败》等系列丛书，希望能够起到教育年轻一代的作用。她还为革命老区以及马忠良等同志提供证明材料，使他们获得应有的尊严和待遇。

在杜娟的忆事文章中，她写道：“回眸走过的大半生，我终于大彻大悟。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我们的先人在近代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曾经长期的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曾经百年多战火硝烟的洗礼，中国人民终于走向成熟，走向奔小康高歌猛进的年代。”“一息尚存，就要为振兴中华，构建友好和谐、光明进步的国际社会奉献个人的一切，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才是生命的意义，这也是终身奋斗的目标。”她想用这些话语，来激励青年人，让奋斗之花常开不败。



杜娟生活照

在《严于律己 甘于奉献》一文中她也写到：“人生要有意义，首先就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追求生命的价值，就必须坚决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办事，勤奋刻苦学习，热情诚挚待人，迎难而上生活，无怨无悔终生。”她也用言行诠释了上述人生观和价值观。

杜娟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革命人永远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革命者永远年轻，革命之花常开不败，奋斗之花常开不败，杜娟老人人老心不老，永远都是“鲜红似火的杜鹃花”。

（作者：姜孜伶）



何访拔，男，1932年生，马来西亚归侨，曾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平生五色线 愿补舜衣裳

——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何访拔

作为归侨，他心中有国，刚正不阿，挺拔一生，护法同行。无论是将心血给了祖国的法律事业，还是凝聚侨心、凝聚侨智、促进中马两国的友好交流，何访拔都做到了极致。他不仅推动了北京法律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中、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少年勤学 青年担纲

20世纪的30年代，马来西亚的大地上风雨迷离。1932年10月，何访拔出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贫困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正直且勤劳，对祖国的思念之情深藏心底，在一家锡矿当工人，用不多的收入维持着生计。1940年，战争的恐怖笼罩着太平洋，人民的心里充满了恐慌。也就是在这一年，何访拔随着家人踏上了归乡的路途。而迎接他们回家的，是在饥寒交迫与烽烟战火中挣扎的故乡广东省梅县。

何访拔的童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的。在风雨漂泊中逐渐成长，见过太多颠沛流离的何访拔也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成熟与刚强。身处异国他乡，对祖国的热爱与思念是无法言表的。当何访拔踏上祖国土地的一瞬间，热爱、思念之情就再也抑制不住。1949年1月，17岁的何访拔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后就加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之中。1950年，他担任部队的文化教员，显示出超于年龄的能力与魄力。

1952年，慧眼识珠的领导保荐何访拔到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本科深造。对于一直以来渴求知识的何访拔，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因此，法律就在何访拔的心中扎了根。随后，何访拔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1956年，学校想要留下何访拔当教员，何访拔说：“我的初衷就是为祖国的法律做些工作。”他谢绝了校方的好意，守着自己内心的坚定志向，立志投身最前沿的法律一线。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法治建设形势严峻，法治工作棘手。23岁的何访拔凭着心中那颗法律的种子，迎难而上，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开始了他的检察官工作生涯。

然而不久后，十年文革到来。中国的法制遭到了严重的践踏。在困难的社会形势下，何访拔被冠以“黑苗子”“黑爪牙”挨批斗，下放到北京农村进行劳动。但风雨后总会见彩虹，光明和正义从不会缺席，终于在1978年，何访拔重返监察机关，继续朝着他的梦想而努力。

1978年检察院恢复建院初期，调来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大多数干部都没有学习过法律知识，更没有从事过司法工作，北京市检察院及时制定并实施了干部教育培训的“三年规划”及“七五规划”。然而当时物质条件差，根本没有培训场所，他们在地下室、木板房，甚至树荫下学习。夏季太阳暴晒、蚊虫叮咬，冬季寒风刺骨，时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魏彬，头戴草帽在太阳底下给大家讲课，干部们就都坐在小马扎上，将文件夹放在腿上记笔记……即使在这样艰苦的办公环境下，何访拔也丝毫没有胆怯，反而更加勤勤恳恳地工作。

挺拔一生 护法同行

1980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成立特别审判庭、特别监察厅，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北京市检察院王振中、何访拔参加办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查起诉工作。在办案过程中，面对江青的种种无理取闹，何访拔冷静地进行了反驳。最终，江青无奈只得在笔录上签字。

20世纪90年代，何访拔参与当时引起巨大轰动的，全市第一起百万元以上特大贪污受贿犯罪案件——管志诚案。1986年8月至1990年4月之间，管志诚利用职务之便，在北京、河北、江苏、福建、广东等地购销钢材、销售汽车、推销煤炭等经营活动中，以“计划处运费”、“指标费”、“分利”等名目，索取收受贿赂141万余元，贪污公款8万余元。管志诚作为首都钢铁公司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人脉极广。这曾让很多办案人踌躇不定，但当案情汇报到何访拔那里，何访拔挥手一说：“岂有不差之理？查！”

在审讯时，管志诚根本没有把检察官放在眼里。他甚至狂傲地对话办案检察官：“信不信我一句话，就把你们检察长的乌纱帽给摘了？”何访拔听后不屑一顾地笑着说：“管他是什么人，管他背后有什么人，只要他犯了法就要追查到底！”多年以后，办案检察官回忆：“这个案子曾

有人说情，但是何检的这句话，一定让所有说情者瞠目结舌、退避三舍。”正义在何访拔的努力下再一次降临，1991年7月18日，管志诚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严格执法 匡扶正义

何访拔将法律视为最神圣的东西，致力于为祖国的法律建设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但在办案过程中，他的思想并不死板，而是灵活运用法律，法律应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他深知，如果法律侵害他人正当权利，那无疑是走向偏门邪道。因此，他在担任检察长期间能深入调查了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正确处理办案与服务，惩治与保护，打击与预防，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注重办案的经济、社会、法律效果的协同性。他制定了北京市检察机关为国营大中型企业、为“三资”企业、为科技工作发展服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工作中，他刚强敬业，严格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率领干警严查贪污、贿赂、侵权、渎职等各类犯罪案例，名列全国检察系统前茅。尤其是在1994年各类腐败案件有所回潮时，在上级的支持下，他决定在中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首都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展览”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对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现代著名作家刘绍棠在《中国检察报》发表文章，称赞何访拔“只认铁卷丹书上的法规，



何访拔参加“重温首都检察历史，献礼国庆70周年”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不畏权势，不徇私情”。原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说他们是“干枝梅”。可见，何访拔的法治思想多么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他的心中满载的是法律的尊严与人民的权利！

工作刚强、不惧困难与挑战、个人能力出色、敬业……但现实生活之余的何访拔依旧有另一面。他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活气息，极具亲和力的。他从来不会趾高气昂，端起官架子，十分和蔼。文革伊始事，何访拔便被审查，而他的儿子出生仅仅几十天。他的妻子李萍为了照顾被冤屈的丈夫，曾请邻居夏大娘帮助照看孩子。大娘无儿无女，始终把孩子当做亲人一样看待。从此，何访拔夫妇尽心尽力报恩，对于老人的衣食住行全部细细照料。

何访拔性格上豁达开朗、富有生活情怀。每天清晨他也会迎着朝阳去散步。工作之余，他也喜欢和朋友聊天下棋。他还十分热爱公益，经常鼓励他的后辈们奉献爱心，曾发动全系捐款33.8万元，在云南省云县建立了“京剑”希望小学。

这样一位刚强、爱国、衷心于祖国法律事业的归侨广受尊敬，何访拔曾担任北京市侨联马来西亚归侨联谊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第五届名誉会长以及第六届咨询委员；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导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市检察官协会会长。无论是将心血给了祖国的法律事业，还是凝聚侨心、凝聚侨智，促进中、马两国的友好交流，何访拔都做到了极致。他不仅推动中国的法律事业走向繁荣，也在侨务事业上促进中、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异国他乡的每一位侨胞，骨子里都有着像何访拔一样的爱国热血。只要心中有国，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都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的炎黄子孙！

（作者：邢炜泽）



胡青，女，1925年生，印尼归侨，曾任职于中国歌剧舞剧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倾心舞台服装设计 我将一生献给幕后

——记中国歌剧舞剧院离休干部胡青

“我没有什么成就，我就是一直学习，一直在做。”从十五六岁接触到舞台美术，服装设计，胡青老师几乎将一生都交给了幕后，从抗敌演剧队的“管、借服装的小能手”到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服装设计，当问及胡青老师此生的骄傲和成就时，她总是谦逊地回答，哪里有什么成就。94岁的胡青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依旧十分动情。

灯光之外 幕后的服装设计

1979年，在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前夕，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台缓缓拉开帷幕，一段历史故事在这里徐徐上演，这是最后一遍彩排。胡青坐在观众席紧张地看着舞台上的人物。和其他观众不同的是，她不看故事里演了什么，也不看演员的美妙舞蹈，她只是紧张地盯着舞台上演员的服饰，感受舞台效果。

《文成公主》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获创作二等奖、演出一等奖，并获二十世纪舞蹈经典提名。舞剧中文成公主端庄貌美，汉藏两族人民载歌载舞。无论是华丽的宫廷伎乐人，手持盾牌威武的武士们，送别的仪仗队，还是莲花童子们，服装细致入微，符合历史背景，塑造了众多成功的舞蹈形象。

为做好这支舞蹈的服装设计工作，胡青和她的小组还是熬夜翻遍了古籍，细细研读了好几遍剧本，和导演商量了无数次，稿纸上画着十几版服饰，画了又擦，擦了又画。草稿乍看来很像，但仔细观察却能看到很多不同，对于胡青来说，每一遍重画的服装都不是轻易得来的。

如何在舞台上体现唐朝的服装特色，怎么表现汉藏两族的友谊，唐朝时藏族人该怎么穿？唐朝公主出嫁时仪仗队的服装该怎么设计？藏族迎亲队伍该怎么穿戴？怎么才能既符合历史文化又能在舞台上有足够的表现力？这些都是胡青反复思考，仔细推敲过的问题。尽管胡青在《文成公主》舞剧中只负责群众演员的服装，但是她所付出的心力和认真程度，让人感动。除此之外，当时歌剧舞剧院的一系列歌舞剧中都隐藏着胡青努力的成果，《中国革命之歌》《红楼梦》等经典舞剧胡青也都参与过服装设计。

胡青对舞台服装的认真，从十几岁时就开始了。早在演剧七队的时候，她就被称为“管、借服装的小能手”，彼时的舞台表演尚无充足经费购买所有服装，甚至大多数服装都是借来的。胡青和孙慕新这两位负

责服装的小姑娘广泛进行社会交往，以便演剧需要时可以借到服装。

有一次，演出话剧《寄生夫人》需要一双摩登的高跟皮鞋和时髦外套。但是演剧队怎么会有这样时髦的服饰呢？而之前认识的太太们也绝对没有这样的衣服，借了个遍的胡青可能比她们本人还要清楚她们衣橱里的点滴细节。胡青为此苦恼了好久，一直闷闷不乐，一连好几天都在想办法找服装，后来有一天走在街上偶然看到一位阔太太的服饰十分符合剧中的人物形象要求，便一直跟随到那位太太的寓所，几次三番登门拜访，交上朋友。最终，那位太太主动翻箱倒柜慷慨借出自己的服饰，合适的服装使演出更加圆满，最终达到理想效果。

谈及那时候借服装表演的日子，胡青感慨到，那时候大家都团结一心，听说演剧队是为了抗日救国，大家都愿意把衣服借给我们，常常是走在街上看到谁的衣服适合演剧，就上前去借了。

一路成长 演剧队的青春记忆

20世纪30年代，战争中日机不时的轰炸让广西处于混乱与恐慌之中，小胡青十来岁就已经经历了多次轰炸，房屋里哗啦啦掉下来大块的灰土。学校里停学，家里被轰炸，难民一样的小胡青和之前的同学一起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第四游行工作队，也叫儿童队。组成这个队的都是十来岁的小孩子，30-40人组成一个小小演出团，唱歌跳舞，而且有演出服，还管吃住，这是胡青最开始和小伙伴加入儿童队的原因。1942年，儿童队被解散，十五六岁的胡青转到了抗敌演剧七队，为抗日军民演出，通过文艺宣传抗日救亡。

对于胡青来说，演剧队如同艺术学校，既有专家、导演、作曲、指挥、歌唱家，又分有文学组、戏剧组、音乐组、美术组几个小组。在演剧队，胡青从儿童队唱歌跳舞的小孩子成长为舞台服装、美术宣传都能独当一面的小妹妹。在演剧队的经历给了胡青一生受用的宝贵财富，也为胡青和齐牧冬的结缘做了铺垫。

胡青在演剧七队时参加了美术组。和其他美术组成员一样，胡青对舞台美术：布景、灯光、道具、服装、效果、化妆等基本上都熟悉起来。胡青在七队既是专长舞台美术，也是戏剧、歌剧中出色的配角。胡青个子小小的，人又瘦弱，常常扮演儿童角色，有一次她在《农村曲》中扮演孤儿，瘦小可怜，声音单薄，十分具有感染力，让周围来观看表演的人们纷纷落泪。在大型话剧《家》中，胡青扮演缠足自卑的四妹淑贞，人物性格鲜明，表演独具一格。

这群凭借着朴素的爱国主义革命热情的青少年，边做边学，用舞台的方式为抗日救国做出自己的贡献。胡青刚加入七队的三年，跟着队伍在湘、桂、粤、赣地区流动宣传，写抗战标语，参加抗战演出，慰问抗战士兵。在街头、车站、演出场地举行流动画展宣传抗战，挂在电线杆、树杆上，挂在剧场内，这些美术作品，从单张宣传画到连环画，从临摹别人在报刊上的抗日作品到自己进行创作。在这期间，胡青不断地进行学习。由于她所做的贡献，2015年，胡青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流动演出到曲江，胡青和队友们多次参观了符罗飞教授的美术作品展览，符老师的绘画水平和艺术造诣极高。抗战初期，符罗飞教授就从



胡青（二排右一）与印尼巨港华侨学校学生

意大利带了一支枪回国参加抗战，胡青一直十分崇拜想要向他学习，终于能有机会结识了符先生，整个美术小队都和符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那时，胡青一有机会就去先生那里看画，学画。因为条件艰苦，演剧队每年就

发几元零花钱，胡青买了最便宜的拍纸簿和铅笔，在排练和演出的空余时间，在行军路上的休息时间，随时随地画速写、画人像、画风景和静物写生。韶关、坪石、兴宁、梅县、广州、香港，每次到符先生处，胡青总是会带上自己画的画请他指导，在符先生的指导下一一纠正，从比例、笔法、人物结构、构图到动态、明暗阴影，胡青的绘画就这样一点一点学习起来。

南洋好梦 在印尼华侨学校的一年

1945年，胡青先是到新加坡的中国歌舞剧艺社工作，后又在新加坡华侨协会的安排下去了印尼巨港华侨学校，帮助当地重建因日军侵略而中断办学的学校，担任教职人员。

胡青喜欢那些年的生活，安稳而平静。她教授孩子们音乐美术等课程，担任班主任，带孩子门种植蔬菜玉米，养小兔子。尽管抗战胜利，但是胡青等人还是希望孩子能够牢记历史，热爱祖国。她和其他同事一起把演剧队的抗日宣传节目也带到学校，和孩子们一起排练来自祖国的抗战歌曲。这些孩子是中国人，他们应该热爱祖国，牢记历史，痛恨侵略者。

从《黄河大合唱》《黄河颂》《黄河怨》到《新年大合唱》《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胡青等人一遍遍和孩子们练习着，过去几年走南闯北以文艺促进民族觉醒，推动抗战胜利的日子又浮现在了眼前。任教一年后，胡青等人回到新加坡与中艺会和，后在中艺巡回演出途中与爱人齐牧冬结为婚姻。自1942年相遇，二人携手走过一生。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1月，胡青等人经香港回到东江参加东江纵队成立的华南文工团，1953年调到北京，丈夫齐牧冬被派往苏联学习舞台美术，并担任中央戏剧学院舞美教授，胡青则在中国歌剧舞剧院从事服装设计，直到退休。

北京文化资源丰富，曾经因为战争颠沛流离未能系统学习的遗憾也

在北京弥补起来。胡青申请在中央戏剧学院进行进修了三年，继续学习绘画和舞台美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是胡青人生的真实写照。尽管多年前就开始自学美术，边做边摸索舞台服装，但是一旦有学习的机会，胡青一定会积极参与，不断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爱人齐牧冬的舞台理念有所发展，胡青自己对服装的领悟亦不断在积淀。也许是因为受到胡青夫妇的影响，后辈们对艺术的追求同样用尽了一生。94岁的胡青如今身体还十分硬朗，微风徐徐的夏日清晨，她会沿着胡同走出来，到离家不远的河边走走看看。看到不远处跳广场舞的年轻人们，胡青偶尔会想起自己当年的日子。

舞台服装，似乎很小，小到聚光灯下人们都无法注意到它，因为它和故事、人物，舞台融为一体，然而却是绝不容许出错的细致工作。似乎只有出错的时候，人们才会注意到服装的重要性的问题，然而胡青不会给大家这个机会。做好一个幕后人，是胡青一生的事业与追求。

（作者：王美力）



黄明生，1930 年生，缅甸归侨，曾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缅甸语播音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倾注半生心与力 中国声音传他乡

——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缅甸语原播音员黄明生

1949 年底，有一个青年从缅甸历时两个月“曲折”终于归国。当时，他乘船先绕道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随后从香港北上青岛，再到天津港后乘火车，最终抵达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由于当时是通过特殊渠道归国的，除了护照以外基本没有随身携带的财物，青年在香港找组织关系花了一两个星期才被安排住进酒店，拿到通行证，青年得以在青

岛港上岸，到达天津时由解放军护送入城。离奇经历比起现在类似题材影视作品的戏剧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青年，就是黄明生。

艰难困苦 美玉初成

1950年1月，黄明生到达北京一个多月后，侨委领导跟他协商后决定安排他去电台筹备面向东南亚的广播。就这样，黄明生开始了大半生的广播事业生涯。

当时的国际台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对黄明生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

起初的办公地点在六部口，办公室仅有30平方米。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聚集了四个方言组和四个语言组(缅甸、印尼、泰国、越南)。领导安排黄明生开播之前一方面练习翻译，一方面熟悉播音业务。由于当时国内建设才起步，相关设备设施很不健全。播音员在翻译稿件时并没有打字机，全部用手写，用竹秆笔外加一个墨水瓶，边蘸墨水边写；工具书就是黄明生唯一一本随身携带的《英缅小词典》，即使他去了多家书店，也找不到任何缅文书籍。播音设备更是相当的简陋——唯一的播音室由各个组轮流使用。播音室里没有空调，盛夏时节室温很高，闷热难耐，不得不用冰块降温。播音室里也没有录音机，播放音乐要使用唱片机，而且要由播音员自己进行操作。换言之，当时播音员身兼翻译、抄写、监听、录放等数职于一身。

在艰苦的条件里开始工作，黄明生也经受着生活条件转换的考验。从热带地区初到北方，寒冷的天气是前所未遇的。加上当时的吃穿都是供给制——冬天组织上发下一套棉衣，每月供给130斤小米作为伙食费，零用钱更是少之又少。伙食的主食就是小米、高粱米、窝头，副食常常是白菜、豆腐。这对于一个生长在饮食习惯迥异的东南亚国家的青年来说，亟需适应。

国际广播工作与国家的声誉息息相关，在当时全部采用直接手段的条件下，为确保质量，正常备稿的时间至少三倍于播出的时间。分析新闻评论的语言结构与口语的区别，研究新闻评论的内容特点，揣摩它的表达方式，精心计算出时间……一切都从生疏到熟悉，使黄明生深切感觉到播音工作远非念字出声而已，它有突出的再创作过程。不过，在开播前的紧张筹备期里，怎样艰苦的条件也不能阻挡以黄明生为代表的播音工作者们投入巨大的工作热情。台里当时还安排了著名播音员齐越来给他们上课，讲解播音的重要的原则、技巧。而紧张的初期工作也为他日后几十年的播音生涯奠定了坚实的业务基础。

全国首播 不负信任

1950年4月10日，经过领导的甄选，决定缅甸语开播之日由黄明生首播。

他的播音名叫“吴明昂”。“当时考虑到责任重大，而且业务水平处于起步初期，实际上还是很有些胆怯的。但是领导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最终还是伴随着紧张的心情认真完成了首播任务。”黄明生后来回忆道。这样的起点也使得他在日后的播音事业里持之以恒、以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广大听众的支持。

开播几个月后，抗美援朝开始了。稿件量大而且时间紧迫，大量的评论、社论、外交部声明轮番到达，黄明生通常从早上7点一直要忙到播出前的23点。有时，播音正在进行中还有急稿要赶，以至于连浏览一遍的时间都没有就要直播。同样的情况又发生在其后的日内瓦会议期间，这对于一个开播初期的电台以及工作初期的播音员来说都是艰巨的任务，播音不能有任何闪失和懈怠。播音员们必须争分夺秒地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工作的需要。而黄明生不仅完美完成了组织给予的任务，还极大地锻炼了自己的业务能力，提高了自身的业务水平。

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开始后，很多重要的社论评论都是黄明生来播音的，比如“九评”。播完后中央领导给予了重奖，播音员不仅晋升了一级工资，而且还受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都参加了宴请，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和奖励。像《王若飞在狱中》《长征》等篇幅长、有一定难度的稿件，也是由黄明生主持播音的。

成果显著 备受好评

以黄明生为代表的国际广播工作者所主持的面向缅甸播音的节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收听率高，广受好评。每天早晚他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在缅甸的茶馆里就聚集了很多听众进行收听，效果很好。这一方面与当时缅甸的政治局势以及播出内容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虽然电台初期设备简陋，但台里对于定向播出技巧十分注重。播音节目当时是从云南发射站发出的，听众来信反映“音响十分清晰，几乎连根针掉下来都听得到”。

当然，作为播音员本身也必须下相当的工夫。首先在节目播出前，



工作中的黄明生

领导会给黄明生等人进行稿件的背景分析，让他们对播出内容有更深层面的理解。而且，播音员日常就要具备对国内外信息随时随地收集意识和习惯。在节目播出后，黄明生不仅要现场重听，而且注意通过短波收听发射后的效果，站在听众的角度去评估节目的状况，从中找出问题以便不断完善。其次，黄明生的声音比较厚重，发

音标准，从这两方面来讲，他是有先天优势的。

黄明生一直认为，播音工作是看不到影像的表达艺术，以声音来传递情感需要播音员内心具备对稿件内容深刻的理解。声由心发，播音过程中才能够自然而然地表达。因此，他事前的准备工作往数倍于播音的时间，而播出的时候高度投入，语速适中，一气呵成，所以听众常常反映，他们的声音非常有吸引力。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1990年，黄明生到了离休年龄，一开始，他还参加返聘工作，后来工作疲劳，身体体能跟不上，就正式休息了。在45年的工作生涯中，由于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黄明生的血压居高不下，药物也无法缓解，离休后终于趋于好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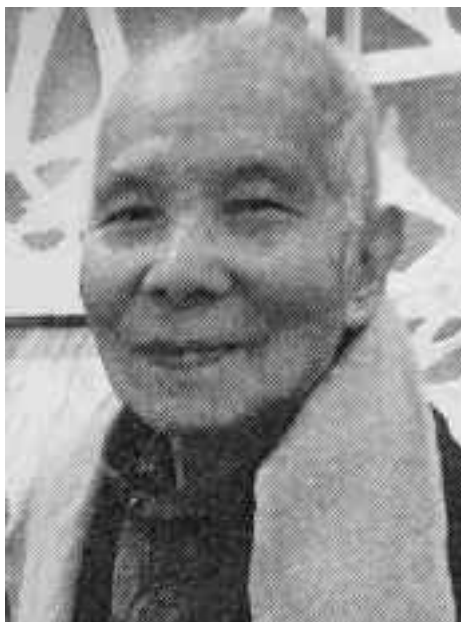
1995年，在阔别缅甸45年后，黄明生终于在家人的资助下回到仰光与亲友团聚了一次，45年的世事变迁令人感慨万分。

离休之后，多年的新闻工作使他养成了关注国内外新闻动向的习惯，每日阅读报纸、上网浏览并且收听世界各大电台的网络节目，成了他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即便足不出户也对外面的世界有相当的了解。黄明生提到，缅语广播开播初期就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嘉许。一位缅甸作家在他的《社会主义国家访问记》一书中讲到，北京电台的缅语广播在各国的缅语广播中是居首位的。然而在“文革”和缅甸排华期间，播音工作陷入低谷。其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延续至今，尽管已有所好转，但听众的反映已不能与50年代及60年代初期相比。广播工作最需要的是听众的支持，全面分析研究对象国的情况、了解听众的需求当是国际广播工作必不可少的。尽管黄明生已不再面向话筒，但他仍关注着同事们为此而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

在中国国际广播事业的历史中，黄明生所经历的确只是点滴而已。如今的国际广播事业已颇具规模，享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令黄明生聊以

慰藉的是，他曾经为这个目标实实在在地付出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而那些为中国国际广播事业起步所历经的团结协作，同甘共苦的最初岁月，依然是永远值得珍视的记忆。

（作者：张鉴之）



黄荣华，男，1924年生，泰国归侨，曾任职于国家安全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天地有正气 杂然赋流形

——记国家安全部离休干部黄荣华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文天祥的五言长诗《正气歌》慷慨激昂，也是黄荣华一生的写照。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我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离国赴泰 积极抗日

1925年9月8日，黄荣华出生在广东省文昌县(现为海南省文昌市)宝芳镇良臣村。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了泰国，在当地一家锯木厂做工，母亲在家乡靠父亲有限的一点侨汇和种田养育着黄荣华兄弟三人。

1939年叔父带着年仅14岁的黄荣华到泰国找父亲，之后，黄荣华也在泰国一家工厂找到工作，成为童工。后来，他在进步工友的影响下加入了工会，到夜校学习文化，还参加抗日活动。1946年，黄荣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荣华曾在泰国侨党领导下的“暹罗(泰国)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总会”(其所属的“曼谷市各业工人联合总会”在抗战胜利后改为“曼谷市职工总会”)的组织中担任职务，先后相任过机械工人总会(简称“机总”)总执委、第二分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

排除万难 终回祖国

全国解放前夕，为支援祖国的解放事业，侨党领导下的“机总”发动和组织一批青年工友与进步学生回国。1949年春天，“机总”通知黄荣华和“侨青”(即华侨青年总会，是侨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组织)的何文雄带领12位青年回国。为避免国民党特务和反华排华的銓披汶政府阻挡，他们避开检查分头上船，先到达香港，由中共华南分局派人到码头迎接并安排他们偷渡到解放区——甲子，在甲子经过编队后又转到潮汕地委。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党的怀抱，黄荣华的心中感到无比的激动、兴奋、幸福、踏实。他想，“从今以后我们就要在党的领导下，直接为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战斗了！”

黄荣华被分配到刚解放的广东省揭阳县工作队任副队长，负责到农村宣传减租退押和征粮工作。汕头解放后被调到市总工会筹备处，不久

又到机械厂筹备组任副厂长。1950年8月调到北京马列学院学习，于1951年结业后，又奉调到云南省边疆做民族工作，先后在潞西、梁河、盈江当过县委书记，直到1964年调到中央调查部，黄荣华才离开云南。1965年6月，他被派到驻老挝使馆，主持领事部的侨务工作。回国后，他以局级待遇被派到国务院侨办工作，1985年离休后又返聘继续工作了两年。

服从指挥 踏实勇敢

从1949年回国到1985年离休的36年中，黄荣华在云南工作的时间最长，地方基层工作的经历让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考验，他在工作中学和领会党的民族政策，踏踏实实地为少数民族做了许多工作。他始终坚持和遵循着回国时的誓言：不畏艰险，不讲条件，服从党的安排，祖国需要到哪就到哪，尽最大努力去工作。

云南工作时期有几件事至令让黄荣华铭记于心，老人回忆时提起，这几件事都清楚地体现了我们党对少数民族的团结政策：

1951年结束马列学院华侨班的学习后，一同从泰国回来的蔡学松、陈国权、关萍、何鸿生、冯慧明、甘炜和黄荣华，还有中央军委调来的郑建生、丁琦，以及蔡学松的未婚妻余玉梅共十人，作为中联部的储备干部被派到云南省委，不久后去了保山地区从事民族工作。黄荣华和蔡学松被分配到潞西县民族工作队，蔡任县长，黄荣华参加调研组任副组长。调研组工作结束后，陈国权、冯慧明、郑建生、丁琦等五人由地委统战部长王毓杰同志带队，组成工作组到双江、耿马县检查工作。

到达耿马时，正好遇到阿佤山发生村寨械斗，现场形势十分紧张，工作组立即配合县委领导前往处理。按阿佤族的旧习俗，每年春耕季节都要在路口埋伏，砍取一个人头回村寨祭谷才能播种。当时正值春耕季节，工作组虽有些顾虑，但仍然勇敢的前往。到达那里后，工作组找了双方村寨的头人和一些群众协商，经过反复做工作，商定由双方杀一头

牛祭谷，此外，还喝了团结酒，事件得以平息。黄荣华回忆道，“通过这次实际接触，我感到佤族虽然落后，但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野蛮’，相反，他们对共产党的工作队都很热情和友好，我们党对少数民族也是十分关心和尊重民族习俗。”

1953年初，泸水县发生基督教徒暴乱，地委派人前往处理，但是这位同志以各种理由推脱。泸水县地跨怒江两岸，山高路陡，从保山到泸水步行或骑马要走几天山路，而且全县多是江面，没有一座桥，只有竹排和溜索为交通工具，交通十分不便，有的人一谈溜索就胆战心惊。最后，组织决定由黄荣华从民干班抽调十多位民族学员组成工作组，并负责带队前往处理暴乱事件，黄荣华遵守党的民族政策、依靠群众，圆满完成任务。暴乱平息后，地委将他们这批人留在泸水，黄荣华接任了县委书记，主持泸水工作。

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泸水的工作刚刚有了起色，正值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接近尾声。越方要求我方顾问团增派民族顾问组，帮助他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中央从内蒙、云南和广西三个民族地区抽调了一批有实际经验的地、县级干部充实顾问团，并要求被抽调的干部在接到通知后三天内必须赶到广西南方(越南)工作团报到，其中，就有黄荣华。

黄荣华作为云南省委派出的六人之一，到广西集合后，跟随由谭辅仁(内蒙区党委成员)和王毓杰同志为正副组长的援越民族工作组前往顾问团驻地。从广西进入越南，首先要通过法国殖民军飞机封锁线，为了阻止我国援越物资和人员入境，殖民军的飞机日夜巡逻，一旦发现目标就狂轰滥炸。顾问组只能夜间行军，一旦听见飞机声音，汽车就熄灯进入树林隐蔽，加之山岭河沟纵横，没有像样的公路，也没有桥梁，汽车只能逢山爬坡，遇沟涉水。从广西边境到顾问团虽然只有一百多里路程，但行军缓慢，走了数天才到达顾问团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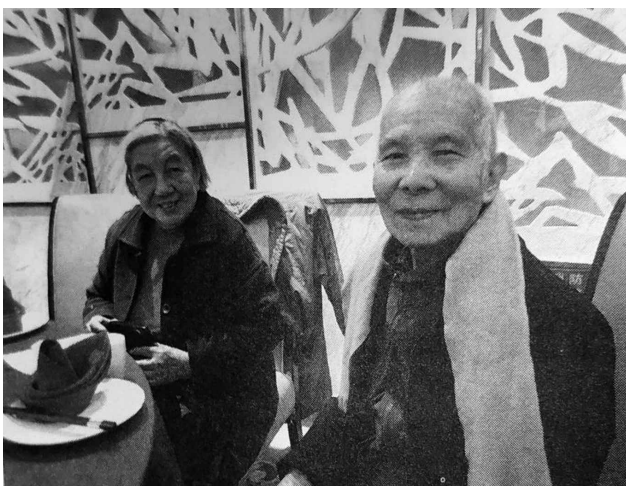
越方莱州省委书记与顾问组进行座谈并交代了任务，派人送他们到泰苗聚居的奠边府。顾问组被分成两组，分别到泰族区和苗族区，配合越方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泰苗民族的社会性质和特点，提出开展工作

的方针政策。泰族人口较多，主要集中居住在平原，顾问组就驻在奠边府的泰族村寨，由正、副组长亲自指导工作；苗族人口少又分散居住在各个山头，由黄荣华带着一位翻译配合越方数名干部前往。经过几个月紧张调查，收集资料深入研究，黄荣华等人针对泰、苗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提出了开展工作的建议报告。这些建议得到了顾问团的肯定并转越共中央批准后，他们就着手筹备越西北泰苗自治州政府的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1955年6月，泰苗自治州政府建立。黄荣华等人顺利完成了祖国交付的国际主义任务，按计划于当年八月回到祖国。

赤子之心 爱国之情

回国后，黄荣华回到云南，担任潞西县委第二书记。1963年又调到梁河县任县委书记，在任时主要整改了领导班子和大跃进中存在的遗留问题。一年半以后，他被派到盈江县担任县委书记，仅工作了三个月后又接到调令前往中央调查部报到。之后，很快被派到老挝使馆以二等秘书身份参加使馆党委，负责领事部的华侨工作。1966年，黄荣华回国休假，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留在北京参加运动，并下放到山东干校劳动改造。由于频繁的工作调动，黄荣华也被同志们戏称为“走马灯”。

在“文化大革命”中，归侨因海外关系被列入另类，受到长期的审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黄荣华也从没有对当年回国的决定有过任何动摇和怀疑，从没有



黄荣华（右）与夫人梁思奇（左，梁启超孙女）

对党的信念产生过动摇。回忆往事，黄老说，作为一名老党员，为了祖国，我们无怨无悔！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一批归国的热血青年都已成了耄耋老人，有的人已离我们而去，值得欣慰的是，作为当年国难当头时回归祖国的华侨青年，为了祖国的前途始终勇往直前，无论艰难困苦，以黄荣华为代表的这些归侨都至死不渝践行着自己的誓言。就像他的归国老战友郑建生、丁琦夫妇在逆境下常吟唱的那首歌：

“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

（作者：张鉴之）



黄淑英，女，1928年生，马来西亚归侨，曾任北京市通州区图书馆副馆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舍身抗日巾帼志 丹心报国赤子情

——记通州区图书馆原副馆长黄淑英

她年少无畏、心中有志，历经艰苦万险，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她爱国心切、满腔热忱，毅然回国重归故乡，倾注心血投身文化建设工作。她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豪，只为把一片丹心献给祖国和人民。

女扮男装 抗日救国

黄淑英一家祖籍在福建，她的父亲年轻时不满北洋军阀腐败统治，漂泊到南洋经商谋生，便把家安在了马来西亚。1928年，黄淑英出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家中的长女，她还有四个弟弟，在幸福温馨的家庭中度过了快乐幸福的童年。

1941年，黄淑英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中华女中”就读，初中一年级就加入了学生联合会，积极参加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在耳濡目染之下，黄淑英逐渐领悟革命精神，萌生了传播革命精神的想法，随后她便加入了马来西亚共产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火声打破了黄淑英原本幸福平静的生活。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马来西亚，12万英军在3万日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损失惨重。1942年12月，马来西亚沦陷，惨无人性的日军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黄淑英一家人被迫躲到吉隆坡郊区干真八条石外婆家，因害怕惨遭日军毒手，外婆只好带着黄淑英到山上的草屋中避难。

卢沟桥事件，日军残忍烧杀中国无辜百姓、抢掠奸淫中国妇女的野兽行为曾在黄淑英心里埋下对日本侵略军的愤慨，而今，日军侵略马来西亚后用同样残酷手段屠杀马来西亚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更激起了她想要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的赤诚热情。由于恶劣的斗争环境，当时的“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只能在山上打游击战，翻山越岭，风餐露宿，食不果腹，生活很是艰苦。

但这些问题丝毫不曾打消黄淑英参加抗日军的念头，她天天早起苦练爬山。在一次练习爬山时，她一鼓作气爬山头，突然日军的轰炸机飞过，在空中盘旋许久。外婆见日军飞机来轰炸，担心黄淑英的安全，不顾个人安危跑出门外四处找她。黄淑英趴在树下躲避日军的巡视，待敌机飞走后，她便匆匆忙忙往家里跑，半路上正好碰见正在着急找她的外

婆。外婆见黄淑英安然无恙，又喜又气，用手指着她狠狠地骂道：“日本那么多的飞机大炮，你一个女孩子家，偏偏去打日本，这不是白白送死吗？”

外婆担心她出意外，不准黄淑英跨出大门一步。此时，她内心深处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挣扎过后她决定离开亲人的怀抱，偷跑出去参加马来西亚抗日军。

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黄淑英决定女扮男装，把头发理成男式，还偷了弟弟的一套衣服。偷跑的前一天晚上，黄淑英呆呆地躺在床上，月光静静地照在床前，想着双亲 and 外婆一旦知道自己离他们而去时伤心痛苦的情形，她不禁流下泪水，悄悄地哭了一夜。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在天将明时，黄淑英心一横，忍痛给家人留下一封信，就偷偷地跑去找部队参加抗日活动。部队派一名交通员用自行车驮着黄淑英到双门丹参加“马来西亚人民抗日第一独立队”，她当时被分在第二分队。



青年时期的黄淑英

多番遇险 死里逃生

山上的游击斗争远比黄淑英想象的要艰苦，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老百姓支援的粮食等很难运上山，加之日军经常扫荡搜山，抗日军要随时转移，食宿难安，紧急时同志们连一口干净水也喝不上，饿了只能吃几片红薯干充饥。有一次，宿营地发生危险，夜里紧急转移，伸手不见五指，同志们只好排成长队一个紧挨着一个，后面的人揪住前面人的衣角儿，交通员带头摸黑往前走。走着走着，黄淑英一脚踩空，掉进深沟

里，衣服都划烂了，身体多个部位疼痛难忍，万幸深沟里没水，她被同行的同志发现，幸免于难。

不仅如此，病痛的折磨也时常威胁着黄淑英的生命。作战生活没有任何规律，白天边行军边打仗是家常事儿，夜里还要睡在阴冷潮湿的山地里。不久，黄淑英的双脚便生疮化脓，奇痒难忍，又无医药，只得用一点煤油当作药水涂抹在患处。后来，黄淑英患上疟疾病，忽冷忽热，指挥部决定送她下山治病，一位交通员自报奋勇冒生命危险背着黄淑英，一步一滑，跌跌撞撞地在电闪雷鸣中急奔下山。生病下山后，黄淑英被安排住在武来岸进步群众刘大娘家中，在刘大娘的细心照料下，黄淑英的身体慢慢好转起来。

敌占区的工作万分危险，黄淑英多次被叛徒出卖，差点被日军抓获。病好后，黄淑英曾先后在加影、武来岸、干真八条石等十余个敌占区开展工作。在敌占区工作，不仅生活条件异常艰苦，而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与敌人周旋的日子里，有一次，黄淑英与母亲同住干真八条村边靠树林的堡垒户家，一个叛徒突然带着日军闯了进来，气势汹汹地来抓黄淑英，幸亏当天她没回那里。但敌人发现家中黄淑英的衣服，在这样的危险情境下，黄淑英的母亲急中生智，一口咬定花衣服是她自己的，在家里干活穿着不便才放着的。日军哪里肯信，先后抓来房东一家，狠狠地毒打拷问一通后才肯罢休。

1943年的一天，干真八条石（老区）第一独立大队司令部的联络站不幸被叛徒出卖，那是中央领导同志往来联络各地负责人商讨抗日工作的处所，可耻的叛徒带着日军在深夜里突然袭击包围了交通站。当时，黄淑英正在另一处交通站屋里睡觉，忽然听到屋子外面有动静，心知情况不妙，正要去通知在交通站里开会的其他同志。

不料，一出屋门就见他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村子围得水泄不通，她已经寸步难行，只好悄悄地退回屋中。不一会儿，日军就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挨家挨户地把全村人都押到村中的空场上，周围架起机关枪，端着刺刀，带着叛徒指认抓捕。黄淑英躲在人群里面，紧张地注意现场的

情况，只见鬼子带着那个叛徒“中央交通员”向自己走来，越来越近。黄淑英紧张得心怦怦直跳，生怕叛徒认出自己，趁乱挤出人群向村外跑去，终于死里逃生。

躲过日军的视线后，她一口气跑到另一个交通站，后来获知陈天庆同志不幸牺牲的消息，她止不住流下了悲痛的泪水。在与敌人的长期斗争中，不断地要付出血的代价，看到曾经在一起朝夕相处、相亲相爱的领导和同志惨遭敌军杀害，黄淑英的心阵阵作痛，目睹敌军、叛徒的丑恶嘴脸、卑鄙残暴的行径，不但没有吓倒她，反而更加坚定了她抗日的斗志。

离开故乡 建设家乡

日本投降后，英军重返马来西亚。1948年6月，英军宣布《紧急法令》，到处逮捕抗日分子。恰在此时，黄淑英听闻许多同志介绍祖国革命的情况，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她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去。于是，她从马来西亚辗转去往香港。在港的好友对她劝说：“你就留在香港吧，工作、住宿保你没问题，不要辛苦再走了。”黄淑英却坚决地回答：“我回来就是要投奔解放区工作，不想住在香港，我选择回福建建设我的家乡。”

同年5月，黄淑英参加了华南分局福建特别支部领导下的“福促会”，到解放区后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文化服务团”。该



黄淑英生活照

团以华侨为主体，由来自东南亚国家及五湖四海的青年、进步学生、知识分子、革命的游击队员组成，他们共同投奔解放区，总计120多人。1949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闽粤赣边区急需一批干部到解放区接管工作，黄淑英得到组织上的通知，坐船离港。海上常有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的舰艇穿梭，十分危险。黄淑英和团队一行人闯过了敌人的封锁线，顺利到达粤东，并从粤东徒步到福建省福州市，一边行军，一边配合当地宣传各项政策和中心工作，还给老百姓治病，受到老百姓们的热烈欢迎。

1950年，黄淑英被分配到福建省委宣传部工作，1954年黄淑英从福建调到北京，选在通州落户，工作分配到通县（现为通州区）县政府负责筹建文化科。1958年筹建图书馆，一直在图书馆工作到1987年离休。

几十年来，黄淑英在文化战线上兢兢业业为党为国，曾经多次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颁发的荣誉证书，这是对黄淑英工作的肯定，也是党对黄淑英的鞭策和鼓励。黄淑英说：“几十年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动摇过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这种真情流淌在我的血液里，迸发出无尽的力量，激励我完成我的革命事业！”

（作者：朱天然）



江雪，曾用名江雪梅，女，1921年生，马来西亚归侨，曾任原北京市文化局艺术处处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一生结缘艺术 鲐背初心未改

——记北京市文化局艺术处原处长江雪

即将满100岁的老人江雪，一生历经风雨，仍然不忘初心，对国家的建设和文艺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坚定的共产党员，她听党指挥，时刻心怀国家。作为专业的艺术工作者，她兢兢业业，坚定文艺宣传的信仰和方向。忆往昔峥嵘岁月，她是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楷模。

赤诚情怀：革命岁月的“文艺青年”

江雪出生于前英国殖民地的马来西亚吡叻州安顺埠，她的父亲年轻时随祖父到马来西亚谋生。1935年冬天，因外祖母病重，母亲带江雪回到广东，这是她第一次回到祖国。在江雪的强烈要求下，家人只能同意江雪留在广东进花县中学读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国家危亡时刻，江雪作为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受到党的教育和影响，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念，深深地领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职责，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领导的“抗日救国宣传队”，在花县的所有农村、城镇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演出，为民族解放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自此开启了她为党为国家的文艺工作。

在革命实践中，江雪受到党的教育和熏陶火速成长起来，明白了家国大义，也深深地坚定了跟着党走的信仰。1938年时局动荡，江雪的母亲考虑到她的安危劝说她回到马来西亚，但是被她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江雪不顾家人阻挠，背着父母，和朋友一起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并将原名“江雪梅”改为“江雪”，同年十月加入到了共产党的队伍当中。在延安的峥嵘岁月中，江雪有幸进入到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音乐艺术，奠定了她在艺术上的坚实基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江雪跟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出队奔赴前方，为抗日前线的部队战士和群众百姓做宣传慰问演出。虽然生活艰苦，但她的内心却始终坚定不移，怀揣着抗战必胜、国家必强的信念一步一步迎来胜利的曙光。

作为一名年少归国的老华侨，江雪自少年时期起就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对党有着极深感情和归属感。在延安的抗战时期，江雪是部队宣传的文艺主力兵，年轻热血的她始终积极参加党的文艺活动，感念党对她的关怀。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江雪参加排演了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为党中央和全体代表们演出。这次表演的经历让她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更加坚定了从事文艺事业的信念和决心。

正是怀揣着为党为国家奉献终生的决心，江雪在抗战胜利之后加入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工作团，之后在承德参加了冀察热辽军区胜利剧社。内战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江雪心系祖国安危，参加联中文工团排演歌剧《白毛女》《血泪仇》等，多次与秧歌队上街演出，宣传反内战要和平，动员青年参军。



江雪在延安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江雪由组织安排进入北平师大女附中工作，之后考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党务理论知识（现中央党校），其后在北京市宣传部理论教育处、文艺处工作，多次组织国家大型文艺庆祝活动，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一直到离休，她都是党文艺宣传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江雪的一生经历过硝烟战火的残酷洗礼，也亲身感受见证了祖国从建立到强大的伟大历程。她时时刻刻都感念党的教育和培养，因此她对祖国和党感情深重，爱国爱党成为生命中不可磨灭的情感和记忆。江雪全心全意地拥护党，全力奉献自己的力量，为了党的艺术工作坚持一生，这份赤诚情怀从没后悔，也未动摇。

初心未变：深情为国的时代精神

2019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作为一名有着突出文艺贡献的老党员，江雪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对她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仅是党和国家对她一生致力文艺工作的肯定，更是她这一生见证祖国强大最为骄傲的荣耀。

她说：“如今想起自己的一生，是党教育和培养了我，让我能够面

对困难始终坚持信念。虽然个人的力量十分微小，但是我为了党的艺术工作尽了全力坚持了一生。我一直跟着党，受到党的领导和指挥，抱着抗战必胜、国家富强的信念克服了许多困难。我深深地为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也衷心地祝愿党和祖国能获得更大的成就。”

少年时回到祖国，参加抗战、解放战争和文艺学习实践，江雪亲历过祖国的抗争和坚守，也相信强大的祖国是她的根，是她为之奋斗一生的梦。从最初参加抗日救国宣传队的热血青年，到后来奔赴部队前线演出的文艺战士，最后成为参与创作和管理的文艺工作者。江雪从来不止步于实践，离休后她再上任，积极投身于写作和记录，曾编辑、组织和编写晋察冀党史中的革命文艺史料内容。江雪说：“党的艺术宣传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用艺术作为手段来宣传党的宗旨和党的政策，这不仅关系到党的发展，更关系到每一位党员和群众的信仰。因此我一直把它当作是我的使命，而党对我的培养和爱护是我工作实践最坚定的力量。”

回看自己与艺术作伴的一生，风雨沧桑，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而如今江雪却还是觉得自己做得远远不够，奈何年事已高无法再有所行动，只能将祝福送给党和祖国，将情怀深植于心间。她的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尽管经历过挫折和苦痛，但她仍然相信党和国家，仍然坚定奋斗为国的信念。江雪的一生，是一段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展现了一个国家的恢弘历史，将一种爱国爱党的伟大精神熔铸于灵魂，让一代又一代的人永生铭记，用心传承。

执着信念：感怀侨梦 祝福祖国

当无情的岁月流逝，光阴荏苒，当鬓发染上风霜，一生经历成为故事，每一个年轻飞扬的面庞都会磨砺至如今的耄耋沧桑，而最令人感动的便是那份经过岁月洗礼却依然执着坚定的心，依然在守护和祝愿着党和国家。

江老时时刻刻感念党和国家对她的关怀，作为一名老归侨，她的心



江雪（第一排左一）参演歌剧《白毛女》

与祖国紧紧相连，她的一生都和革命的艺术工作相伴。说到如今未完成的心愿，江雪说：“进入老年以后身体大不如前，不能再有精力为国家做贡献，只能希望自己还能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取得更多繁荣富强的成就，真正成为世界大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我这一生也算是有信仰有意义，不愧对于祖国也不愧对于党。”

江雪为人真诚，襟怀坦荡，回忆起战争年代，她情绪激昂，对党的革命事业忠贞不渝，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历次运动中，她始终保持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本色。虽然行动变得迟缓，然而脑海当中的革命记忆却格外清晰，对于党和国家的感怀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更为珍重。

什么是侨之梦？是无数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凝聚一心共同为国的梦想，我们在江老身上看到了。不忘初心，薪火相传，这种爱党爱国家的精神早已深深融入她们的心间，闪耀着最为纯粹最为珍贵的人性光辉，深深感染着我们，是我们前行道路上的榜样。

作为老归侨，江雪十分感谢北京侨联对她的关心和爱护，让她在祖国有了更多的归属感。她说，祖国是所有侨胞的根，是一生的信念，手

足同心、血脉相连。侨胞们应当团结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她也希望，国家能够对海外侨胞、华人子辈给予更多关注、关心，让他们时刻铭记自己的祖国，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和工作，对于在海外成长打算回国发展的青年也应当给予帮助，大家团结一心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

（作者：姚灿）



蒋文雄，男，1926年生，泰国归侨，曾任职于北京市建工局第一构件厂，曾任北京市侨联泰国归侨联谊会监事会监事长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雨打飘萍少年勇 风雨不变赤子心

——记北京市建工局第一构件厂高级工程师蒋文雄

岁月流逝，从满头青丝到两鬓苍苍，归国五十余载的他历经风霜，初心不改。沦落异邦流浪汉，别井离乡，尝尽灾和难。穷眼桑梓云漫漫，梦中慈母思肠断。一唱雄鸡天地转。柚子欢归，甘把青春献。装点江山流血汗，秋风秋雨终无怨！这首蒋文雄先生填词的《蝶恋花》便是他一生的最好写照。

国之兴亡 匹夫有责

上小学的第一天，蒋文雄就和他的同学们上街举行爱国募捐。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侨胞在“反日大同盟”的领导和号召下，每个人出钱出力，为的就是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国之兴亡，匹夫有责，蒋文雄等旅泰华侨积极开展抵制日货，惩罚奸商等抗日爱国活动。在电影院开始播放电影之前，都要先播放一遍《义勇军进行曲》。歌曲响起时，全场往往起立齐唱，气氛十分激昂。

那时候的泰国政府已在政变后被军方控制。军政府对内压迫人民，迫害欺辱华侨；对外狐假虎威，投靠日本。军政府还查封了华人华侨所开办的学校，蒋文雄所在的学校也因此被查封。他回忆说：“学校最后一次召开全体师生告别大会，会场哭泣声声，会后我们恋恋不舍地告别老师和同学，背着书包哭着离开学校。”辍学后，年仅十二岁的蒋文雄先生只好走向社会，开始了当学徒的艰难生活。

1941年，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将魔爪伸向了东南亚。泰国被日本占领，华侨和泰国人民蒙受这同样的国恨家仇，愤怒的火焰在中泰人民中燃起，这时候的中泰人民已经别无选择，同仇敌忾的人们联合起来开了抗日运动。在泰国革命组织“反日大同盟”的领导下，被组织起来的人们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遍布全国的抗日组织分布在各行各业，利用各种方式打击侵略者。爱国人民建立起抗日义勇队，在深山密林建立起抗日义勇队基地，筹备武器装备，开展军事训练，准备用枪杆子来赶跑日军。

蒋文雄所参加并主持的抗日组织“泰国机器工人总会”汇聚了这个行业大部分的爱国青年精英、仁人志士。作为义勇队的一员，他与成员们一起，有组织地进行罢工、怠工、制造废品破坏日本军用生产，为义勇队制作武器。

“在义勇队中，有一个支队，是‘机总’青年组成，称为别动队，

在义勇队总部直接领导下，执行特殊革命任务。”蒋老回忆说，“‘机总’还选派不少骨干支援其他抗日组织。在祖国的抗日和解放战争中，‘机总’不少青年同志，响应组织号召，满怀爱国热情回国参战，为祖国的解放做贡献。”

茫茫原乡对唐山

日本投降后，泰国亲日反华政府倒台，开明的抗日民主派当政。他们和华侨抗日组织合作，组织了中泰混合保安队，处理汉（泰）奸挑拨中泰两族人民的纠纷。在联合召开十万人的庆祝抗日胜利大会和打击汉泰奸的“反奸大会”后，抗日义勇队转变为反奸团及纠察队，任务是打击泰奸、汉奸，保卫进步组织和各种集会、游行队伍的安全。

抗战胜利后，蒋文雄等华侨和所有的中华儿女一样，迫切地希望被帝国主义蹂躏百年、被日本侵略者践踏的祖国可以从此安定，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祖国大地上已经容不得更多的战争了！蒋文雄和其他的爱国侨胞一起，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一意孤行挑起内战的可耻行径：“要和平，反内战！”

可是，内战还是爆发了。内战爆发后不久，蒋文雄就接到了噩耗传来：母亲被反动派残忍杀害。他的母亲是一位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支持父亲参加农会及赤卫队；还担任过党支部委员、爱国妇女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汉奸带领日军烧毁了蒋文雄的房子，母亲也被日军抓捕，所幸的是，在党组织和乡亲们的帮助下得以逃离魔窟，免于受难。可是，就是这样一位老党员，在内战爆发后的1946年9月，母亲受组织委派夜里回村活动，由于叛徒出卖告密，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包围逮捕。因为拒绝出卖党的秘密，母亲被迫害后光荣牺牲，父亲也因为承受不了家破人亡的巨大打击，精神失常并走失。

此时泰国又发生了政变，亲日派投靠美国，与国民党反动派大使互相勾结、雇佣流氓来大肆迫害华侨和进步人士的可耻勾当。1948年6月

15日，内外勾结的反革命分子出动大批军警，突击逮捕了进步华人教师 and 各界代表人物数十人，接着又查封了所有华校，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六·一五”反华事件。一时间，侨社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在危机时期，纠察队负起保护进步群众和左派进步组织据点与财产安全的责任。蒋文雄和他所在的“机总”队员担负起进驻进步书店守夜放哨的责任。

游子归把青春献

回忆起新中国的成立，蒋文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三年解放战争，胜利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诞生了！我们太高兴了，激动地落泪。我们多少年的奋斗、流血、牺牲和追求，终于实现。”

刚解放的祖国百废待兴，1952年蒋先生接到组织的决定，在第二年回到祖国，参与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伟大愿望在蒋先生等海外华侨的心中深深扎根。

“吾心不安处，非吾乡者亦吾乡。”接到撤离回国的通知后，蒋文雄对旅居多年的异国他乡有着些许不舍。泰国山水的亲切，对众亲友的依恋，尤其是那个无儿无女的老妈妈（蒋文雄先生的伯母）还等着他来养老送终。

蒋先生何曾未有过烦恼、痛苦？但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服从了组织的调动，于1953年11月9日听从了祖国的召唤，秘密离开黄金半岛，奔向祖国。

归国之路如此艰难。过重洋、闯激浪，还遇到台风的袭击，蒋文雄归国的轮船终于进入了祖国的领海，随着轮船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他终于缓了一口气：祖国啊，海外孤儿回来了。蒋老回忆自己从汕头上岸，政府和侨联热情的接待和慰问的场景，常常使他热泪盈眶。

蒋文雄按照组织的安排，从汕头到广州、台山，最后又回到广州学习。邱及同志还特地从北京赶来看望、安排归侨们的学习工作。广州学习结束后，他又乘坐专列到北京，在中侨委边学习边参加干部学校工

作。干校建成后，他还担任了学习班的班长。

中侨委学习结束后，蒋文雄本可选择进入大学继续学习，但是一想到国家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还需要更多的人投入，自己又拥有一技之长。因此，他再三要求进入工作一线，并终于得到了组织的批准，被调任到北京建工局某新建厂。那是苏联援助的千人大厂，使用的是新式工艺、新式技术。在总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的领导合作下，蒋文雄和他的工友们克服了生活和工作中意想不到的困难，提前完成了全厂机械设备的安装、调试、验收工作，受到了领导的肯定与表扬。

1962年，蒋文雄进入了第二个苏联援助的千人大厂的建设工作，这个工厂的工艺和装备更加复杂。但是，刚刚开始筹建时，中苏交恶，协议合同派来的建设专家也全部毁约。价值千万的上千吨机械设备堆满永定河畔，长久的日晒雨淋会让其变成废铁。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期，蒋文雄所在的工厂临危受命。他担任起设计组组长一职，经过



泰国归侨联谊会看望蒋文雄（中间）

一年多时间的努力，不仅完成了任务，及时投产，还改革了不少不合理的工艺。因为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蒋文雄被提拔为高级工程师。

改革开放后，蒋文雄仍不忘利用海外亲戚朋友的关系，动员了一批又一批华侨来华建设、投资、帮助家乡。回到泰国探亲之时，更是感慨万千，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带领国家走向民族富强，也受到了海外侨胞们的高度评价：多少代华侨的强国梦，竟然成真！

（作者：徐山泉）



李林，男，1929年生，菲律宾归侨，曾任职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一片丹心与国同梦 光阴不改赤子本色

——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离休干部李林

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毅然放弃所有，帮助国家创办第一个在菲律宾境外用菲律宾语广播的官方电台；倾注暮年精力编撰《菲汉词典》，增进中菲邻里友谊；鲐背之年余热仍存，为国奉献初心不改。走近菲律宾归侨李林，学习他与国同梦的点点滴滴。

与国同梦 创办菲律宾语广播

早在1952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俱兴，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准备开设菲律宾语广播，但由于人才和技术的缺乏，一直未能实现，直到1961年，中国广播事业局对外部、中联部和国务院外办三家讨论研究，最后决定到菲律宾去找懂菲律宾语的广播人才，最后找到了李林。

李林没有辜负祖国对他的期望和嘱托，他放弃了在菲律宾拥有的一切，带着三岁的女儿，一家三口回到了北京。回国后，李林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一边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筹办菲律宾语广播，一边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菲律宾语，分设初级班和中级班，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菲律宾语干部。

1965年6月，李林和中级班的几位归侨来到电台做开播前的准备工作。每天上午翻译3000字左右的中文稿，下午录音，翻译、审稿、定稿、录音、监听、审听，这样演练了四个月，台领导认为差不多了，便邀请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许立和他的秘书吴映平来审听，他们两位都是菲律宾归侨，审听了录制的菲律宾语节目后说：“可以了，完全符合要求。”于是，历时十多年波折，1965年10月30日，菲律宾语广播终于正式开播，成为当时世界各国广播电台中第一家有菲律宾语广播的电台。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林的节目非常成功。“我们是第一个在菲律宾境外用菲律宾语广播的官方电台。菲律宾反华势力派人时刻监视着咱们广播播报的内容，他们都不相信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坚信是菲律宾本土国民录好邮到北京来播报的，他们的侦查特务怎么找都找不到一点线索。”回忆起这一段，李林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此外，李林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一些菲律宾的文艺作品，如菲语剧本《顿洛区的纽约人》和《黑暗中的孤独》、故事片《飞蛾》和《我

们的过去》以及多首菲律宾民间歌曲。还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学卷》中，编写了“他加禄语”条目。1983年4月，菲律宾话剧团来京，剧团在北京人民剧场演出了菲律宾独幕话剧《顿洛区的纽约人》和《黑暗中的孤独》，李林还为担任女主角的北京人艺话剧演员李婉芬进行同声传译。

为了表彰李林对推广菲律宾语和促进中菲两国友谊和文化交流所做出的突出贡献，1987年，菲律宾最具权威的学术团体——菲律宾语教授协会给李林颁发了一枚荣誉勋章，李林将这枚勋章捐献给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1989年离休后，李林继续编写《菲汉词典》。这部字典从他回国前就开始编写，回国后，由于工作繁忙，断断续续直到离开工作岗位后才有充分时间继续编写。最终，这部《菲汉词典》于1993年在菲律宾出版，序言由菲律宾语言发展署主任奔舍诺·帛尼查博士（Ponciano Pineda）撰写，“这部词典的主要特点是权威性。我相信作者达到了他编写及出版这部词典的目的，即帮助本国以及中国对菲律宾语言和文化感兴趣的中国青年学习菲语。李林的《菲汉词典》对菲中词典有特别的贡献。”

一片丹心 与时代同行

1929年出生于菲律宾的李林，父亲是福建厦门人，母亲是菲律宾人，兄弟姐妹众多，繁重的生活压力像一座大山压在这家人的肩上。在马尼拉马波亚工程学院学习时，李林一直保持半工半读的状态，直到毕业后进入一家建筑材料公司工作，一家人都靠着外出打工来维持生计。

1952年，新中国有意筹办菲律宾语广播，但一直没能成功。当时已经有一位菲律宾专家，但他是菲律宾人并不懂中文，也没有编播人员，因此，1961年，中国广播事业局对外部、中联部和国务院外办三家讨论研究，决定到菲律宾寻找播音员。“组织找到我，说祖国现在需

要中国人自己做菲律宾语广播，你愿不愿意回国？我立刻就同意了。”李林回忆道。

“菲律宾政府把他加禄（又译‘塔加洛’）语定为官方语言，称为菲律宾国语。这种语言主要是在菲律宾北部，尤其是在马尼拉及周边地区使用。我是生在菲律宾中部的米沙鄢岛，说的是当地的方言。这种语言与他加禄语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在当地学校里也学过他加禄语，但是肯定还不能满足办广播的要求。”为了完成好祖国交给他的光荣任务，提高自己的他加禄语水平，李林决定再上大学。1962年，李林在马尼拉远东大学学习菲律宾语专业，后又转入东方大学。在校期间不仅专心听老师讲课，而且课后利用一切时间，广泛阅读他加禄语书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菲文报纸及其有关语法和写作方面的书籍。为了更好掌握这一语言，他又转到马尼拉奎松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并于1964年获得菲律宾语专业硕士学位。他的硕士论文答辩深受导师的赞赏，推荐他到一所大学教菲律宾语，但李林当时已经准备回国，便以要去香港做生意为由拒绝了导师的好意。

就这样，李林毅然放弃了在菲律宾的一切，怀揣着满腔热忱，选择了为祖国效力、为人民奉献。

1964年，中菲尚未建交。归国之途道路坎坷。“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如何让父母同意自己远涉重洋回到中国，是摆在李林面前的现实难题。“我当时骗了父母，和他们说去香港做生意。”就这样，李林瞒着父母开启了归国之旅。“我带着全家从菲律宾到香港，从香港再到广州，又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这一路从南到北，虽然路途越走越冷，但心却越来越暖。”

不改本色 鲐背之年余热仍存

为国家广播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李林却不曾向国家索取什么。回国后，一家三口挤在不足20平方米的公房里，后来变成一家四口，却

还是这间屋子。再后来，孩子们长大并有了自己的家庭，老两口还是生活在这蜗居之内。家里的摆设除了李林用来写作的一台电脑和平板外，其他家居用品全部都是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旧物。

方寸之间，看到的是李林一家坚守清贫、甘于奉献的宽广胸怀。“当时国家准备好了外籍专家楼给我们，但是我不想当外籍专家，我是中国人，要和自己的同胞们在一起！”这是多么简单而又诚挚的赤子之心，为了全心全意为祖国效力，体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归属感，李林主动注销了菲律宾护照，加入了中国国籍。

老当益壮，这是对李林最好的写照。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那一年李林79岁，是最年长的志愿者。当他手捧《奥运涉外安保外语志愿者聘书》时，难掩激动之情：“百年奥运的梦想终于实现，作为一名外语工作者，我有责任为祖国贡献一份余热。”

如今，已是91岁高龄的李林仍笔耕不辍，孜孜不倦投入到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中，1993年编写出版了《菲汉词典》，又准备出版《汉菲词典》。他非常关注年轻一代的成长，经常参加北京市侨联菲律宾归侨联谊会组织的捐赠活动，资助了不少生活困难的大学生，为国家的未



李林（前排右四）参加侨联活动

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忆往昔峥嵘岁月，李林感慨万千。“1976年，父母和家人来到北京看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挤在这间屋子里。看到我们的生活比较拮据，父母回到菲律宾后，海外的亲戚们经常寄来家用电器，有一次寄了一台电视机，整个楼里的小孩子都来我家看电视，这屋子里满满的人，真是特别有意思！”

现在，面对祖国取得的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李林心中充满了自豪感。“现在，是我们在国内买东西寄给国外的亲戚，国货现在做得特别好。”

为祖国奉献而不求回报，李老归国多年，仍守护着当年踏上归国旅途的初心和使命，“我自豪！特别自豪！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繁荣，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越来越幸福，远在海外的侨胞们也更加自豪。”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李林对祖国淳朴而又真挚的情感。

“祝愿我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愿我们的人民生活幸福，祝愿远在海外的侨胞们顺利安康。”这是一位91岁高龄的归国华侨对祖国的深深祝愿。

（作者：王思蕴）



李越果，男，1924年生，越南归侨，曾任职于国家发改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心系下一代 我们身边的“活雷锋”

——记国家发改委离休干部李越果

2007年10月24日，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极大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全国都沉浸在这巨大的喜悦之中。激动之余，李越果开始查阅资料、撰写讲稿、举办讲座、奔走于各大小学。在三尺讲台之上，他生动、形象地比喻让孩

子们对航空知识更加了解，讲述到我们国家的航天科技的发展历程，让孩子们更加明白成功的来之不易，“嫦娥一号”发射成功的意义非凡……

谁能想到，进行这一系列工作的是一位已经年过古稀的老人。顺利开展那么多场讲座对于李越果而言并不容易，但他却乐在其中，不辞辛苦地前后工作。这一场场讲座满足孩子们的探求科技兴趣、丰富了学生的科学知识，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李越果满身的荣誉，他是“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被评为“北京市活雷锋”“全国精神文明先进模范人物”，在国家发改委退休干部局出版的《金色夕阳——特色老人》一书中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北京电视台上门采访并播出了对他的报道，中国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和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将其列入《共和国功勋人物》。在第八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他被评为“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在历时4个月，在2000多万北京市民中选出500位“身边雷锋——最美北京人”，李越果便是其中之一。2019年，他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在李越果的身上，有数不清的诸多荣誉、成果与赞扬，但他却并不追求这些标签化的名誉，而是真真切切地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为党、为国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风雨青春路 一颗中国心

1929年1月，李越果出生在越南一个侨商家庭，他是辛亥革命时期因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后被匪特伏击暗杀的李卓峰烈士的侄孙。祖辈和父辈都投身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从小受到家庭教育的熏陶，在内心深处他始终不忘自己是中国人，要回到中国去。1946年8月，他在高中毕业时义无反顾选择要回到中国，后就读于厦门大学。旅途中，他既疲惫但又向往着、期待着踏上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靠近海岸时，他更

是难掩心中激动之情。

回国之后，他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也在时时刻刻关注着革命情况，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之中。在大一学习的同时，他积极参与了反饥饿反内战、抗议国民党镇压台湾人民起义等进步学生运动。1948年底，国内局势不稳定、烽火硝烟，他的父母劝他回到家中，送他去西方国家留学，但他却选择留在祖国，留在最需要他的地方。

当时，已经加入共产党的李越果在党组织安排下，奉命与几位青年党员侦察国民党在上海西郊防御工事，以配合解放上海的作战计划。建国后，准备读大三的他被调往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从事管理工作，随后又在华东文教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工作，任副巡视员、高级经济师。任职期间，他曾被下放过，也曾在中南海工作过，但无论处在什么岗位，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百姓着想，直至1990年12月退休。

潜心科普教育 为国为民为党

退休的生活安静舒适，但李越果却怎么也“闲不下来”，他想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能够为人民再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特别关心培养下一代的教育事业，放弃舒适的退休生活，开始着力于对小学生们进行品德和科普知识教育。他经常说：“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不能忘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试验，将下一代培养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老党员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

退休过后，他开始潜心开展对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地为这一份事业辛勤付出，兢兢业业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而忙碌。他义务对北京育才学校、团结湖小学学生进行品德和科普教育，同时也开展着其他小学的讲座活动。因此，他被北京育才学校评为“好长辈”，被团结湖小学聘为“少先队校外辅导员”。

他的科普教育博古通今、结合中西，在讲座中不仅为学生们讲述哥

白尼、伽利略、居里夫人、牛顿等西方科学家的故事，也会讲述祖冲之等中国科学家的事迹。小学生正是对世界好奇心非常旺盛的一个时期，李越果的科普教育始终集思想性、知识性、基础性、通俗性为一体，通过通俗化表达方式，满足对世界的好奇，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增加有益的科普知识。

不仅如此，李越果的科普教育还紧跟时事，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能够让学生们拓宽视野，树立理想，增强担当。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他花了3个月查阅相关资料，为同学们讲解传染病的科普知识，讲述着疫情背后“白衣天使们”的故事，正是她们的付出牺牲精神，在生死线上“拉”回了许多人。2007年，我国成功发射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他又开始记录与查阅资料，为同学们讲述我们国家航天发展的历史……

李越果认为，科普教育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在讲课同时，要更注重帮助学校开展科普实践活动，通过更加直观的角度获取知识。他积极参与和开展“太空种子”种植活动，帮助建立起神州科研小组，后来这个科研小组在“科技奥运、梦想航天”全国青少年航天科技体验活动中所撰写的报告活动获得全国竞赛的二等奖和三等奖。

心系贫苦学生 关怀困难家庭

走进李越果同志的家，可以看到这小小的屋子内摆满他和他资助过的学生们的合影，还有学生们的一幅幅奖状和证书。2007年，他从电视上看到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栏目，其中有关于中国青年基金会资助贫困大学生的“圆梦行动”节目报道。当看着这些孩子寒窗苦读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但却因为经济原因会放弃读大学的机会时，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决定分两次共捐赠15000元，分别资助了3名来自河南、天津、内蒙的贫困大学生，随后又陆陆续续地捐赠资助了10多名贫困大学生，



1959年，李越果（中间穿黑衣者）参加湖南劳动锻炼摄于韶山毛泽东故居

让他们都顺利入学。不仅捐赠，李越果还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解答他们思想上遇到的困惑、帮助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他所资助的一名学生，在天津以607分的好成绩考入北京科技大学，但因为父亲去世、体弱多病的母亲靠一些手工线活来补贴家用，面对高额学费感到一筹莫展。因为李老的捐赠，这位贫困学子得以顺利入学，圆自己的大学梦。见面时，这位学子带着李越果走遍校园的角角落落，把自己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都娓娓道来。李越果担心天气转凉，还特地为他买了一件外套，这名学生特别激动，对李老的关心帮助非常感激，并说要多去看望李爷爷，不辜负社会培养。在李越果的家中，还珍藏着一瓶几年前延安出产的小米，这是延安育才学校送来感谢他的，但他却不舍得吃，想保留着做永久的纪念。

他也一直关注着那些因为灾害而受难的地区，在2008年前往越南拜谒母亲亡灵期间，得知我国南方遭受严重冰冻灾害后很快返国，第2天向灾区捐款3000元；为汶川大地震第一时间交特殊党费2000元、为玉树地震捐了1200元，舟曲泥石流灾害交特殊党费2000元，捐款500元，得知中国侨联负责重建北川中学，在第一时间赶去捐款2000元……

他也一直关注着那些因为灾害而受难的地区，在2008年前往越南拜谒母亲亡灵期间，得知我国南方遭受严重冰冻灾害后很快返国，第2天向灾区捐款3000元；为汶川大地震第一时间交特殊党费2000元、为玉树地震捐了1200元，舟曲泥石流灾害交特殊党费2000元，捐款500元，得知中国侨联负责重建北川中学，在第一时间赶去捐款2000元……

粗略算来，李老已经累计捐赠了20多万的善款。有人曾采访：“您

那么大的年纪了，为什么花费这么多力气和钱财来做这些公益事情呢？”他淡淡回答：“为国、为民、为党”。

这位老人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这片他所热爱的土地，他用自己的言行来诠释了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党员，而正是因为他的帮助，让更多的孩子有了希望，让善良和希望能够像一根火炬一样，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

（作者：杨春炜）



林玉香，女，1929年生，泰国归侨，曾任职于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岗位平凡 境界不凡

——记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离休干部林玉香

利用社会关系，积极参与抗战宣传，为抗日募捐；三年困难时期，想方设法做好单位后勤保障工作；改革开放后，致力于促进中泰文化交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林玉香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把她对祖国的爱通过点滴行动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份平凡工作都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将简单的生活缔造出不简单的境界与人生。

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认真的做好每一件小事，每个人都为实现中国梦前进一步，这或许就是林玉香的故事背后蕴含的精神财富。

积极联络为抗日募捐

林玉香出生在泰国，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下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生在有八个孩子的大户人家，家里男孩子可以上学和在家里做工，但林玉香必须跟着姐姐到工厂做工，补贴家用。

曼谷六点的早晨已经大亮了，林玉香跟着姐姐早早起床，简单梳洗后就要匆匆忙忙赶往火柴厂，帮工做火柴。辛苦劳作的一天当中，当收工的铃声一响，就是林玉香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收工后，她就可以与朋友一道，参加工会和各类抗日组织的活动，接受思想的洗礼。

1941年，日军借道泰国，与銮披汶政府签订了《日泰同盟条约》，将泰国拉进了“大东亚战争”的侵略者阵营，标志着泰国正式成为法西斯的军事同盟中的一员。彼时，泰国物价飞涨，物资极其紧缺。更可怕的是，泰国出现了伤寒，而林玉香的妈妈也不幸染上了伤寒。为避免传染其他家里的成员，孝顺的林玉香一人扛起了照顾妈妈重任。在感染区，林玉香看到每天都有病人死去，处处是患者的呻吟，她在照顾妈妈的同时，坚持跑前跑后，为同一病区的人送水送药。

热心助人让林玉香得到大家的称赞和认可，慢慢地家有难事的华人都愿意找林玉香帮忙，加之父母之前开了个小工厂，有一些人脉资源。林玉香就开始利用这些社会关系，积极联络当地华商，进行抗战宣传，并为抗日到处募捐，为抗日提供力所能及的一些支持。

历经坎坷坚强好学提升自我

1949年中国解放了，在泰国，进步的华人华侨受到国民党和泰国政府的迫害。林玉香向往新中国的美好，告别父母，回到了新中国。

回国后，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化知识。最后，她不仅自己读书认字，还成了夜校的老师，被评为全省先进。

1955年，林玉香和同是泰国归侨的王克结婚了。王克曾任泰共中央委员，他的身份让家庭在文革时期受到冲击。文革前夕，王克回到和平里的家中，神色凝重地告诉已经生下三个女儿的林玉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要爆发了。王克带着全家人一起去照相馆照了合影，并且告诉妻子，这也许是最后的照片，如果实在熬不下去，不如使用家里的煤气……没有等丈夫说完，倔强的林玉香就打断了丈夫，她让王克放心，“再苦再难我们绝不会寻短见”。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出现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在中侨委食堂工作的林玉香，为了克服粮食紧张的困难，改善大家的伙食，想方设法对食堂的菜式菜样进行了创新，让大家吃饱、吃好。

林玉香一边工作一边还要照顾三个孩子，有一次三个孩子同时患了恶性痢疾……生活的艰难并没有打垮林玉香，她甚至连一丝怨言都没有。林玉香的坚强好学也深深地影响了孩子们，1976年恢复高考，四个女儿全都考上了大学。

干一行爱一行发光发热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地贯彻落实《五七指示》，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林玉香也是中一员。1969年，林玉香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负责养猪。

刚到干校，林玉香两眼一抹黑，从什么都不会。更要命的是，她面对的是一无所有的养猪场。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拧劲儿，林玉香从头学起，每日起早摸黑地劳作。三年的时间，养猪场从一无所有到能够为七百人干校提供吃不完的猪肉，这让林玉香远近闻名。

1971年，林玉香随丈夫回到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尽管此时

她已经40多岁了，她又开始学习英语。林老说，活到老，学到老，当时学习英语不是为了充实自己，而是为了能够更有力的扛起国家和人民交给自己的责任，不断提升个人修养，进一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鉴于她的优异表现，1971年，林玉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她又被调到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工作。

改革开放后，林玉香和泰国的亲属恢复了往来。她前后回去过16次泰国，每次到泰国，她总是带着任务去，要么传播中医养身文化，要么交流美食文化，为促进中泰两国的文化交往和友谊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

干一行爱一行，任劳任怨，乐于奉献，始终对生活充满热爱，这位快乐的抗日老战士对工作和生活的乐观态度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2013年，84岁的林玉香得了子宫内膜癌，术后又发现脑萎缩，记忆力和认知能力都不太好。今年，91岁的林玉香还是每天笑呵呵的，充满了正能量，每天都坚持读报纸。



林玉香生活照

每一份平凡工作都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将简单的生活缔造出不简单的境界与人生。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认真的做好每一件小事，每个人都为实现中国梦前进一步，这或许就是林玉香的故事背后蕴含的精神财富。

（作者：吴小意）



林仲茂，男，1932年生，菲律宾归侨，曾任中国声学学会功率超声分会主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超声世界 毕生耕耘

——记中国科学院声学所教授林仲茂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林仲茂教授凭借其对超声波事业的热爱，倾毕生心血，推动中国功率超声科研与应用领域的进步。作为“中国功率超声研究的奠基人”的林教授，目前我国超声波清洗设备生产领域仍是处于先驱地位的领军人物。

结缘超声 潜心研究

1956年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后，林仲茂就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从那一天起，林仲茂就与超声波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中国在功率超声研究方面几乎是空白，为了尽快缩短与国外的差距，中国科学院决定派林仲茂赴波兰科学院学习。四年中，林仲茂在导师的指导下刻苦努力，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大功率超声实验室，并完成了“高振幅、超声频固体振动的产生和测量”的论文研究工作，这项作为以后的功率超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3年初，林仲茂获得博士学位后，结束了他在国外的学习，回到中国科学院。当时超声学是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下属的一个研究室，功率超声是超声学研究室的一个小组。回国后，林仲茂开始创建新的功率超声实验室，在简陋的设备条件下，他当年就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超声疲劳试验设备。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已研制出超声加工、超声粉碎、乳化、超声清洗和焊接等专业设备，有些还得到了初步应用，但当时的科研成果大部分还未能进入到生产领域。为了把功率超声科研成果尽快应用到生产领域，1965年林仲茂带领两位同事与北京开关厂的技术人员开始进行协作攻关。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铜铝搭接处的电化腐蚀严重这一难题，林仲茂带领课题小组潜心研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研制成功了功率为250W和1000W的两种半自动超声搪锡设备，彻底解决了双面120*120mm²大面积铝母线均匀搪锡的问题。搪锡的铝母线经过三个月的连续加速循环试验，证明工作温度可以提高到85℃。采用此项技术生产的产品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单位连续使用5年后，结果证明性能良好。此项科研成果突破了沿用已久的前苏联标准，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有色金属，并使开关板向小型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北京开关厂在此基础上制订出了我国自己的母线选用表，并被列为部级标准在全国推广。

这项技术成果还被推广应用到电子工业中的无线电元件快速上锡工艺中，全国有许多家工厂利用该技术生产超声搪锡设备，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这项技术的成功研究和推广，是我国功率超声应用的一个重要成果，并被编入《母线的选择与使用》一书中。

上世纪70年代，林仲茂集中精力系统地研究功率超声换能器及变幅杆振动系统，并取得了重大进展，相关论文在国际超声学术会议上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为其出版第一部专著《超声变幅杆的原理和设计》奠定了基础。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他又研制出合成大功率超声振动系统，后来成功地用于超声冷拔钢管，并利用该技术成功生产出国际水平的高压油管。

上世纪80年代初，为培养功率超声方面的研究人才，林仲茂应聘到陕西师范大学应用声学研究所研究生班兼职任教，该所后成为我国最早培养功率超声研究人才的单位之一。首批毕业的研究生中，大部分已成长为我国超声波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在功率超声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林仲茂在超声科研领域的道路上不断攀登着，经过多年的研究开发，他在功率超声的核心部件——超声换能器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前，工业超声波清洗机采用的换能器是多螺钉夹紧结构，产品一致性差，频带窄，生产成本低且质量不稳定。林教授经过多年的实验和理论研究，终于研制出半穿孔结构宽频带压电换能器，在北京市医疗设备二厂生产的超声波清洗机上得到成功的应用，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半穿孔结构宽频带夹心式压电换能器”这一科研成果，于1985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该项技术成果后来被广泛应用于超声波清洗领域。

投身实业 无私奉献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学院声学所为了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进一步向产业化方向发展，成立了科声电子技术公司。1987年，

公司委派林仲茂寻找合作伙伴，同年他代表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组建了中外合资的“波达超声工程设备公司”，将科研成果和技术用于开发新型的超声清洗设备，主持超声方面的技术工作。此外，他将功率超声的知识传授给了一大批人，将他们带进了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超声波世界，使得他们能够在这个新的领域里大展才华，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很多人成长为新一代企业家，在深圳等地建立了自己的超声波清洗及焊接公司，在我国南方(特别在深圳)推动了现代超声清洗设备制造和应用的蓬勃发展。林教授将研究成果推向市场的系列行动实乃我国超声清洗设备行业崛起的一个里程碑。

自1988年成立深圳波达公司起，林教授几乎每年都要南下深圳，到深圳波达公司工作数周。他不顾南方天气的炎热，亲自到生产第一线进行技术指导，帮助解决超声波设备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难题。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林教授指导制订了一系列生产标准，从标准的酝酿、起草到制定，从实验到实践，多少个日日夜夜，林教授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到目前为止，各专业生产超声波清洗机厂家的生产标准，大都是这些标准的沿用引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林仲茂教授应该是现代中国功率超声清洗技术在大规模工业生产及应用领域的先驱和引路人。正是由于以林教授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和实业家对超声波事业的热爱和执着追求，才使中国超声波清洗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不忘初心 辛勤耕耘

尽管退休多年，林仲茂教授的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依然排得满满的，其中有些功率超声方面的学术研讨活动不在北京召开，林教授免不了要旅途奔波、舟马劳顿。但只要能为我国的功率超声研究和应用贡献自己的力量，再远再累他也从不推辞。虽然林仲茂退休多年，但他的科研理论水平仍然很高，一些学术观点和国外的发展水平是同步的。这是因为林仲茂教授一直都无比热爱他贡献了毕生的超声波事业，去图书馆或上网查阅最新

的超声波信息成为他每天必须要做的一件事。通过网络和电子邮件这个媒介，他仿佛又回到了中科院声学所的研究室，继续耕耘着他的事业。

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林仲茂和许多超声波设备生产企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退休后还不断有企业登门咨询或邀请他去厂里指导工作。作为一位在超声波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科学家，林仲茂从不摆架子，每一次都耐心细致地解答他们的疑问。

四十多年的耕耘换来了累累硕果，出版第一本功率超声方面的专著《超声变幅杆的原理和设计》，与人合作撰写《超声学》、《超声手册》，主持编写《化工百科全书》第二卷超声部分，1978年翻译出版《超声换能器材料》一书，林仲茂教授为中国的超声波事业和功率超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林教授还有多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重要奖项，发明了《油泵油咀深盲孔的超声清洗装置》、《工业酸度计电极的超声清洗装置》等专利，先后在有关清洗期刊上发表了十多篇文章。



林教授以中国超声行业的发展为己任，刻苦钻研、努力创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了多项科研成果，推动了行业的迅速发展。他身先士卒，主持超声方面的技术工作，培养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带动了我国

清洗行业的科技产业进步。但他深知，我国在这项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必须通过科研与应用领域的密切合作促进这一技术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此，他在超声科研领域中不断地探索创新，孜孜不倦地为中国超声清洗行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为侨之梦和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朱天然）



吕青，女，1926年生，菲律宾归侨，曾任职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何须浅碧轻红色 自是花中第一流

——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离休干部吕青

1926年，吕青出生在一个旅居菲律宾的华侨家庭。她从小努力学习，这为她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那突如其来的炮火，她的人生应当是安稳的。但是，1941年12月，日军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和造船基地珍珠港；仅10小时后，日军又对菲律宾发起了进攻。连天的战火让世界在二战的漩涡中越陷越深，也彻底改变了吕青的人生轨迹。

少年参与菲岛抗日

为了抵抗侵略，1942年3月29日，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在中吕宋山区成立。同年5月19日，分散于人民抗日军各支队的华侨队员集中自成独立作战单位，即华侨抗日游击队，简称“华支”。

参与抗日是吕青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她在菲律宾华侨中学院（原名菲律宾华侨中学）就读时就加入了抗日组织“抗日反奸大同盟”。利用学生身份打掩护，她在组织中担任发放传单、传递情报等工作。一天，她发现了一个“日奸”，但附近恰好没有组织中的武装人员；请示上级后，她又将消息传给友军。很快，该“日奸”就被铲除了。1945年7月4日，菲律宾全境光复。胜利的果实中，也有少年吕青的一份付出。

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怀抱

建国前夕，吕青又做出惊人的决定：离开家人，回到祖国。她和进步的同学一块，从菲律宾出发，经由香港辗转回到内地，又跨越广东，最后抵达福州。从菲岛到福州，山一程，水一程，行军三月余。在战火纷飞、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的年代进行这样的“长征”，不知需要承受多少苦楚。

据吕青回忆，他们常常一连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能够享用白水面条就是一顿大餐”。然而，他们不仅需要承受口腹之欲的折磨，还要时时面临对人身安全的威胁。那时候，广东、福建二省尚未彻底解放，地方武装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仍相当猖獗。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得不选择在白天隐蔽起来，在山沟里、破庙中、屋檐下休息；夜晚相对安全，他们便披星戴月、跋山涉水。行军的艰辛、危险可见一斑，克服了重重困难的青年吕青，拥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和炽热的情感！

吕青抵达福州后，加入了解放军福建文化服务团。少年勤学，青年

担纲。她将自己曾接受的教育转化为高强的工作能力，扎根岗位，踏实苦干。解放战争胜利后，她被分配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工作。因为工作性质特殊，细节不便对外披露。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吕青一直为祖国和人民辛勤工作。

侨联第二个“家”

如今，94岁的吕青已经退休多年。退休后，除了操持家务，她积极地发展自己的爱好。吕青儿媳张俊玲女士告诉我们，受到丈夫的影响，吕青喜欢上了钓鱼。一如那平静的水面，钓鱼最考验心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她常常在钓鱼活动中取得好名次。

吕青一直都有着平和的心态，对于寿命长短，她很达观。看到鲐背之年的她还能拄着拐棍到处溜达，家人就与她开玩笑说：“当个百岁老人已经不算什么了，你得争取活到一百一！”

钓鱼之外，吕青还喜欢唱歌。歌片、歌本买了半柜子，每周还必去声乐班上课，一上就是二十多年。这是热爱，也是坚韧。一家人围桌而坐，吕青带头放歌，全情投入，手比划着拍子，头也随着调子晃动，众人应和，殊为和谐。1949年夏日行军的她从未随时间远去，那样炽热的情感和坚定的信念历久弥新，至今仍在她的生活中焕发光彩。

近年来，吕青每天还会推着小车去紫竹院公园锻炼，参加合唱队练声。虽然已经94岁高龄，但借助拐杖还能自主行走，不禁慨叹于时间都格外优待吕青，许她以健康的身体状况和多彩的退休生活。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她也从未止步：从学生时代参与菲岛抗日；到建国前夕行军三月，回到祖国加入解放军；再到入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为祖国和人民奔波；到现在，她经常都会和女儿、儿媳去敬老院做公益，继续为社会发光发热。

作为北京市侨联菲律宾归侨联谊会的创始人之一，本身就是华侨的吕青对侨务工作非常积极。回想起从菲律宾归国的场景，父亲当时给了

她五十美元作为盘缠，她到达香港后，接待的同志曾说希望华侨能为建立前夕的新中国多尽点力量，她就毫不犹豫地把五十美元都拿出来，全交了党费。多年以后，她依然保持着对侨务事业的热忱。一旦得知要参加侨联的活动，她就会很兴奋，念叨着想见老战友、老朋友。战友于她，是过命的交情，他们曾并肩作战，保卫第二故乡；他们曾共历千险，回归祖国怀抱；他们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和人民燃烧青春。



吕青参观“我眼中的新北京”主题摄影展

在2020年旅菲归侨团拜会上，吕青见到战友们、朋友们，不禁热泪盈眶，再三哽咽。在场众人，无不动容。她也曾多次跟儿媳提及，“她想老战友了，是不是他（她）们都走了。”有时她站在窗前，望着空荡荡的马路若有所思，轻声说：

“看老战友呢！”战友之间的感情和他们一同度过的岁月一样宝贵，吕青对侨界的情感也和她对祖国的情感一样真挚。吕青的亲戚大多旅居菲律宾，她重情义，每年都会飞回去探望他们。但大多时候，她住在北京，侨联就是她和其他归侨侨眷组成的第二个“家”。她对这个“家”有强烈的归属感，“家人们”在节日里围坐团聚，不是亲人却都胜似亲人。

因为吕青曾从事涉密工作，她的部分经历不得不向世人留白，她至今仍保有战士的素养——守口如瓶。直到今日，她曾经的事迹、荣光、奉献也未见诸报端，就连她的家人也未知全貌，甚至还需要从她战友的回忆录、自传中，搜寻、拼凑她的经历。

“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这本是李清照咏金桂的名句，用它来形容吕青也再合适不过。吕青行事低调，不爱虚名，恰如清丽的金桂安静自持。金桂无意争芳斗艳，却使香满人间。吕青少时便心怀家国，并为之奋斗终身，“花中第一流”实至名归。

（作者：叶靖怡）



马梦亭，男，1925年生，泰国侨眷，曾任北京理工大学化工系实验室主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勇入革命烽火 潜心化工事业

——记北京理工大学化工系实验室原主任马梦亭

生于华侨家庭的马梦亭在家人的影响下投身革命解放事业，从热火的革命中得到锻炼成长，后来潜心于化工事业，投入工业建设的热潮。可谓是祖国需要什么学什么。他在校学习时，勤奋刻苦，成绩优异，留校后孜孜不倦钻研学术，培育出了一代一代的优秀化工专家，与祖国命运始终相依，为祖国事业发光发热。

潮汕烽火 少年立志

2015年9月3日的下午，北京理工大学在远志楼210会议室隆重召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90岁的马梦亭同志回忆了在自己哥哥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并在抗日烽火中成长的历程。

马梦亭，原名马余彦。广东省潮阳县和平里美乡人，出生于一个贫农兼华侨小商人的家庭。母亲柳顺是一个平凡、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父亲马成天从小在家乡务农，后因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不得不远涉重洋到暹罗(现泰国)谋生，是一个做小本生意供养家庭的普通商人，后返回家乡，耕地种田。马梦亭上有3个姐姐、2个哥哥，他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因家庭贫困，几位姐姐没有机会上学，大哥投身于革命事业，二哥是个小学教师。

谈起他的革命之旅，不得不谈他的大哥，马士纯。1929年秋，马士纯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曾两次被捕入狱，备受酷刑，坚贞不屈。生前曾任中共潮梅特委委员、兴梅中心县委书记，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深得党内外同志们的敬佩和爱戴。1941年11月11日，大哥马士纯病逝，年仅31岁，为避开国民党反动派耳目，隐名就地埋葬在揭阳县仙桥乡乌木山上，解放之后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马梦亭对大哥的逝世感到万分悲愤。他大哥先后在暹罗曼谷崇实学校、普宁兴文中学、揭阳南侨中学任教，培养的学生许多后来都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解放后的政治军事骨干。马梦亭是从小就在他大哥及其战友的影响、教育和培养之下，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

1935年夏，他大哥从暹罗回国不久，就带领他和马千、马兴勇到兴文中学读书，接受抗战教育。1938年夏，他转到揭阳南侨中学读书。南侨中学是潮汕抗战教育一面鲜明的旗帜，也是一个革命熔炉，师生团结同甘苦，邻里群众共呼吸。马梦亭在这所新型革命学校学习马列主

义，了解革命事业，不断成长起来。1939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曾任过小组长和南侨中学初中部学生党总支宣传委员。

革命战争年代，马梦亭的求学之旅是辗转且奔波。1940年夏，南侨中学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下令解散，他转到普宁流沙私立海滨中学高中部读书，1941年任该校中共党支部书记。

1942年，“南委事件”后，潮汕党组织暂停活动。同年秋，他在大哥老战友陈维勤、林野寂、萧野、吴孙光、江宁静、李坚等人以及大哥的学生洪昌周、郑明、陈达龙等人的协助下，顺利离开家乡潮汕，到达广西桂林。先是在桂林科学书店当职员，数月后入汉民中学读书，又得到大哥学生的帮助，离开桂林到贵州贵阳华侨第一中学读书。1944年秋，随校合并到四川江津华侨第二中学读书至高中毕业。

马梦亭数年间奔波各地，辗转抵达重庆后，得到邱秉经、黄声、杨少任、许涤新、杨世瑞、黄浩、方卓芬等和他二姊夫高铮如的帮助；1946年，经人介绍与协助，马梦亭经过数道封锁线于8月抵达张家口解放区。

当时正是1946年夏天，战云紧锁着祖国劫后的山河。日寇的铁蹄刚从我国的原野上敛迹，美帝又想伸来魔掌，国民党反动派磨刀霍霍，解放区军民正准备举起自卫的刀枪，片云片雨的战争已在部分地区时紧时松地进行着。

为继承大哥马士纯烈士的遗志，他别了蜀水巴山，东走南京、上海而北上天津、北平，通过青龙桥至八达岭之间国民党军队的3道封锁线，和许厚力两人，抵达华北解放区首府张家口。

从潮汕开展革命任务，到转折广西完成学业，从由南至北多省奔走，到奔赴解放区，这一路上，马梦亭离不开大哥英勇事迹和革命热情的鼓舞，也离不开大哥友人的帮助。

沉潜钻研 工业报国

1946年8月1日，马梦亭和许厚力到达河北张家口。不久后，许厚

力到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学习，他进入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前身为我党历史上第一所培养科技人才的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简称“工专”）学习，校长是恽子强（恽代英烈士之弟）。

9月中旬，因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张家口，“工专”奉命撤离，开始为时数月，行程千里的行军，最后到达河北省建屏县柏岭村老解放区重新办学。学校向老乡借房子作教室和住房，因陋就简，用土还垒成桌子与椅子，黑板是用稻草拌泥抹在墙上，再涂上烟囱中刮下来的黑灰制成。教员和学员大家一律过着“供给制”的生活，严格执行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员还要到数十里外的粮站自背粮食，秋收时帮老乡收割庄稼，灾荒时大家节约粮食支援灾民，自己拌树叶和野菜吃，每人一年要交100斤小米的生产任务。生活上虽然艰苦困难，但精神上是很愉快的。

1947年冬，因革命形势的发展，各条战线都需要大批干部去工作，“工专”学员全体陆续走上工作岗位。马梦亭被分配到山西省阳泉市企业部阳泉办事处和阳泉铁厂工作与炼铁，由于他的细致耐心与知识扎实，被选去为办事处处长徐驰（解放后任冶金部副部长）校对和出版编著的培养冶炼钢铁干部的教材——《炼铁学纲要》。

1948年6月，马梦亭经阳泉铁厂中共党委书记郑国览批准，由王毓贤与邵文柄介绍，调干到河北省陉井华北大学工学院学习。1949年7月



马梦亭生活照

随校迁到北京，考入机电班学习，期间因病休学，复学后转入化工系学习。1956年4月，马梦亭留校并在化工系第四教研室任实验室主任兼高级实验员，负责专业实验室的建设，并指导同学作实验。1958年，调任化工系供应室主

任，负责化工药品和仪器、机工、玻璃工、煤气工各室的管理工作，1965年调至学校器材处工作，1974年调回化工系61专业实验室任主任一职，1979年调化工系(基础课)601教研室当教师。1983年获“炸药专业工程师职称”。1985年离休，国务院为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干部离休荣誉证书”，享受司局级待遇。

离休后，马梦亭也不忘继续发光发热，1988年，他被聘请到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企业发展管理部当顾问，任期达9年。不仅如此，怀着对美丽潮汕的热爱，他时常追忆起少年时的革命事业，通过搜集资料编著了《潮汕烽火》。2014年由中共汕头市潮阳区委党史教研室进行出版。



从热火的革命中砥砺成长，与国家命运紧密相依，正如马梦亭《潮汕烽火》书中后记写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年代，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消亡，新社会如旭日东升，光芒普照祖国锦绣河山和全世界，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威风凛凛地站起来了。但是胜利来之不易，这是经过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和勇士们，抛头颅、洒热血奋斗牺牲才得来的，我们应该无限珍惜。在已逝去的黑暗岁月里，他们面对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唤起劳动人民，冲击反动阶级的统治，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马梦亭编著的《潮汕烽火》，由中共汕头市潮阳区委党史教研室出版

(作者：王海英)



孟惠芳，女，1935 年生，越南侨眷，曾任职于中国对外经济联络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漫漫人生路 唯务实而已

——记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公司离休干部孟惠芳

她在贫困家庭出生、在动荡岁月中长大、在新中国阳光雨露抚育下不断成长，她是历史中一个独立的个体，也是一位在时代浮沉中不断前进的女性。虽然经历许多磨砺，却仍然带着希望，勇敢地接受生活的馈赠与考验。

生活多磨砺，动荡中成长

1935年，孟惠芳生于辽宁丹东一个工人家庭。儿时目睹了残酷战争的她成长在一个艰苦但温暖的家庭：抗日时期，正值幼年的孟惠芳经常与哥哥姐姐一同在路灯下糊火柴盒补贴家用；而孟父又被日军抓去做劳工，足有7、8余月音信全无，后经同村人帮助侥幸逃脱，直到半年后才将伤病养好；孟母虽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只认识字，但她爱看古典小说，也常讲给儿女听。孟母也会作诗，当时的少年孟惠芳虽然听不懂这些诗词绝句，但母亲常念的“仄仄平平仄仄平”却深深的印在她的脑海；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孟惠芳的哥哥患上肺结核，由于当时国内尚没有治疗的方法，未到一年便去世了。

1948年，13岁的孟惠芳由于家庭困难，在念完小学后放弃了学业。起初她通过帮助他人做菜园除草的工作来获得报酬。当时正值东北解放，解放军开工生产正需要大量的工人，随后13岁的孟惠芳又报名加入了纺织厂的工作。

1950年由于抗美援朝，纺织工厂迁到佳木斯。历史的洪流呼啸着带来机遇与考验，而少年孟惠芳也随着工厂离开了家。

积极肯干，18岁的共产党员

五十年代初期，“郝建秀工作法”在全国推广，当时孟惠芳所在的纺织厂中表现突出的都是有良好读书经历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背井离乡的孟惠芳心中只有一个目标：认真完成工作。

初到佳木斯的第一年，孟惠芳在厂里负责擦铁锈等工作。当时厂里住宿条件很差，晚上工人就睡在木板房里的大通铺上。北方的夜晚很冷，每到半夜，室内取暖的炉子都会熄灭，第二天起床时眉毛都结了冰碴，厚重的棉被变得又冰又硬。虽然条件艰苦，但孟惠芳从不退缩，每

天埋头苦干，积极完成被分配的任务。

没有人知道，平时直爽能干的孟惠芳也有脆弱的一面。北方的夜晚来得稍早，每晚4、5点钟是她最孤独的时刻：这是过去一家人吃晚饭的时间。虽远隔千里，但母亲声声呼唤的“回来吃饭了！”，仿佛仍在耳边。

尽管面对多重考验，但孟惠芳从未退缩。不怕吃苦、积极肯干的孟惠芳很快成为了厂里的技术标兵，并作为厂里的代表去上海参加了“郝建秀工作法”的学习交流。

回到佳木斯市后，孟惠芳先后被评为纺织厂和佳木斯市的劳动模范。当时入党的要求很高，只有非常优秀的同志才能被吸收为共产党员，1953年，纺织厂车间主任介绍孟惠芳入党，时年18岁。

从1950年到1959年，孟惠芳在佳木斯纺织厂一共度过了九年的时光，当时的她不会预想到，这会是她前半生中一次相对稳定的工作经历。

1959年，孟惠芳被调回吉林，经半年的区委党校学习，到吉林纺织厂工作。1962年，孟惠芳与正在越南工作的王德伦结婚，二人的婚礼十分简单，“只摆了桌糖果。大家祝贺一下就结束了。”

婚后王德伦回到越南，第二年孩子出生，由孟惠芳抚养，平时有孟母帮忙照看。由于丈夫常年驻外工作，孟惠芳总是会听到孩子问“爸爸呢？”，这使她真正意识到父母的陪伴对孩子的重要性。

从容奔波，绝不退缩

1966年，孟惠芳奉调带着孩子来到北京，结束了四年的两地分居生活。从吉林调到北京，起初面对繁荣的大都市，孟惠芳有许多思想负担：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新的工作任务、新的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充满挑战的未知数。但为了孩子和家庭，孟惠芳没有退缩。

初到北京，她在中国对外经济联络部办公厅铅印所从事校对工作。

工作时效性很强，经常加班，内容严格保密。孟惠芳负责校对，校对工作要求严谨可靠，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通过不断的自主学习和勤奋工作，顶住了压力，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当时单位只有二十余人，工作十分辛苦，孟惠芳以身作则，对加班毫无怨言，主动顶班，从排字、拼版、校对、印刷、装订、拆版再到铸字，参与所有工序工作。在铅印所时，曾经有一次印刷时找不到一个对应的铅字，但她没有忽略这个问题，而是找到负责铸字的老师傅进行沟通：“不能没有这个字”，最后老师傅采取拼字的办法解决了问题，严谨圆满地完成了工作。

过去一直在工人圈工作的孟惠芳性格直爽，总是快人快语，到了新的环境，每天都要接触各部门人员，她便有意识地注意自己“待人接物”方式。

孟惠芳的工作表现被领导看在眼里，随后被任命为铅印所所长。当她受邀分享经验时，她只说：“以身作则，每个工序我都参加，哪里缺人我就到哪里。”

1977年，孟惠芳领导的铅印所被评为对外经济联络部的先进集体，全所同志与陈慕华部长及四位副部长合影留念。

期间，中央国家直属机关党代会召开，孟惠芳受党组织委派，与其他三位党员一起，作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络部党员代表前往参加，履行选举全国党代会代表的重要职责。

对外经济联络部与对外贸易部合并后，孟惠芳被调到成套设备进出口公司，先后负责文件管理、人事档案分类和登记等工作。

1983年，孟惠芳随丈夫王德伦至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工作，她在大使馆负责财务工作，处内人员少，丈夫作为参赞在“台前”工作，而她为了顾全大局，默默承担了“幕后”后勤工作，任劳任怨。二人于1987年回国。1990年，孟惠芳又随丈夫王德伦到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工作。由于人员精简，孟惠芳的工作任务更加繁重。

两次出国经历让孟惠芳感触颇深，面对过去的选择，虽有遗憾，但从不抱怨：“有的时候会觉得如果不出国，在部里也许会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从全局考虑，就默默支持。而且国外工作让我学习到很多，也遇见很多新鲜事物。”

1993年回国不久后，孟惠芳离休。离休后，孟惠芳同越南归侨的丈夫王德伦积极参加北京市侨联越柬老归侨联谊会的创建和各项活动，深切感受到国家对归侨的关怀和照顾，愿为联谊会的建设和发展出力。

漫漫人生，唯务实而已

“我的想法就是服从组织，服从工作需要，努力完成任务”，务实就是孟惠芳一以贯之的态度。回忆往昔，有舍有得。如今85岁的孟惠芳对新的时代感慨万分，也对新一代充满希望。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她



孟惠芳生活照

毫不自满，总是说“我是一个文化不多的人，就是一个普通人”。她认为，年轻人一定要多读书，要好好学习，对祖国做贡献，工作以后要认真完成自己的职责，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坚持下去，就是面对时代最好的成就。

“我现在很知足，赶上了好时代。满洲国、国民党、新社会都经历过，退休后，还有国家和领导关心，所以很满足。”

（作者：王楠）



农开清，男，1927年生，越南归侨，曾任地质部水文工程司副司长、北京市侨联越南老归侨联谊会副会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踏遍青山人未老 赤子之心寄“山水”

——记原地质部水文工程司副司长农开清

农开清一生与山水结缘，工作中，他不断追寻水的足迹，被亲切地称为“龙公”，他开采出来的水源遍及世界各地，正滋养着无数鲜活的生命，那些留在山川中的水利工程与时间厮守着，造福着一代又一代人。

脚踏实地 才能将山川江河装进心里

农开清出生于广东钦州（现属广西），幼年随父母在越南定居。日军占领越南期间，当地华文中学关闭，少年农开清随祖父回到钦州读中学。八年战火纷飞期间，农开清与父母的联系中断。为了考取大学，农开清初中毕业后又辗转进入陈济棠夫人创办的广州道正中学读高中。在校期间，他生活拮据，但因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获得学校免费生的资格。

1949年，农开清如愿考入了中山大学地质系，当时广州未解放，成为当年中大地质系仅录取的3个师范新生之一。1952年，农开清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工作。此后，农开清开始了与“水”的不解之缘。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地质人才稀缺，刚一上岗，他和同事便接到任务要绘制北京水文地质地图，当时物质匮乏，没有先进的测绘设备，许多地方甚至没有交通工具，农开清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用自己的双脚一步步踏遍北京的山山水水，终于绘制出第一份1:20万北京水文地质图。直到现在，他依旧对北京的地下水资源烂熟于心，哪里能打井、哪里能筑坝、哪里能建大型建筑，他都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954年，新中国开始计划建设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当时，农开清负责大桥主干线桥墩的工程地质勘察，这是建桥的基础。然而，他却要面对武汉长江地区地质资料几近空白的局面。建桥工程需要把钻机装在船上，钻船固定在江面上，再往江底打钻建桥墩。当时正值寒冬，施工环境恶劣，农开清要解决的问题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这需要勘探准确江底地质环境，同时要决策桥墩建在什么地层位置上。

桥墩要建在符合条件发育成熟的岩石面。钻探取芯打到岩层几百米，取上来才知道下面的情况。当时责任之大，环境之恶劣，工作强度之大，超乎农开清的想象。他干起活来夜以继日，一丝不苟，所有决策都建立在详实的实验数据上，因为他知道“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国第一

座长江大桥，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决不允许他有丝毫失误。

最终，武汉长江大桥在八条桥轴线中选择了第五线（即现在的通车线）进行详细勘探。这条线正是农开清负责勘测的线。农开清带着队伍，克服了水上施工的种种困难，在百年一遇的洪水中完成了勘探任务。大桥建成后，效益巨大，也为今后在长江建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为他对武汉长江大桥的杰出贡献，农开清获得了当年地质部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1955年，西安城市缺水问题凸显，严重影响了城市建设。农开清又被派往西安寻找地下水资源。在农开清的带领下，西安901地质队成功在泾河、灞河及渭河冲积扇地带找到了丰富的地下水源，解决了西安市用水的燃眉之急，为老百姓提供了安全可靠可饮用的自来水。

由于农开清工作成绩突出，完成多项国家重大项目，因此他多次被立功受奖。1955年农开清被西安市政府评为“西安市劳动模范”，同年被地质部评为“地质系统劳动模范”，由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颁奖，1956年国务院授予了农开清“全国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受到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多年后，因在北京城市供水和北京市地铁工程地质项目的突出贡献，1979年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奖章，1980年再次获得国务院颁发的“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农开清倍感光荣。作为新中国建设初期的知识分子，农开清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在奉献中砥砺青春，他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

化作一滴水 奉献时代洪流

上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农开清先后受祖国委派赴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地，他将自己化作一滴水，奉献给了新中国建设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

1965年，中国开始援越抗美，农开清当时被调至工程兵部队，负责修路修桥等大量军事工程，农开清作为总工程师。当时军事工程建设



农开清在越南

环境非常恶劣，常常工事还没建好就被美国部队炸毁了，桥梁、公路，军事工程都是美军轰炸的目标。

据北京地矿局局长宾德治回忆，当时他是农开清的助手。农开清与他一起负责钻机钻探。有一天，他带着施工队伍选地方准备宿营安营扎寨，农开清在大部队后抵达。当时宿营地选在一个渡口，考虑到前面是大河，工程部队有很多车队，工具、材料，没有船无法渡河，只好选择安营扎寨。农开清抵达后，坚决认为营地不安全，美国

飞机一定会来轰炸营地，他要求队伍立刻转移两公里外山沟中隐蔽。当时队伍里几乎所有人都不同意离开，天黑路难行，大家又饥渴难耐，刚安顿好装备驻扎下来。农开清坚决要求工程部队再苦再累也必须换地驻扎，部队连夜转移驻扎地，结果第二天大家再回来一看，原来停留过的渡口已被美军飞机炸平。农开清因为曾在越南工作过，熟知美军轰炸越南北方的情况，因此能带领队伍避免了一劫。

在战争岁月中，农开清骨子里对祖国的忠贞与热爱让他将自己的生死抛之脑后。他看到那些为了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士兵，内心被深深触动。农开清常说，自己虽无法上阵杀敌，但他却倾尽全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大部队，架桥铺路，在枪林弹雨之间奔波，为军队寻找水源、勘探地点，修筑工事。在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中，徘徊在生死边缘是家常便饭，但为了祖国，他从未想过退缩。

神奇“龙公” 架起中非友谊“桥梁”

1969年，应索马里政府的邀请，我国派出农开清为专家的水源队来到索马里第二大城市哈尔格萨市解决城市供水难题。在当地人眼中，农开清脸黑话不多，爱思索，是一位实干家。然而，从他那奇迹般寻水的业绩中，大家又会发出由衷的赞叹：“龙公”真是名不虚传，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找到了水源。

哈尔格萨是索马里北部重镇。多少年来，当地居民盼水、思水，祈求水，又受尽了多少干旱带来的痛苦与煎熬。殖民时代，殖民当局找了三十多年的水，钻了三十多眼井孔，但始终没能找到水源。1960年索马里独立后，又有不少外国专家应邀前来勘探，而结果都令人失望。市政府只得把两个大水塘里的雨水，一桶桶、一杯杯地卖给市民。到枯水季节或干旱之年，水塘干涸，许多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水谋生。留在城里的人靠汽车拉水维持生计。水价之昂贵，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农开清同志受命于困难之际，一到水源地，他就立即带领团队开展大面积的现场踏勘工作。哈尔格萨的哪一座山头没有留下他的足迹？哪一条沟谷没有闪现他的身影？崎岖山路磨破了他的劳动保护鞋，野生剑麻扎得他的手臂鲜血淋漓。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他终于发现了哈尔格萨北部花岗岩洼地断层交错、阶地残留的痕迹。凭着他丰富的学识，他判定很可能是大沉积盆



农开清在索马里

地，应该含有丰富的地下水。经过实践的检验，终于在地下二百米处证实了农开清的预见：那是一个古河道交错、沉积层较厚、含水层较好的古洼地。

农开清带领同志们一起，在哈尔格萨市先后打井八口，日供水量达九千吨。从踏勘到钻探成井，中国水源队仅仅花了九个月，解决了该地区百年缺水的大难题。谁说中国人效率低？先进的科学论证一旦与实干精神相结合，中国人不同样也能创造出外国专家望而却步的奇迹么了？农开清在东非之角寻水旗开得胜，不仅确证了花岗岩地区深钻成井是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且为加强中索两国的合作树立了一个范例。农开清本人也得到索马里总统的高度评价。

农开清作为水文地质学家化身可敬的“龙公”，成为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合作中的杰出代表，架设了中非友谊的桥梁。他的精神也有力勾勒出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脚踏实地，胸怀理想，奋力拼搏的感人风貌。

（作者：金丽萍）



舒璋，男，1928年生，缅甸归侨，曾任职于文化部外联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胜利来之不易 和平更应珍惜

——记原文化部离休干部舒璋

舒璋先生祖籍云南鹤庆，抗日战争时期跟随家人一起从缅甸回到云南昆明，回国后就读于云南大学。毕业后曾任职于国家旅游局美大处、文化部外联局、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等单位，曾陪同东方歌舞团出访泰国、新加坡及港澳地区，陪同中央芭蕾舞团访美。离休后，受聘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在香港人罗德承办的英文周刊《香港之窗》，

从事联络、采访和撰稿工作。

山河破碎风飘絮

舒璋是战乱时期跟随家人一同从缅甸归国的，回忆起当年父亲带着他们一家颠沛流离、四处逃难的悲惨日子，老先生痛感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和残暴、也更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

舒璋的父亲是舒子栋，幼年时，父亲在家乡云南省鹤庆县断续地上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练得一手好字。15岁到下关“鸿盛昌”当学徒。两年后去缅甸曼德勒，在“福春恒”当学徒，后来该商号更名“复协和”，他当了营业员。1942年4、5月间，日本人侵占了缅甸的仰光、曼德勒，直攻畹町，进入云南怒江西面的一片土地，即腾冲、龙胶一带。

舒璋同父亲、继母和收养的一个女孩，都成了难民。家里几个装衣服杂物的箱子已先期由卡车运到保山，一家人乘坐一辆破旧的小汽车，在路上停停走走，风餐露宿，狼狈不堪。

“复协和”在曼德勒的经理是赵老九，也就是舒璋父亲的老板，也同时带着全家逃回国。一路上，都是像这样携家带口的逃者，且多数都为老弱病残。不知走了几天，才赶到怒江上的惠通桥。从那里到保山只有几十公里，他们过了惠通桥不久，日本的先头部队已经跨过怒江，人数不多，与中国部队发生激战后被歼灭。为了防止日本人再追上来，守卫的部队把桥炸了，阻住了敌人的前进。这里地势两边高山峻岭，悬崖峭壁，是很好的天然防线。

“5月4日、5日两天，我们正到达保山，日军又开始狂轰滥炸，大部分民房被毁，两万居民死伤过半。我们进城，东西全部丢了。日机轰炸时，我们就在郊外的田间地头躲避，目睹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与日本飞机的空战。”

那时舒璋年纪小，帮不上父母什么忙，养女年纪比他还小，都需要家里人照顾。父亲说，绝不能再到城里寻找箱子，情况危险，身外之

物，随它去吧。根据历史记载，1942年5月5日左右，共有54架日机，数次轮番轰炸保山，全城大片房屋被毁，居民伤亡无数，尸体遍地，无人掩埋，致使霍乱、瘟疫、肺炎等疾病流行，加上土匪趁火打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保山成了一座恐怖的死城。

舒璋的家人们与一帮先生伙计从保山到了顺宁(现今地图上找不到此地名，可能是昌宁)，在一所叫盘陀寺的大庙里住了近一个月，才分道扬镳，各行其路。他的父亲是东家的忠实职员，死心踏地，一心为主。在那战乱年代，商号危机重重，他也忠心耿耿，不为私利起心眼。逃难时，包括他们两个孩子，都帮商号在腰间揣藏了金银财宝，到顺宁后，父亲将其如数交回了东家。他们徒步辗转到老家鹤庆，最后到昆明。

日本侵略军占领云南边陲的腾冲、龙陵等县城，在怒江西岸盘踞了两年。后来，怒江西岸的一座山头上，我军发动了著名的松山战役。双方伤亡惨重，终于把日本人赶出云南、赶出缅甸。

舒璋从缅甸带回来一个小望远镜，当年见过这东西的人也少，他们在进入昆明时，受到检查。检查的警察发现后，立刻把他们扣留下来，说这是军事用的侦察望远镜，需要调查清楚。他们被扣了几个小时，才弄清楚这是个小孩玩具，他们一行才被释放，进入昆明。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个人的经历与国家和时代的命运紧密结合，舒璋先生和他的家人因战乱而被迫举家迁徙，四处逃难。如今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安定，舒老更加感慨，我们今日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今日重走旧时路

2000年9月，舒璋在侄女的陪同下，从昆明坐汽车，走滇缅公路，到大理、腾冲、瑞丽、经畹町、龙陵、保山，回到昆明。

在腾冲著名的学术之乡——哲学家艾思奇的故乡和顺乡，他们参观

了和顺图书馆和滇缅抗战纪念馆。纪念馆中展出的中国远征军收复腾冲、龙陵的光辉事迹。有大量老照片、纪录片、史实资料、油画、战争用品、缴获的日军武器等，真实再现了那段历史。据历史记载收复滇西的战役，日军死伤21057人，我军死伤67439人，我方牺牲如此巨大，令人震惊。

在“一腔热血洒焦土，万座雄碑泣鬼神”的国殇墓园，那一排排墓碑令人肃然起敬。舒璋重温了《腾越玉碎记》，讲述松山战役的书籍。舒璋先生说，“我们不能忘记为国捐躯的烈士。以史为鉴，珍惜今天幸福的生活。二战中，美国飞机飞越驼峰，从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3年零4个月的时间，运送物资70余万吨，损失飞机609架，牺牲和失踪的飞行人员达1500多名。今天我们想想，胜利来之不易，更应珍惜和平。”



缅甸归侨联谊会党小组看望舒璋同志

正因为经历过战乱中的艰难岁月，舒璋先生更能体会到和平岁月的宝贵。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更深切体会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结合、不可分割。对于老一辈归侨而言，他们更能体会到，祖国的繁荣安定是实现个人美好生活的基

础，而个人的奋斗又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舒老也希望年轻一代能继承他们的事业，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高悦）



栗秀玉，女，1920年生，缅甸归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孜孜不倦 促进中缅友谊

——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栗秀玉

她并非政界人士，却能与缅甸政府灵活沟通；她不是宗教人士，但在缅甸宗教界有着很高的威望；她在中国执教50年，缅甸华人圈里有三分之一的人曾经是她学生。信仰奠定了她一生助人的基调，她就是“弘善贤德楷模”，中国缅甸语泰斗、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栗秀玉。

连两国深情 促中缅友谊

栗秀玉毕业于仰光大学，1965年受中国政府的邀请，以专家的身份回到中国，先后在中国外文局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著有《梵缅老东汉宗教词典》缅文部分，翻译和审定了《毛泽东选集》等多部作品，其个人事迹被收入《中国专家大辞典》。栗秀玉教授不仅是中国的缅甸泰斗，而且对巴利文有很深的造诣，更是通过了缅甸佛学考试最高级别九级的唯一中国人。

作为我国著名的缅甸专家，她在北京侨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好师长和前辈，非常受人尊敬，出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为人民生活、权益的各方各面做出努力，大到妇女权利和儿童权利保障、高校体制建设、法律的修订，小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门口的信号灯开设、公共汽车路线的开通、归侨餐厅经营问题的解决，都有她的身影。



2014年，栗秀玉获得首届“京华奖”特别荣誉奖

2013年1月4日，缅甸总统吴登盛宣布获得政府宗教勋章的海内外人士名单以表彰他们对宗教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栗秀玉女士荣获该勋章。这是缅甸的国家最高奖项之一，在缅甸国内有重要影响力，象征着获奖者绝佳的品质和卓越的才能。谈起自己获得缅甸政府宗教勋章，栗秀玉教授感到很高兴，也很自豪，她说，

“获得这个勋章，是对自己为促进中缅两国民间友好往来努力的认可，也是两国情谊的见证，这个勋章也在鞭策自己继续为两国民间友谊做出更多的贡献。”

多年来，栗秀玉在促进中缅友谊方面孜孜不倦。虽然身体不好，但她对公益事业尽心尽力，每天都安排满满的活动。听说一位缅甸华人要到北京看病，栗秀玉全程安排了她在北京的衣食住行，类似的事迹很多，因此有人把栗秀玉当作在民间为中缅友好作贡献最多、影响最大的人。

缅甸驻华使馆也将栗秀玉奉为上宾，在得知其通过缅甸最高级别佛教考试后，根据缅甸习俗，使馆高级官员向栗秀玉行跪拜礼，足以看出缅甸方面对其的认可。2013年3月30日，“栗秀玉教授基金”成立，用于在缅公益慈善和增进中缅友谊民间活动，她说：“我和国人一样有中国梦，我还有一个缅甸梦，中缅两国人民世代睦邻友好之梦。”

年少勤学努力 年长毅然回国

栗秀玉于1929年出生于缅甸一个华侨富商家庭，从父母口中得知父辈早年创业的血泪史：在她出生前，父亲栗运广不堪战争和贫穷，从厦门海边游到近海的商船上找出路，数百年来，上百万华人劳工用这种方式“下南洋”谋求生路。出发时，栗运广的全部家当只有身上的裤衩和背心，到了船上，他帮船员洗船板、洗厕所，包揽全部的脏活苦活，以换得几餐饭食。当有人检查，船员也会帮忙把他藏起来。商船一路向南，为东南亚带去了早期的中国移民。当到达马来西亚西北海岸外的槟榔屿时，与栗运广同行的妻弟便下了船。“谁都不知道是哪里，舅舅下船是因为不想全家在一棵树上吊死，我父亲跟着船继续走。”

凭借顽强的适应能力，栗秀玉的舅舅和当地人结婚，很快在槟榔屿开枝散叶，如今已经有了第三代，而栗运广也在缅甸仰光的港口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刚开始什么都没有，怎么办？你们不干的活我干，苦活

累活脏活都干。”栗秀玉说。全力打拼下，父亲栗运广每月能挣六块大洋：两块钱吃饭，两块钱寄回老家，两块钱攒下来。就这样，从最初的两块钱攒起，栗运广逐渐在缅甸站稳了脚跟，等到栗秀玉出生，他已经在海边经营起海产批发的生意，一家人生活富足了起来。

父亲的奋斗史是华侨在海外生存的缩影。“中国人到海外（谋生），有三个特点：一个勤劳、第二有智慧、第三个节俭。”栗秀玉说。“我说这话不是在标榜自己，华侨确实是这么过来的。”从这些记忆印记中，栗秀玉学会勤劳和乐观，懂得知足和感恩。

当时，缅甸还是英国殖民地，懂英语的华人十分稀缺。父亲发现，在自己的店里，一名普通会计每月能赚15块大洋，而懂英文的会计每月赚50块大洋，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学费略高的英国学校。栗秀玉四岁时就被送进了教会学校的幼儿园，又不间断地上到了七年级，为了吸引缅甸人和华人子女，全英文授课的教会学校也开设了缅文和中文科目。另外，她的母亲虽然是文盲，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保有朴素感情，认为语言是最好的文化保护者。于是，栗秀玉在家被要求讲闽南话，就这样，从小就掌握了多门语言。

父亲去世那年，栗秀玉和家人逃到缅甸南部县城竖榜，经过八个月的佛教知识学习，考取了佛教哲学（论藏）考试最高级九级。1947年，仰光大学举办了战后第一次入学考试，当时17岁的栗秀玉因为“缅文底子好”，成为被录取的唯一华人。“二战的时候，我所在的基督教会学校关了，13岁从仰光逃到县城，正好碰到传授佛教的，传授者是缅甸总理乌努的老师，而且是无偿的，爱读书的人有书念就好，我不管，有书念有课听我就去，我就去参加了八个月的培训。这也与我后来获奖有关。”栗秀玉说。

根据福建人的传统习俗，如果女孩满18岁时尚未婚配，就会有人“戳脊梁骨”。因此，1948年，在母亲的主张下，栗秀玉嫁给了26岁的福建同乡郑振汉。栗秀玉说，在她母亲眼里，不论是通过佛教最高级考试和被仰光大学录取，都不如出嫁更重要。这一携手就是大半辈子，直

到2005年郑振汉辞世。两人婚龄57年，办了银婚、金婚，只差三年就“钻石婚”。而正是因为“老郑”，粟秀玉成为了一名教师，并有了完成学业的机会。1965年，新中国急需各类外语人才，粟秀玉作为缅甸语专家携一家人回到祖国。回国前，她已经是缅甸仰光福建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和缅甸南洋中学校务委员。

满怀感激 绝不退缩

北京市侨联缅甸归侨联谊会自1988年成立，是北京市最早成立的归侨联谊会之一，粟秀玉是创始人之一，从1988年至2014年止，当了26年会长。粟秀玉讲述缅甸老一辈华侨创业史时感慨颇深：“为什么到哪里华侨都比当地人富，我就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老华侨的富不是抢来的，不是夺来的，是靠自己的亲身奋斗、勤劳吃苦换来的。不光是缅甸的，包括东南亚一带，许多都是卖苦力起家的。我告诉他们，中国人的特点，一个是勤劳，一个是有智慧，一个是严谨。”

在缅甸担任仰光南洋中学教师和缅甸福建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她也常常教导学生要和缅甸当地人友好相处：“我们都是出生在缅甸，喝这里的水、吃这里的大米长大的，应时时刻刻感激养育我们的缅甸人民，这里的土地和缅甸的一切。”从缅甸回国后，生活上艰难和巨大反差没能使这个要强的女人退缩，她拒绝国外亲戚的援助，



2013年，粟秀玉获颁“弘善贤德楷模”勋章

选择留在北京。因为，这里有她的根，有她的事业，有她的梦想。

中共十九大昭示，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作出的贡献，新的高度在砥砺前行中积累、质变。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今，新的征程已经开启，广大华侨华人要传承中国五千年文化积淀，集思广益、不懈努力，向住在国人民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文化自信；同时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为下一代在住在国真正拥有多元化的生活和工作创造条件，进而更好地回馈祖籍国。

（作者：王競一）



孙立华，女，1933年生，菲律宾侨眷，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大医精诚 在生命的天平上寻找平衡

——记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孙立华

一颗仁心敬日月，不枉白衣天使名。每当听到一个新生婴儿的哇哇哭声时，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的主任医师孙立华都会松一口气，嘴角也会不自觉地扬起。她的左手和右手，承担起的不仅是一个鲜活生命的重量，还有属于一个家庭的期望与幸福。

基层实践 点亮信仰之光

1956年，孙立华从山东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面对的是医疗卫生恶劣、新生儿死亡率高、医生稀缺、医疗条件简陋的境况。

“把医疗卫生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农村医疗基础设施落后，医生稀缺问题尤为严重。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刚毕业的孙立华和同事一起坐上了长途火车，来到了江西。孙立华满眼看见的是大山深处无数百姓落后、贫穷的生活。生育观念落后、卫生院甚至没有专门为妇产科设计的手术室。这一幕幕中国农村的落后模样，刺痛着这个年轻医生的心。

孙立华和同事下了火车就开始“干起来”，出诊看病、帮扶抓药……刚踏出象牙塔的孙立华第一次意识到，可以尽己所能，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孙立华虽是“初生牛犊”，却足智多谋。当时在江西余干县，一位怀胎十月的农村妇女面临生产困难，其丈夫是一位盲人，生活十分贫困，产妇骨盆畸形，孙立华一问病史，得知这位妇女曾经有两次失败的生产经历，这是她第三次生产，她哭着握住孙立华的手，说“一定要保住孩子！”孙立华见产妇情况不佳，顺产会有很大危险，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剖腹产。可是，当时医院内部根本没有专门的妇产科手术室，手术需要的基础设施也十分有限，孙立华和同事思索片刻，决定和当地外科医生联系，利用外科手术室进行剖腹产。最终，产妇顺利生产，母子平安。

“过去那么多年，患者的信息我已经记不清了，但那是我第一次做手术，当时复杂的心情，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孙立华说完，陷入了沉默。每一次站在手术台上，即使内心焦急万分，孙立华也会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让左手配合好右手，在一次次平衡中，找到最佳的方式，去

帮助患者脱离危险。每当听到一个新生婴儿的哇哇哭声时，她都会松了一口气，嘴角也会不自觉地扬起。她的左手和右手，承担起的不仅是一个鲜活生命的重量，还有属于一个家庭的期望与幸福。

孙立华说，“当时毕业下乡，在基层帮那么多老百姓看病，但是也没觉得多苦。那时候救人，医院没有血了，就输自己的血；患者钱不够，就自己掏腰包，无论如何，都要把（患者）病治好。”

1965年，孙立华参加医疗队到了福建闽北的武夷山区，在那里，她一方面全心全意为群众治病，一方面不断总结提升医疗水平，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后来理论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人生天平 成就生命大爱

提及自己的孩子，孙立华言语之中充满歉意，“当时孩子才几岁，我要下基层，只能将孩子送到老家照养。后来大了点，老头子自己管孩子。干这一行，真是没办法，家庭和工作真的很难兼顾，总是顾此失彼。”

是啊，孙立华虽是一名母亲，但更多的时候她是一名人民医生。在医院的时间比家里长；见患者的时间比家人长。这其中虽然饱含无奈，但孙立华早已习以为常。

从医数年，孙立华也曾为缺少时间陪伴孩子有过深深的愧疚，但她在工作和家庭的选择中没有放弃前者，因为她知道穿上白大褂就意味着责任。每每把患者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她觉得就是对医务工作者的最大慰藉，而她的坚守和奉献正是给孩子做出的最好榜样。

在小爱和大爱的天平上，孙立华失衡了，她放下了小爱，走向了大爱。她选择了为更多人奉献自己的时间，因为有多人亟待她的拯救。

“孩子后来逐渐长大了，也开始明白我的不易，现在连我的孩子都快退休了。”孙立华跟我说，言语之中满含幸福。家，毕竟是自己的港湾，即使只能片刻驻留，也常常给她疲倦的心一丝最柔软的安慰。

中西融合 带至异国他乡

孙立华大学是学西医出身，1972年被组织调来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并学习中医。在后来的医疗实践中，发现中医有其独特的精妙之处。西医讲究科学，诊断方法主要依靠技术。而中医不同，中医讲究中庸之道，正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讲究不偏不倚、精微之极致也。所以对于慢性疾病，中医的调理有着神奇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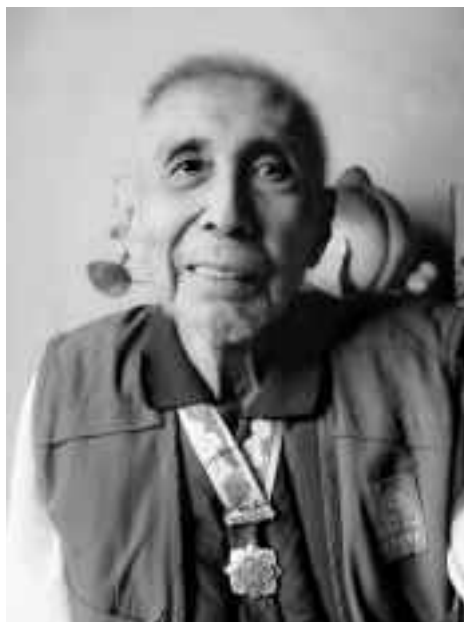
孙立华（左二）参加西苑医院
离休老干部活动

孙立华在中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1986年，参与科内妇炎康复片治疗慢性盆腔炎临床与实验研究，获中医研究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94年，调经止血冲剂治疗月经失调临床与实验研究，获中国中医研究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孙立华从不给自己设限，对于中医和西医，她一直认为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统一的，在中医和西医的天平上，孙立华一直在寻找两者的平衡点，优缺互补的中医和西医结合，更能发挥两者的作用，“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拯救更多人于病痛之中，对于孙立华而言就是最大的幸福。

孙立华常说，作为一名医生，只全心想拼尽全力去救每一位患者。每次手术成功的时候，用自己的双手拼命将病人从死神那儿拉回来的时候，我会给自己一个微笑。这就是于她，最好的肯定与回报。

（作者：金丽萍）



王澄枢，男，1930年生，菲津滨归侨，曾任国侨办宣传司司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赤诚爱国 致力侨务事业

——记国侨办宣传司原司长王澄枢

“我是在菲律宾出生的，小时候经常被当地人讥笑‘吃稀饭的’，甚至有人骂我‘中国猪’，幼小的我因此激发了强烈的爱国心，希望有一天祖国能强大起来。现在，因为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高，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每年都亲自参加华侨的庆祝活动，在对外讲话中

也公开提到“我的丈夫有中国血统”。华人华侨的地位真是有了天和地的差别。”

这是2009年王澄枢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谈及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前后菲律宾华侨的地位变化所说到的。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王澄枢1930年出生于菲律宾班艾岛怡朗市，祖籍福建。父母都是中国人，父亲在菲律宾经商，主要做水果生意，从国外进口水果在当地销售。当时华人在菲律宾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大多是商人和伙计。由于中国人早晨和晚上吃稀饭，只有中午吃干饭，便经常被当地人讥笑“吃稀饭的”，甚至曾有人骂他是“中国猪”，这激发了王澄枢强烈的爱国心，为日后服务祖国奠定基础。

当时生活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主要受到两股势力的影响，一种是从事进步事业的组织的影响，另一种是国民党当局派驻的大使馆的影响。两派分别开办了华商学校和中山学校，虽然都是华侨，但是互相看不起。华商学校设有小学、初中和高中，王澄枢童年时就读于此。小学主要学习中文，包括汉语发音、世界书籍的中文读本等。提起小学课本，王澄枢清晰地记得80多年前的第一学期，第一堂课的课文是9个字：“小弟弟，小妹妹，来来来”。

然而生活并不总是坦途，珍珠港遇袭彻底打破了王澄枢惬意的学生生活。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日军侵略菲律宾，当时读初一的他被迫辍学。随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愈演愈烈，1943年，13岁的王澄枢参加了党领导的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简称“抗反”。他的主要工作是传递情报、散发地下报纸和进步刊物，内容包括巴金小说等。虽然不直接进行军事斗争，但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仍然残酷，一旦文章审核不严，有政治风险的内容被敌人发现，地下党人随时都会面临生命危险。次年，王澄枢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是在“抗反”的日子里，王澄枢认识了一生的伴侣，他的同事陈金奎。他们经常一同参与左派举办的唱歌、话剧等文艺活动，一来二去，便熟络了。

在党的组织下，华商学校每周定期举办时事讲座，讲述中国的抗日情况。王澄枢回忆起当时的一场讲座说道：“我还记得华商学校曾讲述过《红色的延安》，反映了当时延安的生活。”

1945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太平洋战争取得胜利，王澄枢的抗反工作也随之结束，但地下工作并没有停止。在“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既定方针指引下，他在菲律宾不断磨砺自我。

1947年，王澄枢到菲律宾最大的华语报纸——《新闻日报》担任编辑，期间学习英语，修改英文稿件，出外勤，培养了良好的英语水平。同年，17岁的他进入菲律宾马布亚工程学院化学工程系，成为了一名大学生。由于课程都安排在下午5点到晚上9点，白天便在报馆工作到12点，中午休息一下，下午5点到学校上课。

事实上，由于学制的缘故，那时的大学生半工半学是普遍情况。大学时期的王澄枢有三重身份：一是党员，二是报馆编辑，三是大学生。誓言、责任和挑战都落在了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年轻人身上。功夫不负有心人，1951年，王澄枢参加了菲律宾化学工程师的考试，包括他在内的中国人包揽了前5名。同年，王澄枢取得学士学位。

毕业后，他到一家美国洋行的纺织部担任经理助理，同时他还帮助美国洋行介绍生意，从中抽取佣金，双重收入让王澄枢踏入高薪阶层，在菲律宾有着滋润的生活。

遭遇危机，主动撤退，致力侨务事业

1956年，王澄枢夫妇经香港中转，最终回到祖国大陆。

归国的路途注定是坎坷的，当时中国大陆和香港以深圳的罗湖桥为

界，只要从香港越过罗湖桥分界线。王澄枢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道：“在香港的英国人坏得很，当时香港移民局知道我是大学生，又在美国洋行工作，就找我谈话表示大陆经济条件很不好，要认真考虑去向。英国人不是对所有人都进行阻拦，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人才流入大陆”。但是最终，在组织的帮助下，王澄枢夫妇还是经深圳成功进入中国大陆。

抵达北京后，王澄枢被调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开始他的第一份工作。那时，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的廖承志同志直接领导日本组和泰马菲组，王澄枢便在泰马菲组担任组员，他的工作有两项，一是负责中国和菲律宾的沟通联络，发展两国外交关系，加快建交步伐；二是负责搭建对菲律宾的国际广播，同时培养我们国家自己的菲律宾语专家，当时还派同志到大学攻读菲律宾语硕士。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承志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

文革期间，王澄枢下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当时任上的干部十分短缺。有一次他从干校到北京办事，第二天就回，期间恰好被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的丁雪松留住说：“明天你就不用走了，美国代表团要来，现在缺少接待外宾的干部，你的东西我派人从干校拿回来。”于是王澄枢就留在北京负责接待外宾工作。

1980年，即将赴任的驻孟加拉国大使馆大使刘述卿到对外友协翻档案时，看到了王澄枢的简历，就安排他到驻孟加拉国大使馆研究室担任主任。5年的时间里，王澄枢先后陪伴了刘述卿、肖向前两任大使。研究室主任的工作让王澄枢对孟加拉国的情况十分熟悉，加上出色的英文水平，以至于他经常在中孟会谈中担任翻译，而大使的翻译常常只做记录工作。

回国后，王澄枢担任国务院侨办宣传司司长，期间又赴任香港中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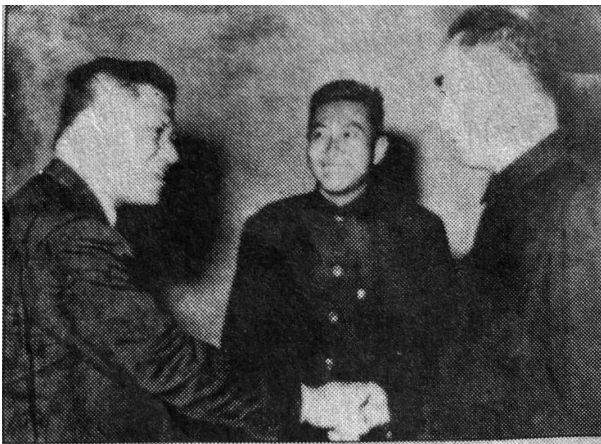
社英文部主任，负责挑选适合翻译成英文稿的文章，交给专家翻译，专家翻译完成后再交由王澄枢审核、刊发。在香港呆了2年后，王澄枢回到北京。

1990年，60岁的王澄枢离休，但他仍然在北京市侨联菲律宾归侨联谊会挂职，从事公益性质的活动，继续为中菲民间交往做出自己的贡献。

铭记历史，荣誉加持，华人华侨谱华彩乐章

2009年，王澄枢在参观“辉煌六十年”成就展侧记时，边看边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带艺术团去国外演出时的情景：“1989年，我带国务院侨办艺术团到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等国家访问演出，受到外国朋友的热烈欢迎。如今，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很多国外的好演出，在家门口就可以欣赏了。”这足以见证我国国力的发展壮大和外交事业取得的长足进步，中国人在世界舞台日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连同王澄枢在内的14名国务院侨办离休老同志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裘援平为抗战老战士、老同志的代表颁发了纪念章。裘援平表示，为他们颁发纪念章是为了继承伟大的抗战精神，传承前辈的光荣传统，以当代中国人责无旁贷的使命担当，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



2008年6月8日版《世界日报》头版剪影，右一为周恩来，中间为王澄枢

出业绩。

2019年，89岁高龄的王澄枢又获得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对此，他表示能够获得国家荣誉非常高兴。

（作者：信德源）



王明爱，男，1929年生，菲津宾归侨，曾任职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北京市侨联菲津宾归侨联谊会会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追求真理洒热血 爱我中华心不改

——记国侨办离休干部王明爱

1949年3月，一群爱国青年华侨们怀揣着理想与抱负几经辗转抵达北平，他们在北京青年训练班学习马恩列史毛理论著作，随后被分配到不同岗位，投入建设新中国的浪潮中。一晃几十年，白驹过隙，时移世易，几十年风雨沉浮，当时意气风发的少年已成为鲐背之年的老人，但年少时的爱国初心却未曾改变。

人不能没有追求与理想

王明爱的父亲王雨亭是个资深的革命家，儿时受到父亲的谆谆教导，知道中国共产党为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在血雨腥风之中，怒挥宝刀斩楼兰，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杨开慧“死不足惜，只盼革命早日成功”……他们用生命之光点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照亮了后人前进的征程。正是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让他更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

王明爱说，人不能没有追求与理想，更不能没有信念。没有理想和信念，就会迷失方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就不能很好地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而他的理想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十几岁时，王明爱就满怀一腔爱国热血，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抗战结束前，年仅13岁的王明爱在海外参与抗日斗争，他在日军占领的菲律宾马尼拉扮成富家子弟，将情报藏于衣角内，骑自行车送情报，蒙混过日寇关卡，为抗日军事情况站传递秘密情报，直至日本投降。

1949年，他从香港达德学院进入中共中央统战部青训班学习，后分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和地方工作十年。后国侨办从事宣传教育、侨务研究、参与起草《侨法》等工作。离休后任北京市侨联菲律宾归侨联谊会会长，继续做着为侨服务的工作。

王明爱少年时勇敢机智，在海外参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青年时意气风发，怀揣爱国赤子心归来建设祖国；此后在长期侨务工作中依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退休后依然不忘维护归侨的各项权益。回顾他的经历，“爱国”与“归侨”是抹不掉的关键词。

拳拳归国赤子心

进入香港达德学院的那段经历对王明爱尤为重要，对建国有用的爱

国民民主人士大多聚集在香港达德学院，达德是民族精英荟萃之地。正是在那里，王明爱确定了人生的目标与意义，要永远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脚步，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奋斗终身。也是在达德学院，他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同时，在达德学院王明爱结识了他的爱人庄钦华，俩人从此将毕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3月19日，他与其他爱国华侨青年们带着对建设新中国的期盼，从香港乘搭悬挂外国国旗的轮船，在国民党对台湾海峡的封锁下冒险北上，经天津进入北平。抵达北平后，他与其他青年一同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青训班学习。

1949年10月1日，二十岁的王明爱与其他归国的华侨男女青年，身着解放军制服和淡黄泛绿中山装配着鸭舌布帽，神采奕奕地列队站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西华表边上亲历开国大典。长安街各处聚满人群，王明爱望着两道红墙中间，旗杆正南方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陷入沉思，他想到了在青训班学习中关于“人民英雄”的讨论，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王明爱认为“死并非最高境界；而不怕死，长期在死的威胁下，从容完成任务，也是很伟大的。”



王明爱旧照

一阵礼炮过后，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结束之后，王明爱与其他亲历开国大典的华侨青年们一同在青训班继续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带着建设新中国的初心，这群华侨青年开始了他们的征程。

百感交集拟侨法

归国华侨在不同岗位上发光放热，投入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浪潮中，但关于他们权益的保护立法却迟迟没能落到实处。1986年，在国

侨办调研室担任副主任的王明爱与调研员曾毓祥受命起草《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当时在个别交谈及大小座谈会上，关于归侨侨眷权益的问题大家争论不休，有人说“做侨务就是为了消灭侨务”，“照顾就是为了不照顾”，“情况变了还照顾什么侨汇特殊供应？”“照顾华侨学生，会降低我们大学质量”，等等等等，反对之声十分高涨。但身为归侨的王明爱理解归侨的难处，“他们满腔热情回国，有的是自己本想回来的，有的则是被使领馆动员回来的。绝大多数人不是为了温饱，更不是想捞一官半职，而是想报效祖国。中华大地虽然是他们血缘之根、文化之源，他们有故土之恋，但是他们有的是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人在‘侨’居地生活、繁衍、建业，有很多亲友社会关系。他们对祖（籍）国多数人没有感性知识，有的知道祖籍省不知县、乡；有的除中国外什么都不知道；回过故乡的太稀罕了。在故乡甚至在整个中国有无亲戚故旧也往往一无所知。”归侨大多在国内举目无亲，又长期生活在海外，往往口无禁忌，不太会绕弯，生怕自己会被人指责为反动派，被戴上帽子。

王明爱正是出于这些年来对归侨境遇的耳闻目睹、感同身受，理解保障归侨侨眷权益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他们把《侨法》草案反复修改至第6稿时，得到通知把它移交给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终于通过了《侨法》。全体归侨侨眷翘首企盼的法律，终于在新中国成立41年后正式颁布。对于王明爱而言，他希望《侨法》及其实施办法不仅是为了体现对社会正义、公平、公正的向往，而重要是让归侨侨眷确实能用它夺回他们本来应该拥有的社会正义、公平、公正。

追求真理 爱我中华

除了《侨法》的落实之外，为“青训班”同学们争取结业证书也是王明爱参与维护归侨权益的重要工作之一。北京的“青训班”1949年

开班，招收的学员300多人，几乎全是华侨学生。学习三年结业，因为决策的变化，学员们仓促间分配了工作，遗留的问题长期没有给予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结业证书，始终没有颁发。学员的学历得不到承认，人事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如评职称、办离休退休、确定医疗待遇、调整工资级别等等，均置身在外，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擦肩而过，大家的意见很大。



2018年，王明爱在《华人华侨与改革开放》主题展上

作为“青训班”校友会负责人之一的王明爱，早在1983年时已经对这件事表示过意见，未受重视，后来他主动起草了致中联部、统战部和当年的领导人童小鹏同志的报告，并形成正式文本呈递上级。最终在1999年，决定给青训班每位学员颁发学历证书，证明他们当年在青训班学习政治理论达到大专水平。

颁发证书大会上，刘延东常务副部长说，“今天给大家颁发大专学历证书，不仅是对各位同志光荣的革命经历的肯定，更是对同志们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为祖国贡献青春乃至毕生精力的表彰。”蔡武副部长说：“当年青训班的学员都是生机勃勃的热血青年，满怀的炽热之心和强烈的爱国之志，在接受青训班的培训之后，奔赴全国各地，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特别是不少华侨学员放弃较优越的生活条件，不顾各种阻挠，不畏路途险阻、遥远，义无反顾，前来报效新中国。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虽是晚来的慰问，同学们还是颇受鼓舞。事后，香港同学发起制作

一个反映青训班同学50年情况的“录影专辑”《追求真理，爱我中华》，王明爱从收集资料、写解说词、分镜头、配图、配音、刻盘直至发行，大约忙了两三年。

到底什么是侨？王明爱说“中国人在海外是侨，回到国内就是归侨”。归侨的祖辈们由于祖国贫困积弱，被迫背井离乡漂泊海外，只靠双手劳动，辟草莱，开矿藏，含辛茹苦，勤俭劳动，谋求生存。在海外都曾遭受或目睹过殖民主义者对华侨的歧视、欺凌。建国后他们又放弃在国外的生活，回到国内建设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回归祖国，不仅是因为对故土的依恋和对祖国的热爱，更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坚信和对真理的追随。他们因国家衰弱而漂泊海外，又因民族独立而重返故土，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他们曾憧憬过也曾迷茫过，他们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崛起、时代更替紧密相连。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几十年弹指一瞬间，谈及对年轻一代的期望与寄语，王明爱老先生想到的依然是“追求真理，爱我中华”八个字，他认为对国家的热爱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出于对真理发自内心的追求与坚守，出于对建设祖国、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

（作者：高悦）



巫志远，男，1922年生，泰国归侨，曾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武官、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老骥伏枥志犹壮 铁血丹心卫和平

——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原武官巫志远

在那段战火连天的岁月中，他出入前线炮火，矢志不渝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全心抗敌、四处奔劳；在如今和平幸福的年代中，他仍密切关注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祖国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烈士暮年志犹壮，铁血丹心卫和平，他用始终如一的赤子情怀和铮铮铁骨，履行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军人的职责与使命。他，就是巫志远。

“向北望星提剑立 一生长为国家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掀起了抗日的浪潮。少年时的巫志远常常目睹人民的艰辛和苦难，逃避压迫或战乱而颠沛流离。此后，他也耳濡目染受到了一些进步青年的影响。“七七”事变后，时年16岁的巫志远，怀着一腔热血，出于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不满，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潮汕青年抗敌同志会，积极地投身于各种抗日活动中。

1938年秋，巫志远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压制“青抗会”（由中共韩江工作委员会建立）和禁止学生参加抗日活动的请愿示威游行、罢课，要求撤换校长陈创筹（国民党员）等的斗争，不久后，国民党普宁县政府和县党部忌惮于青年抗日同志会组织的活动，强制解散了该组织，巫志远也因参与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这却成就了他人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

巫志远被开除后不久，与他一起被学校开除的孔祥集找到他，并表示希望他能够加入共产党。巫志远毫不迟疑地表达了自己意愿的，他在几名同窗的见证下宣誓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1939年初，他到南侨中学学习关于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群众运动、游击战术等一系列相关知识，同时经常秘密接受党课教育，这为其坚定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和党性意识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暴露，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组织活动愈发艰难。1942年中共“南委事件”后，潮汕党组织根据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暂时停止组织活动，一些已暴露身份的骨干撤离潮汕。而巫志远则被组织留下来坚持秘密斗争。此时的他，名字常常出现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围捕的黑名单上，颠沛流离的同时，还要想方设法与组织保持联系，保全组织在潮汕大地的一点星火。

1944年，广东腹地受日本侵略军的袭击，揭阳、潮阳、普宁等县城和交通要道相继沦陷，四处一片荒凉，潮汕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针对这种局势，中共潮汕特委决定恢复组织活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国民党当局对此高度警惕，展开了对地下党的大规模逮捕活动。巫志远也在当局的黑名单之列，因此不得不辗转于各地躲避杀身之祸。年底，巫志远受组织召唤，到达揭阳县石牛埔山村参与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筹建工作。

1945年4月，巫志远调到广东省潮（州）、揭（阳）、丰（顺）县委任副特派员，主要负责发展组织、动员群众参军和解决部队的给养。要打仗必须动员群众参军，参军的人多了给养就成了问题。巫志远四处奔波，说服解释、筹款筹粮，较好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在此之后，巫志远又参与小北山人民抗日游击队和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分队的建立，真枪实弹地投入到了抗日作战中去。烽火连天的作战岁月里，巫志远和其他将士一样，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有时候战火一燃，卯足了劲便只顾着想办法消灭敌军，全然顾不上休息，甚至经常遇到威胁生命安全的情况。但是即便这样，巫志远也从未想过退缩。“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面对敌人，像巫志远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人们抛头颅、洒热血，在军民齐心的顽强抗争下，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

1946年6月，韩江纵队奉命北撤，上级给了50个名额，将主要的骨干力量转移。巫志远获准随部队北上转战，经香港至大亚湾与东江纵队会合，乘船到山东。到山东后，巫志远首先被分到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后调到两广纵队3团3营任教导员，转战于华东战场，北到渤海南至苏北，东到日照西至新乡。1948年6月，他和部分两广纵队干部正集中在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准备南下两广之际，被调到中央军委作战部作战室情报科任参谋。三大战役、渡江战役等解放全国的战役之所以大获全胜，情报工作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作为其中的一员，巫志远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两次获得三等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

利，蔓延在中华大地上的战斗硝烟终于得以平息，巫志远的革命生涯暂告一段落，随即投身到了守卫和平、建设祖国的新征程中。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1950年初，我军中央军委作战部组织机构扩大，巫志远任第五处南亚组组长，负责研究东南亚各国情况。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巫志远被调到中南海总参谋部作战室工作，主管朝鲜战场的敌情，每天编写《每日军情》，直接上报中央军委领导。后毛主席指示，作战部参谋要分批到朝鲜战场上去见习战争。1953年1月，巫志远赴朝鲜参战，1953年6月金城战役后，美军被迫签字停战。根据作战部的指示，巫志远和作战部情报处副处长吴传保等到仁川、平壤、埔项等地收集部队关于作战方面的意见，9月回国后，将情况向上级汇报。抗美援朝战争是以美英法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发起的、纠集了17个国家的军队参战的、海、空军占绝对优势的不对等的战争。中朝协同作战，经过三年的苦战，最后把他们打回三八线，被迫停战。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巫志远又于1958年去越南了解印度支那人民抗法战争发展情况，1961年1月，巫志远参加中缅边境勘界警卫作战，把国民党军柳元麟残部赶到了缅、泰、老边境的“金三角”，就此捣毁了国民党残军经营了10多年的巢穴，使得一直骚扰我国西南边境安全的国民党残部无法再形成威胁，并协助缅甸解放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保障了勘界工作的顺利进行。1962年，巫志远参加中国代表团，赴日内瓦与美英法帝国主义集团谈判印度支那停战问题，经近一个月的艰苦斗争后终于达成了停战协议。1979年6月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后，南方工作组成立，担任昆明中央南方工作组副组长的巫志远，负责开展对越南、老挝的工作。

1981年9月，巫志远调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武官，作为中国军队的代表开展工作，在积极完成任务的同时，他还先后两次进入柬埔寨，

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红色高棉解放区、西哈努克和宋双的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为国内准备给柬埔寨的援助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在完成这一使命后，巫志远于1986年6月离休，后受聘为汕头特区顾问。1993年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成立，他又先后任联谊会理事长、副会长、顾问和商会名誉顾问等职。



巫志远（右5）参加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

巫志远的一生，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征战南北、颠沛流离，但他从未有过怨言，这也是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前辈们的真实写照。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从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开始，巫志远一字一句所念的入党誓词便深深铭刻在了他的心里，时代和平的召唤和人民求安定的呼声成了他投身革命，不断前进的动力。从那一刻起，他便在这条抛头颅、洒热血，一心只为国民、一生献给国家的道路上义无反顾的走了下去。如今的巫志远，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外交任务，早已成长为了一个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但少年时的那股热血仍然涌动着，到了离休之年，巫志远老人也依然在为祖国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1985年10月，经上级批准，巫志远被聘为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对于家乡的那份炽热的情怀，巫志远也从来未曾

改变。1993年7月，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成立，巫志远出任副理事长，1994年11月，又被选为联谊会理事长。在他的指导下，联谊会同海外30多个潮人社团建立了联系，对推动全世界各地潮籍同胞的广泛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我们处在和平年代，华夏大地上的炮火之声早已不再。这是无数个像巫志远这样的革命前辈用自己的血汗换来的，他们用几十年的全心全意，诠释了什么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而当提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巫志远老人表示他对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充满了信心。相信在老一辈共产党人和新一辈党员的精神传承与接力中，我们很快就会迎来更加美好、更加辉煌的明天。

（编辑：姜孜伶）



吴彩本，男，1925年生，泰国侨眷，曾任国侨办办公室调研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兢兢业业 一心为党发光发热

——记国侨办办公室原调研员吴彩本

这位已入鲐背之年的老人，自1945年3月参加抗日革命工作以来，根据社会形势和党的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段解锁多重身份，在多个领域都颇有成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吴彩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军流窜，形势严峻时，依然坚守情报交通等工作的第一线。新中国成立后，吴彩本从事青年工

作和宣传工作，他工作积极，所在地区被评为“先进典型”，推动了土改和民主改革等实际工作有效进展。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吴彩本一直从事党的侨务工作，为中国侨务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获得成就和荣誉的背后，他又拥有一段怎样的人生经历呢？让我们走近这位拥有多重身份、一心为党的老党员，聆听他的人生故事。

一心干革命 不畏艰险

吴彩本是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东寮吴乡人。1940年冬，年仅15岁的吴彩本在党员吴扬同志的引导下，积极参加“读书会”，学习革命进步书籍。17岁时，他进入潮阳县立联合中学师范部学习，并在联合中学郭春等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参加读书会并且参与各项革命工作。1946年秋至1949年冬，受党组织派遣，吴彩本先后在当地神仙里乡、石桥头乡、井都乡和桥柱乡等党管理的小学当教员，从事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1948年1月，吴彩本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建国前夕国民党胡璉军队流窜潮汕，形势十分严峻，他依然继续坚持在情报交通等工作第一线，不肯撤离，一心干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吴彩本在广东省普宁县的土地改革中，撰写了大量土改和民主改革的宣传报道，让普宁人民更加了解、拥护党的政策，极大地推动当地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担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他建立宣传网的试点工作，积极组织农民读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因此，还被上级领导评定为“读报起家”的先进典型，这一经验受到了地区党和政府的高度肯定，粤东区党委宣传部在会议上号召毗邻各县委宣传部进行学习推广。除此之外，吴彩本还积极担任《粤东农民报》《潮汕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多次受到上级党委宣传部和报社的表彰。

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恢复侨务工作后，吴彩本作为侨政处负责人参与了侨办一系列侨务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如关于落实“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政策，关于落实平反归侨侨眷冤假错案

政策，关于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策，关于落实归侨侨眷精简下放政策和关于落实华侨房屋政策等等，吴彩本注意相关政策的宣传和实施，为中国侨务事业的建设与推进，为华侨们更好地融入祖国，更好地在祖国工作、生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此外，吴彩本曾先后应邀代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政部门赴北京、河北等省市侨务办公室做落实国内侨务政策的报告和讲解；为全国人大侨委会赴美洲国家考察团专门介绍我国的华侨房产政策；还先后带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政部门工作组，分赴广东、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甘肃、青海等地调查华侨房产政策的落实情况。他参与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海军司令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河北省派员组成的中央联合工作组，复查平反了河北省越南归侨、原省文化局长“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受到了中纪委的表彰。

离休后，吴彩本被聘为《中华大藏经》编辑，参与了这部由中央古籍整理小组领导、数百人参加、历时十年、耗资巨大、内容浩瀚多达100册的《中华大藏经》的校勘编辑出版工作。这部书荣获北京出版部门1992年“古籍整理出版一等奖（集体奖）”。奋斗不息，为侨务工作发挥余热，1993年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成立后，吴彩本被选为首届理事会理事并连任多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

终身艰苦朴素 传承精神

“新时代，我们仍要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矢志不移的跟着党走。”作为一名老革命党员，吴彩本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良好作风，理想坚定，热爱党的事业。他经常对子女说，要牢记使命，不能忘本，党于他们而言是拯救人民于水火的革命信仰，而于新一代而言，是前行的灯塔和方向，要跟着党走，为党、为国家做奉献。对于侨眷这个特殊身份而言，更要立场正确，坚定信仰。

从简入奢易，从奢入简难。吴彩本常说，虽然现在人民过上小康生

活，但是仍要保持艰苦朴素，不要铺张浪费、搞面子工程。吴彩本夫妻一直都是身体力行，从不任意挥霍；但对公益事业却从不二话，主动为社区捐款捐物，常常低调地连家人和子女都不告知，大爱无言默默行善。

多读书、多看报是吴彩本一生的坚守，也是他对子女的殷切期许。青年时期，吴彩本追求进步，经常阅读革命书籍和进步书籍，学习先进知识。这为他的文学素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创造了未来的工作机会，让他在宣传岗位上发光发热。吴彩本常对子女要求：“人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提升自己。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要时刻保持上进，做好对各项工作的准备。”吴彩本夫妻都出生于混乱的年代，在艰



吴彩本在天安门广场

苦条件中格外珍惜受教育的机会。高考恢复伊始，他的三个女儿受父母亲教诲，都考上大学并学有所成，近年来外孙儿女们都陆续攻读研究生并顺利毕业。吴彩本对此十分感怀“是党让现在的中国这么安定、繁荣富强”。而今，吴彩本已入耄耋之年，读书念报的习惯却没有改变。

2015年，吴彩本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个年岁近百的老人，生于战时，成于革命。吴彩本始终为自己是个革命党员而骄傲着，他青年时为了中国革命而奋力拼搏、无畏生死，中年时为了中国的侨务工作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晚年时不忘发挥余力，为侨联组织、社区继续贡献力量。吴彩本的一生，辗转多份工作，服务于党，一心为党。他见证着新中国的诞生，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实现了自我价值，找到人生理想和归宿，这是身为中国人的骄傲，也是身为中国人的自豪。

（作者：刘海）



肖增效，男，1930年生，泰国侨眷，曾任原机械电子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致力机械振兴 传承血脉情深

——记原机械电子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肖增效

早年投身革命，满腔热情为党和人民；工作后尽职尽责，为解放初期我国的机床工业贡献力量；积极支援西北建设，在机械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有信心；离退后不忘传承血脉情深，诚诚恳恳协助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完成在京举办的国际联谊活动，悉心关怀在京上学的潮人学子；肖增效的一生无怨无悔，有苦更有乐。

投身革命 困境苦争新

广东省潮阳县（今汕头市潮阳区）棉城镇，因境内多产木棉而闻名，这个东倚东山，西靠西山，北接牛田洋，南濒海新河，没有工业污染的现代化城镇是肖增效出生的地方。1946年开始，肖增效进入广州广雅中学、中山大学附中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影响下，他于1948年参加了地下学联（爱国民主协会），并成为这一组织在中山大学附中的负责人。在这期间，他积极进行革命宣传，秘密发展成员，开展社会敌产调查，为党接管广州准备有关材料，组织护校活动，迎接广州解放。他还参加广州中共地下党刊物（广州文稿）的油印和派送工作。该刊主要登载《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毛泽东著作、党的文件和新华社播发的消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常在市内进行突击检查，形势险恶。年轻的肖增效未曾退缩，他按组织安排，利用中学生的身份，将油印品包扎伪装，灵活转运派送，圆满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49年11月，为响应毛泽东主席“在华南办好一所革命大学”的号召，肖增效参加了南方大学的筹建工作，边工作边学习，读完了财经学院的全部课程。1952年，他被调到广东革命干部学校，任教学研究室财经教研组组长和潮汕地区学员班代班主任。该班主要培训在职的区级领导干部和政法、财经专业干部，学员毕业后有力推动了潮汕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1953年，肖增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前往广东省交通厅办公室任职，从事制订有关政策的调研工作。解放前，广东部分华侨为造福乡里，常常出资购置土地，修建乡镇等地的小段道路并雇工维护，以利乡民。土改过程中，面对如何确定和处理这些道路的产权问题，肖增效与公路局的同志共同调查研究，提出土地所有权归国有，但不以此作为占有土地评定成份的建议，由华侨继续经营，畅通道路，方便群众。又

如，当时省内内河航运中华侨合资经营的轮船公司，合资对象既有民族资本又有官僚资本，界线混淆，常有纠纷。肖增效和工作人员经过调查，提出区别情况，逐一处理的政策，将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保留民间资本，适当维护华侨利益。

1954年，中央从各地抽调干部支援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肖增效被抽调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参加筹建工作；不久又调至北京，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局（主管机床与工具）专家工作室负责统筹工作。当时，机床工业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有前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参与援建的重点项目的技术专家，局里还聘请包括设计、工艺、生产和管理的50名前苏联专家组，帮助老厂进行技术改造和改进生产、计划和劳动工资管理。这是一项崭新、具体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他按照部、局领导的要求，协调维护好前苏联机床与工具工业部的关系，从工作、生活上照顾好外国专家，整理、汇编和督促检查专家的建议执行和推广工作，组织、安排各种外文的翻译工作等，为解放初期发展我国的机床工具工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8年春，为支援西北建设，肖增效和新婚的爱人郑丽珍踏上前往兰州的征途。生长在终年翠绿的南国，工作在热闹舒适的首都，肖增效面对如今眼前西北黄土一片，没有自来水、充满泥泞土路的兰州，感觉反差太大。国家要将兰州建设成以石油、化工、机械为重点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的美好前景，给予他以极大的鼓舞。

这一阶段，肖增效作为中共兰州市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着重进行工业和经济方面的调研工作。他还根据中央下达的各种整顿条例，总结有关经验，为市委草拟相应的贯彻执行意见和措施，为纠正受“大跃进”的损害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异国苦学 带领机械振兴

1968年，肖增效被下放到一机部信阳“五七”干校。1971年从干

校调到一机部由北京搬迁到桂林的电器科学研究所，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所长。他协助书记、所长，稳定充实职工队伍，边建所、边科研，并分管部分行业技术组织工作，为恢复在“文革”中停顿下来的电机电器基础科研工作作出了贡献。1980年，肖增效调回北京，任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电影、照相、复印机械处处长。在认真进行市场预测和广泛收集国外技术发展资料的基础上，组织制订5年发展规划，合理调整产量；推动建立局属的销售、维修服务部，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了解用户意见，掌握销售信息，改进生产技术。在此期间，他还带队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国和香港地区，考察生产、技术和销售状况，推动了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市场的开拓。

1983年，肖增效调任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该院是原机械工业部直属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机械工业共性基础技术、基础工艺和产品的研究、开发工作，并兼有这一领域的归口管理职能。其所属的研究所分布在北京、上海、沈阳、武汉、郑州等地。他作为院领导成员，在分管范围内，参予并推动共性技术研究，面向经济建设中的迫切需要，促进与武汉、南京、柳州等工业城市的联合；力求基础工艺与相应的设备制造相结合，开发节能、高效、优质的生产线和专用设备，使之成为成套的生产手段；同时促进科技与经营相结合，在深圳等地成立技、工、贸联合公司，讲求经济效益；用活资金，尽可能支持科技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资金需要。

在此期间，他还先后兼任振华机械技术咨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机械工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理事、机械工业经济法研究会理事等。直至1991年，61岁的肖增效正式离休。

老当益壮 传承血脉情深

离休后，肖增效先生担任起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的副会长。侨联一直对潮人的发展提供诸多帮助，潮人也坚持贯彻国家和侨联的政策建

议。肖老一直诚诚恳恳，协助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老领导完成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和潮汕地区联谊活动，关心在京上学的潮人学子。

2012年5月5日，初夏的北京，阳光明媚，百花吐芳，北京潮人学子又迎来了一件大喜事——潮阳实验学校北京校友会成立。在京的



肖增效参加第十四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团长秘书长会议

潮籍学子一百多人齐聚在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交流中心，共同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北京的潮籍学子多了一个温暖的家。

肖增效先生作为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顾问、原副会长，为在座嘉宾和学子们讲述了母校在他心中永不磨灭的影响与同学会60多年来始终不变的情分。他说告诫在座的年轻人：要永远铭记母校的教育之恩、同学之情，塑造美好的人生。

（作者：冉乔月）



谢衷洁，男，1935年生，印尼归侨，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心系高等教育 彰显报国之志

——记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教授谢衷洁

谢衷洁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概率统计数学家。谢衷洁原籍福建泉州，侨居印尼泗水，1950年秋初中毕业后回国，次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后考上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攻读概率统计专业，毕业后，留校致力教学和研究。

早年,谢衷洁从师于我国著名数学家江泽培教授,80年代后,从事时间序列的理论方法和应用的研究。在应用研究方面,他广泛涉及天文地球物理、生理、医学、石油勘探、通讯、空间技术等领域。他成果累累,先后在国内外重大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七十多篇论文,出版《概率论》、《时间序列分析》、《滤波及其应用》、《小波与随机过程》等著作,在业界具有崇高声望。他在国外上世纪出版了一部专著《Case Studies in Time Series Analysis》,影响很广,不仅上了“Math. Rev.”,不久前竟然还在以色列的书店出售!

谢衷洁等的“时间序列及其应用”,将时间序列的理论创造性地用于天文、地质、生理和医学等领域获得成功,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谢衷洁历任中国概率统计学会副秘书长、理事、时间序列分析专业委员会主任、《应用概率统计》责任编辑、国际统计学会L.S.I刊物“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Review”的副编辑。

1990年,他被日本著名学者永井昭等教授提为“国际日本奖”的候选人,该项大奖在国际上具有很高地位,授予对人类的科学技术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90年代,他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任访问学者,并多次出访美国、欧洲多国,在国际间进行学术交流,享有很高声望。一生中,他两次获维也纳欧洲控制论会议最佳论文奖。

心许数与形 勇攀数学之巅

1978年,谢衷洁等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及北京天文台合作,运用时间序列统计方法,在强干扰背景下检测,发现天王星有五个环。在观测中,由于中国仪器的灵敏度较低,记录中除半个环信息外,其他的无从辨识。用谢衷洁的时序统计检验法,仅在中国的记录上就发现了5个环,并作出了至少有6个环的结论。这为十年后美国利用宇宙飞船拍回的照片所证实。天王星环的发现推翻了“除土星外,其它行星不可能有环”的学说,对今后关于天体演化、太阳系形成的研究有重大理论意

义，成为国际天文学界引人注目的事情，使我国关于天王星光环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79年，程乾生、谢衷洁对时间序列应用中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谱估计的时窗选择和最大信噪比滤波，从数学上进行了严密的讨论。80年代末，谢衷洁、程乾生、叶抗生将经典信息和系统理论、观点及方法应用于时间分析的建模和预报，并用谱域分析的方法来检测特征，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好结果。

他们提出拟合模型的极大互息原理，最优谱窗的选择、马氏扩张参数表示与非平稳序列的预报，以及对带噪声观测数据信号成分的拟合方法。他们将时间序列的方法应用于除了天王星环的检测外，还有利用非线性预测法给出了工业噪声条件下工人听力损伤的预报公式，并在5年至10年内对300多人进行了实地检验，取得成功。该项成果获1991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及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他们还将时间序列的方法应用于视觉诱发电位与智能的关系研究，及离体脑垂体LH释放节律性的发现。

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时间序列得到深入研究和应用。在谱估计方面，北京大学程乾生、谢衷洁提出了谱域上的极大能量化准则，并在此准则下得到了最小核能的谱图核函数。谢衷洁用山农互息概念提出了带噪声数据模型拟合和谱估计方法，他给出了对指数布鲁木费尔德模型的一种定阶方法。

谢衷洁既是一名重要的科研人员，也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在科研和教学两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90年，他获得获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是国务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奖5大奖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之一，主要授予在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创新、推广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及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等过程中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中国公民。1991年，他又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心系国与家 致力教育公平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谢衷洁以教育为落脚点；作为一名政协委员，谢衷洁也一直以祖国教育视野的发展为自己的责任。他在任政协委员期间，一直十分关注教育方面的问题。

针对教育收费的问题，他曾对媒体说：“媒体应该好好监督一下这上学难、乱收费的问题，要从根儿上找原因。”通过实地调查，谢衷洁发现北京各个地区的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同学校的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各方面相差也很悬殊。

“师资力量的悬殊程度决定着学校教学水平的差距，一个学校关键是要有一批优秀的教师。”谢衷洁认为，只要能够将全国的师资力量比较合理地分布，地区间的教学水平差距就会很明显地缩小。可以将中学里经过资格评定的优秀教师集中由政府部门聘任，并超脱于学校之外，由各级政府按公平原则轮流分配到各所学校，其待遇均维持不变，解除其后顾之忧。如果达到理想效果，这一方法可以把重点中学的色彩淡化，家长对名牌效应趋之若鹜的情况会大为减弱，择校费也就会逐渐消失。

关注教育问题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视察和调查，将科学的调查和统计方法应用到调研之中。他一共担任过15年的全国政协委员，曾在全国各地视察，将概率和统计应用到了了解社会和调查社会中。凭借科学的方法和踏实的作风，资料详实，数据准确，报告往往有的放矢，切中要点。他常说，这就是北京大学的作风。

心怀美与善 彰显报国之志

谢衷洁的一生，都在努力地钻研和奋斗。一生的成就与自己的努力息息相关，时代与机遇也给了他前进的方向和空间。1949年，新中国

成立的消息传遍中华大地，所有的华侨都非常兴奋，想要回到祖国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1950年，谢衷洁和大哥偷偷登上回国的轮船，毅然决然地从印度尼西亚出发，前往心中牵挂已久的故乡。回到国内，国家为谢衷洁解决了当时学费的问题，如今已入耄耋之年的他追忆往事，仍然感慨万千，“全靠国家。”



谢衷洁编著的《普通统计学》教材

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的数学教授，谢衷洁开设的“普通统计学”闻名全校。统计学是关于收集和分析数据的科学，其重点就是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在日常生活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谢衷洁在课程和讲座中讲统计学，都会用大量的事例和数据。他语言平实易懂，将高深复杂的数学学科分支化为生动、具体的现象和分析。

他的研究代表了统计学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学生们在他的课堂上能接触到最前沿的知识。

谢衷洁说，高校教师必须以科研为基础，在科研成果的前提上，才能有最好的教学效果。他以“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为治学理念，潜心科研，才能放眼世界，帮助学生开拓视野，树立理想，坚定方向。退休之后，还有许多学生登门请教，他也都耐心回应，一一解答。

百舸争流千帆竞，借海扬帆奋者先。谢衷洁的一生，就是为祖国教育事业奉献的一生，在他热爱的北大，他奉献出了自己一生的热情。他用过人的胆识，惊人的钻研，傲人的坚守，描绘了一幅逶迤磅礴的奋斗画卷，唱响了一曲恢宏荡气的成长壮歌。

（作者：吴悦）



许南明，男，1922年生，泰国归侨，曾任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献身艺术以明行 秋风歌咏以明志

——记中国电影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许南明

提及电影艺术，许南明的名字总是能够立即浮现在人们脑海中。从留洋海外到奔赴前线，从抗战老兵到出版大家，从抛洒热血到繁荣文艺，许南明的一生精彩而纯粹。他是无数电影人的榜样，也是电影出版事业的突出贡献者。

从旧社会到新时代，许南明这位爱国归侨，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故

事，如何走上电影道路，为何编撰《电影艺术词典》？让我们走近许南明，感受他的电影人生。

爱国归侨 赤诚之心投身进步事业

许南明先后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许南明少年时期，随父侨居马来西亚槟城。后回国在广东普宁一家进步中学——兴文中学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1940年留洋泰国。彼时正值国家危急存亡之际，许南明执意回国参加抗战。后经父亲同意，前往中国香港就读高中。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举办了四期文艺讲习班，每期两个月，聘请著名的思想文化界前辈作为老师，许南明也参加了文艺讲习班，名家的演讲对他而言是思想和文学的进一步启蒙。

在香港的几个月中，许南明从讲习班汲取了进步思想。那时候，文协分会下设文艺通讯部，简称“文通”。“文通”不仅负责组织讲习班，在讲习班结业之后，还会将进步学员组织起来，组成“香港青年文艺研究社”，简称“文研”。许南明既是“文通”的成员，也加入到“文研”中。在组织里，他受到了许多老师演讲的启发，进一步认识到“写作要深入生活，深入民间。”

抗战胜利后，东江纵队奉命北撤，许南明和部分人员则奉命留守香港。但由于港英当局对共产党及进步社团持敌视态度，带有红色印记的“文通”部的注册被坚决否决。“文通”成员只好另寻他法。

后来，许南明等同志获悉秋风歌咏团这一群众性团体，其团长陈先生是爱国进步人士。日本投降后，秋风歌咏团继续作为合法的社团存在，但活动仍旧处于暂停状态。得知这一情况后，“文通”部立即派人与陈先生协商，在努力之下，最终达成共识——让“文通”挂秋风歌咏团的牌子进行活动。自此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香港的青年团体

如雨后春笋迅速蓬勃起来，“秋风”的成员也不断增加。

1948年秋，中共香港工委“青委”决定成立由“青委”直接领导的党的中心支部，加强对青年团体的领导。许南明成为中心支部成员，兼任“文通”党小组长，并与许戈阳、高建民作为理事共同负责“秋风”的领导工作。为了传播新思想同时解决党组织的资金紧缺现状，秋风歌咏团另辟蹊径，联系各方人士租借资源放映苏联电影。后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华南文工团三队，迎接广州解放。



1949年10月4日，华南文化工作团第三队全体人员在广东省龙川县老隆镇合影，最后一排左五为队长许南明。

结缘光影 聚沙成塔开拓艺术视野

全国解放以后，许南明的老师杨少任、洪藏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公司任职，向许南明抛出橄榄枝，希望他加入到公司中。“他们是我的启蒙恩师，对我比较了解的，我从此进入了电影界。”

发行公司的华南分公司设在在广州，分公司下又分设几个办事处。许南明就成为了其中之一的广州办事处副主任。1953年，许南明负责电影发行，“其实重点就是影院排片。”后来，由于表现优秀，许南明被

调往中南湖北省办事处。同样为了配合影片上映，负责宣传工作。从开始的小消息和影片介绍，到之后的电影评论，以及在比较重要的电影上映之前的宣传舆论工作，许南明得心应手。

1956年，许南明从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调往文化部电影局任外事科科长。之后，中央号召革命干部下乡劳动锻炼，许南明作为文化部下属单位干部去往江苏扬州地区进行劳动锻炼，至1958年底回京。这年，许南明被调到电影出版社属下的《大众电影》杂志任编辑部副主任。在任期间，许南明在《大众电影》1958年第20、21期发表了苏联影片《共产党员》笔谈文章六篇。随后，他代表刊物发表总结性文章，题为《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论“共产党员”》，在1959年第5期刊发。

文章发表后，大量读者纷纷来信表示赞同文章的观点。“《大众电影》是一份通俗性刊物，拥有大量读者，而且是半月刊，一期紧接一期，工作紧张，责任很重。好在编辑部同志们关系融洽，很有干劲，基本能保持刊物的特色和质量，按期出版。我也通过实践，学到一些办刊的知识，开拓些电影艺术的视野。”

躬身笃行 建设中国特色电影学派

许南明先后出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一直到67岁才离休。“我们出版社的出版理念非常明确：那就是传播和积累电影文化，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学做出贡献。”

不久，中国“影协”也恢复，出版社遂划归影协领导，由许南明等人组成领导小组。“任务艰巨、力不从心，但又有一股被荒废的时间必须追回来的迫切感，所以只有硬着头皮干！”作为出版社的编辑室，《大众电影》恢复后一度非常红火，销售网点被挤破门窗的事时有发生。发行量最高时曾达到960万份。于是，许南明有了系统地出成套电影理论书的想法。“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电影出版社有些垄断性质。那时候出

版通俗读物赚钱多，而专业学术书籍发行量小，我们只好以丰补歉。但是，我们坚持要多出书、出好书。”

许南明“出版系统化电影专业书”设想的实现过程中，《电影艺术词典》是不容忽视的部分。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电影艺术辞典，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电影工具书。“搞电影理论研究、电影评论工作的人非常需要一本专业辞书，电影界各个门类的人士也纷纷提出了要求。我们为此特意成立了一个辞书编辑室。150位撰稿人由编委和各分科主编约请而来，35人的编委会由出版社的五人任常务编委，许南明任主编。



许南明工作照

《电影艺术词典》的成功问世，受到电影界

专家学者的热烈支持，海内外媒体广泛报道，颇受好评。这部词典还荣获两个国家级图书奖：1986年中国图书荣誉奖，以及1986年全国优秀图书畅销奖。许南明曾说，“电影专业辞书能够畅销，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2003年，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出版社决定对《电影艺术词典》进行修订，以满足广大专业人员的需要。许南明和已离休的前总编富澜以及刚刚退休的总编崔君衍并列主编，主持修订工作。时隔20年，新技术、新思潮、新观念不断涌现，修订工作遭遇了很多困难，如词条的设置、框架结构的变动等等都要有所调整和补充。“我们的工作要求很严谨，宁可慢一点，也要科学准确。这次修订，假如没能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交代不过去！”于是聚集了许多初版的编委，并邀请电影理论家、电影教育界的一些精英新锐，历经两年琢磨，修订版终于于2005年12月出版。

许南明在电影出版界工作超过30年，主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工作期间，他先是组织重印了“文革”前一些有价值的电影专业论著，使之重见天日；随后又组织专家、学者撰写或翻译出版了海内外电影学术专著和通俗读物，多年积累下来总数竟超过3000多种，产生了相当不错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出版社的领导者，他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善于经营，他组织全社员工重新规划产品线，发展了声像读物等新的品种，开拓了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电影发行渠道，创建了印刷厂，成立了北京、广州两家电影书店，创办了《环球银幕》《孙悟空》两种杂志，还承担了《大众电影》《电影艺术》《世界电影》等8种刊物的出版工作。

作为一个跨世纪的老人、一位归国华侨，“一个幸存者”，许南明有很多感慨。“新时期我有幸受邀访问过一些国家和地区，看到外面不少东西，我到过美国、法国、苏联、捷克、朝鲜、新加坡和香港等，对不同的社会状况、人文风貌有所感触。我还接触了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思潮、新的理论，对过去一些事情、一些现象、一些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非凡成就，综合国力空前提高，这是全球都有目共睹的。”许南明动情地说。

（编辑：普文越）



许蔚文，男，1924年生，泰国归侨，曾任中影公司国外处亚非科科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心向艺术 一生相随

——记中影公司国外处亚非科原科长许蔚文

书店，报纸，电影是许蔚文人生的三个关键词，他一生都坚守在文化艺术事业发光发热。从参加“华侨书店”经营，在战火燎烧中守护进步书刊的据点；到从事报业新闻工作，在泰国进步侨报的一面旗帜《全民报》中笔录春秋；再到加入电影的宣传发行行列，在泰国新泰影业公司、中影公司国外处等舞台挥洒人生。心向艺术，一生相随，就是许蔚

文最真实的写照。

爱国新青年：坚守战火中的书店

许蔚文，1924年12月出生于泰国曼谷，1939年回国到昆明读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进攻向南太平洋国家，切断了缅甸公路，外汇都断了，昆明也遭日本飞机轰炸，学生都无心上学。

广州沦陷后，香港和泰国等地华文报刊介绍在祖国抗日战争大后方——云南、四川、贵州等省，政府专门设立接待站和各类学校欢迎海外侨胞回国投资，安排接待各地华侨学生回国升学。昆明春城四季如春，因此南洋各地，特别是受泰国排华影响的侨生，大多都经越南进入云南昆明继续学习。其中，也有不少泰国侨党送回国参加抗战的青年，许蔚文在昆明结识了一群有志之士。

许蔚文作为一名爱国华侨青年，在战火的燎烧下，和一群人同伴守护着书店，坚守为读者提供进步书刊的据点。

1941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之后，贵阳、桂林的“生活”、“读书”、“新知”书店（即“三联书店”）相继被国民党查封或被迫停业。昆明生活书店的薛迪畅经理早已做好应变准备，他找到泰国归侨马扬生商量，建议借政府宣扬爱护华侨政策之机，找一些爱国华侨，以华侨名义开办书店，由生活书店暗中提供书刊，一旦三家书店被封，华侨书店可以坚守据点继续为读者提供进步书刊。马扬生等立即赞成并表示要以“华侨书店”为店名，即日开始筹备。于是，许蔚文以华侨身份加入了守护书店的阵营。

1941年4月1日，“华侨书店”开门营业，秉承三家书店的革命优良传统，继续坚守传播进步文化。

那时，许蔚文上学的昆明育侨中学为避战乱搬到乡下，而他则选择一直留在书店工作。书店建成后，他又和同学前往桂林开办华侨书店的分店。因战乱无法正常上学，他一直在书店坚持到日本投降。

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见读者庆祝华侨书店开门营业，马上四处散布谣言，威胁人们不要到华侨书店买书，以免遭到追究和处分。许多读者不怕威胁，顶住逆流，纷纷到华侨书店来。

由于长期遭受反动派查扣邮包及在门市都随意设收书刊，书店损失严重，经济周转十分困难，为了解除经济困境，他们也曾经营运输副业。有的泰国侨生先后前往贵阳和重庆升学，许蔚文知道书店人手不够，放弃上学而坚守在华侨书店，领着微薄的工资，生活十分艰苦。

昂扬报业人：呕心沥血传播进步文化

1945年日本投降后，许蔚文离开父母弟妹多年，重新回到泰国。华侨书店的马经理建议他在泰国寻找机会，与昆明的华侨书店合作继续开办书店。但是战争刚结束，父亲身体不好，作为大哥家中还有三个弟弟和四个妹妹，无法筹集资金开设书店。家庭重担压在许蔚文身上，他面临两条路：一是做生意，二是找工作。日本投降后民盟在泰国建立支部，许蔚文参加了民盟支部并结识一些报界同志，加之原先在国内开办书店时经常与进步人士，共产党员有联络，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回到泰国后的他很快就与这些思想进步的人士聚集在一起。

当时，泰华社会想要恢复一个旧的《华侨日报》，需要华侨商人出资，但是他们的思想右倾，进步组织决定让许蔚文参与恢复《华侨日报》的工作。他开始进入《华侨日报》社，但观察两三个月发现报社仍然坚持右倾，不久后许蔚文就退出了。

1945年前后，民盟也开始办报《民主新闻》和《曼谷商报》，侨党从地下转为公开的日报《全民报》也纷纷兴办起来。《全民报》以“实现民主、中暹亲善”为办报宗旨，关注中国时局，力主争取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是泰国进步侨报的一面旗帜和东南亚华文报业的一个积极阵地。组织让许蔚文参加民盟报纸的筹建工作，《全民报》工作的同学找到他，并邀请他为邹韬奋逝世纪念日的纪念周刊撰写文章。不仅

如此年许蔚文还参加了《新时报》的工作，又到泰国安达公司与庄世平接触，在庄世平开办的“卢沟桥电影院”中负责宣传工作，撰文介绍苏联影片，发行苏联影片。

《新时报》结束后，党领导李启新找到许蔚文，邀请他前往《全民报》工作，许蔚文欣然接受，不辞辛劳，不仅要担当外勤工作，还要上夜班做编辑，负责本地新闻一整版的工作。二十几岁的青年许蔚文工作十分辛苦，白天开始采访新闻，跑外勤，晚上回报馆九点开始上夜班，直至早上五点才回家。

1946年至1947年是《全民报》的全盛时期，1948年泰国爆发“六·一五”时间，泰国军人集团政变，报社受到摧残，工会被封闭，人员被抓走。面对严峻的形势，社长通知《全民报》本地新闻版的邱健、许蔚文躲避动荡。

电影把关人：重任在肩奋战宣发一线

1948年，许蔚文加入泰国新泰影业公司，正式进入电影发行放映行业，从事苏联影片的宣传发行工作。1950年回到广州，到华南影片经理公司，任职于“观众服务课”。1951年，许蔚文到汉口的中南区影片经理公司工作，任宣传科科长。1954年到中影公司宣传处工作，后任中影公司国外处亚非科科长。1969至1973年期间下放干校，1973至1976年到文物出版社工作。“文革”后回到中影公司国外处，历任副处长、处长，直至1986年离休。

许蔚文刚回广州的时候，正赶上《中国人民的胜利》与《解放了的中国》接连上映。他的具体工作是组织观众，到工矿企业去宣传。当时印刷很多宣传品，“海陆空”全体出动。谈起这段经历，许蔚文回忆道，“当时我们通过各种交通工具来宣传，公共汽车上挂大广告，天上用飞机撒传单。我们把宣传品交给民航，他们用小飞机撒传单，并在轮船上做广告，海陆空全出动。工作量很大，大广告一做要挂牌、挂红条幅。

那时候爱群酒店是广州唯一的高楼，有二十几层，我们的宣传条幅就从楼上面挂下来。可以说宣传得很深入，面很广。”

此后，许蔚文转到汉口任宣传科科长。汉口的工作比广州更为复杂，电影海报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电影海报由总公司统一供应，但数量不够，有时海报形式也不适应南方需要，各地方影院都想自己印刷。因此，许蔚文和同事们想出一个剧照的流通办法，依据总公司提供的剧照照片，做成彩色版的纸质印刷，供应给各影院，既节约了费用，又解决了影院需求。

1954年，许蔚文到中影北京总公司。总公司要在宣传上要起到领导全局的作用，印发宣传品不仅要介绍影片的故事内容，还需要包括主题思想、艺术成就、各方面，以及加上一些宣传词句。于是，许蔚文常常编纂一些宣传词句，以供参考、使用，还需要肃清不正确和不健康的宣传词语。他们还定期请一些传媒业、教育界、文艺界、专业的影评家等人员，甚至邀请科学技术方面的人士来座谈，提供一些宣传意见。



许蔚文生活照

除了致力于国内影片的宣传工作，许蔚文在影片的输入输出也作出诸多贡献。建国初期，出国展映及贸易谈判路途遥远、影片重，运输花费多，通常只能利用当地中国使馆现有的影片。与此同时，政治因素对影片输出工作也具有很大影响，冷战时期很多国家将中国的影片视为政治宣传品。许蔚文感慨道，“在发行工作中，对意识形态问题形成的发行障碍，我们感触很深。所以那时候对外发行影片不能着急，要细水长流。”

电影的引进同样困难重重，亚非会议之后决定举办亚洲电影周，但是立刻引进这些国家的影片不是件易事，需要得到各个驻外使馆的支

持。尽管宣传铺开影片陆续来了，但是进度缓慢，许蔚文费尽全力寻找联络泰国影片，香港的南方影业公司也竭尽全力一同帮助。直到活动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影片才成功拿来，而且只是拷贝和一册泰文对白剧本，并没有底片和译制素材。

当时，周恩来总理出席北京饭店举行的电影周招待会，中影公司向总理汇报情况，泰国的影片刚收到，可是翻译影片来不及了。总理询问：“谁管啊？”大家都看着许蔚文。总理说：“你们不要考虑赔钱，要考虑影响。”许蔚文回答：“只有赶快翻译剧本，然后打印字幕。”于是，电影周的字幕工作全部交给字幕工厂，大家都全心全意地工作，虽然很遗憾泰国影片来不及配音，但最终还是顺利过关。

许蔚文归国后的数十载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响应国家影业政策，电影事业的起伏中坚守如一，履行和承担好电影放映的把关人。

回首从事一生的电影艺术工作，回首国家电影对流交流事业，他感慨颇深：“周恩来总理一直很关心我国电影的对外交流工作，包括影片的字幕和译制片工作。早在1956年，在日内瓦时周总理就对中影公司杨少任总经理指示，要把中国电影放映给各国人民看，也要把优秀的外国电影放映给中国人民看，而且都能看得懂！可见电影的对外交流工作以及字幕工作、译制片工作的重要性。我们那个时代的电影输出输入工作，就是遵循周总理的指示和贯彻‘贸易性和非贸易性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不断取得进展。”

（编辑：王海英）



杨金，女，1925年生，泰国归侨，曾任职于中国侨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我用一生证明 保证完成任务

——记中国旅行社接待部离休干部杨金

走过艰辛的岁月，经历过时间的磨砺，一批批优秀的共产党员肩负着爱国的使命，在国家建设中一步步走向新的辉煌。对于杨金而言，异乡，是童年的记忆；斗争，是青春的主色彩；奋进，是工作的代名词；炽热的爱国之心，是一生的徽章。

斗争，青春的主色调

六点的清晨，早早起床，匆匆忙忙赶往火柴厂。尽管羡慕那些能够上学的孩子们，但是身边更多的，是和她一样瘦骨嶙峋，补贴家用打工的同龄人。瘦小的杨金从七点开工，一直到下午五点半下班，但只能赚到一点点工钱。当时九岁的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枯燥重复的工位上将发生怎样的故事，她将在这个火柴厂里度过漫长的岁月，经历一生难忘的冒险，抛洒革命的热情。

从9岁时的帮工，12岁时成为正式工，再到15岁，20岁，见过了太多次火柴“噼”地一声闪耀出细小火花，杨金觉得自己也好像一根火柴在时代的大风中摇曳。微弱地昂着头，顽强地抗争，被风吹得几近熄灭，但风定下来，你看到它还是燃着的，而且会越燃越烈。

1941年，日据帝国主义强行登陆泰国，数日内泰国銮汶政府沦为日本走狗，泰国物价飞涨，物资极其紧缺。侨居泰国的华侨、华人受到了残酷打击和迫害，杨金所在的火柴厂也被日军占领。

勇敢坚韧的华人在爱国力量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宣传抗日，组织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等抗日活动，组织募捐筹措抗经费，成立抗日义勇队准备武装抗击日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和爱国主义的热情让少年的杨金，迎着恐惧和危险前进。后来，杨金还和当时姐妹会的黄音、何宝珠聚在一起，回忆当年在泰国参加抗日斗争的日子。说到激动处，三人仿佛回到了对敌斗争的紧张时光，感慨万千，“追忆往事，是为了教育后代，勿忘国耻，将爱国主义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942年，杨金加入在泰国的中共组织，1944年，她又加入了抗日义勇队。在艰难的环境下学习用枪，接受训练，随时准备上前线。不到二十岁的杨金已经做好了为组织牺牲的准备。在抗日义勇队的时候，杨金曾和其他队员一起偷袭过日军武器库，面对守备森严的日军武器库，备好了煤油等物品的十几个人，打算拿走部分武器，再烧掉日军武器

库。但是，刚拿走一部分军用物资就被日军巡逻队所发现，只好迅速撤离。没能成功烧掉武器库，她对此深觉遗憾。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抗日，杨金被党组织派到工厂发展队伍，找机会组织罢工怠工，参加工会组织的罢工运动，去工人家里探访情况，和其他女工一起建立“勤劳姐妹会”——一个由工厂女工组成的抗日基层组织，后来和其他组织一起组成“华侨工人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姐妹会里，杨金和姐妹们一起努力培养工会会员，壮大工会力量，为宣传爱国思想，激昂抗日士气做出很大贡献。

当时，泰国被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后勤补给基地，很多日本军需工厂进行生产做子弹带、马鞍、纺纱等。经过党组织的了解，杨金和姐妹们积极应聘，进入工厂当工人，秘密联络工友（以华人华侨为主），继续发展组织，宣传抗日，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杨金和工会会员一起，利用下班时间广泛接触工人，组织识字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大声疾呼，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国家民族的危难。虽然她年纪尚小，但头脑灵活，初生牛犊不怕虎，很有干劲。前一天学习的革命道理在第二天就可以在宣传时用上，警醒工友同胞。

还有一次，被派到日军军需纱厂做工的杨金在组织工友破坏机器时被日本人察觉。之后，日军进行追赶，杨金在电车上差点被追上，但是机智的她在轨道交叉处，跳上了迎面驶来的另一辆电车车门成功逃脱。杨金已不记得当时的自己是怎样有勇气和力气从车门跃出，往迎面的电车跳去。但是她依旧记得，破坏机器，破坏日军生产是组织交给她的任务，服从组织的安排是自己的职责。

归根，历经艰险的归途

在杨金的眼里，华侨身份更重要的是，她是中国人。这是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多次说过，并在一次次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争中感悟出来的。

1945年日本投降后，泰国当局迫害华侨进步人士。危险还远远不止这样，1952年，泰当局勾结国民党对华侨和进步人士实行白色恐怖，地下党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了暂时停止组织活动，就地隐藏，伺机而动的指示。杨金等人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威胁。当时，存在暴露风险和已经暴露的党员同志有很多，国内也开始大批组织东南亚党员的撤退。

一直在为工会工作的杨金有一天忽然失去了和她单线联系上级的消息。1953年，丈夫接到上级要求撤退的通知，杨金未能成功联系到她的上级。沉吟再三，杨金最后决定和丈夫一起回国。杨金一家人通过组织回到了祖国。因为事发突然，回国之路并不平静。带着回到祖国怀抱的激动和对无法联系到上级的不安，心绪矛盾的杨金带着三个孩子，在船上遇到了大风浪。那时最小的孩子才4个月，受到惊吓整天哭闹，她们花了整整十一天才到汕头，杨金他们没能成功找到联系人，无法直接到达广州，辗转回到祖籍广州已经是一周后。初回国时没有住处，只好住在公安宿舍，后来搬到了暨南大学。

刚回国，杨金进入侨办工作，普通话不好，交流有一定的障碍，生活习惯也不适应。而因为在泰国时与之单线联系的上级的杳无音讯，杨金的党组织关系一直无法得到交接。工作也一直没得到落实，但是杨金并没有抱怨，恰恰相反，她觉得回国后安稳的环境，幸福的生活正是自己所期望的。

努力，永远的前进之路

在未能证实党员身份的这些年里，杨金先是在红十字会学习包扎等护理技术，争取有一技之长，找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后又积极参加夜校学习，尽管白天要照顾三个孩子和家里的老人，辛苦劳累一整天，但是杨金对知识的渴求却从未间断。时隔多年，那双会做火柴盒，会破坏机器，能拿枪打仗的手，再一次握住了四年级时因为战争和贫穷不得不

放下的笔杆。

因为这几年的学习积淀，杨金被安排到中侨委的食堂做会计工作，帮忙记账。1959年，她下放到东郊黄各庄进行劳动，儿子还依稀记得自己坐着长途汽车和母亲杨金一起从东郊回北京的场景。下放回来的杨金被安排在华侨饭店接待处工作，饭店中会粤语的工作人员很少。杨金被派往华侨饭店接待部前台工作，负责教服务员粤语，尽管工作人员大多都是北方人，但她还是不厌其烦的指导，纠正发音。

1969年，杨金主动申请去五七干校进行贫下中农再学习，1972年结束后回到了北京，在华侨大厦问询处工作，后来借调到中国旅行社。



杨金生活照

改革开放以后，来北京旅游的港澳台同胞越来越多，祖籍广东的杨金，因为从小在泰国

时父亲就教她说广东话，潮州话，语言优势和杨金不懈的努力让她在接待工作上表现十分突出。杨金家里有很多笔记本，笔记工整，内容完备。一点一点记录了她为中旅接待工作做出的努力，大到北京的风土人情、历史背景，长城、颐和园等景点，小到博物馆某件著名展品。不仅密密麻麻写满了好几个本，还圈圈划划，增补删改，这些都是杨金的为接待工作做的准备，早已烂熟于心。

在中旅的这些年，她数百次带着访京的港台演员、政协委员等登上古老的长城，介绍这里的一砖一石，讲述千百年来的历史故事。

不论是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帝国主义的斗争，还是举家从熟悉的泰国回国，又或是在组织关系无法正常交接时期的“自我充电”。从一开始

就做好为抗日救亡事业牺牲的杨金，用尽一生的力量发光发热，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杨金用一生去证明，保证完成组织安排的任务！

（作者：王美力）



叶瑞福，男，1921年生，缅甸归侨，曾任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宣传资料部经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信仰不灭 初心不忘

——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原宣传资料部经理叶瑞福

翻开《金色记忆—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口述记录》一书，37篇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的口述记录中，所配的许多历史图片都注明“叶瑞福供图”。而这每一张珍贵的照片背后，都有一段浓墨重彩的历史故事。提及自己所获的摄影奖项，叶瑞福说多到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谈到自己

所参与过的文化活动，他却又如数家珍。

“胞波情”，这是叶瑞福在两国文化交流工作中总爱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像心中一直以来的美好期盼。无论是对祖国深沉的爱，还是对缅甸无法割舍的情感寄托，他总是希望，两国的合作交流能一如陈毅元帅所赋的诗一般：“胞波感情重，江水溯源长”。

他乡遇恩师 坚定信仰

1931年，叶瑞福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在这一年，国人遭遇了数十年一遇的洪水，更让人愤懑和屈辱的是这一年秋天，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而后，1938年5月10日，日本进攻厦门，市民纷纷撤离，部分市民逃往海外，年幼的叶瑞福正是其中一员、他与一个同行的女孩扮成姐弟，历经一周才到达父亲做生意的地方——缅甸。

在缅甸，帮助父亲打理水稻生意的叶瑞福初中时进入缅甸华侨中学读书，在这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老师。这几位参与创办《人民报》的老师都是爱国民主人士，叶瑞福深深被他们投身革命的坚定信念，以及实现心中理想的坚忍不拔意志、顽强奋斗的精神所感染。在爱国老师的教导之下，他坚定了自己一生的信仰，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叶瑞福从未停止一刻思念自己的祖国，始终牵挂祖国未来的发展。身在国外的他，因更加坚定了党领导祖国人民走向胜利的信心，也坚定了自己要回国的赤子之心。1948年，在其中一位恩师姚立明的推荐下，叶瑞福和自己一位缅甸华侨中学的同窗离开缅甸，前往香港的达德学院继续学习。

对于叶瑞福而言，回忆起这段在达德学院的学习时光仍旧充满幸福。在这里，学院为了让学生了解国内革命斗争及民主运动情况，经常聘请由内地来港的民主党派领袖、无党派人士和著名学者来校作形势报告、讲学或作学术报告。因此，包括叶瑞福在内的学生思想空前活跃、

政治觉悟显著提高。但是，幸福的时光却是短暂的，港英当局为了打压中国共产党在港势力，于1949年3月封闭了达德学院，民主进步人士在中共的安排下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活动。

1950年，在恩师姚立明的推荐下，叶瑞福怀揣着自己坚定的信仰来到了北京。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际上众多国家拒绝承认新中国，而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消息让叶瑞福无比振奋，他认为，这意味着两国的外交关系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期待着能为两国之间的交流作更多的贡献、这无形中也为他奋斗一生的工作埋下了一颗种子，随着信仰和爱的不断浇灌，最终长成了一棵亭亭如盖的参天大树。

游子着军装 追逐信仰

“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当被问道为什么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叶瑞福直接哼唱了起来，他说不需要任何理由，解放军在他的心里就是无比神圣的，能够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他最自豪的事情。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对朝鲜半岛实行武装干涉，同时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国的行径引起了海内外华夏儿女的极大愤慨，广大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祖国人民一道支持抗美援朝斗争。叶瑞福回忆道：“包括缅甸的侨胞们都非常踊跃地参加抗美援朝的海外募捐，大家都非常支持祖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国家物资匮乏的年代，海内外华夏儿女和人民都义无反顾地支持这场战役，因为，他们在这个崭新的国家看到了希望，就如初升的朝阳，点亮了他们信仰的火光。

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作出《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以此为契机，全国掀起了积极参军的热潮，广大归国华侨热烈响应祖国号

召，踊跃报考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报名参加志愿军，积极投身到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中。叶瑞福和几个归国华侨一起报名参军，并正式成为志愿军公安部队政治部文工团的一员。

他们所在的部队多次冒着敌人飞机狂轰滥炸的生命危险，利用夜晚给前线运送物资，一趟趟地奔波于阵地之间。部队在哪儿，物资就送到哪儿，节目就演到哪儿。叶瑞福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深入火线，及时把英雄事迹编成短剧、快板、小调，行军中边讨论边编排，充分发挥战场思想工作的威力，鼓舞士气。但在一次演出的排练中，叶瑞福关节受创导致腿部受伤致残遗憾退伍，1953年转业，来到当时的对外文化联络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

“我加入了解放军是要去解放人民的，这点伤算得了什么……”叶瑞福提起自己的腿伤总是这样说道，说着说着又唱起那首《解放区的天》，他把自己最初的信仰扎扎实实地刻到了灵魂深处，穿上了军装的他，在追逐信仰的路上，已然已经和它化为一体了。

胞波重情谊 实践信仰

2019年11月3日，缅甸宗教事务与文化部长在中国援缅国家艺术剧院升级改造项目的座谈会上表示，中国援建的缅甸国家艺术剧院是象征缅中友谊的标志性工程。近30年来，它为缅甸国内文艺表演以及外国来缅举办文化艺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

叶瑞福颇有感慨，“我们去帮它建了剧院，在这所剧院两国的舞蹈团啊都在这表演，一起交流。”很多两国精彩的文化碰撞都留在了这个舞台，也留在了叶瑞福的记忆中。而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入，缅甸也出现了很多传播中国文化的学校，给当地的华侨或者想学习中国文化的缅甸人民更多的选择。转入对外交流工作的叶瑞福，无疑将自己的信仰也带入了自己这份工作实践中，并与自己心中那份对缅甸的情感深深契合在一起。

除了文化上的交流，叶瑞福也无比自豪国家和党在经济各方面对缅甸的支持与帮助，双方的经济贸易也在稳定扩大。他说，自己仍在缅甸的侨胞兄妹也经常往来于中缅两国做生意，每年回国都会感叹国



叶瑞福生活照

家发展的日新月异。即使在缅甸生活，仍然保持着中国的文化习俗，牵挂祖国，因为拥有这样一个日益强大的祖国而自豪。随着中国与缅甸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化，贸易政策的不断发展，也更多人得到了切实的惠利。

2011年5月，中缅决定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以来，两国在“一带一路”等领域的合作进入快车道，成绩斐然。2019年4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时指出，中缅“胞波”情谊深厚，共饮一江水，是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一带一路”的合作，为这份深深记挂在叶瑞福心中的胞波情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而这份叶瑞福坚守一生的信仰，也为他余生最大的心愿——“胞波感情重，江水溯源长”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作者：朱天然）



张德维，男，1930年生，越南归侨，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中越联络的桥梁 中越关系的见证者

——记外交部亚洲司原副司长张德维

张德维是江门新会人，曾侨居越南求学。四十年代中期，在中越边境参加越南游击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参与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建馆，负责翻译、调研。历任驻越南大使馆翻译，外交部亚洲司科员，驻越南大使馆三等秘书，外交部亚洲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

驻泰国、柬埔寨、越南大使，驻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代表。离休后，历任中越友好协会副会长，北京市越南、柬埔寨、老挝归侨联谊会第三、第四、第五届会长和名誉会长，曾荣获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50年代，见证援越抗法

从1950年1月，党中央派罗贵波同志作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赴越开始，到1954年秋，中共中央应越共中央（当时称“印支共中央”）的请求，先后派出陈赓为中共中央代表和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以罗贵波为团长的政治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历时近5年之久，直至越南军民取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奠边府战役胜利，随之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获得签订和实施，战争结束。包括首都河内在内的越南一半国土获得完全解放。至此，中国援越抗法的这段光辉历程始告结束。

1950年初夏，张德维奉调至驻在越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机关（即“中国援越顾问团”），担任越文翻译工作，在政治顾问团、军事顾问团工作四年半多，经历了众多援越抗法的重大事件。1954年8月，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9月1日，首任大使罗贵波向胡志明主席递交了国书。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提出逐步撤销中国军事和政治顾问团的建议。越共中央表示同意。1955年冬至1956年春，我国先后撤销了军事、政治两个顾问团，并根据越方要求改派军事专家和经济技术专家。中国赴越南顾问团的使命，至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60年代，陪胡志明到最后

60年代，越南领袖胡志明因病到中国疗养。张德维作为胡志明的

翻译和中国医疗组的秘书，一直陪伴胡志明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1967年初，当时还是中国驻越南使馆三等秘书的张德维接到胡志明秘书的电话，胡伯伯让他到小木屋去。原来，胡志明最近一段时间，胳膊和腿部活动都不灵便，做了一些治疗，但不见好转。所以，他想去中国看病。



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亲切交谈（张德维任翻译）

张德维立刻发电报给周总理。两天后，北京复电，周总理建议胡志明住到广东从化温泉宾馆，中央将选派有经验的医生前往诊治。4月14日，胡志明飞往广州，随行人员只带了张德维、秘书武奇和越南的保健局长茹世保。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广州方面成立了“中国医疗组”，为胡志明做系统体检和治疗。治疗了两个半月，疗效显著，1967年7月1日，胡志明离开广州返回河内。谁也没料到，一个多月后，胡志明的健康突然出现新问题，淋了雨高烧不退。周总理得知后，立刻派医疗组赶赴河内。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下，退了高烧，但脑部的旧病又有复发的迹象，心脏也出现新的问题。最后，在多方协商下，胡志明再赴中国，疗养半年多。

此后的两年间，中国医疗组又3次赴河内为胡志明治病。1969年夏，胡志明想让医疗组回中国休假一个月，顺便让张德维带封信给周总理。“信是他自己写好的，表达了感谢和想再去中国的愿望。我译成了中文，他看完后用汉字签了胡志明三个字”。

当年8月中旬，胡志明外出视察后突患感冒，引发急性支气管炎，曾出现过一次短暂休克。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同时发作，继而支气管炎转成急性肺炎。从8月25日开始，北京接连增派两批中、西医专家及医疗

队赶赴河内，采取一系列治疗办法，但都未见效。

张德维清楚地记得，老人家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表现十分安静。他一直陪在胡志明床前。1969年9月2日，胡志明没能迈过79岁那道坎儿。当时，周恩来当日指派的第三批医疗专家尚未赶到河内。

80—90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

1985年3月，张德维成为中国驻柬埔寨大使；1989年9月，张德维成为中国驻越南大使。

从1978年到1991年，中越之间持续敌对。80年代末，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冷战格局彻底崩塌，整个世界的主题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对抗，和平和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流。1989年，张德维赴任中国驻越南大使，他所肩负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使中越关系正常化的渠道。1991年11月，越共总书记杜梅正式访华，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从而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两国关系对立状态。为达到这一目标，双方都作出了巨大努力，其中两国领导人于1990年9月在成都举行的秘密会晤，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而且继续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当时的领导人在错误路线指引下，一面公开反华，一面加紧对老挝的控制，直至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导致越南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际处境空前孤立，陷入极度的内外交困境地。阮文灵出任总书记后，急于纠正黎笋的一整套错误做法，对内提出全面革新的主张，对外力图摆脱极为孤立的国际处境，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口号。

阮文灵认为，对越南来说，当时最为急迫的两件事就是要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但是，越南外交部长却千方百计干扰和阻挠阮文灵的战略部署，继续按照黎笋的一套思维行事。阮文灵作为新上台的领

领导人，在中央决策层中无深厚根基，他的一些设想也尚未得到更多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是极为棘手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1990年6月5日，几经辗转，阮文灵总书记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张德维。阮文灵首先请张大使转达他对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中国领导同志的问候。他说，越南抗美胜利、全国统一后，本应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但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复杂情况。这十几年越南比抗战时期更艰苦，日子更难过。特别是越中关系出现了困难。应该说，越南对中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始终主张做错了就要改正。这方面的事情请中国同志谅解，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当前更重要的是搞好现在和将来的两国关系。张德维大使立即把阮文灵的谈话内容详细报告了国内。中国领导人尚未准备很快同阮文灵见面。

1990年8月16日上午，阮文灵总书记又托人给张德维大使捎个口信。其中一段说道：“我认为，现在两国领导人有必要进行直接和深入的讨论，以便消除所有的误会，并排除越南外交部的干扰。我相信，两国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从捍卫社会主义和恢复纯真友谊的殷切希望出发进行会晤，柬埔寨问题一定能迅速得到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也有这种看法，请发出内部邀请，我将立即秘密前往中国”。张德维立即把阮文灵托人转达的意见报告国内。在谨慎思考和商议后，使馆郑重建议国内对阮文灵再次提出的内部访华的要求给予积极考虑。

8月19日夜，使馆收到了国内的答复。国内指示张德维向阮文灵身边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想于近日单独会见阮文灵，以便当面了解阮的真实意图，结果立即报部。见面后，张德维立即将他的谈话内容报告国内。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的指示，请张德维大使转告阮文灵：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欢迎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经请示国内同意，张德维将搭乘越方专机前往成都，参加会晤。

从成都会晤至今，中越关系逐步正常化，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

国在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两国领导人保持了经常接触，双方的相互信赖较前有所增强，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领土问题也取得了明显进展。

（作者：吴悦）



张淑英，女，1931年生，马来西亚侨眷，曾任职于国侨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平凡如斯 一心为党

——记国侨办离休干部张淑英

“在普通平凡的岗位上要勤勤恳恳”，这是张淑英时常挂在嘴边上的的一句话。无论是解放战争中的情报交通员，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侨联工作干部，亦或是离休后的社区工作者，张淑英始终在岗位上勤勉不辍，兢兢业业。她常说，新时代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践行

中国梦的一小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实现中国梦，要响应时代号召，脚踏实地。

生于侨村的革命战士

张淑英，一位出身于广东普宁大南山革命老区、侨村的山妹子。青少年时，在老区革命精神的熏陶下，受党的指引走上了革命道路，坚定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身怀中国心的革命战士。她是出色的共产党员，《普宁党史资料》上有老地下党员撰文称赞早期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张淑英等女青年。

张淑英的家乡是一个穷僻山村，又是一个华侨众多的侨村。在落后的社会环境下，积贫积弱，民不聊生，不少人远离家乡到异国谋生，张淑英的胞兄当年也曾被迫漂泊海外。在旧社会的阴霾下，张淑英虽然自己积极争取读书机会，但受制于条件所限，入学受教育年限不过四五年。

“受老区革命精神传统熏陶，我幼小心灵就逐渐萌发了对旧社会封建压迫剥削制度的不满”。青年时期，张淑英为谋求民族解放，为争取男女青年婚姻自由，和几位姐妹参加了党的革命活动。尔后，参加了党组织，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组织工作期间，她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她做过情报交通工作，积极动员群众入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好坚实的后备工作；她担任过宣传员，广泛散发革命传单，做好革命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低的现状，她办夜校识字班，串联成立农会、妇女会组织等等。张淑英所在村成立了妇女会，由于她的突出表现，被推选为第一任主席。

全国解放后，张淑英积极参加地方民主改革与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她在地方参加工作队，任区妇联干事，并前后参加了党的基层妇女工作、农民运动、减租减息退押、清匪灭霸等运动。后来，她调任中侨委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忠

于职守，尽责尽力，多次受到党组织和领导的肯定赞扬。1994年7月至1996年6月，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机关党委连续三年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并荣获所在单位颁发的“从事侨务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的表彰。离休后，她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义务参加居委会工作，参与社区建设，2011年荣获了“北京市导引养生功推广贡献奖”。在侨务工作中，她积极做好海外亲属工作。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国家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她的亲人们接踵而至回到故乡探亲，修建祭扫祖坟，寻根认祖、溯源追远。张淑英常说，“要怀有一颗中国心，铭记党给予侨眷家庭的恩惠，我们要世代相传，坚定地跟着党走。”

紧跟党的步伐 积极提升自我

时势造英雄，张淑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离不开时代的机遇。

在动荡的年代，身为山村的女娃娃，张淑英文化程度低，不谙世事。但在封建社会的重重剥削下，经由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她认识到了旧社会封建剥削制度的本质，在党的沐浴下，她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队伍“武工队”来到了她们的山村，传播革命火种，发展革命力量。张淑英听取“武工队”的宣讲后，深受鼓舞，意识到现有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民族亟待解放，人民正在受到压迫。她决心，要走出旧家庭，投入新社会，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努力奋斗。其后，她坚定地加入了革命队伍的行列。

参加革命后，张淑英深感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基础知识薄弱，主动要求学习新知识，提升自我文化素养。在地方工作几年后，党组织选派她到普宁县中等简易师范学校接受速成培训，两年后毕业。张淑英说：“这段经历对自己提高自己政治思想、文化水平，实实在在获益匪浅。这都是党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培育，造就了我。”多年来，张淑英一直坚

持看党报、阅读红色书籍，时刻紧跟党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而今她虽然已至耄耋之年，却仍然保持这个习惯。

在张淑英成长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她前进的风向标。解放战争时期，那个极其动荡的年代，困厄重重，民族亟待解放。革命兴起，机遇随之而来，张淑英在党的指引下，严于律己，不断学习，未曾懈怠，最终完成了从山里女娃娃到革命战士的蜕变。

心系侨务 一心为党

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她坚持每月参加一次党支部会，几十年来，风雨无阻始终如一。这是张淑英同志对党的赤诚，也是她矢志不渝的信念，她说“决心在党的光辉旗帜下，为党旗争辉，为党的事业，发挥余热，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奋斗终生。”

张淑英出生于华侨众多的侨村，她的胞兄和侄辈现侨居国外，身为侨眷，她在做好侨务工作之余，也尽心尽力做好海外亲属的工作。张淑英二胞兄在20世纪30年代便漂泊侨居马来西亚，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响应党的侨务政策，于1984年首次回到阔别40多年的故乡探亲。张淑英单位和地方侨务部门十分重视，热情接待，安排专人陪同。组织的热情接待、祖国家乡的昌盛繁荣令张淑英的胞兄十分激动，表示有生之年还要再度回来。张淑英对党和侨联组织等各级单位的关心关怀始终保持感激，她时常叮嘱家人四个“不忘”，即不忘初心和党的恩情，不忘组织教育培养，不忘单位领导的支持同事的关心，不忘所在社



张淑英参加国务院侨办离退休干部2012年新春团拜会

区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关心关怀。

新时代，张淑英夫妻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虽然生活节俭，但对于公益活动却从不吝啬。张淑英老人及其伴侣乐善好施，经常默默为社会公益活动捐款捐物。她还经常教育后辈，“不要忘本，要懂得感恩，为国家社会，发挥余热”。在张淑英离休后，因所在居民楼有不少单位职工，单位为支持街道办事处工作，便推派她来到新建的小区居委会当副主任。她一干就是三届，响应党“老有所为”的号召，发挥余热，尽心尽力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普通平凡的岗位上要勤勤恳恳”，这是张淑英时常挂在嘴边上的的一句话。无论是解放战争中党的情报交通员，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侨联工作干部，张淑英始终在岗位上勤勉不辍，兢兢业业。她说在新时代，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践行中国梦的一小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实现中国梦，要响应时代号召，脚踏实地。张淑英一生追求祖国的繁荣富强，并为之奋斗不息。

（作者：刘海）



张文正，男，1931年生，马来西亚归侨，曾任职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研究院岩土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赤子心系祖国 一生投身水土

——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文正

弱冠回国，他是岩土工程专家、全国劳模、归侨代表，怀着党心与侨心永相连的赤子之情，坚定不移投身祖国水利事业，为水利水电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鍾靈成長 求學歸國

坐落在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的鍾靈中學是一所被公認為檳州及全馬的著名中學。1942年起，日本帝國對馬來西亞進行了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侵占，鍾靈中學被迫停辦。1945年9月日軍投降後，鍾靈中學籌備於同年12月8日舉行復興開學典禮，14歲的張文正進入高小二年級，重新開始了他的求學生涯。

與大多數同學一樣，張文正勤奮努力地學習每科課程，且每學期成績優異。1950年高中畢業後，他順利獲得英國劍橋大學會考一等文憑和倫敦大學入學考試文憑。但由於家庭經濟情況受限，不允許他去到學費高昂的外國上學(當時馬來西亞還沒有一所大學)，听闻中國學費便宜，儘管當時英國政府規定回到中國就不允許再回馬來西亞，一心想讀大學的張文正還是決定去往北京。

1951年3月18日，張文正和其他十多位一同歸國的学生都非常興奮。因為，他們即將搭乘荷蘭籍貨輪“他士文(TASMAN)號”前往中國。



1951年，歸僑學生代表向敬愛的何香凝主任委員獻錦旗(站立前排右二為張文正)

他第一次離開出生地，告別了登船送行的家人、同學和朋友們，回到新中國。為了通過參加國內高考，考上理想的大學，盼望有機會學習專業知識，能夠為國家和社會作出应有的贡献。

离开马来西亚后，经过海上漂流18天，20岁的张文正终于在4月5日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在广州停留数天后，乘火车于4月20日到达北京。当时，他暂住在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进行华北区统一高考前的复习功课。10天后，张文正和其他归侨学生高兴地参加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举行的群众游行，身穿灰色中山服经过天安门前远望城楼上毛主席，大家无比激动地高喊“毛主席万岁”。在这期间，张文正还作为归侨学生代表向“敬爱的何香凝主任委员”敬献锦旗。

投身科研 成果丰硕

1955年9月，张文正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本科毕业，从那以后主要在北京从事工作。在岗40多年来，他坚定不移地投身祖国水利事业，长期从事水利工程土石坝及地基技术工作。曾经担任南京水利实验处技术员、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和三门峡工程局工程师，美国TAMS工程咨询公司高级工程师，兼任中国大坝委员会副秘书长、国际大坝委员会大坝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

1982年，张文正担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并在1989年被评为全国水利系统劳动模范；1990至1991年间，张文正受水科院委派，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聘任的孟加拉国20条中小河流治理国际专家组组长，圆满地完成了河流清淤治理的考查论证报告；1991年应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聘任，张文正担任了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第17届国际大坝会议讨论题的专家……回顾过往，他在一步步踏实的工作经历中历练出丰富的专业经验，收获了众多荣誉成果。

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方向性、关键性和综合性的问题，1982年起，中国开始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这是第一个国家科技计划，也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科技计划，涉及农业、电子信息、能源、交通、材料、资源勘探、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等领域。从“六五”计划

到“九五”计划，张文正曾担任“六五”“七五”和“八五”国家科技攻关专题研究三个子题的负责人，其中“七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土质防渗体高土石坝筑坝技术”专题于1993年先后获电力部和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状和奖章。

几十年来，张文正始终怀着侨心与党心永相连的赤子之情，为水利水电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而伟大的贡献，以他为代表的老一代归侨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了宝贵的青春岁月。

履历精彩 情味厚重

1997年，20多名在北京的中学校友成立了鍾灵校友北京联络中心，张文正担任理事会副主任。受马来西亚鍾灵校友会总会委托，北京联络中心各位校友经过两年的努力筹备，于1999年成功地举办了第三十一届世界鍾灵校友嘉年华会，14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校友到会欢聚一堂，北京市副市长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出席和讲话。

张文正在2003年至2018年间担任主任。2017年鍾灵中学庆祝成立100周年，他还专程回槟城参加庆典活动，世界各地有2000多校友返校参与，中国驻槟城总领事吴骏先生也出席致贺词。



1991年，张文正（右一）在奥地利维也纳国际大坝大会专题会上发言

张文正难忘母校的栽培，谨记为人的准则。不仅将鍾灵校友的情谊挂在心上，也惦念着从小生活到大的马来西亚的发展——1997年间担任马来西亚政府沙巴州Liwagu水电站工程设计项目总经理，负责完成了工程设计全套任务。

此后数年间又担任马来西亚砂捞越州4项水电站工程设计的顾问和咨询专家。不仅如此，他还担任过更需要帮助的越南、老挝、泰国和尼泊尔的水电站工程设计施工的咨询专家和顾问。这是专业的指引，更是情味的彰显。

张文正曾被亚洲开发银行批准注册为该行个人咨询专家。而且兼任过国际大坝委员会大坝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大坝委员会副秘书长，连续8年出席国际大坝执行年会或大会，曾数十次出国到北美、南美、欧、亚、非、澳洲的一些国家及地区参与国际技术交流会议、主持专题分会、工程考查等。

不仅如此，张文正还积极参政议政，他曾担任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1988-1992科技界），第八届（1993-1997无党派）和第九届（1998-2002侨联界）全国政协委员。他将人民关心的大问题撰写提案，参加全国政协视察团到部分省区考察十余次，其中有三三次担任视察团副团长，赴湖北省、广东省和海南省专题考察有关“水多水少水脏”问题。1999年，张文正受邀在天安门城楼下观礼台观看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阅兵仪式。

作为一名归侨，张文正也积极参加侨联这个特殊群众团体的很多活动。1958年12月，广州召开的中国侨联第一届三次全会扩大会议，张文正在内的北京10多位归侨先进工作者出席并受到表彰。1992年，水利部直属在京机关成立水利部侨联后，他担任侨联副主席，一直到2014年10月第四届开始后，又当了五年顾问。

2019年5月1日，中国水科院致敬“全国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最美水科榜样”时这样评价他——“弱冠回国，他是岩土工程专家、全国劳模、归侨代表，怀着党心与侨心永相连的赤子之情，坚定不移投身祖国水利事业，为水利水电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作者：唐佳一）



张衣霞，女，1930 年生，马来西亚归侨，曾任职于北京市无线电元件六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一生奋斗 做祖国的螺丝钉

——记北京市无线电元件六厂离休干部张衣霞

有这样一个人，她不是科学家，不是创业家，她的经历平凡，却印刻着时代的烙印，她将每一段平凡经历演绎到最佳，将点滴奉献汇成清泉献给祖国。她是张衣霞，一位马来西亚归侨，自 1949 年归国，投入祖国建设，跟祖国涉过冰冷的河水，走过坎坷的小路，饱尝过风霜雨

雪，共饮过胜利美酒。

工农兵学商 祖国的螺丝钉

1949年，19岁的张衣霞从马来西亚回国，在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青训班，经过两年半的学习，她汇入祖国建设大潮中。为支援抗美援朝，她捐出了当时身上唯一值钱的一块手表；她曾五次下乡：第一次是1951年3月，参加中央南下工作团去广东搞土改，参加“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工作和侨乡侨务政策宣传队；第二次是1953年，从北京华侨补校调广东筹建华侨补校，后调中新社广东分社做新闻记者，到侨乡采访；第三次是1958年，响应中央号召去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劳动锻炼；第四次是1961年，去福建省漳州角尾公社和双第华侨农场贯彻中央人民公社十二条；第五次是1969年，中侨委撤销，随大批干部从北京去江西进贤县中侨委五七干校。文化革命十年，她仍不停息工作，在印刷厂三班倒，校对每天送给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阅看的《内参》；1976年，张衣霞成为了北京市无线电元件六厂的一名工人，在工厂担任过部门党支部书记，后来又作为北京市侨联华建公司任总经理和公司法人，负责和海外事务联系……

“我从一个天真幼稚懵懵懂懂的海外穷孩子，从一个追求真理、寻梦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期间的风雨坎坷、酸甜苦辣我都经历过，而我的信念始终如一，没有动摇！”提起那些往事，她坚定地说道。她的经历是时代的缩影，她坚强度过每一段日子，认真对待每一件任务，在各样的工作中闪烁微光。在土改工作中，她被评为“优秀工作者”；在中央万名干部下乡支农工作中，被角尾公社评为标兵；在电子厂的工作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荣获“三八红旗手”等称号。社区工作中，被评为“优秀党员”，“志愿者之星”……

“我是祖国这部大机器里一个平凡而渺小的螺丝钉。七十年来，共

产党把我培养教育成为一个涉及工、农、兵、学、商的万金油革命干部。虽然没有丰功伟绩，治不了大病，但是像黄河中的一滴水，永不停息，是持久的，是一贯的。”张衣霞在庆祝祖国七十华诞时写道。

工：在电子厂工作十七年，做过焊瓷片，开机器打引线，管理工装材料，搞工程，排毒烟。

农：十多年，多次下乡，插秧，种地，施肥，喷农药，割麦子，挑水上山抗旱，挑稻谷走十多里地送公粮。

兵：虽然没参军，但土改时和解放军在广东鸡冠山剿严宗英土匪。当过基干民兵班长，打过97、三八步枪，放过左轮驳壳手枪。

学：在北京华侨辅校当生活指导员，审批发放学生人民助学金，管理学生和教职员工食堂。

商：在北京市侨联华建公司任总经理和公司法人，联系朝鲜商社、香港电子公司和新疆商事等业务，在厂里小卖部当经理卖百货和食品等。

从1949年归国，张衣霞一直同祖国共成长。

历经坎坷 波折的回国之旅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庄重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城楼下，在中央直属机关的队伍里，张衣霞站在金水桥前，心情激动，热泪盈眶。那时，她刚回国不到5个月。

那一年，19岁的张衣霞费尽周折回到中国，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个瞬间，她落泪了，她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在马来西亚的日子是寄人篱下的，小时候，全家靠帮人割胶维持生计，生活很是拮据。父母总是成年累月地忙碌在橡胶园里。然而，辛勤地汗水并没有换来一家人的温饱，更不用说供九个儿女上学读书。张衣霞是家中最小的女孩，上面的五个姐姐全是文盲，她很小就帮父母分担

家务。在海外的生活十分困难，张衣霞一直期盼着回到自己的祖国。

自懂事起，她就非常羡慕那些能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为此，总是缠着父母要去上学，父母咬紧牙关将她送进学校读书。有一幕永远留在张衣霞的脑海里，当时家中实在凑不齐学费，那是母亲为了她而向校长下跪的场景，是一位母亲为了孩子能够继续上学的无奈之举。因此，张衣霞一直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勤奋读书。后来，她的刻苦努力感动了校长，学校给了她这名“贫困生”以免费就读的待遇，使她完成了学业。

中学就读书期间，党组织经常召集马来西亚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阅读《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人民服务》等毛泽东著作，为学生们介绍中国的革命形势。张衣霞进一步了解祖国，并向往有一天回到祖国，投身革命和建设。受到当时的革命熏陶，从小就喜欢唱歌的张衣霞，十二岁在马来西亚的大街上唱《卖花歌》募款抗日，1948年，为纪念五四运动罢课，她还到华中学校演出“茶馆小调”。张衣霞的心始终与祖国紧密相连，参加悬青队，游击队，认真排练出演抗日歌剧《放下你的鞭子》，用自己的点滴行动表达了对祖国的关心与期望。

高中肄业后，张衣霞和几位同学原准备到“香港达德学院”读书。然而，1949年5月，达德学院被港英当局查封。身为党员的老师告诉他们，新中国即将成立，建议他们回国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于是，张衣霞怀着对祖国母亲的好奇心，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和建设新中国的热切期盼，与胡愈之、沈滋九等民主人士经香港来到北京，回到祖国的怀抱。

张衣霞回忆道，那天是星期六，学校没有上课，她和同学偷偷坐船准备前往香港，但是两手空空，也没有带上钱财和行李，还是靠同学的帮助顺利购买船票。后来，张衣霞母亲发现家里和学校都不见女儿踪影，南洋女子学校的校长就派人追到香港。张衣霞和同学们不敢外出，在党的帮助下，他们一行青年学生继续踏上了回国之旅。同行青年分为两批，一批到福建广东去参加游击队，张衣霞所在的另一批则乘船北

上，在天津上岸，受到了当时市长的热情接待。再之后，张衣霞抵达北京，参加青训班学习，开启了为祖国奋斗的一生。

祖国热情地欢迎他们这批海外归侨，他们也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建设。

余热不息 小车不倒只管推

1986年10月，张衣霞从工作岗位上离休，但她离而不休，仍在社区发挥余热，为社区居民服务。



张衣霞生活照

2003年，酒仙桥街道成立志愿者队伍，她积极报名成为第一批志愿者，担任扶贫助困岗和巡逻岗；积极参加社区里组织的活动，支持社区工作。张衣霞夫妻都是社区的积极分子，爱人王伟也曾是楼层层长，常常自费更换坏的

公用灯泡，还经常打扫楼层走廊，清理小广告，被社区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五好家庭”。

2003年起，张衣霞担任社区归侨侨眷联络站站长，后改为社区侨联主席至今。她将社区的归侨侨眷凑在一起，发挥侨的力量。在街道、社区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为侨眷排忧解难，为社区归侨做好事办实事。每逢春节，社区侨联都举办联欢会以慰逢节思亲之情，组织春游，秋游促进身心健康，联络感情。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寻找亲人、探望病号，进行生活困难的补助、年节慰问等等，让海外的亲朋好友更加热爱祖（籍）国。

除此之外，张衣霞还是高家园社区中出了名的“热心肠”。遇到地震、海啸、新冠肺炎等捐款，她都是第一个跑到社区居委会，主动要求捐款。逢年过节，她还带领着联络站的成员到生活困难的居民家中进行慰问。她还出资购买许多生活用品，送到生活困难归侨家中，帮助邻里同胞渡过难关。张衣霞说，“我受过苦，回国后，日子渐渐好了，我想能尽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

离休之后，张衣霞老两口还积极参加老年大学剪纸班学习，这一学就是十年。这些年来，他们为宣传和传承中华文化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剪了十二生肖、少数民族、歌颂祖国等数百个作品，不少作品曾登载在《朝阳报》和《北京老干部》等报刊上。

“除了归侨的身份，我还是一名党员，这些都是应该做的。”张衣霞常说，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她会一如既往，将一名归侨的赤子之情永远传承下去。“虽然我已耄耋之年，有些慢性病，行动欠佳。但是身体还算健康，我仍然不忘初心，老有所为，小车不倒只管推吧，争取再为祖国奉献二十年！”

（作者：王海英）



庄钦华，女，1933年生，马来西亚归侨，曾任国侨办办公室处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终生奉献全无悔 夕阳余晖别样红

——记国务院侨办离休干部庄钦华

1949年，她有幸站在天安门广场亲历开国大典，秉承父辈之救亡图存之志将爱国爱党谨记为一生信仰。

1952年，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开始侨务事业，兢兢业业三十载，青春无悔为人民。

如今87岁的庄钦华，仍然保留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躬身

家国不言苦，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侨务事业奉献终生，是她对自己永恒的要求，也是穷尽一生最好的答案。

言传身教：踏寻救亡图存之路

庄钦华出生于一个爱国家庭，父亲庄明理和伯父庄明恩是马来西亚槟城的爱国侨领。小时候，她就常听长辈们说：“我们都是从‘唐山’（中国）来的，那是我们的故乡。”父亲和伯父积极创办爱国侨报，办学校，成立爱国侨团；组织工会、商会；组织抗日筹赈会，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抗日，组织滇缅公路运输抗战物资。在战火硝烟和生活压迫的年代，父辈们年轻时目睹了旧中国的黑暗，决心为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寻找强国之路。

在爱国活动中，父亲和伯父接触到许多共产党员和国内外许多进步人士，也积极为这些人士提供经济资助、活动场所和住处。他们逐渐清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必须毫不犹豫地跟党走。

1947至1948年，父亲和伯父以及家庭移至香港，陆续回到祖国大陆。

父辈们从青年时代起，就活跃在南洋华侨之中，不顾个人安危，勇赴国难。耳濡目染之下，爱国并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祖国在庄钦华的幼小的心灵中逐渐生根、发芽、成长。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尊严不容侵犯，即便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从我记事起，整个大家族都在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奔波劳作。”

亲历大典：爱国爱党谨记于心

1949年10月1日，30多万军民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贺新中国的诞生。在这场抗战胜利以来全中国最大的集会中，年仅15岁的庄

钦华有幸参加开国大典，而这也成为她一生中最为难忘和宝贵的经历。

作为华侨青年，她们这群人特别幸运地被照顾站在队伍前面。那时，天安门还尚未搭设观礼台，庄钦华站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抬头就能看到城楼上毛主席和中央国家领导人，她还看到了城楼上的父亲庄明理。父亲作为毛主席邀请回国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的马来西亚爱国华侨，与陈嘉庚先生等海外华侨代表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目睹人民解放军雄壮的阅兵式。

第一次见到五星红旗在蔚蓝色的天空飘扬，她激动地热泪盈眶，瞬间明白了父辈送自己回国的良苦用心：祖国是华侨的靠山，只有祖国强盛，海外华侨的腰杆才能硬起来，才能真正站起来。

从那之后，庄钦华时常回想起这段难忘的亲历开国大典的经历，也秉承着父亲的一贯教育理念告诫子女：永远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把自己的生命与党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死！

青春无悔：以奉献为一生荣光

1951年，庄钦华和哥哥庄钦沂加入南下工作团到广东参加土地改革。

1952年2月，庄钦华和王明爱（后成为夫妻）等人一起被分配到中侨委。

强国发展需要大量外汇，广东省和福建省作为重点侨乡，外汇收入一向居全国前列，无疑是侨乡宣传队工作的重中之重。

因此，必须宣传保护侨汇政策，搞好侨乡建设，通过媒体的对外报道，使海外侨胞了解侨乡新气象，从而信任、拥护新中国，侨汇才能恢复。庄钦华处于侨乡宣传粤西队，王明爱处于粤东队，他们都是归国不久的华侨青年，与侨眷感同身受，心心相依。他们与广东各地、县、区、乡政府组成工作组，带着信封、信纸和邮票，头顶烈日，肩扛背

包，徒步于侨乡，挨家访问，与归侨侨眷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困难和思想动态。侨眷不识字，就帮他们给海外亲人写信，装信封贴邮票寄出。

不仅如此，庄钦华和同事们还将解放后侨乡新面貌写成通讯报道，刊登在广东各级报刊，以及香港和海外华文报刊之上。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是这一点一滴的辛勤付出，写的家信和通讯报道有的放矢，消除了部分海外华侨的一些疑虑，侨汇也随之不断增加，许多华侨也陆续回乡探亲。

侨乡宣传结束，庄钦华被分配至中侨委教育科，之后进驻东堂子胡同25号“北京归国华侨联谊会”参加华侨学生的教育和管理的工作，帮助他们适应祖国的生活，学有所成。“文化大革命”之后，她回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继续侨务工作，一生与侨结缘，为侨务事业辛勤耕耘，奉献一生。



1952年，北京东堂子胡同25号北京市归国华侨联谊会（左为庄钦华）

从1949年响应祖国的号召与国家共呼吸、共命运，马来西亚归国回到北京；再到1952年从土地改革前线调至中侨委，为侨务事业呕心沥血；倘若不算上“文革”阶段下放的五年，庄钦华从事侨务工作整整三十三年。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三十载，青丝变华发，无怨又无悔。三十余年的寒暑春秋镌刻着庄钦华红烛般献出一生的忠诚、砥砺前行的拼搏，以及风雨传承的坚守。作为老侨务工作者和侨务世家，她把青春和毕生精力献给党的侨务事业，她下过侨乡，去过华侨农场，做过归侨学生工作，在宣传统战工作励精图治。

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为五星红旗永远飘扬，庄钦华的父辈们在

救亡图存的革命生涯中曾蒙受冤屈，付出沉重的代价；她的父亲庄明理与家翁王雨亭，她与爱人王明爱，姻亲两代四人侨务工作者投身侨的事业，奉献终生。这些年，常有人问她：“回国后悔吗？”她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这是无悔的选择。”如今耄耋之年的庄钦华回首岁月，虽然家庭曾遭受冤屈，但始终没有忘记回国的初衷，牢记入党誓言，兢兢业业为祖国强盛、人民幸福而默默无闻地奋斗。

发光发热：躬身后勤勇于担当

岁月无边，人生有涯，从国侨办离休之后，庄钦华依旧带着责任与使命，坚持老有所为，继续发光发热。

由于国侨办在团结湖的家属住宅区单元楼没有楼组长，一些公共事务没法交流解决，难以处理。曾有着多年基层群众工作经验的庄钦华便自告奋勇，在居委会成立后正式成为楼组长。当时，团结湖地区偶有发生治安事件，有的居民家中被盗甚至在单元楼道也险遭抢劫，于是庄钦华和居委会联系，鼓励各户安装防盗护栏和防盗门。并在每层楼道装上灯泡，协助在大院安装防盗大铁门，小区里的盗窃事件渐渐平静下来。除此之外，作为单元楼组长的她还紧抓卫生，维护邻里利益，促进邻里和谐，所在的单元楼道经常收到全居委会的表扬。

从第一届到第六届居委会，庄钦华都积极参加活动，主动到居委会帮忙，尽力做到有求必应。她还热心参加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检查委员会、健康讲座和联欢活动等，被选为居民代表参加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和定期评议居委会干部，而且还参与支持侨联组织的各项活动，经常给侨联建言、献策。

在创建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中，庄钦华一家被评为团结湖地区“共产党红旗户”；创建“平安家庭”和“五好家庭”活动中，被评为“平安家庭标兵户”、“五好家庭户”。

守为民之初心，抱奉献之情怀。诞生于侵略压迫，艰难困苦旧社

会，浸润于救亡图存，以身献国的家庭中，成长在归侨回国，与侨结缘的历程里，庄钦华的一生凝结着对人民群众深沉的大爱，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高尚追求，展现出一位巾帼的矢志不渝和责任担当。

正如庄钦华所言：“我唯一的梦想就是祖国永远安定团结，繁荣强盛。”活在当下，倍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前辈们打下了江山，要坚守好、保护好，绝不能让祖国再经历之前的痛苦折磨，这是每一位归侨心中最虔诚的心愿，最执着的坚守，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与义务。

（编辑：张世文）



安友仲，男，1961年生，美国侨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第八届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

退思静品得失处 仁心精术为良医

——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安友仲

“老夫聊发少年狂，赴汉口，跨长江。医亦凡人，匹夫尽责灭疫狼。”驰援武汉之始，安友仲曾这般赋诗一首，表达自己的信念和决心。

自踏上医学这条道路起，安友仲的生活便被奉献和奔波填满，年近花甲，他依然满腹豪情、壮志凌云、信心满怀。过去的很多次，他冲锋

在前，为患者撑起一片天；这一次，他依然坚守在第一线。

从2月1日晚，安友仲主任抵达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并临危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专家组组长，负责指导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工作，到4月20日踏春回家，再到次日启程再赴西南，直至5月返京……100多个日日夜夜，安友仲都在为着疫情防控、国家诊疗方案制定、重症病人治疗而奔走。

肩上，是家国安危的重任，是无数百姓无法辜负的信任，是重症病人们的生存希望，这是属于安友仲的责任，竭尽所能，为良医，为良人。

一线医生要有“心”有“术”

过去的许多年，作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重要一员，安友仲医学基础修养广博，重症医学临床经验丰富，成就非凡，为我国重症医学做出开创性卓越贡献。

1995年，安友仲在国内较早提出严重创伤应激时胰岛素受体下调而导致应激性高血糖及免疫营养支持和代谢调理治疗的思想，成功地治愈了多例重度复合创伤和严重外科感染病人。其中严重消化道瘘合并感染病人近5年来无一例死亡。安友仲根据不同病因和阶段进行了分类，并采用了不同的针对性治疗方案，使得凝血障碍特别是DIC病人的死亡率由90%以上降至10%以下，并首次提出了DIC的病因是血管内皮细胞功能衰竭的概念。安友仲对于危重病人严重的水电解质平衡紊乱的原因及其防治方面也做了大量观察研究，成功地救治过严重高血钾(11mmol/L)、心跳呼吸骤停以及血钠超过200mmol/L的高渗透性昏迷病人。

安友仲还十分强调重症病人的整体支持治疗，注重（原发）“病”与（危重）“症”兼治，使大量危重病人转危为安。在重症营养领域，一直强调肠道菌群的重要性，提出了“先喂菌，后喂人”等理念。他还一直致力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机制研究，发现腺苷受体在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尽匹夫之责 吾心无悔

今年已59岁的安友仲，有着多年参与重大灾害伤病员救治的经验。在许多国家危难的时刻，我们都能看到安主任冲锋在前的身影。

早在2003年SARS肆虐期间，安友仲就冒着被疾病感染的危险，与SARS患者零距离接触，拯救了院内外大量危重患者的生命，获得北京市抗击SARS先进的表彰。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安友仲凭着职业的敏感和强烈的责任心，第一时间向医院和上级卫生部门报名，要求赶赴灾区一线救治伤员。并于5月22日作为北京市卫生局和国家卫生部重症医学专家，奔赴四川参加危重伤员的救治工作。在四川7周的时间里，他和同事们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亲自管理病人，为病人换药、吸痰、插管、翻身……仔细地呵护着每一个伤员，同时也以其扎实广博的医学知识和精湛熟练的操作技能，赢得了同行的尊重。

再次踏上一线救治的道路，安友仲受到许多人的劝阻，可他的初心始终不变，他的决心亦未动摇，他说：“年近花甲，很多人劝我勿赴前线，但作为医生，看着前方有难，难以冷眼旁观。但医生亦凡人，我没法做到‘神医’般的妙手回春，只尽匹夫之责，吾心无悔。”

自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安友仲高度关注疫情进展和救治情况。国家组建以重症医学专家为主的第二批援鄂医疗队，从接到通知到出发只有一个小时，安友仲没有任何迟疑，来不及收拾行囊，来不及和家人告别，知难而上、逆向而行，奔赴一线。他说：“加强武汉新冠肺炎重症救治力量，我责无旁贷！我们将加强分级诊断，充分发挥重症医学专业的特长，全力以赴挽救每一个重症病人。”从新冠肺炎重症监护病区改造方案研讨到现场考察调研，从重症设备物资到位到救治流程规范制定，安友仲马不停蹄多方奔走。夜里，与医疗队员们探讨危重病例、交流诊治经验，不仅从宏观角度制定重症救治战略，更从细节着手

把控救治环节。

抵达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后，安友仲结合自己的经验及武汉地区疫情的实际情况，立即召集专家开会，形成统一思路：按照患者病情划出轻、中、重等级，逐一筛查，分类诊疗。

重症患者救治是场攻坚战，场场都是硬仗。作为这场“战疫”的指挥者，安友仲提出从源头上抓的“战法”，提供给患者最佳的治疗手段与最优化的治疗方案，保证诊疗过程的精细化、标准化、程序化。在他的带领下专家组讨论最终确定了《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入院病人初步处理流程和原则》，这已经是修正的第十版病历问诊表了。这份规范流程的出台，为一切工作有条不紊地高效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他还带领专家组制定了一系列医疗、护理和控感的规范化流程及标准，做到医疗队无论谁上班执行的都是“国家队标准”。他说：“与新冠作战，战略要宏大，而战术却要精细”。就这样，“危重病例讨论”一轮又一轮的上演着，以国家标准要求的专业医护亦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作为重症医学的知名专家，他没有站在一线医护人员背后，仅仅提供理论指导，而是奔走于武汉多家医院，会诊重症病人，参与国家卫健委第二版新冠肺炎重型、危重型病例诊疗方案的制定。密不透气的厚重防护服，对于年轻医护人员来说都是对身体和生理的考验，对于年近60岁的安友仲来说，更是一种极限挑战。但他喜欢跟患者床边交流，他细心的话语，温暖了患者，也改变了原本沉重压抑的病房气氛，让患者眼中有了亮光，心中有了希望！正是这样的精神，让安友仲接触了大量的患者，获得了



安友仲（右二）正在查房

丰富的经验，前期积累的重症患者救治经验和丰富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为全国新冠肺炎诊治方案制定提供了大量细节指导。武汉同济医院陈孝平院士讲到：“安友仲主任不仅知识面广，而且临床经验丰富，安主任绝对是个好医生！”

在安友仲主任的领导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赢得了这场战斗，4月4日，独立管理的重症病区“清零”。

疫情一朝不息 医者奋斗不止

在武汉奋战两个多月返京，刚结束医学观察的安友仲，于4月20日傍晚再次接到国家卫健委紧急任务——作为专家组成员，随“中央指导组赴西南地区工作组”前往西南边境，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昨日方归今又去，征衣重披别京华。边塞烽烟频示警，老骥奋蹄再出发。无情未必真丈夫，恋家更先忧天下。泪眼欢颜执手约，归来共赏京城花。”4月21日一早，安友仲在去往昆明的飞机上有感而发。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外防输入已成为我国疫情防控的重点之一。“西南边境，情况十分复杂，绵长的边境线实际上是应对输入风险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另外边境地区地广人稀，医疗机构少，应对重大疫情整体上力量比较薄弱。”谈到西南边境的情况，安友仲坦言道。

“与我们在武汉时的工作是救治患者不一样，这次来西南地区的主要工作是帮助这些地区制定疫情防控的具体方案。一地一策，因地制宜。守住国门、守好西南防线，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安友仲坚定地说。

而随着北京地区发生疫情，5月末回到北京的他，6月份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

医学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但是面对一个个垂危的重症患者时，安友仲仍是坚持对生命的思考、对疾病研究的不懈探索。很多人说安友仲是医生里的哲学家，重症医学一直站在生命的前沿，丰富的经验、渊博的

学识、豁达的胸襟，让他在重症医学领域独树一帜，对医学本质有着更多思考。

退思静品得失处，仁心精术为良医，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安友仲主任一生为人为医的座右铭。

（作者：张忆杭）



白重恩，男，1963年生，美国归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教授，第三届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获得者。

深耕学术之师长 建言献策之大家

——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

生于计划经济，长于改革开放：时代在冥冥之中让白重恩和经济结了缘。少年勤学，壮年担纲，学成归国显担当。从中国科大数学系的优等生到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再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院长，他深耕学术沃土，孕育桃李芬芳。执教之余，他还身兼数职：“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40

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百人会成员……白重恩用实际行动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造梦伊始，结缘经济

白重恩出生于南京的一个教师家庭。1969年，年仅6岁的他随父母被下放到江苏农村，9年的农村生活经历对他的许多观念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有一次突然来了一个命令，让大家把已经长好的麦子铲除，改种水稻，这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小小年纪的白重恩对单一计划经济的负面印象十分深刻，当时的他尚未意识到，自己将会为经济学奋斗终身，但思考的种子已经播散，时代在冥冥之中让他和经济结了缘。

1978年，白重恩在读中学的最后一年回到了南京。1979年，不到16岁的白重恩被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录取。在那个专业选择空间非常有限的年代，少年白重恩选择数学专业的原因，只是纯粹觉得“数学很有意思”，对未来的职业规划也非常简单：“我以后要成为优秀的数学研究人员，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数学教授”。在科大，白重恩的确体会到了数学的魅力，因成绩优异，他还被授予了科大最高奖学金——郭沫若奖学金。

目标转折点在本科毕业时来临。1983年，白重恩已考入中科院数学所继续攻读研究生。这一年，改革开放的国家决策也在高校掀起一轮学术讨论热潮，校园中随处可见对新经济形势热情讨论的学生。“那时候，同学之间的聊天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经济改革，种种不确定性与多元观点更激起了大家的热情。”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期，大家开始了解美国、日本、东欧等国家的经济制度，探讨哪些经济改革经验值得借鉴，新思想碰撞出的火花点燃了白重恩对经济学的兴趣。在中科院数学所攻读研究生期间，他开始挤出更多时间学习研究世界多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自此，比较经济制度成为白重恩开始研究经济学的第一步。

研究生期间，白重恩在老师安排下拜见了来中科院访问的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在丘成桐的推荐下，白重恩中断硕士学习，赴美攻读数学

博士学位。“去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转修经济学。”幸运的是，丘成桐教授对白重恩的决定给予了充分的支持。考虑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与经济学相距甚远，丘成桐还给他推荐了研究数理统计的教授——他们的研究领域与经济学有一些交叉。1988年，25岁的白重恩顺利获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数学博士学位，但他毅然决定，继续申请到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

追梦之路，深耕学术

在哈佛，白重恩的导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他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每次都用红笔在学生交的手稿上面做很多标注，会很认真地给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另外，他对经济转型特别感兴趣。尽管他研究的是纯理论问题，他不仅对中国经济转型，对苏联和东欧的转型国家都很感兴趣。”当时的哈佛，共有9位中国学子在攻读经济学博士，除了白重恩，钱颖一、李稻葵也都投在马斯金门下，大家都希望将来能为中国经济服务。每次讨论问题时他们都有指点江山的豪情，日后他们确实也对中国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美国求学期间，白重恩的兴趣和关注点始终是中国国情。他也密切地注视着世界，因为“要为中国未来设计一个方向，那就要想哪些发达国家是我们应该去特别关注的。”白重恩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公共经济学、组织和激励经济学、发展和转型经济学。他深耕学术，著作等身，主要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兰德经济学杂志》、《劳动经济学杂志》、《国际经济学杂志》、《比较经济学杂志》等国际杂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国内杂志上，对社会和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圆梦之时，报效祖国

在哈佛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白重恩先在波士顿做了一段时间大

学教师。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问题，他转到香港大学任教。2002年，清华经管学院邀请华人学者每年到清华教学一段时间，白重恩在受邀之列。2004年，基于对学院的了解与感情，白重恩最终决定全职进入清华经管学院。

到了清华后，白重恩更多地关心政策制定中的问题，希望为政策制定提供素材和研究的支撑。“很大程度上就是寻找中国经济中比较大的问题，希望能够做一些研究来提供答案，我比较少研究短期的波动，更多的研究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的问题。我的研究更多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怎么让经济增长的质量更好。”因此，在诸多经济领域，他研究再研究，献策再献策。他作为主要执笔人撰写的《清华大学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政策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并因此担任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他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为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线索。他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的研究对于理解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理解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支撑；他



白重恩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三场“委员通道”上答记者问

他作为“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所提出的关于“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的建议提供了研究依据；同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他积极参加有关复杂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制定的讨论。他的研究成果两次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研奖。

2018年7月，白重恩接替师兄钱颖一，担任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清华经管学院是一个充满光环的机构，白重恩深知，在一所顶尖高校中持续建设好这个学院，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生活在中国，

最有可能做好的就是由中国的实践所激发出来的学术研究，我希望能够创造更好的研究环境，让年轻的学者能够做更深入的、影响力更大的研究，这些研究有普遍适用的意义，能对经济学、管理学学科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最近两年，白重恩大力推动了清华大学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的建设，争取到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更加开放，以更丰富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数据，鼓励学者聚焦中国经济的研究。与此同时，他重视学界与业界的交流，以实现经济管理学科与现实的接轨。他曾六次被清华大学学生选为“良师益友”，可见他不仅是一流的经济学家，还是一流的老师。

白重恩曾说，“中国需要世界一流的经济学”、“金融学研究要扎根中国”。作为一流的经济学家和老师，他正努力发光发热，报效祖国。其实他也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你说出来的话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可能会起一定的作用，就要格外深思熟虑。”这些年，他因为呼吁降低社保费率被人赞过，也因为呼吁改善公务员收入结构，却被简单地解读为给公务员涨工资，遭到过批评。不过，他自己很坦然，因为他的建议都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

在第三届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颁奖仪式上，白重恩作为获奖者代表在发言中表示，非常幸运能够以一名教师、一名北京市民、一名中国人的身份亲自见证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间的快速发展和进步。他说：“我为能对国家的发展、北京的发展和工作单位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感到非常自豪。”回望过去几十年的历程，白重恩说：“我从十几岁到现在都没有怎么变。尽管头发都白了，但是心态还是跟那个时候差不了太多，没有变俗。经济学家最应该的立场就是客观，做冷静的分析。我现在一直在做的事儿就是找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又是自己还有能力研究的问题，努力把它研究得更清楚。核心就是让自己有用，让自己有价值，让自己对得起良心。”

（作者：叶靖怡）



曹晓风，女，1965年生，美国归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心主任，北京市侨联委员，中科院院士。

迎接新时代 播种新希望

——记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心主任曹晓风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

每当谈到自己过去的求学经历时，曹晓风都对自己能够以科学技术报答国家而心怀感恩，在国内的十三载求学时光让她暗暗许下“在新时代的春天播种新希望”的心愿，乘着“科学春天”的微风，她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国外求学、工作的经历让曹晓风体会到了科研人员的家国情怀，回国后，她开始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国”一词。她开辟了高等

植物组蛋白甲基化动态调控的新领域；她关心国家粮食安全，充分发挥自己的科研经验，为推动基因编辑技术商业化奔走呼号；她调研分析中国女科技工作者现状，呼吁和促进相关政策和环境关注女性成长，努力搭建平台为年轻女科技工作者创造机会实现自我价值。

与“生”俱来 三十年专注植物研究

曹晓风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表现出对生物学的非凡兴趣。本科她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应用生物化学专业，在发现自己不喜欢动物学后，硕士阶段转向植物学研究。读博期间，她得到一个公派留学机会，到英国 John Innes Centre 任访问学者，这段学习经历也让她坚定了一生的事业方向。

在美国做助理研究员期间，曹晓风开始了当时新颖的表观遗传学研究，良好的科研氛围让她在4年时间里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了数篇高水平论文。但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动荡。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实验室中的美国同事漠不关心；2001年“9.11事件”发生，实验室中最懒散的美国同事排队4小时前去献血。种种对比让曹晓风突然明白“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爱国绝不能停留在嘴巴上。”

于是她做出重大选择，放弃了在美国前途一片大好的事业，回国在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临时腾出来的玉米储藏室开展科研工作。“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她毅然放弃了自己擅长的DNA甲基化研究，结合国内实际，以拟南芥与水稻为材料研究植物组蛋白甲基化和小分子RNA等调控机理，相继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论文，同时还在杂交水稻温敏雄性不育的分子机理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

“科学家要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在美国，大学里重视基础研究，基本很少考虑应用问题。而在中国科学院这样的国家科研机构，我们的科研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必须更加强调科研成果应用的潜力，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曹晓风说。

生“生”不息 基因编辑技术帮助解决粮食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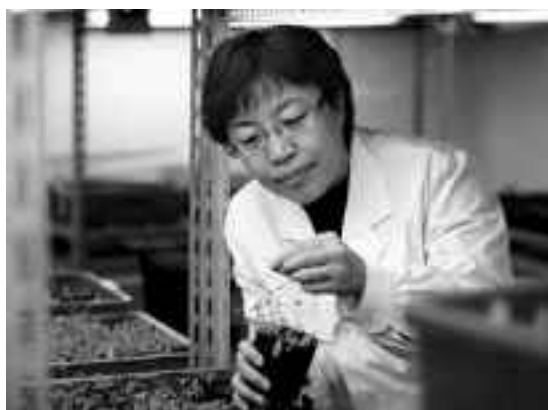
曹晓风说，至今记得自己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那一刻，她在承诺书上署上名字：履行院士应尽义务，珍惜院士荣誉，发挥明德楷模作用。在投身农业研究和国家粮食安全近20年后，她于2015年正式当选为院士，曹晓风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科技创新很不容易，但这是科学家肩负的使命，要给国家和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卷，必须有紧迫感。”

在曹晓风看来，基因编辑育种之于中国人的饭碗就如同5G技术之于当代信息社会发展，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自2018年成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曹晓风连续三年在提案中提及基因编辑等分子育种技术。“如果错过当前契机，错过更多分子育种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未来有可能出现育种产业受制于人的现象”。在提案中，她建议加速我国基因编辑技术在花卉、牧草和果蔬等重要经济作物上的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对基因编辑技术得到的作物新种，应当有区别于转基因作物的管理标准。

曹晓风呼吁政府和社会正视分子育种对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战略意义，希望公众能够打破对分子育种的误解，携手共同改变“国家不敢管，企业不敢做”的尴尬局面，“在欧美国家早已把大量基因编辑作物搬上餐桌的今天，中国也有必要加速基因编辑技术在花卉、牧草和果蔬等重要经济作物上的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她提出，除了水稻和小麦一部分重要农作物继续按当前政策管理外，可以适当放开对基因编辑育种新品种的登记制度，加快这些新品种的审（认）定程序并许可规模化推广应用。对基因编辑作物，应当实行区别于转基因作物的有限监管政策，“这将节约巨大的社会成本。”她希望，在政策和公众的双重努力下，未来基因编辑技术能够帮助农民用更少的水和土地、更少的农药和化肥，创造出更多的收获，帮助人类更好应对粮食危机和气候变化。

铿锵玫瑰 女性科研工作者的坚实后盾

除了院士这个身份，曹晓风还身兼中科院妇工委委员和研究所妇委会主任，对女性科学家的成长尤为重视。多年来，她一直鼓励年轻的女性科研工作者发挥自己的优势，追求自己的梦想。曹晓风用自己的行动为女科学家代言：作为优秀女性科技工作者代表，出席发展中国家妇女科学组织大会，在“中英女性科学家论坛”上讲述自己投身科学研究的故事，参加全国妇联专题座谈会并畅谈女性科技人才的创新奋斗；当选中国科学院第五届“十大杰出妇女”、斩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等荣誉称号。



曹晓风在观察实验材料

2016年，曹晓风协助组织世界生命科学大会“生命科学中的女性”分论坛，召集200多名女性科研工作者参加，2017年，中日女科学家会议组织来自两国20多名生命科学领域的青年女科学家在论坛上交流研讨，并多次邀请国际上优秀女性来中国交流，探讨国际女科技工作者

现状，关心关爱科技女性成长发展。她强调“男女平等”的理念，呼吁有关部门采取一定措施促进高端女性科研人才的成材率。她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过分强调‘女性’身份，有时也未必是件好事”，她相信在如今的信息社会时代，面对工作时，性别不再是显著差异因素；但她也看到了女性在科研工作中的弱势地位，积极为女性科学家奔走，热心帮助女性科研工作者成长。女性做科研需要足够强大的内心来坚持自我，“你应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为他人做什么。”在这方面，曹晓风的独立与强势显而易见，“虽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但我认

为，为了家庭放弃事业是会后悔的。不管是为了谁而放弃，都不值得。”在曹晓风看来，知识女性对孩子的言传身教，远比单纯照顾饮食起居更为重要。拥有事业和经济独立的女性，也更能赢得丈夫和孩子的尊重。

2019年11月，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第二十二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24位中国学者增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是中国科学家当选人数最多的一次。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曹晓风，是这24人中的唯一女性。

曹晓风热心侨联事业，积极参加侨联活动，宣传支持侨务政策。作为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她通过自己辛勤积累的学术影响吸引了不少海内外优秀青年科学家加入中英合作的科研机构，推动两国20余项合作项目的启动和开展。她利用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双边会议、学术互访、联合培养等多种途径，她在对外友好交流与合作上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和突出的贡献。她的投入和奉献，为不断提升中国科技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国际科技合作的不断深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她在一次分享中提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四次选择和三次机遇，这些转折和变化的背后是国家发展与时代进步的不断助力。国际形势的动荡让她明白了爱国不止于口头表白，更需付出实际行动，于是她放弃一切回到国内，平地楼台，在新的研究方向重新创业；迫在眉睫的粮食安全问题让作为政协委员的她坚持不懈建言献策，希望能够帮助基因编辑技术正名，推动其商业化应用；学术领域女性声音的缺失让这位独立自信的女性科学家成为了众多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榜样，她也积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热忱帮助朋辈成长。

曹晓风曾说，她最大的心愿，便是在新时代的春天播种新希望。“如今，我们已进入新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国家的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先进科技的支撑，新时代在呼唤新的科学春天”。她是这么说的，也正是这么做的。

（作者：高鑫宇、孟菲）



陈宽，男，1988年生，美国归侨，北京推想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第八届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

立足科技 圆“医疗强国”梦

——记北京推想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宽

几年前，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陈宽踏上了回国之旅，原本约好共同创业的朋友纷纷改变想法未能赴约，此时他的身旁，仅仅只有留学时养的小猫陪伴。这是一段孤独的旅程，是一个独属于陈宽自我的决定。而正是这个决定，使得中国多了一位优秀的人工智能从业者、坚定

理想的追梦者，多了一家将AI应用于医疗行业的科技公司。

2016年1月，他创办了推想科技，这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医疗创新高科技民族企业。4年时间，推想科技获数轮融资，领跑医疗AI行业。不仅广泛覆盖全国33个省级区域各级医疗机构，更是将中国的AI技术输出到北美、欧洲、日本这些科技和医疗最发达的地区。

这些成就背后，许多过往仍历历在目。起始于一个归国的决定，发展于对梦想的追寻。

“如果心里有非常想做的事，你就应该去追逐它”

如果没有选择休学，按照正常人的轨迹继续生活下去，陈宽会拿到世界顶级经济学博士学位，也许会去做教授、教书，更有可能去到华尔街，做一份令旁人艳羡的高薪工作，过上另一种光鲜的生活，而这正是陈宽许多师兄师姐们所选择的生活。但陈宽却在不断的学习中，对人生的价值选择进行了思考，他做出了不同于他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回到中国，利用自己所学习的技能，用AI技术和数学模型去改变或改善一些社会现象，让数学模型带来实际的社会价值。

陈宽15岁便离开父母，在新加坡颇负盛名的新加坡莱佛士书院读高中，这个学校曾被誉为是培养新加坡领导人的摇篮，后来他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继续在本校攻读金融学 and 经济学双博士。在陈宽看来，于美国学习经济和金融这一块，基本上和计算科学没有太大区别。当时的他有很大的精力是从海量的数据当中去挖掘规律，然后利用规律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预测金融现象。这样的学习，为日后找到毕生奋斗方向的陈宽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在陈宽决定放弃博士双学位，回国创业时，他曾向他的博士生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表达过这一想法，詹姆斯给他说了一句类似《圣经》里的箴言，“如果有心里非常想做的事情，你就应该去追逐它。”

此时不做，更待何时？我们相信，有着种种因素使得陈宽的归国之旅成行，但对于心中梦想的执著追求，一定是使他最为坚决的那一个。

想“医”所想，民生所向

陈宽将医疗选做自己创业研究的重点，有着自己的考量。AI对于医疗行业，相较于其他行业，是最具有社会价值的一件事。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医疗资源永远是稀缺的，总是有很多患者可能得不到特别好的治疗。人工智能的一个巨大价值，就是通过技术让医疗资源均质化，让不同地方的人享受到相对平均的医疗资源。这对医疗资源分配不平均的中国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与此同时，放眼全世界，AI将优质医疗能力固化并快速复制，让建设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成为可能。

回国后的创业早期，还处在AI浪潮爆发的两年前，医疗人工智能并不为大众所知，在这时引入全新的AI医疗概念，其实十分不容易。陈宽和联合创始人王少康跑了全国的三、四十所医院，大多数医院都把他们当作骗子，话没说完就被赶了出来。只有一家医院愿意合作。陈宽首先从癌症入手，打算利用深度学习模型帮助医生筛查癌症。

为了离客户近，为了省钱，他带着团队租住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外的一栋破旧的居民楼里，楼下火锅店的四个大烟囱正好对着他们的窗户，满屋子都是火锅味。他们每天和医生在一起，了解医生真实需求，根据客户需求终于训练出了国内第一个可用于医疗影像的AI模型。

2016年，AlphaGo在围棋领域赢下人类棋手李世石后，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许多人开始期待人工智能在其他领域里的应用。有着诸多数据的医学成为这次浪潮的重要参与者。

2016年1月，北京推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自推想科技创立四年来，公司基于多种深度学习算法，研发包括胸肺部、脑部、骨疾病、辅诊、质控、科研等各类临床场景的解决方案，秉承“用先进的科技，解决民生的问题”的信念，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发展包括AI部署管理平

台、AI大数据挖掘科研平台以及AI临床应用平台在内的医疗AI全流程平台，打造医疗质控、健康管理以及科研创新等医疗AI产品，切实为政府、医疗机构、医生、患者提供先进性、智慧化、系统化的服务，真正做到“推动科技，想医所想”。

4年来，陈宽带领团队在产品研发、营销体系和建立AI+医疗的新模式中不断探索创新，通过完善的科研研发体系，寻找到解决实际临床问题的切入点，研发出工业级的医疗AI产品并逐步推向市场。



截至2020年7月，推想科技执行点已经覆盖全国33个省级行政区，复旦榜前50名医院

2018年，陈宽在第22届北京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演讲

覆盖率为56%。拓展中国医疗市场的同时，完成了北美、亚太以及欧洲的战略布局，推想医疗AI服务已覆盖全球10个国家，合作医院400余家，平均日AI质控运算超过61,000例，完成总病例数已经突破22,000,000例。推想科技医疗AI方案正迅猛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AI医疗服务体系。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不断地推广。

疫情期间大展身手，时势造英雄

新年伊始，一场疫情突然爆发，并逐步于全国、全球扩散，形势十分危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陈宽带领着他的AI智能医疗技术，大展身手。

早在春节前，他带领的推想科技迅速成立“肺炎特别版本攻坚小组”全力投入研发，快速研发出肺部辅助诊断系统肺炎特别版本，致力于辅助医生对新冠肺炎做出诊断、量化评估和分诊等判断，利用最先进

的人工智能技术结合CT帮助医生筛查新冠肺炎患者，提示风险，提高效率，降低院内交叉感染风险。帮助医院在短期内迅速完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断体系的建设，促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断流程合理化以及诊疗效率与质量的提升，提高医院综合救治能力与医疗安全。推想科技率先和武汉同济医院、武汉中南医院、深圳三院（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研究中心）等重点医院的相关负责人联系，了解需求，根据临床需求升级开发新冠肺炎AI产品，临床测试显示模型具有极高的敏感度。

陈宽带领推想科技积极响应国家抗疫“走出去”号召，实现了中国高科技技术走向全世界，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力。2020年2月底，推想科技获得欧盟医疗器械CE认证，是目前中国胸部AI产品的首个CE认证。3月4日，与日本最大的远程影像诊断领域龙头企业 DoctorNet 达成合作，助力日本肺炎防控。3月16日，上线意大利罗马生物学大学医院，3月30日，上线美国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医院，4月7日，上线德国耶拿大学医院……推想肺炎人工智能在全球新冠疫情阻击战中与时间赛跑。截至2020年8月20日，推想新冠AI已在包括疫区在内的国内外近百家医院应用，用先进的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全世界共同抗击疫情；国内累计筛查肺炎病例已经超过百万例，每天监测疫情发展情况，为疫情公共政策的决策管理做出卓越贡献。

推想在参与这场疫情攻坚战时，不仅做到了产学研结合的产品快速研发，跨越了国界，使得中国的“科学抗疫”得以走出去，更是尊重科学，促进循证医学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它还积极根据海淀区政府的需求，研发了新冠肺炎人工智能预警系统，并接入海淀智慧大脑，每天更新数据形成海淀区域疫情直报系统，实时为政府决策做好助手。

不论是独木桥还是康庄大路，坚持就不会失败

三年前，陈宽还处在创业的艰辛期，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觉得只要推想科技还有我一个人在，它就不会失败。我是抱着这样的心

态去做任何事情的。”现如今，陈宽与他的推想科技已然大放异彩。

创业初期，模型难以准确识别癌症，他就驻扎在医院一线数月以实现理想的准确度，他坚信人类肉眼可能错过的小结节，机器不会漏掉；后来，机器发现肺部小结节的敏感度越来越高，推想科技逐步获得医生的信任。疫情期间，他带领推想科技主动担起社会责任，为家国危难做出卓越贡献，陈宽付出多少艰辛，背负多少压力，恐怕只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他与他的伙伴们才能准确知晓。

从“独木桥”到“康庄大道”，陈宽这四年来的轨迹既是他坚持不懈追逐AI理想、致力于为民谋福的见证，亦早已融入了国家发展、时代变迁的洪流中，成为一个旗帜，一种标杆。

而陈宽，正是这新时代盛放的弄潮儿。

（作者：张忆杭）



高福，男，1961年生，美国归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海淀区侨联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

志存高远 长风破浪

——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

热爱科学，志存高远，高福院士在科研路上披荆斩棘，不断突破研究难关，心怀家国，视野开阔，他将专业前沿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解决现实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一代代侨胞或在海外求学后毅然回国建设，或身在异国，却心系祖国发展状况，他们前仆后继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高福不是唯一的一个，但却是其中一个。

成就斐然，身兼数职的科学院院士

2020年7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发布的一则消息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消息的内容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于近日当选为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德国国家科学院作为德国最古老的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的联合会，同时也是世界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学术机构（研究中心），为保证独立性和学术性，其院士选举过程严谨、保密，这也说明了这个荣誉称号水平之高。

这已经不是高福第一次被授予这样顶尖的荣誉称号了，他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除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非洲科学院院士等，兼任国家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国内外专项奖等30余项。他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研究以及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不仅如此，他还在包括Nature, Science, Cell, Lancet,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等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600余篇，兼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长、欧美同学会留英分会会长。

长风破浪，在科研路上一注无前

高福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他对科学研究的热爱和坚持更令人钦佩。塞缪尔·厄尔曼曾说过：“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退却，颓唐必至灵魂”，即将迎来六十岁的高福，依然对科研充满热情，即使年龄增长，也依然保有热血青年般的活力。高福的科研探索道路并不总是顺利的坦途，在成功之前他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幸运的是他心中始终坚守这份热爱。

1979年的高考考场上，沮丧的高福趴在桌上睡了几分钟，因为那一年的化学题目非常难，他看到考卷时几乎想要放弃，最后担心考不上大学还是答了卷子。但他的成绩并不理想，只拿了四五十分，错失第一志愿，被调剂到山西农业大学的兽医专业。这并非他的理想专业，他想从事科研，而从小父母包容鼓励的教育氛围也激励着他勇往直前。

1961年，高福出生于山西省应县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家中有6个孩子需要供养，且父母的教育水平都不高，这使得这个家庭的条件十分困窘。高福在年少时曾经有个到银行工作的机会，但他想考上大学继续求学，开明的父母没有让这个长子出去赚钱补贴家用，还不遗余力供他上学，也许正是这样的教育，使得这个家庭中有3个孩子都拿到博士学位，并从事科研工作。高福对父母的教育十分感激：“我非常感激他们，他们那种积极上进的精神，鼓励着我努力工作。”

下定决心的高福从大一下学期起，就立下改考传染病学专业的目标，终于在1983年，他通过努力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高福赴英国牛津大学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相继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而后又在牛津大学任教。

他对科学有情感上的热爱，但在选择和规划自己的事业时却不凭感性行事，而是用理智进行判断。在牛津读博期间，高福研究病毒，但他认为专攻病毒，很难成为大家，于是将方向转到当时热门的免疫。他认为人生就是平衡，科研工作也需要进行平衡。“我爱科学，科学却不一定爱我，不能单相思。”高福曾坦言自己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虽然全力追求科学，但也会给自己留有退路。

高福说，在别人看来他当上了院士，得过许多奖项，看起来很光鲜，其实“我也经历过很多失败，失败的次数远远要比成功多。”高福说，“我一直坚信失败是成功之母。你今天看见我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却不知道我之前被拒绝过多少次。”科研有时是枯燥乏味的，有时又是难以出成果的，这不仅仅需要专业的知识，更考验科研人的耐

心和毅力，在重复无数次的失败之后才可能迎来希望，这份希望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看到，而坚持也需要心底的热爱来支撑。高福说在欧美的科研文化中，有一种说法是叫“与科学结婚，就是说科研工作者要把一辈子奉献给科学。”高福表示“科研过程中，我承受过很多失败。但爱科学就要去全力追求她。”

强学力行，志存高远，数十年来，高福坚定地行走在科研的道路上，热爱科研事业，长风破浪，一往无前。对一个领域的热爱，能够给予我们坚持奋斗的动力、勇往直前的勇气，甚至让我们抵达梦想的目的地。这份热爱带着他踏过各地，攻克了一个个医学难关，也驱使着他攀越过一座座科研高峰。

心怀祖国，毅然回国的科研工作者

2004年，在国外求学、工作了13年之后，高福选择回国，第二年他的家人也回到祖国。

回国后，高福担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研究。在所务管理上，积极推动工业生物技术发展，推动了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建立。2011年，高福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这个职务让他更加关注与国民健康紧密相关的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2013年，高福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一直秉承一个原则：不做为了基础研究而研究的项目，要重点解决实际需求。

他的名字，总是伴随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而频繁进入公众视线，每当禽流感、大流感、人感染猪链球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来袭时，他积极组织协调多家单位、研究机构进行紧急应对。

2013年，面对来势汹汹的H7N9疫情，时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的高福带领团队投身H7N9病毒分子机制的研究中。他和团队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规划好时间安排，确定目标，便一心一意投身于病毒攻坚战

中，当时全国有十多个研究H7N9病毒的研究团队，而高福的团队将全部工作重心只放在两件事上：研究宏观生态和分子机制。美国、英国和荷兰都在研究，“不过我们赶在他们前面做出来了”，在与病毒的时间赛跑中，高福还带着他的团队超过了英美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进度。

高福他们从宏观生态学角度解释了病毒来源，完成了溯源研究并定位于活禽市场，还解答了H7N9病毒能够感染人类的原因，既为人类预防控制，乃至攻克病毒奠定基础，又在国际上发出了铿锵有力的中国声音，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高福在2020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发言

在高福带领的重点实验室和团队中，他要求团队成员专注于科学工作，不把时间花费在无关的八卦上。他讲到，“我有十几年的积累，回国可以释放十几年，尤其是在科研文化上学了不少，要把自己的科学做好。这几年我们的确做得不错，拿到国际上也绝对一流。”

高福说，“兴趣是科研的动力，而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把个人的兴趣与国家的需求结合，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高福将自身的研究兴趣和国家需求结合在一起，努力推动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与疾病防控事业向国际领先水平发展，为国家在该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张诗悦）



龚旗煌，男，1964年生，日本归侨，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侨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燕园情 中国梦

——记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龚旗煌

1979年，龚旗煌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大物理系，其中物理考试得了100分。当时的他年仅15岁。从初入燕园到现在，龚旗煌已经在未名湖畔度过了四十余年时光。他曾到英国、日本学习工作，但又几次放弃国外更好的条件回到北大，带领团队潜心科研。龚旗煌说，只有燕园才能

使他产生一种安定的感觉，把根扎在北大、扎在中国，是他从未后悔过的选择。

执着创新 成就科研梦

三十年前，龚旗煌在做博士后研究时，一位老师曾对他说：“你应当学会独立做课题，老跟在别人后面跑的人永远成不了真正的科学家。”这句普普通通的话使龚旗煌认识到首创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于是，初生牛犊不畏虎，他把研究的重点转到当时国内还没有展开研究的有机非线性光学新材料上来。自此以后，他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范围，涉及超快光谱及强场下原子分子物理研究、新型非线性光学材料及微纳光子学研究、光场调控及极端光学研究等多个方面。



龚旗煌在实验室

三十年后的今天，龚旗煌带领的北京大学极端光学创新研究群体已成为国内外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研究团队。该群体涌现出中科院院士1人、长江特聘教授4人、国家973项目和国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2人、万人计划领军人才3人、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7人和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7人。群体成员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肯定。

从一个几乎“一穷二白”的薄弱学科到研究水平国际先进的国家重点学科，龚旗煌和同事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每当回忆起自己初建实验室时的种种情形，龚旗煌都十分感慨：“最早只有一个教员、一个学生。”在实验室建设最初起步阶段，风气还不是很好，龚旗煌要求学生坚持考勤。通过近一年的努力，大家都

养成了自觉的习惯，考勤制也随之取消了，良好的工作和研究风气则一直保持和发展下来。龚旗煌根据每一位同学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特长，因材施教，认真安排他们的研究课题题目、研究方向和目标，并从他们进入实验室的第一天起，就力求使他们明确实验要求和实验方案。

龚旗煌特别注重发扬团队精神。他说：“现在的科学是大科学。不像以前，量子力学已经一百年了，当时一个人的努力和天赋就可以诞生量子力学，奠定量子力学基础。现在的科研需要团队作战。关键是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建设一个非常团结的团队。”他的课题组每周进行一次学术交流，由每位老师和同学轮流汇报和介绍各自研究进展和最新文献资料。在此过程中，他十分注意发挥团队成员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认真对待大家提出的新想法和新方案，告诫大家不要忽略任何在试验过程中发现的特殊现象。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的课题组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开拓进取的学术氛围。近年来，通过自主培养和外部引进高层次人才，龚旗煌带领科研团队不断发展壮大，促使北大光学学科实力快速提升，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并发展了原子分子学科，成为新的学术高地。

值得一提的是，龚旗煌所在的科研团队有一支规模不小的党员队伍。龚旗煌早在198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人人都想为自己的国家真正做一点事情，入党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和途径了。”他的团队里，有一半人是党员，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实验室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在龚旗煌看来，党员是一种标志，是一种激励和督促，更是一种责任，有了这种责任感，一个团队就能够战无不胜！

放眼世界 筑就中国梦

回顾龚旗煌的成才之路，在很多人眼中无疑是一个传奇：15岁考入北大，19岁硕博连读，27岁晋升为副教授，31岁被破格提拔为教授，49岁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本科毕业时，他只要通过一个中美联合培养考试，就可以很顺利地赴美国留学。在班上同学纷纷选择出国时，他

却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举动——选择在北大读研。“我一直觉得北大让我学会成长。在这里，我开始认真地考虑一些问题。因为在北大，人完全属于自己，个人的思想和理想，个人的意见和能力的发挥显得极为切实。你只能靠自己，不能随波逐流。当时我才19岁，还不敢想象离开这个精神家园我会怎么样”。

1988年，龚旗煌作为北大中英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上世纪80年代，中国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很大，英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比国内好得多，很多人也因此留在了英国。可龚旗煌在交流学习后依然选择了回到北大。他说：“我出国的机会是北大给的，北大需要我，我自然应该回来。”

1994年，龚旗煌受聘为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前沿科学研究员。他杰出的科研素质以及严谨创新的精神，使日本老板对其刮目相看，热切要求他留在日本。为了挽留这位青年才俊，老板愿意提供很高的薪水以及优越的待遇。1995年，北大校领导到日本访问，特意带给他一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申请表。龚旗煌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一方面是炙手可热的日本研究所的丰厚薪水、雄厚的科研资金、先进的科研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无法确定能否得到批准的科学基金申请、处于低水准的国内生活条件。两方面的条件对比悬殊太大了，留在日本当然是很多人同等情况下做出的不二选择。然而，令当时许多人跌破眼镜的是：龚旗煌毅然决然地收拾行装，重新踏上了迫切需要高科技人才、并不富裕的中国土地。谈及理由，他十分坦然：“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我是中国人，去国外、去英国、日本，老板确实愿意留，也愿意提供很高的薪水，但在那里做事是在帮别人做，在帮别的国家做，缺少一个根，没有根的感觉。”

龚旗煌并不是把自己同不断发展的世界科技潮流隔离开来，相反，他举目四方、海纳百川，不放弃任何一个同国际同行对话的机会。“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和所获得的知识，对我以后的课题开展、方向选择都有很大帮助。”他不仅促使团队成员积极主动走出国门、放眼世界，而且

还把世界上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请进来，邀请他们在北大访问、作报告，以此使大家能够掌握最新最快的信息，不断开阔研究的视野。如今，他充满自豪地说：“现在可以讲，我们的研究条件不比发达国家的差，在一些研究领域我们已经实现了并跑乃至领跑。”

龚旗煌坦言自己是幸运的，能在大学校园里做科研，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做贡献。“我个人的成长历程正好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等政策的实行，赶上了好时候！”得益于国家高考制度的恢复，他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学习。大学毕业时，研究生制度的实行又为他学业深造提供了机会。随后，国家留学政策又为他打开了一扇与世界科技前沿对话的窗口。

回国后，龚旗煌还兼任北大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积极联络归侨侨眷并组织各项活动，将海归学者凝聚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我相信大家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报祖国。”2012年，他带领的研究群体获得中国侨界贡献奖（创新团队）。

2017年以来，龚旗煌出任北大副校长、常务副校长，承担了更为繁重的教学科研管理任务。他提出“四个面向”（面向重大科学问题、重大国家需求、重大学科交叉和重大仪器研制）的科研管理理念，在继续营造宽松氛围、鼓励前沿创新的同时，加强高水平团队建设，整合人才资源，开展协同攻关。他领导制定了理工科科研创新能力建设专项方案，建设专职科研队伍，加大对重要科研基地管理和支持力度。在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大时，龚旗煌带领同事认真筹划“北京大学理工医科5年成就展”，并代表学校为总书记作现场讲解。总书记对“四个面向”管理理念和具体措施及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表扬北大做出“颠覆性、突破性、革命性的成绩”。

“与全国人民一样，我还要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努力奋斗！”龚旗煌说，“作为一位在高校工作多年的教师，我的‘中国梦’就是人才梦、创新梦，为实现这一梦想，我还需加倍努力，勤奋工作。”

（作者：陈瑞清）



关鸿亮，男，1969年生，日本归侨，天下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北京市侨联委员，第三届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获奖者。

精准测绘天下图 心中不忘桑梓情

——记天下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关鸿亮

他是海归精英，怀揣中国梦，毅然放弃日本第一大地理信息企业高管优厚的待遇回国创业，以服务社会、造福百姓为宗旨，以实际行动来回报祖国；他积极推动了国内测绘产业从手工作业向高科技数据处理的转型，积极引入最先进的科技理念，成为行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测

绘行业工作 20 多年，他曾两次荣获国家颁发的测绘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以及多测科技进步奖项，为中国地理信息技术的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对他来说，测绘不仅是事业，更是毕生追逐的梦想。

他，就是天下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关鸿亮。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0 世纪 90 年代，关鸿亮在武汉大学就读，学习环境科学。1992 年从武汉大学毕业，随后进入北京市化工局工作。1996 年，关鸿亮被公派到日本进行学习交流，之后考取了东京大学。此后不久，他辞去了化工局的工作，开始专心在东京大学进行应用遥感技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大学期间的关鸿亮时常抬头远望天空中飞翔的鸟类，观察鸟儿的行为以及研究鸟类保护。但是由于鸟类迁徙路线复杂，途径的许多地方都在人类无法抵达的范围，这给他在研究鸟类行为与鸟类保护方面带来了许多困难。之后，在导师的帮助之下，关鸿亮开始在鹤的身上装发报机，并通过与卫星遥感技术结合来确定鸟类的定位，利用卫星、GPS、GIS 技术做鸟类的调查研究，从而更好的研究鸟类行为、进行鸟类保护。从那时候起，他便积累了许多地理信息方面的知识，开始走上了地理信息行业的道路。

从东京大学毕业后，2003 年，关鸿亮顺利就职于日本最大的地理信息上市公司，2004 年，关鸿亮出任该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在该公司工作期间，关鸿亮在遥感、GIS、激光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得到了进一步的积累，同时提高了他的管理能力，也让他越来越具有国际化视野。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06 年 7 月，关鸿亮毅然辞去了原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的职位，在北京甘家口一个写字楼里，凭借 200 万元起步资金与 15 名员工，创办了北京天下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从此开启了他的创业人生。公司创办初期以遥感影像数据加工处理为主营业务，但

关鸿亮并没有局限在这一单一的数据加工业务里，而是通过收购兼并，资源整合，将天下图打造为“数据获取+数据处理+增值应用开发”一体的全产业链型集团化企业，并带领公司于2013年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精准测绘天下图

地理信息测绘，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小到地图导航、寻人定位，大到精准制导、飞航安全，它的每一项数据都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为了达到精准测绘的目的，航空测绘就成为掌握地理信息资料的重要手段之一。

“当时国内做地理信息服务的企业有不少，但都很分散，专做航拍、制作、应用的某一个环节，缺少全产业链。”关鸿亮深刻意识到全产业链才是大势所趋，唯有发展全产业链才能为用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他独到的眼光让天下图在创建之初就拥有了开阔的视野，从而为天下图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国内航空、卫星影像数据加工能力较差，关鸿亮果断引进了当时代表世界一流水平的海量影像数据加工系统——像素工厂。天下图的数据加工能力迅速占有国内数据自动处理市场50%的份额。业务覆盖范围还扩展到了日本、东南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成为行业中的领头羊。

2007年，关鸿亮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测绘无人机研究，当时国内航空测绘还停留在载人飞机应用的层面，测绘无人机研发仍是空白。关鸿亮意识到，这对国家航空测绘的发展非常不利，为此，他们开始组建团队，开启技术攻关，并打造出中国最早的高原无人机测绘勘灾团队，一举掌握了复杂地形条件下的无人机勘灾能力。

自2008年开始，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内对高分辨率航空影像需求日益增加，完全靠政府投资航飞，投资大，更新机制欠缺。基

于此，关鸿亮提出由公司自主投资航飞，并利用市场机制由公司负责航空影像数据的增值运营和更新，这就是“城市高分辨率航空影像数据库”，即“天下图库”的雏形。

随后几年，天下图一直在做两件事，构建天下图库和建设天下图云。关鸿亮打比方说，天下图库可以看作一个地理信息数据图书馆，而天下图云则负责为使用者提供服务。这样既能提高国家反恐、维稳、救灾、测绘等能力，企业又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预期的收益。

围绕这两件事，关鸿亮在数据获取领域潜心研发制造了无人机、街景车、地理信息应急监测车、移动激光全景测量车等可以在低空、城市街道、救灾现场各种场景中快速、精确获取高清影像的创新装备，供国土、规划、交通、环保、电力等行业从数据产品中了解发现专业信息，指导部门生产和管理。同时代理国内外卫星遥感业务，还自主研发了GIS软件。

从汶川大地震到玉树地震，从舟曲泥石流到盈江震后重建，再到江西水灾、四川雅安地震等众多事件中，天下图公司承担了大批地震灾区数据的紧急处理任务，以最快的速度，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陆续攻克了无人机的高原飞行、长航时飞行、远距离传输与制导等技术难点，成为国家在航空测绘和救灾领域的生力军。

几年来，天下图的硬件及软件产品在大型空间数据库管理、空间数据专业编辑与制图等方面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有四项产品获得了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证书，列入政府采购目录。2017年，“天下图一站式”地理信息资源云服务平台与应用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热心公益勇担社会责任

一路走来，关鸿亮在业内屡创奇迹。但他却说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他和他的团队在汶川大地震与玉树救灾中“帮上了忙”。

在汶川地震期间，由于四川连日阴雨，遥感卫星无法及时获取震区

的高清影像指导救灾，航空测绘就成为了当时唯一的手段。关鸿亮团队拍摄的近500平方公里航测影像成为抗震救灾中最重要的参考依据。从汶川地震到玉树救灾，关鸿亮带领的无人机测绘团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关鸿亮无人机测绘团队的出色表现，玉树灾区的即时灾害影像被迅速获取送往救灾指挥部。抗震救灾过程中，从航拍到拿到数据的时间由原来的七到八天缩短到了几个小时就能获取现场影像。“我们做这个事情，是要把数据交给国家，我们做的这些公益全部都是免费的，确实要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关鸿亮说道。

2016年，关鸿亮开始与中国边坡灾害研究专家谢谟文合作，希望借助产学研合作的力量解决我国地质灾害多发地区的早期预警技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地质灾害的早期预警依然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山体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的发生往往在瞬息之间，给周边区域生活的民众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地质灾害面前，人类有着极为痛苦的记忆，然而在现有的地质灾害防控预警中，大到卫星监控，小到人力盯防，都需要依靠复杂的信息处理与经验判断，无法实现监控、预判、灾情发布的同步处理。为此，关鸿亮希望改变，通过科技驱动去破解这道困扰人类防灾能力的技术难题。在关鸿亮与谢谟文的努力下，他们提出了名为“边坡失稳动力学”的预警监测理论，一款名为“微芯柱”的地质灾害早期预警产品应运而生。微芯柱技术通过感知山体滑坡、泥石流发生前的地质异常震动，由产品自带的处理系统迅速做出灾情判断，同时通过窄带网络向区域内人员发出危险预警。这一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地质灾害预警能力，为地质灾害多发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善行天下，产业报国”，关鸿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这八个字。“心怀中国梦，精绘天下图。勇担社会责，不忘桑梓情。”关鸿亮在带领北京天下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快速发展的同时，始终视社会责任为己任，坚持热心公益、回报社会。“我不由自主将对国家的热爱、对社会的担当、对科学的追求，融入到了自己创业的梦想中，‘让社会更加

智慧’是天下图的发展愿景，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用丰富的地理信息数据实现智慧的功能，让社会更加和谐、友爱，让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便利。”关鸿亮说。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创业是一个寂寞的过程，需要忍耐、坚持，也需要理想和激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汗水洒过，身后早已开满一路鲜花。关鸿亮一直相信，未来，地理信息技术一定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关鸿亮获第三届京华奖

（作者：姜孜伶）



黄锡璆，男，1941 年生，印尼归侨，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顾问首席总建筑师，第八届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

国士之才 君子之德

——记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顾问首席总建筑师黄锡璆

身披满身荣誉 心怀家国使命

黄锡璆是我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在国内外医疗建筑领域中的造诣和影响力颇深，自从业以来主持与指导了近 200 余项的医院设计项目，我们所熟知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协和医院等国内

知名医院均是黄老先生的代表作。

他在医疗建筑方面的成就卓越，获得的荣耀满身，第六届梁思成建筑奖、北京市奥运工程规划勘察设计与测绘行业突出顾问奖、全国设计大师、全国先进工作者……

他获得的荣誉不胜枚举，但真正令大家为之动容的，是黄锡璆心中的大义和担当。医疗建筑的设计与人民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当国家和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义无反顾地坚守在他的岗位上，筑起保卫人民生命健康的阵线。

2020年1月23日下午，中国中元接到了一封来自武汉市城乡建设局的求助函，对方请求支持武汉建设新冠病毒肺炎应急医院，中元曾在“非典”期间完成了建设小汤山医院的设计任务，具有相关的经验和基础。收到函件后，中元立即召开支援武汉应急医院建设的工作会议，迅速整理出了小汤山医院的设计图纸与资料，一个多小时后，武汉建设局就收到了修订后的小汤山医院设计图纸。中元还成立了技术支持专家组，为武汉建设局和相关单位提供技术咨询，由黄锡璆担任应急技术专家组组长，对武汉火神山医院设计进行技术指导。

面对这样紧急的重大设计项目，黄锡璆早已积累了经验，17年前，他率领的团队便创造了一个医疗建筑设计“奇迹”。2003年，“非典”疫情在北京爆发，中元承担了小汤山医院的设计任务，黄锡璆临危受命，经过7天7夜的奋战，黄锡璆团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圆满完成小汤山医院高质量的设计任务。该医院在“非典”期间救治了680名患者，治愈率超过98.8%，医院1200名医务人员无一感染，做到零死亡、零感染，为北京市有效控制非典疫情传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黄锡璆深知形势的严峻性，小汤山设计建造的场景历历在目，“每张图纸，都印在心里”，彻夜难眠的他又在24日除夕的早晨将手写的医院设计要点及时传真到对方手中。他还通过微信群和火神山医院设计团队探讨设计细节，完善设计方案，并先后为其提供了三份具体建议书。

抗疫前线是一场刻不容缓的生命保卫战，而疫区医院设施的建设同样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战争，武汉的目标是参照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10天内在武汉建设一座床位达1000个的大型专门医院，时间紧，任务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年逾79岁的黄锡璆身先士卒，主动请缨，积极响应党中央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号召。在农历腊月二十九那天，正是大多数人准备阖家团圆的日子，黄锡璆向组织递交请战书，他亲手写下了：“与其他年轻同事相比，家中牵挂少，具有‘非典’小汤山实战经验”，表达了他愿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前线参加抗疫的坚定决心。在整个春节假期期间，黄锡璆更是一天也没有休息过，坚守在指导多项应急医疗项目设计工作的前线，对于自己的付出，他只说道，“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是跟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碰到这样的大事，就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



黄锡璆工作照

从业数十年，黄锡璆兢兢业业，将国外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技术与我国实际相结合，设计作品是很多国外知名设计师一生作品量的5到10倍，引领我国医院建筑规划与设计的发展，也推动了我国医院设计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有人评价他说，“每一页图纸，都承载着黄锡璆的家国梦想，每一所坚固的医院，都体现着他的工匠精神。”真正的国土，从来都是胸怀家国大义，肩负使命责任的大家。“为中国人建造自己的现代化医院，改善中国人的就医环境”是黄锡璆从事医疗建筑的理想信念，任岁月消逝，容颜衰老，家国和人民的使命担当未曾有一日从他肩头卸下。多年来，黄锡璆始终坚持自己的追求，发挥自己在建筑设计领域的才干，为祖国医疗建设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助推中国现代医疗水平跻身世界前列。

专业品质：细心、耐心、仁心

黄锡璆令人惊叹的专业成就和设计才华背后，是他在进行医疗建筑设计过程中始终保持的细心、耐心和仁心。

医院建筑对安全性的保障有很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抵御较高强度的自然灾害，还需要为病患提供便捷的诊断治疗通道，因此在项目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需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合理规划设计，细心把关每一个设计的环节，否则一个微小的差错可能就会影响诊治效率，危害生命救治。在黄锡璆看来，医院建筑设计师要多观察、多学习，周全考量各种因素，既追求建筑外观的审美性，又要保证内部结构的科学严谨。

在细心之外，黄锡璆认为“医院是治病的场所，做医院设计，你真的需要体会病人的感受，为病人服务好，自己做设计工作也要有耐心。”他在与医生打交道的过程中看到了医疗工作者对病患的关爱，这种工作精神感染了他，让他学会了用耐心对待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与医生真诚地沟通、解释自己的设计想法、听取他们的意见。

黄锡璆在医院设计中不仅拥有高超的专业水准，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仁心，尊重生命、关怀人性。“建筑师是专业人才，除了解决医疗流程的问题，还要让医院空间更加合理，空间变化丰富，建筑不能设计的太枯燥无味。”黄锡璆深刻地认识到，医院不是一座流水线工厂，如果仅仅采用标准化的设计，毫无空间情趣，既冷酷又没有人性，那它只是“治病的工厂”。医疗建筑师应该要给医生和病人创造更舒适的环境，正如他所说的，“医院设计是在真正考验建筑师对人性的关怀”，建筑师需要像医生一样，有治病救人的仁心仁术。

生在印尼，心系中国

在印尼出生、长大的黄锡璆，从小就对祖国怀有赤子的情，虽然

与广大旅外华侨一样居住在异国他乡，但依然心系中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使他时刻盼望着回到祖国的怀抱，也让他更加坚定回国学习参加祖国建设的奋斗目标。

黄锡璆从青年时代起，心中就十分钦佩那些义无反顾投身祖国建设的前辈们，他曾坦言，“很多科技人员包括建筑师放弃了在国外优越的生活和物质条件回国参加建设，他们令我敬仰。我要学习他们。”高中时期，黄锡璆所在的学校很多老师都号召学生们北上返国报效祖国，1957年，还在读高二的黄锡璆怀揣着为国效忠的热忱，与同学亲友结伴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1959年，黄锡璆考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并在改革开放后考取公派赴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医疗建筑博士。留学期间他刻苦读书，不敢浪费一点时间，为此，学校甚至允许他自取系资料室钥匙阅览。对于祖国的栽培和时代的机遇，他一直心怀感恩，“国家花了这么大代价培养我们，就应该赶紧回国做点事情。”而他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刚回国时，国内的医疗建筑理念、水平还相对落后，他从小项目做起，一点一滴积累，面对质疑，他坚信“在祖国，医疗建筑设计人员需要做、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壮心不已的老年，黄锡璆把自己的所有青春年华都献给了中国的医疗建筑事业。

无数海外求学归来报效祖国的前辈们为后继者树立了榜样，鼓舞并坚定了黄锡璆走上建设祖国的道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黄锡璆曾是中国医疗建筑事业的“拓荒者”，而黄锡璆又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医院复兴事业的领路者之一，他的先进事迹也必将启发、引导更多的侨胞，为祖国的复兴和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张诗悦）



黄岩谊，男，1975 年生，美国归侨，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第七届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

坦然面对意外 不断超越自我

——记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黄岩谊

放弃在美国继续发展的机会回到北大白手起家建设实验室，在很多人来看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黄岩谊却没有过一丝犹豫。相比较北大、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这三所学习工作过的大学，黄岩谊说“我很感激在北大受到的教育，能够有机会回来为母校服务，是很自豪的。”

黄岩谊直言，他很欣赏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的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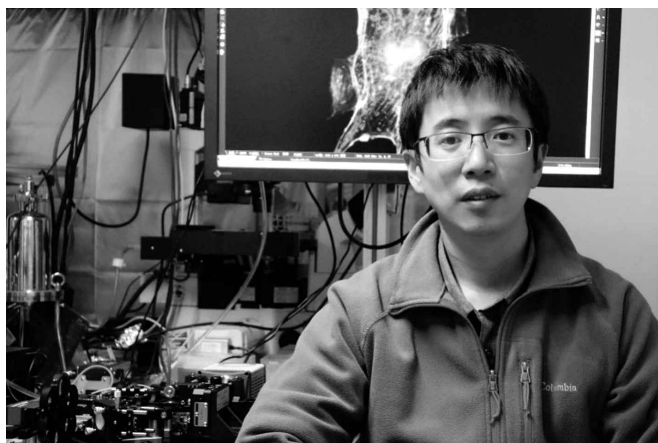
话：“科学研究中攻克难关后的兴奋和成果普遍推广后的喜悦是一种最大的报酬，这是金钱换不来的。”而今天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这样的“报酬”。

追求科学的引人入胜

博士毕业后，黄岩谊离开了北大化学学院并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应用物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在这里他进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光学。黄岩谊说，之所以选择进入一个并非科班出身的专业，除了一直对光学很有兴趣外，还想拓展自己的视野和能力。他大概花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才渐渐地能和那些同他专业背景相差很远的同事开始正常地对话，“一旦跨越了最初的障碍，再往前走，就很快了。”

黄岩谊认为这几年光学的研究，对他今后的研究工作有很好的帮助，让他了解了工程科学的思维方式。2005年9月到2006年10月期间，他又选择了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系做博士后，这次他专注的是生物工程领域。

2006年，黄岩谊从美国回到北大工作，如今他已是北大化学学院终身教授，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未来基因诊断



黄岩谊在实验室

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研究员。他的课题组目前主要专注于单细胞分析化学、微流控技术、高通量基因组测序技术的研究。通过融合生物技术、生物物理、计算机、

分析化学等多个学科的技术进步，来实现对复杂生物体系的定量和高通量测量。

自2006年开始，黄岩谊课题组发展了一系列关键的微流控结构、功能模块及加工方法，用于实现传统生物分析无法或者极难完成的实验过程。他们在集成微流控芯片、单细胞基因组分析技术与器件、单细胞定量化学成像分析方法方面的工作，可以很好地将表现型和基因型及其动态调控很好的关联起来，在单细胞层次上对复杂体系进行多维度、高精度的测量分析，提供可靠数据并揭示功能相关性。这些精巧的微流控器件被用于研究细胞的迁移、相互作用、自动化微体积培养、纳升精确控制、光流控检测、超高灵敏度生物分子分析、单个体动物研究等多个方向，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

除此之外，黄岩谊课题组还研制很多研究相关的仪器设备。但即便如此，在黄岩谊眼中，他的课题组并不是专门“做”仪器的。“正如我所在的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的宗旨一样，我们做的是技术驱动的生命科学研究。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现有的仪器设备，同时创造性地建设目前市面上没有的或价格昂贵的仪器与设备，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我们想完成的科学研究。问题和目的决定了我们的手段，如果需要做仪器，我们就做，不是单纯为了仪器研制而研制。”也许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黄岩谊课题组研发的很多设备并没有产业化。“一些是专门为自己实验室设计的，没有产业化需求。但是还有很多通用的小部件、小设备，可以推广并成为很好的产品，需要产业化的支持。”黄岩谊说。

黄岩谊的科研工作，不仅仅追求技术上是创新的，同时追求科学上的引人入胜。黄岩谊在微尺度生物分析领域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原创而又独特的，课题组首次将先进的显微成像技术、基因组分析技术与微流控系统结合，提供了一套独一无二的工具用于进行单细胞实验，以达到极高的精确度、准确性和稳定性。同时，黄岩谊课题组还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测序技术方面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突破，利用信息理论的支持，使得测序化学的准确度得到了大幅提高。通过微流控来实现新型的测序

化学，来帮助构建单细胞基因组学，使得我们可以在单个细胞的水平上实现表现型和基因型的对应。

毫无疑问，黄岩谊是能够在国际上建立学术声誉的中国本土年青科学家。他带领的团队是单细胞定量生物分析化学领域在国际上受到广泛认可的开拓者之一，是测序基本原理少有的具有突破成就的研究集体。

坦然面对命运的“意外”

1975年，黄岩谊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的一个普通家庭。虽然家里并不富裕，但是父母从不吝啬给他买书的钱。慢慢地，他对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在这一点上，黄岩谊一直很感激父母对他的支持。

“小时候，我的阅读面非常广，课外辅导书、科普书、小说等都有所涉猎。”上初中时，他最喜欢的一本科普书是《从一到无穷大》，这本书以生动的语言介绍了20世纪以来科学中的一些重大进展，书中先漫谈一些基本的数学知识，然后用一些有趣的比喻，阐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四维时空结构，并讨论了人类在认识微观世界（如基本粒子、基因）和宏观世界（如太阳系、星系等）方面的成就。黄岩谊说：“我之所以喜欢科学，与这本书写得有趣、引人入胜、让人忍不住想继续探究有很大关系。”

“但是实际上我小时候没有想过我会学化学。我小时候一直很想当宇航员，觉得能上天很酷。大了一点之后，发现当宇航员对身体要求比较苛刻。我就想当一个修收音机的无线电工程师。”初中时的黄岩谊酷爱无线电，当时他的梦想是以后当一名无线电修理工，后来不知不觉中，黄岩谊开始对物理产生兴趣。初三时他参加了一次物理竞赛，可惜当时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名次，而后在一次化学竞赛中他却“不经意地”得到了全市最高分，得到化学竞赛的老师青睐。“这个结果实属意外，化学竞赛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命运安排。”黄岩谊说。

在学习化学的过程中，黄岩谊慢慢发现，选择化学虽不是自己的初衷，但好像对化学也并不是很“反感”。高二时，他获得全国高中学生化学竞赛冬令营一等奖，被保送到北大学习。

在选择专业时候，他又曾有过动摇的念头。“那个时候我特别想读历史，或者考古，但是我没有那个胆量写志愿，我就只好选择了化学。斟酌再三，最后他在3个志愿上都写上化学。可以说，参加化学竞赛对他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上研究生时，黄岩谊又犹豫了一次，出于对历史的兴趣，他很想报考化学史的研究生，就去请教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徐光宪先生。徐光宪先生对他说了一句话：“趁年轻多做点业务吧，化学史你退休了研究还来得及。”听了徐先生的话，黄岩谊决定还是把考古和历史当成个人兴趣，继续研究化学。

博士毕业后，黄岩谊申请了好多地方做博士后，最后他却选择了与自己原先所学不相关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应用物理系。在他看来，如果遇到意外或者巧合，就大胆去面对，没有什么事是干不了的。“我后来总结，对待这种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你什么都不是，你就往下学，我发现这一招很有效。”黄岩谊说。

在挑战中不断超越自我

黄岩谊出国工作几年后又回到北大，最怀念的是北大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理想主义”情怀。“我有幸经历了这个社会可以给予我们的最好的教育，享受过最好的资源，这成为了我进步的动力。”他坦言道。



黄岩谊于北京大学中关村新园致辞

怀着对祖国和母校培养的感激，他也不遗余力地栽培自己的每一位学生。他常常鼓励学生要尝试不同方向的研究，不拘泥于课题组的研究范围，“如果你们连我都不容易超越，怎么超越那么多竞争对手？我有信心战胜摆在面前的一个个困难，相信你们也同样可以。”而黄岩谊教授正是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在挑战中不断超越自我。现在，他许多学生已经陆续成为科研领域的新星，在国内许多知名科研机构任职；他训练的美国博士后也已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世界顶级大学任教。

（作者：陈瑞清）



金磊，男，1954年生，美国归侨，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第七届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

大医精诚 一生守护中国“心”

——记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磊

2000年8月，美国爱德华公司牛心包生物瓣获美国FDA批准上市，同时登陆纳斯达克。导师朱晓东院士打电话给金磊博士：“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心脏瓣膜研究，中国瓣膜病患者更需要你！”为此，金磊博士萌发了回国研制中国自己的牛心包瓣的念头，希望用自己的所学回报给祖国母亲。于是，他放弃了美国优渥的工资待遇和优越的生活环境，带着

生物工程的前沿技术和全部积蓄，义无反顾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从此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

回国后，在政府的支持下，金磊注册成立了北京佰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这是国内第一家、世界唯二从事人工生物瓣膜生产的企业，也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家能自主研制和规模化生产人工生物瓣膜的企业之一，填补了我国生产生物心脏膜瓣的空白，拯救了数万膜瓣病患者的生命，让更多的中国“心”获得重生。

仁心仁术，大医精诚。金磊和他的佰仁医疗一直秉承“厚德载物，以人为本，振兴中华，造福人类”的核心价值观，以为患者研制出优质人工心脏瓣膜为己任，牢固树立“再塑高品质人生”的指导思想，致力于守护万千中国“心”的生机与健康，让中国“心”重新焕发生命之光。

与医结缘 三十年专注瓣膜研发

金磊博士出生于医学世家，家人润物细无声的熏陶将“救死扶伤”的种子深深植入到他幼小的心灵中，让金磊的一生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业于吉林医学院之后，又考取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朱晓东院士的研究生，师从北京阜外医院朱晓东院士开始了人工生物心脏瓣膜的研究工作，从此开启了医学研究的大门。

在协和医院求学期间，金磊先后参加了国家“七五”和“八五”人工生物心脏瓣膜科技攻关课题的主要研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于1994年4月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教授，成为当时协和最年轻的教授。在导师的带领下，金磊所在的阜外医院瓣膜研究室研制牛心包生物瓣的技术已经步入了世界医学该领域的前列。1995年，金磊博士被派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继续深造，经过近7年研究、积累与沉淀，牛心包生物瓣的核心技术日臻成熟，为后来回国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2001年，已经功成名就的他毅然回国，用自己的所学回报祖国，

创办了北京佰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2003年10月，佰仁公司生产的牛心包生物心脏瓣膜正式获批上市。经过近20年的持续研发积累，佰仁医疗已经完成了丰富的产品布局，已获准注册Ⅲ类医疗器械产品共13个。其中，人工生物心脏瓣膜（牛心包瓣、猪主动脉瓣）等6项产品为国内首个获准注册的同类产品，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医术仁心 拯救中国膜瓣病人于水火

我国是风湿性心脏病膜瓣患病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自“六五”开始，研制人工生物瓣就被列为国家医学科技攻关项目。目前我国，手术置换的患者多数为风湿性心脏病膜瓣病，主要分布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无论医疗设施还是保险制度都尚未完善，植用人工生物膜瓣更适合我国患者。以牛心包组织作原材料，经过处理和加工，制成与天然瓣膜结构类似、瓣叶柔软、生物相容性好的人工生物心脏膜瓣，植用这种膜瓣替代患者病变毁损的瓣膜，术后患者无需终身服用抗凝药物，术后15年80%以上的患者均可安然无恙。这也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病人青睐生物瓣膜的原因。

然而，根据相关报告，我国生物瓣用量约占20%，相对国外市场，国内生物瓣使用量明显不足，发展空间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佰仁医疗的牛心包生物瓣上市后，截至2013年就已经植入了万余名患者的体内，免除了抗凝相关并发症的风险，获得了高品质的远期治疗效果，不仅使得我国生物瓣膜产品先于国外产品在国内市场实现临床应用，更是减轻了万千膜瓣病人的痛苦和担忧。“足够的病例证实，无论技术水平，还是产品质量，较美国生物瓣膜进口产品相比，佰仁的牛瓣都更适用于中国年龄偏轻，特别是多瓣膜病变的风心病患者，且价格为进口同类牛瓣产品的一半。”

人工瓣膜从研发到产成品中间环节多，一个瓣膜需要人工缝制需要1800针才能完成。公司的缝瓣员工缝制1个瓣膜需要2个半小时才能完

成，且达到这一水平需要很长时间的培训。在金磊的带领下，佰仁医疗制定了“以仁为本，聚识谋进；精益求精，独创精品；再塑高品质人生”的质量方针，引导公司全体员工以仁爱之心、“视为己用”的心态来完成每一件产品，以救治数百万患心脏瓣膜病同胞为己任，共同保障和守护膜瓣病患者的生命健康。

万侨创新 助力华人华侨归国创业梦

当谈起归国创业历程时，金磊最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他带着自己的核心技术向国家申报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很快就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我们的第一笔资金来自于国家的支持，我两次获得了创新基金的支持，第一次获得了100万，后一次获得了80万，然后中关村科技园区也曾批给我们资金，还有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北京市科委和中关村知识产权局都给了我们几次的资金支持，加在一起我们总共获得资金700余万。”



2019年12月，佰仁医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创业园区也是归国华人华侨创业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金磊很感激当时他所在的中关村昌平园区给予了他非常大的帮助。“刚到昌平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知道。开始到厂房，我们看到是一个标准化的工业化厂房，不适合我们的产品研发。

因为企业对实验室和生产场地要求比较高，无论是在海淀也好，在昌平也好，都没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孵化器，因此我们提出来说可能要用一笔资金来建实验室，建实验车间。当时的洪区长就表态，这个钱我们可以出一半建实验室和实验车间的费用。”在昌平创业园区的大力帮助扶持之下，第二天金磊的团队就

开始了建设实验室和生产车间的工作，一个月以后正式投入了使用。

“不仅如此，我们租用的这块场地三年之内没有收我们的租金，在我们起步阶段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包括各种鉴定会、产品注册的法规等各个方面的支持，这使我们企业在创建初期很快就进入了一个良好发展轨道。”金磊每每回忆自己的归国创业历程，总是免不了对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的感谢，感叹自己创业逢时，赶上了好时候、好政策。

正是有了好的项目、好的团队、好的融资渠道和好的创业环境，金磊的初步创业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助推力，得以顺利进行。

面对越来越多海外留学生渴望回国来创业的现状，金磊表达了鼓励的态度，也道出了自己的感悟，“我觉得非常重要是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价，看自己已有的技术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他鼓励归国创业者们“要有一个面对挫折的良好心理准备，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回顾金磊的创业历程，仿佛是一幕勋章墙，上面贴着满满的“名头”和荣光：他曾是协和史上最年轻的教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心脏外科专家朱晓东教授最得意的弟子；他是一位拼搏在医用领域，不走寻常路的勇者，是一个为商不为“利”而在“益”的创业归侨；他从事生物心脏瓣膜研究数十载，研制出牛心包生物瓣膜的核心技术；他是北京佰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创立的企业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家从事人工生物瓣膜规模化生产的企业之一；他将自己的心血注入所研究领域，又将其制成实实在在的产品植入到患者的心脏之中，挽救了数万生命……

金磊的事迹和精神令人钦佩和敬仰，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心脏瓣膜研究事业，致力于造福中国瓣膜病患者早日脱离苦海，投入创业的浪潮，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姜桐桐）



李然，女，1963年生，香港同胞，鑫桥联合金融服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第八届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

风雨兼程 不忘初心

——记鑫桥联合金融服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然

追逐优秀 不断创新

作为中国知名企业家，李然有多种身份：鑫桥联合金融服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北京市侨联副主席、中国侨联特聘专家、中国侨联

创新创业联盟副理事长、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侨联创新创业联盟执行理事长，北京华商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融资租赁研究基地博士后流动站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清华大学法学院金融所研究员、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香港侨界社团联合会永远名誉会长等职务。

2007年5月，李然作为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北京创建成立了由国家商务部批准的外商投资公司，鑫桥联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多年来，李然领导公司管理团队致力于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和中国城市经营性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提供以资金为核心、以金融技术和金融服务为支持的盘活存量、支持增量的定制化创新型金融服务，并创造性地将产业和金融相结合，创立并发展了具有特色的以资源组织能力和资源增值能力为依托的、促进中国城市经营性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构性融资租赁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模式“鑫桥模式”，成为中国融资租赁行业的金融服务品牌。在行业中，连续几年获得服务于中国大型企业集团公司和城市经营性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排行首位的荣誉，已完成中国城市经营性公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融资额达上千亿元人民币，荣获北京税务局颁发的“纳税信用A级企业”。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中国各监管机构和金融行业诸多好评，并多次获得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融资租赁年会、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融资租赁三十人论坛等各监管机构和金融行业颁发的“最佳结构金融产品创新奖”、“中国最佳融资租赁业务模式创新奖”、“年度最佳融资租赁公司”、“融资租赁杰出贡献奖”、“中国融资租赁创新奖”、“创新中国杰出贡献单位”、“最佳融资租赁创新奖”、“最佳融资租赁商业模式创新企业”；被中国侨联授予“中国侨界贡献奖创新企业”；被北京华商会授予“企业创新发展奖”等荣誉。

把握机遇 贡献国家

九十年代初，李然怀揣梦想，赴美学习工作。她和所有那个年代的

海外华人华侨一样，在住在国学习生活，经历风雨的洗礼。在美国创新创业发展的圣地硅谷，她创立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子商务技术服务公司及以投融资为基础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在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这一重要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时期，李然毅然决定回国奉献社会，把握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作为一位海归女企业家，她既有中国女性特有的优雅气质，又有着运筹帷幄的思想格局。从国外回来的李然，就如何解决当时金融产品单一，满足国家投资建设发展需要，把已形成的存量资产盘活，支持中国基础设施产业及实体经济发展进行了考察研究，并与先生共同创建了鑫桥联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她希望通过国外先进金融工具融资租代的方式，服务于中国的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

当我们看到城市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公路、铁路网络贯穿南北、四通八达；一座座工厂在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设备更新换代，产品质量不断升级，逐步满足人民对幸福美好的生活向往时，金融服务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正是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最强有力的后盾。李然领导公司管理团队潜心于融资租赁模式的创新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应用，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鑫桥模式”，不仅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更成为中国融资租赁行业进行金融创新的一面旗帜。

2010年5月，鑫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创建成立了中国唯一一家以融资租赁领域为研究方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成立至今，为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培养了多位博士后人才，为带动和引领融资租赁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中国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行业经验。

为了更好的响应支持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中心城市、“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发展和实践，更好的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提供创新金融服务，分别在“一带一路”路上枢纽的云南、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深圳、天津、上海等地投资设立全资融资租赁子公司，公司已逐步形成了服务于中国城市经营性

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产业升级转型、国家中心城市、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国策实现的全方位、专业性强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推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和中国城市经营性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贡献。

不忘初心 回馈社会

在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同时，李然始终未曾忘记担当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在“精准扶贫”、“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两岸四地经济文化科技交流、支持新侨人才创新创业方面、支持国家基础教育，资助优秀学生及贫困学生、社会公益等方面累计捐赠金额多达上亿元人民币。

今年一月以来，李然第一时间响应国家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号召，捐资捐物累计约300多万元人民币。分别向北京市红十字会、海淀区红十字会捐赠三辆医用负压救护车；同时，积极参与香港基层组织的抗疫工



李然捐赠救护车

作，捐赠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并多次走上香港街头参加派发口罩等活动。

2月10日以来，李然领导公司管理团队积极响应国家复工复产的号召和要求，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于3月1日，利用高科技远程签约模式，为国家西南部地区交通运输建设和发展注入开年第一批中的14.1亿元人民币项目资金。

几年来，李然和公司为国家的基础教育事业积极捐款，资助贫困学



李然为“京侨帮扶·双百行动”捐款

生，奖励优秀学生，在支持推动两岸四地的文化、科技、经济交流和发展等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出资出力，做出了贡献。

为加强首都与两岸四地的交流

，提供研究与合作的平台，先后支持赞助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两岸发展研究院”，为推动港澳台两岸四地经济、文化交流和人才的交流和创新做出贡献。积极支持清华大学化学系成立“汪家鼎励学基金”，精准捐助贫困学生求学深造；与清华大学法学院共同成立“王汉斌法学基金”“王汉斌法学研究杰出贡献奖”，该基金已经资助了超过500名贫困优秀法学专业学生。

积极响应国家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积极参加北京市侨联组织的“京侨帮扶·双百行动”，用于资助河北省阜平县贫困大学生及农棚信息化升级改造。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李然以“厚德载物”的精神，行走走在为国家发展的征程上，面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新格局，李然领导公司管理团队会继续紧紧围绕国家发展规划，围绕国家“新基建”、“高质量”、“高品质”发挥自身优势，“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为全方位推动国家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做出最大的努力和贡献！

（作者：陈瑞清）



李玮，男，1971年生，美国归侨，罗克佳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第八届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

汇聚海归精英 打造物联网数据“托管地”

——记罗克佳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玮

“参与到祖国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将高科技深入基层，面向应用，努力自主创新，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尽一份力。”成为罗克佳华科技董事长李玮这样的海外归国学子新的光荣与梦想。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李玮带领团队紧跟时代发展，深耕物联

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在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方面发力，实现数据的复用和增值，打造物联网数据“托管地”，做实平台化建设，构建智慧城市云链大数据平台。

怀揣梦想 回国后建起一支“物联网施工队”

上世纪90年代，李玮赴美深造，经过多年的学习积累，在美国底特律成家立业，任职于一家世界知名的自动化公司，爱人是通用汽车的经济学家，衣食无忧、前程似锦。2003年的一次回国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当时美国公司组织团队来华，为未来在华投资做前期考察。李玮也是这个团队的一员，跟着团队回到了太原。当时山西面临产业升级，需要高科技企业进驻，李玮作为土生土长的太原人，就想着是否能为自己的家乡出一份力。

在经过不断沟通，反复争取后，李玮在美国和太原找到投资，2003年底注册了太原佳华科技公司。

公司建成后，攻克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矿井的智能化改造问题。为建成智慧矿山，李玮和团队用了长达4年的时间，协助政府将4000多个矿井整合成1093座，全部进行4级联网，对瓦斯、人员定位、产量等展开智能化监测。在4年里，他们的足迹遍布山西、陕西、内蒙古、贵州等地，几乎每一天都在矿井下实施运维。

井下工作是没有昼夜之分，身处在黑漆漆的矿洞之中，有时一待就是一整日，饭食就是馒头、辣椒、白开水。“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关注的是怎样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在矿井现场的实际工作中。他经常跟我们说，最好的技术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再好的技术如果别人不用，那都是假的。”团队中人如是说到。

李玮恪尽职守、不知疲惫的精神，鼓舞了整个团队，他们研发出了综采工作面系统、皮带运输系统、无人值守通风系统、重大灾害预警系

统等产品。荣获国家煤炭安全体系防爆认证、安全标志认证。承担了“数字化矿山ACC”、“矿井综合灾害预警系统”、“井下无人化采煤”等国家重大课题和研究项目。相继为中煤平朔安家岭矿、陕煤柠条塔矿、李雅庄矿龙泉矿等多个大型矿井提供完善的数字化矿山整体解决方案，实现了全年无安全事故，受到用户称赞。

“物联网涉及现场采集，需要用什么传感器、用什么协议、形成什么样的数据，以及最后形成什么样的服务，各方面我们都做。”谈及创业初期的岁月，李玮笑称初创团队是一支“物联网施工队”。

也正是凭着这支“物联网施工队”，李玮与团队得以接触各种大型监测系统，并积累了丰富的物联网解决方案项目经验。

不忘初心 建立物联网数据“托管地”

2006年，李玮联合海外的专家团队，开发工业污染源监控技术，将末端监测改为过程监测，有效避免了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由此被国家生态环境部评为工业污染源监控工程技术中心。

从2003年一次偶然的回国经历，到归国创业解决矿井安全问题，再到介入环保领域……这其中有历史的机遇，有时代的召唤，也有个人的选择。李玮将个人事业的奋斗与国家的发展脉络紧密结合。

2013年，全国大面积爆发雾霾，北京尤为严重，其中通州区是全市PM2.5污染值和改善率最差的区域。佳华科技通过多年在煤矿安全领域积累的对危险气体的监测技术，快速在通州布设450个空气微观站点，为通州布设全国首套网格化监测体系，实时发现问题，精准溯源，快速反应，为通州的大气质量改善提供数据服务，全区域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创立了全国环保学通州的“通州模式”。

此后，佳华科技借助在通州落地环保SAAS服务的成功案例，将通州模式在全国推广，通过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川渝地区、东三省等地建立示范基地，不断“开疆辟土”。目前已经拓展到近60个城

市，发展十分迅速。

以智慧环保领域为流量入口，是李玮选定的公司垂直领域发展的赛道。李玮团队用环保引流，横向拓展智慧城市的其他领域，稳步布局全产业链的物联网大数据。“做物联网的平台公司而非工程公司，首先需要聚焦。我们做智慧环保，开始是因为环保领域信息化基础比较弱，竞争对手少有大公司，但真正让我们聚焦于此的原因，是环保领域的数据共享性是强需求。”李玮解释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李玮工作照

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才能生产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数据产品。李玮积极响应国家技术自主创新的号召，大力在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方面投入研发经费，形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物联网IOT平台、智能传感器、云链数据库

和人工智能算法等核心技术，打通物联网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全产业链条。

“物联网发展了那么多年，一直没有出现巨头公司，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做的只是物联网中的局域网。一开始，我们公司也是这样，但现在我们要做真正的物联网的广域网。”李玮表示。

为解决物联网发展始终处于“局域网”的瓶颈难题，李玮带领团队在数据库和数据交换方面投入了核心研发力量，长期重视数据共享方面的技术创新。公司早在2011年就开始自主研发分布式数据库技术，经过多年的迭代，已发展为成熟的针对云链数据库的数据共享交换技术。

可以将垂直部门的数据上云管理，将跨部门共享的数据上链分享，在数据可追溯的情况下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数据交换模式，实现数据拥有者与使用者双方的“点对点”交换。

由李玮牵头研发的云链数据库共享交换平台，已成功申请软件著作权和基于区块链的数据共享专利，通过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区块链系统功能测试，可以有效解决数据可追溯、可信任的安全问题，实现数据资源的自由共享。

李玮团队建立的三个智慧城市基础平台：物联网IOT平台、云链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人工智能综合运营平台，从智慧园区入手，为智慧城市打好“底座”，集合第三方数据服务企业，建立SAAS服务的生态链，打造智慧产业。

在李玮看来，“物联网时代的大平台公司一定都是数据源合法的，数据都需经授权。佳华科技现在能做到：你们把数据给我，我能让它增值。”

为这片伟大的土地，不断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

李玮的父亲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学生，上个世纪70年代，整整8年时间追随华罗庚先生在全国推广优选法，将数学应用到田间地头、企业管理，为工人农民带去实际的效益。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李玮从小耳濡目染，父辈们的经历让李玮从小就坚定理想：长大要像父亲一样，学好技术，为社会做实事。

在海外的十多年中，李玮聚集了一批海外学者，他们有工作的交集，更有思想火花的碰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和梦想：有一天，能用毕生所学回到国家做些事，不枉一生。李玮率先从美国回国创业，而其他海外专家则在国外积极调研管理理念、开发前沿的创新技术和筹备技术团队。提供数据挖掘、模型算法等方面的技术支持。

提及国内与国外的不同，李玮认为“在国内，只要你肯努力，有技

术，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获得更多的平台，可以承担很多的国家专项，来解决一些事。这在国外是很难想象的。”

佳华科技的公司愿景是“为这片伟大的土地，不断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这句话激励着许许多多像李玮一样的优秀青年们，放弃国外的生活，在国内从零做起，迎难而上，无怨无悔，在工作中享受发自内心的快乐。

凭借深厚的技术背景，李玮脚踏实地地走出了一条物联网发展之路。随着业务涉足领域的逐渐扩大，佳华科技的平台价值越来越得到体现。李玮现身说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国外更多的海归精英一步步吸收进来，成为企业最核心的管理和技术团队。

参与到祖国的建设中，为国家和社会做一些实事，这已成为李玮这样的海外归国学子的光荣与梦想。对于李玮而言，回国这几年间他做了几件事：于祖国，不断进行技术的创新开发，实现智能化落地应用，向“万物互联”的愿景迈进；于企业，不断扩大业务版图，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多个前沿科技领域大展宏图；于个人，怀抱满腔热血，做科技路上的“奔跑者”。

（作者：高悦）



廖洪恩，男，1974年生，日本归侨，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终身教授，第七届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

致力中国智造 助力健康中国

——记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廖洪恩

廖洪恩怀揣“中国人的健康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坚定信念，放弃了海外优越的条件，毅然回到祖国，为中国的医疗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矢志不渝地坚持着高端医疗设备中国智造的目标，将自己的学识回馈给祖国，为中国先进医疗技术的进步上下求索，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微创手术治疗的立体空间透视导航，解决了微创手术治疗中困扰医生多年

的“眼手协调”科学问题，成功地为医生装上一双“透视眼”。

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为医生装上一双“透视眼”，解决医生在进行微创手术时无法直接看到人体内部情况的问题，将精细的“三维人体地图”叠加显示在手术区域中，构建精准直观的人体三维地图，医生便可以直接看着手术区域进行操作，被外部皮肤、骨骼遮挡的内部器官病灶一目了然，解决了医生手眼协调问题。这项技术的发明者就是廖洪恩教授。

“被显示的三维物体就像真正存在于空间一样，好像伸手就能触碰到，不用戴眼镜，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未来裸眼真三维显示技术”，廖洪恩说，“这项真三维立体影像的研究涉及到多学科技术的碰撞与交叉，虽然困难重重，但是边往前走边学习，遇到不懂的就学，就像自己当初从生物力学转向医用精密机械一样，一点点奋力向前开拓”。

近年来，廖洪恩带领团队在立体图像显示领域再次取得重要突破，成功研发出世界最长显示距离的动态立体显像装置，立体图像可以“跃出”屏幕6米，刷新了裸眼立体显示距离的世界记录。同时，他所主持的真三维空间透视融合导航项目在研究、临床与转化方面都得到深入开展，其中融合三维医学影像的立体空间透视导航技术在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方面都有显著的成果。

廖洪恩以项目主持人的名义获得国内外30余项重要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并在近年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字诊疗装备研发”重点专项等多个国家重大、重点项目。在包括IEEE Trans系列、Nature Photonics、Theranostics、MedIA等发表了250余篇国际期刊和学会论文，合著和编辑专业书籍13部，专利50余项。曾获得国际医学生物工程联合会颁发的IFMBE青年学者奖、日本文部科学大臣表彰、爱立信青年科学家奖等十余项国际/地区性奖项。2015年获得“中国医疗工业发展与创新大奖——最佳

医学发明创造奖”，并获得“发明家”荣誉称号。2017年完成的“空间透视融合导航”科研项目荣获第十一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金奖；同年，其团队的“立体空间透视融合微创导航系统”项目获得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最高科技奖“黄家驷生物医学工程奖”。

廖洪恩带领团队开发的三维影像显示系统已在国内外多家医疗机构中开展了神经外科、骨科等多领域的临床试验与评估，并取得良好的临床应用结果。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我国在微创诊疗与三维影像方面技术的发展，在许多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中，为诊疗精度的提高与后发症状的减少提供了技术保障。

廖洪恩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近年应邀担任医学影像和微创诊疗领域等多个主流国际会议 MICCAI、MIAR、ACCAS 的大会主席、程序委员会主席、组委会主席，以及包括生物医学工程领域顶级国际会议 IEEE EMBC 以及十几个国际期刊和会议论文集的副编辑、编委，受邀担任荷兰、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多个科研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和评审员。

“希望有一天我们医院里用的高端医疗设备更多地来自中国智造，希望中国人的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廖洪恩在2018年6月17日做客央视《对话》栏目时，将“医疗智造”作为关键词，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国未来医疗事业的期望与愿景。

从科技少年到医疗发明领航者

廖洪恩从小就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钻研，总是要带着问题去研究身边的种种事物。比如，学了昆虫的复眼与相关的仿生学知识后，他就去学习照相技术，探究多视点成像的原理。优异的成绩和对科技的浓厚兴趣让廖洪恩在学业方面表现突出，1991年，17岁的廖洪恩顺利考入北京大学生物力学专业。受到母亲与外祖父从事医疗行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选择了医疗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方向。

“我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选择出国留学的，当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憧憬，所以当留学的机会出现时，我选择了出去看一看。”廖洪恩分享了自己选择走出国门留学深造的理由。能有机会走出国门接触不同的环境、学习更多的知识，这是祖国给廖洪恩提供的宝贵机会，他没有辜负这份机遇。

他选择了东京大学的医用精密机械专业进行深造，跨学科的学习并非易事，面对全新的专业，几乎是从零开始。留学期间，他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工作到午夜12点，廖洪恩像一块海绵，努力吸收着知识。2003年，廖洪恩顺利获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在担任日本学术振兴学会特别研究员之后，2004年又获东京大学教职，2006年还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客座研究员。在这期间，廖洪恩研发出世界上首次实现微创手术治疗的立体空间透视导航，系列成果被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并在德国汉诺威世界博览会、日本科学未来馆等十几家展览会和博物馆展出。

不忘初心 医疗智造

学有所成报效祖国，是廖洪恩矢志不渝的目标。为此，已在海外功成名就的廖洪恩决心回到祖国，为中国的医疗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归国后的廖洪恩，积极践行着自己的目标。他认为，中国人的健康应当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国高端医疗装备及技术大多都源于国外。廖洪恩清楚地意识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真正的博弈，除了产品与技术的竞争，最重要的还有人才的竞争，只有培养出中国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才是祖国持续发展的关键。

回国后，忙，对于廖洪恩来说成为了常态。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生物医学工程系副系主任、清华大学侨联副主席、国家特聘专家、国际医学生物工程联合会亚太区秘书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对于廖洪恩来说，身兼数职也就意

味着更多的责任与使命。这意味着，在学校放假期间，当别人在休闲放松时，他却要为科学研究、学科发展及社会服务而不停奔忙。

廖洪恩全职加入清华大学后，将自己多年来的成果与积淀毫无保留地传递，培养了多名获得“北京市优秀毕业生”、“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清华大学优秀学位论文”等称号的青年学子，并在承担副系主任与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过程中积极栽培优秀青年科研人员与学科团队，两次获得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廖洪恩获“中国侨界贡献奖”一等奖

像很多归侨，廖洪恩长年致力于公益事业，广泛参与公益科普活动。他受新华网聘请担任《科普中国—科技前沿大师谈》栏目专家委员会委员，同时作为公益性讲坛“CC讲坛”的主讲嘉宾，向大众深入浅出的普及高精尖科技知识，鼓励更多人一起参与改变世界的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的创造与传播。

2018年，廖洪恩受邀作为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嘉宾，通过讲述自己的海归故事与中国梦，勉励新一代年轻人不忘初心，逐梦前行。谈到自己预想的人生目标时，廖洪恩表示自己“没有走偏”，一直沿着自己感兴趣的道路前行。在被问到作为归侨的初心时，廖洪恩再次提到了自己“高端医疗中国智造”的梦想——“目前我国用到的许多高端医疗装备仍需进口，希望终于有一天，我国医疗健康领域的关键技术与装备都能拥有自主产权，来自中国智造！”

（作者：李倩雨）



陶庆华，男，1961年生，新加坡归侨，华夏国际人才研究院院长，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第六届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

揽天下英才 展报国之志

——记华夏国际人才研究院院长陶庆华

“近代以来，留学运动之所以浪潮澎湃，一代代青年学子之所以前赴后继，负笈海外上下求索，其主题和目标就是‘索我理想之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初心和使命就是留学报国。”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的一篇文章《把青春融入中国梦》中如是写道。

这篇文章的作者——一位从新加坡回来的归侨，毕其一生为侨务事

业而奔走，积极为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服务，坚持改善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环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国际化人才支撑。他就是陶庆华，揽天下英才而助之，为他们学成后归来报国开垦出一片平坦之途，让海外人才皆有报国之门。

陶庆华，现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华夏国际人才研究院院长、北京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在首都新侨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多次被授予“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首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作为著名的国际人力资源专家、国际人才研究的学术带头人，陶庆华在国际人才、新侨和留学人员工作理论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积极为国家特聘专家计划的实施和改善华人华侨回国创新创业环境建言献策。

荣誉等身，宏论盖世，陶庆华的事迹令人敬佩。多年来，他不仅热心新侨事业，协助有关部门解决新侨实际困难，更为海外人才创新创业而奔走呼告，为海外引才引智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堪称“海外人才‘民间智库’的探索者”。

海外求学：青春浩气走天涯

1979年，他从家乡江苏盐城考入哈尔滨工程大学，成为了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来的“新老三届”大学生。1985年，陶庆华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自动控制专业。在这座美丽的北国城市里，陶庆华读完大学本科，还拿到了硕士学位。1988年，又被派往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我在英国学了4年，毕业时，正值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不久，国内正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当时，我就想，随着国内的进一步开放，中国经济必将越来越国际化。届时，国内必然需要大批熟悉各种国际惯例的高级人才，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陶庆华回忆道。留学期间，他切身体验了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制度，了解一些国际

企业、大学及政府部门的运作惯例。

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毕业后的陶庆华没有选择留在英国，也没有去北美，而是选择了弹丸之地新加坡。

“之所以选择去新加坡，主要是考虑那里东西方交汇的文化氛围和特殊的发展道路。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亚洲国家，但在李光耀等人的努力下，完全建立了现代市场经济，成为东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的发展道路，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得到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做法，都直接借鉴了新加坡当年的经验。”

到新加坡后的十多年，陶庆华开始了多年的高校教学科研、高科技产业管理生涯，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研究及投资管理经验，还结识了许多志趣相同的各界朋友，这一切都为他后来归国创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赤子丹心：学成归来报国家

进入21世纪后，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海外侨胞的心魂。陶庆华强烈意识到，此际归国或能为国家的发展繁荣尽一份绵薄之力。2004年，他决意从新加坡回到首都北京寻求创业。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要求，着眼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人才保障。党和国家为了充分挖掘海外学子这一巨大人才宝藏，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大力吸引他们归国创新创业。然而，当时国内研究国际人才的专家学者却寥寥无几，陶庆华凭借在国外多年从事学习研究和管理工作经历，应邀担任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海外人才战略研究组副组长，也因此在国际人才研究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在开展海外人才研究的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国内的人才工作仍大有可为，国际人才研究更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亲身经历了英国、新

加坡、德国等发达国家吸引人才的过程，他更加认识到中国参与全球人才竞争的战略意义。

人生有时需要转身，如果说陶庆华的第一次转身是放弃了在新加坡成功的事业与优裕的生活，那么他的第二次转身便是从一个“工科男”转变成为国际人力资源专家。

建功立业：揽天下英才而助之

2004年，陶庆华协助北京市侨联成立了全国侨界第一家留学人员组织“北京市侨联归国留学人员联合会（留联会）”，为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搭平台、创机会，促成大批留学人员在京津冀区域创新创业。2007年当选市侨联副主席，就拓展海外工作和新侨工作，改善华侨华人回国创新创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向北京市和国家建言献策，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党和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感召和激励下，十八大以来，中国迎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



陶庆华在欧美同学会第八届年会暨海归创新创业济南峰会上接受采访

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较2012年增长14.49万人，归国总人数43.25万人，较2012年增长15.96万人。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由2012年的72.38%增长到2016年的82.23%，吹响了建功立业新时代的“集结号”。

与时代共舞，与辉煌同行。幸逢人才发展的黄金岁月，陶庆华也不

负时代重托，他应邀参加了全国各地的多个大型研究课题，连续多年参与国家特聘专家评审工作，积极为国家特聘专家计划的实施、国家及有关省市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环境建言献策；主持编辑了《人才竞争》、《海归情中国梦》、《大国侨都》等书籍；他撰写的《人才制度优势从何而来》、《以互联网思维会集网络英才》、《“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等文章在中国人才杂志、光明日报等发表；他连续多年参与侨务工作理论研究，撰写的研究报告连续多年在市委统战部理论与调查研究成果评比中获奖。为了更加系统、更高质量地开展国际人才研究，2012年陶庆华牵头创办了华夏国际人才研究院，发掘留学人员特别是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智力优势，为国家及区域人才发展提供决策咨询和信息服务。

2013年，陶庆华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为北京市实施积分落户制度、华侨华人来京创新创业合法权益保障、北京人才发展促进立法、提高困难老侨生活补贴标准等积极建言献策，至今已向市人大提交关于华侨华人、海外人才工作等百余份议案建议，为完善人才创新创业环境竭诚尽智，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竭诚心愿：侨之梦筑中国梦

百年风云，百年激荡。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海外学子，始终与民族共患难，与国家共命运，为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独特而重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亦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人才智力优势，积极创新创业创造；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投身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所带来的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文化流，如长江之水，挡也挡不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

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华侨华人一直是中国人才队伍的重要来源，也是推动中外交流、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他们继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砥砺奋进新征程，建功立业新时代，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独特、不可替代的贡献。

青春浩气走天涯，学成归来报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最大同心圆，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努力使自己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材，让青春之光闪耀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道路上”。陶庆华一直与广大海外学子共勉，同筑侨之梦，共圆中国梦。

（作者：姜桐桐）



王辉耀，男，1958年生，加拿大归侨，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第三届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获奖者。

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 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

——记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

“他秉持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献策，致力于为更多海归搭建互通平台。他著作等身，不论高居庙堂还是站在三尺讲台，他始终心怀家国天下”这是2018年十大品牌年度人物暨中国品牌40年40人颁奖盛典对

王辉耀的评价。

他曾入选过“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榜单，被评为“2016—2017年度十大中国管理价值年度人物”，2018年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年度人物，被中国青年网评为“中国智库建设40人”，在2019年被品牌中国评为“中国品牌70年70人”，在中国留交会上被评为“中国海归70年70人”……

诸多的成就令我们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是全球化建设者，在2008年与苗绿博士创办的全球化智库已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社会智库，是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他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在多所高校通过授课传递全球化的思想，教育大学生如何更好成就开放式人生；他也是一名慈善家，积极举办国际论坛，热心慈善，关心大学生成长，为母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连续二十年不间断颁发奖学金，鼓励优秀大学生学业进步。

命运不是机遇，而是一种选择

1958年，王辉耀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父母均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为琅琊王氏后裔，王氏家族宋代出了16个进士，父亲当年也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坦赞铁路援建工作，回来教育儿子具有国际化眼光。母亲先祖欧阳厚均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被称为“近代湖湘文化的开启者”，执掌岳麓书院27年，亲授弟子中不乏赫赫名气的曾国藩、左宗棠。母亲非常注重他和弟弟的教育。母亲深知教育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完善、未来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便选择更容易照顾儿子的工作，放弃了专业的追求，选择回家陪伴孩子学习成长，并且订阅报刊，教会他们读书。在那个动荡年代，书籍成为王辉耀的精神支柱，像朋友一样一直陪伴着他长大。

1976年，刚刚中学毕业的王辉耀被下放到四川省一个条件十分艰苦的乡村。这里的艰苦生活令王辉耀苦恼过，也失望过，但并不因此而

颓废，自幼养成的读书习惯使他劳动生活逐渐充实起来。干完农活无论多累，他总要抽时间看书，每周都去公社领取免费订阅的报刊，有时甚至连夜走30里山路去换书。

在1977年10月份他迎来了重新高考的消息，决定报考自己优势专业后，他开始加倍地复习。终于在1978年，他成为了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被录取到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专业，与国际化结缘。

在1982年大学毕业之际王辉耀来到了北京，被分配到了经贸部工作。刚开始的工作对于他来说并不顺利，他只能做一些抄抄写写的杂活。得到了这一份工作后，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他利用一切时间强化业务知识，学得越多，就越感到不满足，更加想学。通过强化学习，他比大多数中国人更有机会了解世界尤其是西方经济的面貌和走势。

他敢于抓住机遇，就像他在他的书中所提到的“命运不是机遇，而是选择”。他相信事在人为，相信努力终有回报，正是这样的他，在面临人生中一个又一个选择中，终能做出不悔决定。

踏上国际平台，来自红色中国的“陌生人”

在对外经贸部的工作中，王辉耀也越来越清晰自己未来发展道路。“那时我觉得，中国肯定要走国际化这条路，必定需要了解国际贸易运作的专业人才，我想应该到国外看看，以便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或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成大气候。”

1984年，他选择出国去攻读MBA，成了加拿大最早读MBA的大陆留学生之一。在加拿大读书期间王辉耀感到十分无奈，很多西方人对待中国都戴着有色眼镜、理解偏差很大，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他举办了讲座，主动介绍中国，很多同学都更加了解了中国文化。

王辉耀在校时他专心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同时也注重知识在实践里的运用。“不想浪费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和任何一点时间”，了解到加拿大公司非常看重个人的经历，他需要在同样的时间内迅速积累个人的资

历。在暑假来临时，他开始积极寻找暑假工来积累经验、提高自身资质。通过他的努力，毕业时，丰富的资历为他进入了国际十大工程咨询公司之一的SNC-Lavalin公司奠定了基础。工作刚六个月，王辉耀就被提升为国际市场部经理，一年后升为董事总经理，如此迅疾的上升速度在这种国际级的大公司中是非常少见的。

1990年初，王辉耀应聘加拿大魁北克的首席商务经济代表，经历了激烈的竞争后，最终应聘成功。在中国和加拿大学习和工作的这些年，王辉耀接受了不同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的培养，掌握了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打交道的能力，这促进了他全球化思想的形成。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让他能够为后来中国全球化发展提出切身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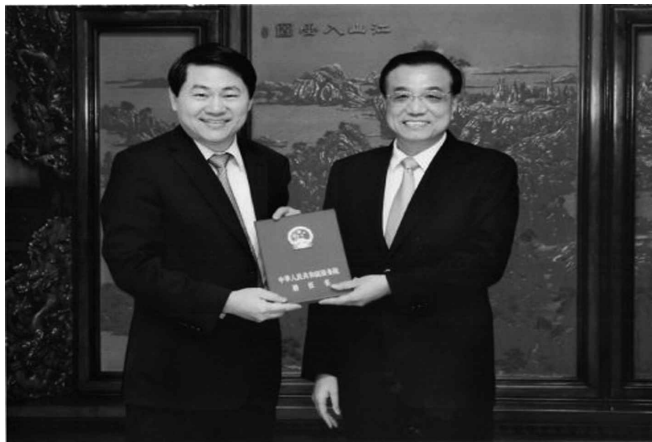
“海归”代言人

1999年，凤凰卫视对海归王辉耀的一个访谈节目，提及“海归”这个词，他说“海归”就是“海外归来”的意思。20世纪90年代，王辉耀回国不久就加入了欧美同学会，想通过这个中国留学人员最大的平台汇聚更多志同道合之人，推动中国海归事业。2002年，他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担任国际商务教授之余，他提议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为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归群体中的商务精英搭建一个平台，王辉耀被推举为商会的首任创始会长，开辟了中国欧美同学会办会的新模式。在商会的基础上，他和田溯宁、王波明、李山、汤敏等又组织创办了高端海归的精英组织“2005委员会”。

“海归回国以前带回来的是技术，之后是模式，现在则带回来的是理念和创新模式。”他谈到，希望更多的优秀海归人才安心回国助力国家的发展。他还担任了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和欧美同学会总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为欧美同学会和中国海归群体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发展大环境提供了一个融汇各国智慧、提供政策建言、联络国际交流、深化中外合作的平台，为中国的留学和海归事业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创办智库 咨政启民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口号深深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他想到自己的经历不就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缩影吗？回首穿梭于东西方的这几十年，他深刻感受到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个国家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硬实力，同样需要智库等软实力。其实早在留学期间他就一直有建立民间智库的想法，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影响力可以上达国家政策、国家格局，下触及到百姓民生，他觉得他还可以为国家再做一些事情，就在这一年他和苗绿博士创办全球化智库，致力于中国全球化战略。



李克强总理向王辉耀颁发国务院参事聘书

他创办的全球化智库成立十多年来，始终以中国与全球化事业为己任，立足于人才国际化、中国企业国际化、全球治理以及国际关系等领域的扎实研究，首创国际人才、企业国际化系列蓝皮书，连续多

年在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等社科院蓝皮书，奠定了智库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影响社会大众，推动舆论共识。

智库要成为有决策影响力的研究机构，需要在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提供独立、专业、可操作和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2008年，作为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国际人才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王辉耀参与了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起草工作。2017年，CCG提交的《关于成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得到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和王沪宁、栗战书等中央领导的批示。近年来，CCG在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中美关系、一带一路等领域多篇建言得到中央领导批示。通过国家课题、政策报告、建言献策等方式，CCG影响和推动着政府相关决策与制度创新。CCG成立十多年来，得到了国内外权威机构的高度认可。目前，CCG是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财政部“美国研究智库联盟”创始理事单位，拥有国家颁发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是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所在地，CCG也是被联合国授予“特别咨商地位”的唯一中国智库。

在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多变的当下，社会智库以独立第三方身份可以很好的担当“民间外交使者”，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话的第二轨道。王辉耀带领CCG率先“走出去”，积极进行着中外之间二轨交流机制的有益探索。历时十年，他们的足迹遍布全球许多国家。为中国与世界的民间交流与二轨外交开辟了一片新天地，通过探索构建共赢合作的中美关系，在全球治理中发出中国智库的声音。在当今纷繁芜杂的国内外政经脉络下，塑造出一个国际化社会智库所能扮演的最积极和最有效的角色。

开放合作是这个时代宝贵而又稀缺的精神，王辉耀用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为中国国际化建设提供良策，为实现伟大复兴梦做出了巨大奉献！

（作者：杨春炜）



王琳达，女，1954 年生，香港同胞，怡海社区侨联主席、全国“侨之家”建设典型。

三重身份 一颗红心

——记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琳达

有这样一位侨商代表，她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四次荣获我国政府最高规格的慈善奖项“中华慈善奖”，爱心足迹遍布海内外，累计公益慈善支出数亿元。23年来，她致力于推动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致力于把教育资源引入社区，成为将教育与地产结合的第一人，被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为“王妈妈”。她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各大重要会议上，作为“王

委员”向公众传达着侨商的态度，发出时代的声音。作为孩子们的王妈妈、怡海集团的王董事、中国侨联的王委员，王琳达用同样的真心承担起了三重身份下的不同责任。

用“恒心”做教育 用“爱心”做慈善

1992年，参加了北京第一届香港招商会后，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琳达决定来北京投资地产。在克服了恶劣条件后，房子终于建成。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

怡海花园当时位置偏远，周边缺少配套的教育资源。孩子上学的问题成了一块大石头，压在王琳达心头。“我都不知道让我自己的孩子去哪里上学”，王琳达在后来的采访中这样跟记者讲道。丰台区委书记告诉王琳达，政府批下一所学校最少得三五年时间，即便到时候批下来，可能也只是一所农村学校。

“怎么样让孩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教育？”王琳达萌生了自己办学的念头。

然而发展民办教育并不是件易事。在丰台区委区政府和北京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王琳达经过不懈的努力，北京八中怡海分校和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怡海分校最终落户怡海花园。这一创举开创了民办教育、教育社区模式的先河。

王琳达没有止步于此。为了办好教育，她远赴美国、英国、日本等地的十几所名校去读书“充电”，学习国外优秀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并向国内教育专家、一线教育工作者请教，以“确定人才如何培养”。

这份爱心与热情也被投入到了慈善事业上。在四川地震灾区的北川中学，有一座王琳达出资捐建的“怡海楼”。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王琳达带领怡海集团参与北川中学的援建工作。从学校的设计、施工到落成，她全程参与。为了帮助重建的北川中学提高教学质量，2009年至2015年，怡海和北京市西城教委共同派遣6批教师，73人次赴北川

支教。北川中学教学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2015年1月5日，王琳达同怡海公益会基金会秘书长王敬等4人，代表怡海教育集团前往北川中学进行慰问。在看望支教老师带的高中师生时，一阵阵“王妈妈”的呼声打破了校园的安静，学生们簇拥着王琳达，亲切交流汇报了学习成绩和心得。

王琳达之后向记者透露，在20多年办教育的过程中，她最喜欢的称呼就是“王妈妈”。对于王琳达而言，她在做的是一件可能长时间都不见效果但利国利民的事情，然而“这正是基础教育的魅力所在，也是每一个教育人值得尊敬之处”。

“我随改革开放一路走来”

作为最早进入内地的侨资企业之一，谈及当初来中国内地投资，王琳达这样说：“不能说我自己多有眼光，我只是赶上了好时候。”

1989年6月12日，王琳达带领怡海从香港进入内地，开始开发怡海广州世界贸易中心。半年后，怡海进入深圳特区投资建设。1992年底，王琳达应邀参加首届京港洽谈会，成为第一批在京投资的侨资企业代表，着手开发怡海花园住宅项目。

初到北京创业时的情景，王琳达仍记忆犹新。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三环路刚刚启动建设，而怡海花园项目远在南四环边上，当时还是一片旷野荒郊和废弃垃圾场，目之所及只有3个大沙坑。不到4个月，原本跟她一起踌躇满志要搞开发的4个股东全“吓跑了”，但王琳达坚持了下来，让“怡海”成为了一个口碑品牌，成为北京市幸福指数最高的社区。

亲历中国发展，王琳达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完善，尤其是十八大以来，良好的政治生态让政商关系越发清朗。回望在内地发展的这三十年，王琳达说：“必须要爱国，对国家要有信心。”

怡海集团成立31年来，始终紧跟中国发展潮流，与改革开放的步

伐相随，坚守社会担当。在发展自身业务的同时，怡海集团主动为政府分忧，安排下岗职工就业，积极纳税。从2000年至今，公司综合纳税率在丰台区一直名列前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王琳达带领集团第一时间成立了“怡海集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集团与北京侨商会共同策划组织了“石榴行动”，筹集到大量防疫物资，为疫区人民雪中送炭。新发地疫情出现后，王琳达更是不惜投入经费对怡海物业员工、超市员工、商业街工作人员等400余人进行了全覆盖核酸检测，为怡海社区筑起一道防护网。

此外，怡海集团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践行者。

2013年12月，王琳达开始带队到中东欧各国考察。5年里，她33次走进中东欧，并建立起以塞尔维亚为核心辐射周边各国的合作模式。2016年，怡海集团出资捐建了塞尔维亚乌日策幼儿园，被当地政府命名为“怡海—王妈妈”幼儿园；2018年，怡海集团促成中国哈尔滨与塞尔维亚乌日策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开启了双方常态化、机制化交流先河……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怡海集团起源于香港、奠基在深圳、深耕于北京。”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参与者、受益者，王琳达表示：“国家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中国改革开放共同成长的这段岁月里，怡海以发展教育社区为核心，兴办教育，关注交通，努力保障和改善社区民生。在首都改革发展的新长征路上，怡海也将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为构建和谐社区，为推动和谐北京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国之所需，“侨”之所向

不同时期的侨的身份有着不同的意义，但相同的是，总会有一部分人走在人群前端，引领方向。作为优秀的侨资企业家，王琳达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上胸怀大爱，在践行一带一路、推动华文教育、讲好侨商故

事等方面，为华人树立了好的榜样。

作为新时期侨商的代表，王琳达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着自己和广大侨胞们跟党走决心和信心。



2018年，王琳达作为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出席了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十周年座谈会。会后，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王琳达表示：“侨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紧跟

时代发展步伐，顺应经济形势，享受企业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在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发挥着先锋引领作用。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侨商应把自身事业与民族复兴大业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抓住发展新机遇，自主创新转型升级的同时，也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成为‘一带一路’的推动者、参与者、建设者，为国家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除了发展自身事业外，王琳达认为，侨商有责任、有能力凭借自身的优势，把真实的中国推介给世界，让中国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多一些理解和帮助，少一些误读和猜疑。

2018年9月1日上午，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王琳达再次当选中国侨联常委。她激动地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做好侨联工作，坚持‘五个不忘’，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为广大侨联干部作出表率，尽职尽责，尽己所能，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国与海外在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凝聚侨心、侨力，为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重身份，一颗红心。面对新的考验，王琳达仍在坚定地做着时代的践行者。

（作者：佘欣阳）



王璞，男，1965年生，英国归侨，北京工业大学激光工程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侨联归国留学人员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玉汝于成 激流逐光

——记北京工业大学激光工程研究院博导王璞

1965年，王璞出生在山东，父母期望他能温润如玉。如今，这枚璞玉，玉汝于成，逐渐在激光技术领域散发出璀璨的光芒，在新型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光纤放大器等方向上不断钻研，取得了令国际瞩目的累累硕果。他，就是王璞。

缘起晶体 “激” 流逐 “光”

激光是20世纪以来，继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之后，人类科学史上的又一重大发明，被称为“最快的刀”、“最准的尺”和“最亮的光”。激光科学技术的兴起使人类对光的认识和利用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如今，激光制造技术深入各个应用领域，从大型的机械设备到引领时尚的智能手机，都离不开它的身影。

1986年，王璞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考入本校晶体材料研究所凝聚态物理专业，1991年获硕士学位。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习凝聚态物理专业，研究方向是晶体材料的生长和性能研究。

山东大学晶体材料研究所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晶体材料的重要基地，科研实力雄厚，这为王璞的学习和科研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环境。他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专注于激光晶体和非线性晶体生长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错成绩，并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开展了一系列合作研究。1996年，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Jim Piper教授到清华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他和他带领的团队正在做一项关于半导体泵浦固体激光器的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生长晶体材料。教授了解到王璞在晶体材料生长方面有着扎实的研究基础后，当即询问他是否有意愿到澳大利亚进行学习深造。出于对自己专业发展的考虑，王璞毫不犹豫地把握住留学机会，于1996年4月进入麦考瑞大学激光与应用中心攻读博士学位。

博士学习后，王璞的主要研究任务是为半导体泵浦固体激光器研制生长一种所需的晶体材料。他发现，半导体泵浦固体激光器这项研究在国外属于新兴领域，有着良好的发展趋势。研制过程中，有一项重要任务是使激光晶体出光，这项任务最初由麦考瑞大学激光与应用中心的其他研究人员负责，但是他们却遇到不小的阻碍。尝试多种方法却仍未能实现激光晶体出光后，这些研究人员有了放弃的念头，不再坚持进实验室。面对不利情形，王璞结合自己的专业所长进行分析后，认为可以

在晶体材料上做些尝试。在无人协助和指导的情况下，他一边积极准备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一边着手搭建起了另外一套实验平台，凭借自己在晶体材料方面所做的积累，开始了一步步的摸索。经过夜以继日的反复实验后，他终于使半导体泵浦固体激光器成功实现了激光输出。

这次实验的成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半导体泵浦 Yb: YAB 晶体的高效红外及自倍频绿光输出。王璞也因为专业研究上的出色表现，获得一份全额奖学金。1998 年博士毕业前夕，他代表麦考瑞大学参加澳大利亚物理协会组织的博士生论文课题竞赛，这项研究成果最终荣获“优秀学生一等奖”，并引起很大轰动。澳大利亚最大的全国性报纸《Australian》、英国的老牌杂志《New Scientists》等媒体对王璞的研究成果争相报道。

2000 年，王璞取得博士学位后，选择到澳大利亚北方电信公司工作。这家总部设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高科技公司，是全球电信行业的一个标杆，曾有光通信领域“旗舰”之誉。20 世纪 90 年代，他们研发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高速光纤传输技术。王璞深入到光纤通信领域继续扎根，然而随着 2000 年后高科技泡沫的破灭，通信设备市场萎缩，这给通信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下，王璞面临着重要抉择，是回国，还是留在国外继续深造？

别澳赴英 求取“真经”

在澳大利亚留学的 7 年里，王璞时刻关注着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发展动态，并不断思考、探索着自己未来长远的发展方向。在他的内心中，一直有一个想法——掌握国际顶尖的技术，取得“真经”。于是，王璞仔细分析整个光纤通信行业的发展背景后，选择继续求取“真经”之路——赴英求学，继续深造。

在光缆网络已经遍布世界各地的前提下，光纤通信成为“信息高速公路”的重要支柱。通过大量阅读具有行业前沿的科学杂志，王璞发现，光纤激光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这种激光器不但可以应用于激光

光纤通信、激光空间远距离通信，还可以应用于工业造船、汽车制造、激光雕刻、激光切割、印刷制辊、金属、非金属钻孔/切割/焊接、医疗器械仪器设备、大型基础建设等。他还注意到，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已成为国际上的研究热点。

其中，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光电子研究中心的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的研究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因此，为了深入了解和掌握光纤激光器的前沿技术，王璞决定到这一世界著名的光电子研究机构“取经”。凭借自己在激光和光纤领域的科研经历，王璞于2002年8月进入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光电子研究中心，开始了对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光纤放大器以及光纤超荧光光源等新型高功率光纤激光源的研究。

从2002年至2009年，王璞参与了光电子研究中心的多个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目睹了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由几百瓦功率发展到数千瓦，直至上万瓦的研究过程。在这7年中，他在高功率光纤激光器、高功率光纤超荧光光源等研究方向进行了多项技术探索，主要包括：新型特种掺杂光纤的设计与制备、新型高功率光纤激光组束技术、新型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光纤耦合技术，光纤中非线性光学效应的抑制与应用等，并在“高功率大模场双包层螺旋芯光纤激光器”“高功率多芯缎带光纤激光器”“高功率光纤超荧光光源”等前沿研究课题中，取得世界领先的创新性研究成果。通过这些研究，他逐渐掌握了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研究的部分核心和关键技术。

从留学澳洲到远赴英伦，从专注晶体激光器研究到掌握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研究的部分关键技术，王璞在探寻接触光学领域的尖端技术之路上不停行走。在对激光技术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中，他找到了自己长远的发展方向。

玉汝于成 助力兴国

从国内到澳大利亚再到英国，王璞曾变换研究方向，但他让自己始终处于光学研究方向的最前沿。他说，在专注自己的研究方向之时，还

要环顾四周，密切注意大的学科领域下其他专业的发展动向，这样才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也能够保证自己随时处在研究方向的前沿。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还要有适合自己的舞台。于是，王璞把这个舞台定在国内。

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光电子研究中心工作7年后，他回到国内。中科院物理所、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多个科研单位对他发出邀请，2009年11月，王璞作为北京市特聘教授正式加入北京工业大学激光工程研究院。



在对光纤激光器研究前沿的关注中，他注意到，超短脉冲光纤激光器因为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光束质量好、电光转换效率高、激光性能稳定以及维护成本低等特点，已逐步在激光医疗、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领域获得了广

泛应用，并且也成为研究院所、企业单位研究开发的热点。在欧美等国家，部分工业用超短脉冲光纤激光器已经产品化。因为受到西方国家的禁运，那些具有高平均功率、高重复功率输出的高尖端产品，而不能满足需求，所以，开展高功率超短脉冲光纤激光器及其应用系统的研究，实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功率激光器的国产化，对我国国防建设、工业制造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虽然高功率超短脉冲光纤激光器这项研究有着更大的研究价值，但它对技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找到突破口，王璞以石墨烯为研究基础，将之与光纤激光器进行结合，开展了石墨烯锁模光纤激光器的研究工作。经过一个阶段的反复试验后，他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碳化硅衬底外延石墨烯锁模的光纤激光器，并用石墨烯复合物薄膜锁模器件获得

高能量脉冲输出，在2011年美国 and 欧洲CLEO会议上，他对这两项研究成果作了口头报告。

核心材料、核心器件和核心技术是民族工业长远发展之基。王璞特别强调：“我国制造业整体升级，追根溯源，要从基础材料、核心器件和生产工艺上真正实现升级，这方面核心能力必须牢牢攥在中国人手里！”

（作者：张鉴之）



王跃驹，男，1972年生，美国归侨，北京睿诚海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第八届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

赤子之心 回国立业

——记北京睿诚海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跃驹

1998年，他前往美国求学，之后一直在植物分子生物学领域做研究，并获得诸多荣誉。2015年，他被美国东北州立大学授予终身教授职位。本可以在美国风顺顺水地从事教育工作，但他却在2017年毅然回国。原因是想要打破生物制药价格被垄断的局面，研发出中国制造的生物制药，让生物制药的价格降低，使老百姓都能够用上现在用不起的药，让自己的所学能够为祖国发展做出贡献。他，就是王跃驹。

刻苦奋斗，一心投入生物制药

王跃驹博士是北京睿诚海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1998年前往美国求学，之后一直在植物分子生物学领域做研究。在美国求学期间，王跃驹博士整天扎根在实验室，十分勤奋，由于导师对学生要求极高，项目进程也十分紧迫，王跃驹经常没有时间休息，“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12点是常有的事，做一顿饭经常能够坚持吃上一个星期，非常累。”这种忙碌和劳累一直延续到了王跃驹2004年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2006年到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等世界级名校进行博士后研究。也正是由于他不分昼夜、一刻不停地刻苦与奋斗，2013年，王跃驹博士获得了东北州立大学最佳科研奖，同时，他也是该校成立150年来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华人教授；2015年，他被东北州立大学授予终身教授职位。2016年，学校为了表彰他，还专门设立了“焦点教授”奖项；2017年，王跃驹博士又获得了模范教师奖，他是第一也是唯一同时拥有最佳科研奖和模范教师称号的教授。

在海外的一切都非常顺利，但就在2017年，王跃驹博士却毅然放弃了其在美国的终身教职，选择回国创业，建立了睿诚海汇。

北京睿诚海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植物分子医药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的高新技术创新型企业。公司基于植物平台技术，专注于无动物源、安全、廉价的重组蛋白和多肽产品开发，是一家由世界顶级科研团队与国内顶尖资本方合作创立的企业。自回国以来，王跃驹博士带领团队日夜不停地研发，如今已经申请了近40多项专利，其中包括多项世界专利。其中，王跃驹博士团队研发的植物反应器技术——植物瞬时表达技术平台，利用生菜来生产各种蛋白药物，包括医治肿瘤的特效药—单克隆抗体PD-1，PDL-1以及像白蛋白、八因子这样的血液制品等，这种从生菜里生产出的蛋白药物，既安全又绿色环保，产量也十分可观。另外，还大大缩短了研发周期，仅耗时四到七天就可以生产

出产品，该技术还有望大幅度降低一些治疗重大疾病药物的价格，很有可能会给整个生物制药行业带来一场革新。

在技术研发期间，为了尽快推动公司及技术走上正轨，王跃驹博士及其团队成员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一个月连休息一天都变成一种奢侈。有人说，“王教授7月8日回国，当天就进实验室，凌晨三点才回家。当时实验室刚建立，办公室没有空调，王教授差点中暑。”对此，王跃驹表示：“我们可以让老百姓用上现在用不起的药，我们做的事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巨大的市场价值，值得我们去奋斗。”除了医药板块，王跃驹博士的团队还在陆续拓展工业原料和试剂、健康用品、技术服务和精准医疗等方面的业务。对于未来的规划，他打算以北京为研发中心，以济南为产业化基地，还计划以旧金山为海外业务基点，将中国技术推广到全球。

毅然回国，坚持做利国利民的事

在获得终身教职后，王跃驹本可以在美国顺风顺水地从事教育工作，但他却在2017年毅然选择了回国。当时，身在美国的王跃驹博士看到国内生物医药的产能非常低，因为国际垄断，国内生物产能还不到韩国7%，不到美国的1.5%。中国老百姓用不起好药，尤其是生物药，这让王跃驹十分揪心。因此，他下定决心辞去美国终身教授职位，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带领团队回国创业。他说：“我的目的就是利用多年研发的植物反应器核心技术去打破国际生物巨头对中国的垄断，减轻国家医保负担，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用上生物药。”

1994年从山东农业大学毕业之后，王跃驹考取了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的研究生项目。这打开了王跃驹的眼界，使他加深了对国际学术前沿信息的了解，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国际生物技术研究领域的前沿，也是在这时，他有了前往美国求学的念头。2000年前后，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而美国大学的互联网行业已经非常发达

了。美国高校为中外学生提供了免费上网、免费打印和复印资料等优质的学习条件和服务，先进的教学和科研设施设备也为王跃驹博士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助推作用。

21 世纪可以说是一个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不断发展到新高度的时代，在过去的 20 年里，生物制药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近年来国家推出系列医疗改革，对整个医药产业的竞争格局以及产业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药企竞争也将由



原来的销售为王，变成以创新、质量和成本为核心竞争力。北京睿诚海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把握机会，走向成功。当前中国具备巨大的市场潜力，国际重磅生物药专利到期，大量的海归人才回流以及中国日益强大的资本助力都为我国生物制药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也是睿诚海汇获得成功的一大时代原因。

睿诚海汇的植物瞬时表达技术在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利用植物系统生产疫苗为产品，一旦疫情大规模爆发即可作为国家战略性产品抵御疫情。因为产业化容易，生产速度快，4 天就可以表达，2-3 天纯化，7 天就可以生产蛋白。2020 年 3 月，iBio 宣布将与北京睿诚海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公司的植物瞬时系统已被用于生产埃博拉病毒和登革热病毒的候选抗体。

不忘初心，用赤诚之心规划未来

回想起创建睿诚海汇的初衷，王跃驹在接受采访时说到：“当时我们创业的初衷是生产让老百姓用得起的生物药，做利国利民的事……我

一直认为科研人员不应该只做研发，因为做研发只是满足于自己，应该让研发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这才是有意义的事情。我回来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现在总是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早回来。我一直很想回来，因为国家总是在进步，每天都有奇迹发生，所以我希望海外学子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否则你们将错过见证国家发展的每一步。”当初回国，王跃驹就是想要打破生物制药价格被垄断的局面，想要研发出中国制造的生物制药，让生物制药的价格降低，使老百姓都能够用上现在用不起的药，让自己的所学能够为祖国发展做出贡献。

睿诚海汇正在计划利用植物瞬时表达技术平台生产药用蛋白的竞争优势和独特性来生产国家和社会急需的产品，做出这样计划的背后，是王跃驹深刻的洞察：第一，技术领先；第二，这是生物制药业的“工业革命”；三、该技术是在国内唯一产业化落地平台技术；四、技术工艺比较成熟；五、市场前景和空间巨大。另外，还具有特殊性的一点是，植物瞬时表达技术不但可以生产药物，还能作为生产原料，为生命科学的科研市场和工业用原料市场提供科研抗体和细胞因子。

作为从海外毅然回国的华侨，王跃驹表示，公司将不断提高和完善现有平台技术，将通过平台技术优势不断输出新产品，今后产品开发方向将向原始创新型产品延伸，并逐步形成独立自主、原始创新的药物开发和生产的完整体系。公司将利用技术平台的独有优势，研发社会紧缺但是具有重大需求的生物医药产品，打造植物分子医药的产业群，同时始终秉持“生产让老百姓用的起的生物药”的初衷，砥砺前行，将科技的作用更好更充分地发挥到老百姓身边，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为全世界的脱贫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不仅对我国技术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够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际合作水平，扩大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影响力，更好的传播中国的声音，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这是王跃驹对睿诚海汇的美好展望，也是王跃驹赤诚的爱国之心。

（作者：王競一）



魏英杰，男，1963年生，美国归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在人为英杰 与国作祯符

——记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研究员魏英杰

旅居美国六年后，魏英杰毅然回国，把自己多年来所积累的经验 and 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侨联主席，魏英杰热心侨联事业，热爱侨联工作，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搭建了工作之桥、生活之桥、爱国之桥、学习之桥、友谊之桥

……他以身为“桥”，将“侨”与祖国联系起来，为推进首都侨联事业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心系祖国 成绩斐然

有一类人，他们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心怀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回国创业发展、投资兴业，他们奋战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经济科技等各行各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勇于承担改革、发展、创新的使命，在前瞻性基础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在众多普通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做侨。

1963年出生的魏英杰就是众多归侨中的一员。他自1999年走出国门，开始侨居美国，六年后，在美国的医疗领域本有着大好前途的正直壮年的魏英杰，选择于2005年1月归国，成为了建设新时代大军中极为重要的一位归侨。

魏英杰从事医学研究领域，回国后，他把自己多年来所积累的经验 and 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他的研究成果有利于阐明疑难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有利于疾病的预防和早期诊断，并为疾病治疗提供靶点。作为课题申请者和负责人，魏英杰圆满完成了包括“973”、“86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课题。他所承担完成的“863”课题“重症心脏病的临床蛋白质组学研究”，为心力衰竭的早期预警、疾病分层和预后判断及指导个性化治疗奠定了基础；而他承担完成的“973”课题“先天性心脏病肺血管功能异常的分子标志物研究”，对阐明先心病肺动脉高压的发生机制和防治做出了贡献。

目前，魏英杰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一项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创新工程重大协同创新项目，致力于心肌病发病的分子机制研究，已经发现了数个新的心肌致密化不全型心肌病的致病基因。

作为第一通讯作者发表了37篇Sci论文，获得了两项发明专利和两

项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出版了一本专著。

除了在专业领域做好本职工作，回馈祖国之外，魏英杰还身兼数职：全国政协第十二、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届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科技组成员，中国侨联常委，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北京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侨联主席，科技部863计划评审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北京市科委医疗卫生领域项目评审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位授予专利审查委员会委员。这些看似风光的职位背后，承载魏英杰了无数辛劳与责任。

履职尽责 建言献策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魏英杰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魏英杰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次全国两会让海内外侨胞倍感振奋，必将有更多侨胞归国作贡献，也激励我以更大热情投身到为侨服务的工作中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地方和用人单位引才项目竞相发力，新侨人数剧增。”作为2018年两会的侨界政协委员，曾在海外学习工作多年的魏英杰深刻感受到了侨情的变化。针对归侨人才面临的配套政策、侨益维护等实际问题，他多次积极主动地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的思想、工作、生活状况，侨居国当地政府和民众对待他们的态度，以及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的看法等展开了调研活动，撰写了有价值的调研报告，对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掌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海外侨情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每年两会结束后，魏英杰都会组织侨联委员学习和领会“两会”的主要精神和议题。通过学习，使侨联委员对“两会”精神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

化身为“桥” 沟通侨胞

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侨联主席，魏英杰热心侨联事业，热爱侨联工作，在为侨服务和推进首都侨联事业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搭建起一座座桥梁。



他带领院校侨联委员加强自身学习与互动，搭建工作之桥。为了尽快了解相关的侨务政策，熟悉侨联工作特点，提高院校侨联委员的工作水平，魏英杰主动联系和邀请北京市侨联和侨办的相关领导进行侨联发展史和侨务相关政策方面的讲座；在北京市侨联等单位主办的“北京公益行”健康义诊活动中，魏英杰带领阜外医院的教授为100余名归侨侨眷和市民进行了义诊；积极配合市侨联参加“北京市侨联健康讲堂”活动，分别两次带领阜外医院多名教授做心血管健康讲座。

他积极为侨服务，搭建生活之桥。为了落实党的侨务政策，魏英杰主动与市侨办沟通，为各所院符合条件的归国人员集中办理了归侨证，免得其他专家要跑许多手续，减轻了归侨专家的额外负担，使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去。本着为侨服务的思想，魏英杰与各所院有代表性的老归侨建立了联系，以便于了解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尽可能地为他们反映和解决实际困难，经常主动去

看望生病住院的老归侨。

他组织归侨侨眷进行参观学习，搭建爱国之桥。为了加强对归侨侨眷的爱国主义教育，魏英杰组织院校侨联委员及归侨侨眷代表分别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和中国兵器第一研究院国防教育基地进行参观学习，亲身感受空间科学研究创新精神及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学习了航天人的拼搏精神，亲身感受祖国的日益强大。为了深入了解华侨史和华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魏英杰还组织院校归侨侨眷、归国留学人员参观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通过参观使大家进一步了解了华侨华人漂洋过海、艰苦奋斗的历史以及对中国所做的贡献，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激发了大家将华侨华人的优秀传统发扬到院校、所院各项发展工作中而努力的热情。

他带领归侨侨眷听取报告和讲座，搭建侨胞的学习之桥。魏英杰组织院校侨联委员参加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举行的“同心·讲坛”活动，促进大家了解当前日趋复杂的医疗环境下如何通过加强自身语言表达来改善医患双方的沟通，使归侨侨眷受益匪浅；组织归侨侨眷、归国留学人员代表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并参观现代农业种植高新技术园，让大家对归国人才取得的辉煌成绩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深切的感受，带领院校侨联委员到顺义进行了调研活动，院校侨联委员对顺义区在医疗改革中取得的突出成绩及所属李遂镇卫生院在妇儿保健中的改革创新经验有了详实的了解和学习。

魏英杰是首都侨界勇于创新、开拓进取风貌的缩影，他弘扬侨界优良传统，凝聚侨心、侨智、侨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功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相信以魏英杰为代表的归侨事迹势必激励更多的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設。

（作者：李倩雨）



吴德胜，男，1979年生，加拿大归侨，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侨联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

孜孜不倦科研报国 点点心血勇攀高峰

——记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吴德胜

信仰无声，拳拳赤子心就是最好的名声；生命无华，殷殷报国行就是最好的芳华。有这样一位归侨学者，他赤诚爱国、无怨无悔，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响应祖国号召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他知难而上、成就斐然，在国际前沿科学问题上勇攀高峰，在专业领域

开创了一套全面风险管理及智能决策方法论。勇立潮头，科研报国，是他人生的写照，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国际学院副院长吴德胜教授。

积极应对勇担当 全力以赴抗疫情

庚子鼠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全国。

作为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吴德胜勇于担当，第一时间投身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在强力的责任感驱使下，以实际行动体现了科研工作者的爱国情怀与敬业精神。

截至2020年4月25日，吴德胜所在的研究团队已经完成17篇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针对疫情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启示、实体经济债务风险防控、交通运输和保险行业、物流与运输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判，针对疫情冲击下当前我国面临的全球产业链风险、宏观经济遭遇的下行压力、金融波动等因素带来的挑战进行了细致全面分析，就不同疫情发展模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新基建”精准布局与分类施策形成我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等问题做出了系统性分析。

来势汹汹的疫情打破了生活的常态，却丝毫阻挡不了人们不畏艰险、开拓前进的脚步。吴德胜和团队以扎实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最终系列报告通过不同渠道上报，其中9篇被中办、国办采纳，并获国务院总理等多位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吴德胜撰写的多篇建议也被《中国侨联侨情专报》摘登。

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研究的国际合作，与全球学者伙伴风雨同舟，践行合作共赢之路。吴德胜积极联络、组织国际知名学者，共同研究疫情演化过程、发展趋势，探索其对全球经济社会风险传播路径以及对国际社会经济的影响。其中，包括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芝加哥大学 John Birge 教授、国际风险分析协会前主席、美国维吉尼亚大学 James Lambert 教授等全球近20国家50余位国际知名专家，以及美

国风险分析学会、IEEE系统理事会和IEEE系统、人与控制论协会等国际行业学会与机构。并且通过8个国际知名期刊在国际学术界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让国际学者看见中国的经验。

锐意创新勤进取 上下求索展作为

从科研新秀到领学一方，如今已步入不惑之年的吴德胜一路砥砺前行，励精图治，已经是风险管理和智能决策专业领域的领路人和先行者。

2005年，受中国科学院资助，吴德胜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2012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14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大学领军人才。2015年，担任多伦多大学特任教授，风险实验室执行主任的吴德胜选择回到祖国，加入中国科学院大学，为科技强国建设事业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攀高峰，不惧前路艰险，勇创新，无畏山高水长。他以厚实的专业功底、扎实的学术素养和出色的团队组织能力，带领团队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吴德胜的研究重点，一方面是全面风险管理方法论研究。他基于大数据复杂系统建模思想，开创一套全面风险管理及智能决策方法论，理论工作被国际同行学者命名为“W-O”模型方法（“W-O” ERM Model and Methodology，取吴德胜与合作者美国学者Olson资深教授姓氏第一个字母命名）。长期从事复杂管理系统风险决策的研究工作，利用复杂管理系统建模思想，以决策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为集成工具，将情感分析、运筹学优化算法、博弈论、计量经济模型、机器学习技术综合集成起来，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一个新的处理一类复杂管理系统风险识别的研究方法论。

另一方面是多主体博弈智能决策及风险研究。复杂管理系统中存在多主体交互行为，例如，股市开盘前投资者可能在各类网络空间讨论热

烈，顾客做出商品购买决定之前可能通过社交网络了解产品口碑。以供应链系统为背景，在对典型的多主体复杂系统作优化分析时，经常得到双重边际化的次优解，或难以处理一般市场的不确定性问题。为克服这些问题，吴德胜在以下两方面对该类问题做了原创性的研究工作：第一，开发了基于情感分析机器学习与风险值的综合集成风险分析模型，设计并实现了一套利用金融新闻褒贬倾向性预测金融市场波动的方法。第二，建立了需求不确定情况下竞争供应链纳什讨价模型以及供应链成本风险传导模型。他的研究工作获得国际学者的高度肯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 Becker认为吴德胜的研究“坚实并且发展了现有理论”。

凭借杰出的学术贡献，2015年，吴德胜获得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2018年获得杰青基金资助。2018年和2019年，先后当选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2019年3月2日，吴德胜应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长菲利克斯·昂格（Felix Unger）邀请，参加了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的新院士庆典，领取院士证书并接受院士表彰。欧洲科学与艺术院是世界范围内在科学和艺术领域享有崇高声誉的学术组织，是全球的科学院中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比例最高的科学院之一。其中，只有约10%的院士来自非欧盟的国家，每年全球增选的中国籍和华裔院士少之又少。

传道解惑引路人 科研报国守初心

新形势下，吴德胜继续推荐大数据金融、环境经济、风险分析三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在潜力科研上，玉汝于成，彰显着一名学科带头人的报国情怀，为国家建立完整的全口径服务经济数据体系提供科学依据，在风险动态性、多风险联合识别评估体系建设等方面，帮助提高京东、平安、中油财务、鞍钢、东海航运保险公司在投资业务方面的风险管理能力。与此同时，在传道授业上，诲人不倦，彰显出良师益友的深



吴德胜受邀参加天安门阅兵仪式

刻情谊，因材施教帮助学生成长成才。

吴德胜守“传道、授业、解惑”的育人理念，把培养学生成才视为自己的使命，并且带领学生学习创新技术知识，根据每个同学的

科研进展设置明确的未来发展规划，促进每个学生个体的发展。他常说，“如何培养出好的学生？要注重引导性，因材施教，注重把握学生群体的差异，在差异中将自己的知识传道授业解惑，以可变的方式去应对环境对学生群体的差异。”

不仅如此，作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和国际学院副院长，吴德胜也十分注重科研管理的作用，注重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在建设科学合理的创新科研工作机制的同时，发挥科研管理在高校战略部署与策划中的导向作用。他提出，创新高效科研管理理念，处理好学生、员工的关系，充分调动科研积极性，形成管理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加强重点学科和研究室建设，为响应国家知识经济严格要求的大背景下，成立了国科大环境经济研究中心，运用现代的管理手段满足对科研工作的需求。

亦师亦友，教学相长，他在多年的教学管理工作中注重修德修才、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关爱学生。因此，2018年10月，吴德胜获得世界企业家集团、《总裁》杂志社联合颁发的“中国十大最受尊敬商学院院长”的荣誉称号。

为科技立心，为人民立命，这是科研工作者的坚守的初心与使命，

也是一生的探索与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吴德胜将会在科技创新的漫漫征途上，继续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张世文）



肖苒，女，1971年生，美国归侨，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医院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侨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博学慎思 明辨笃行

——记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医院研究中心主任肖苒

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已经成为了肖苒的代名词。自归国以来，她时时不忘自己侨胞的身份，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与科研项目、投身科学研究，填补学界空缺；热心医学人才培养事业，关心医生生存现状，不断提出切实可行方案，积极承担身为政协委员的责任；在疫情来

临的关头，以“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志气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组织募捐物资，为前线抗疫人员提供物质保障。

硕果累累

在华西医科大学扎实度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时期为肖苒未来的医学研究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0年她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等学校从事颌面发育和畸形机理研究以及真核基因可变剪接在器官形成中的功能研究。2007年学成归国，加入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负责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研究中心工作，2010年受聘北京协和医学院“协和学者特聘教授”，2015年带领团队入选“北京协和医学院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肖苒教授是专业领域内的佼佼者。海外的经历让她得到了充分的历练，积累了渊博的知识。她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重点项目、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体表组织器官再生和构建重点实验室”等项目，对于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技术促进组织再生和修复的关键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近年来以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20余篇，主要研究成果为间充质干细胞临床应用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组织工程种子细胞的应用策略以及工程化组织的血管化方案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学术成就硕果累累，但肖教授不止步于此。在科研工作中不断进取的同时，还积极投身医学教育事业，参与编写多本教材，开设研究生课程，努力为国家医学人才的培养作出贡献。

学术领域之外，肖苒教授踏实履行自己身为政协委员和侨联委员的职责，围绕整形外科行业管理整形外科专科医师制度、医学教育改革、医学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机制的完善等方面，细心观察、用心思考，提出多项提案，为国家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建言献策。

除了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应用在解决社会问题上，肖苒教授还对弘扬

新时代民族精神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她曾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说，“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必须传承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要切实做好新时代民族精神的历史记录与传承，让新时代民族精神深入课堂、展现在文艺作品中，上到互联网的日常热搜，成为人们思想的启迪、理想的追求，培育和坚定以新时代民族精神为底色的文化自信。”身兼多职依旧全力而为，充分体现了肖苒教授的责任心和行动力。

时代浪花

诸多成果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凭借旁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不断耕耘得来的。化用爱因斯坦形容灵感和汗水的一句话，肖苒教授如今的成就是个人努力与时代发展的共同结晶。个人成长与时代发展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个人是时代浪潮中的朵朵浪花，个人成长是时代发展的动因和基础；同样的，时代发展为个人成长提供物质基础和广阔舞台，为个人成长提供机遇。脱离了时代背景的个人发展是难以承受历史检验的，肖苒教授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下，主动抓住机会，不断学习、充实自身，开拓眼界，最终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贡献者。

从2007年回国加入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以后，肖苒带领团队紧密结合临床，开展干细胞和组织工程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探讨了不同发育阶段、组织来源和炎症微环境中干细胞的生物学特性，解决多项工程化组织从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转化的关键技术问题。相关研究成果成为后来的整形外科医院十大创新技术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肖苒教授同时还不忘自己身为归侨的社会责任，时时关心社会发展现状，提出具有专业性、建设性和实践性的意见建议。从2014年开始，肖苒就对医学行业优秀人才的培养倍加关注，“无论在我国还是国外，培养一名医生都需要付出极大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但据调查我国医

学毕业生中仅有六分之一最后选择从医，而已经工作的医务人员每年也有很多转行，这对医疗资源本就稀少的中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培养不已，成长困难，医生在职业生涯中不仅面临生理压力，同时还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她曾接连提出单独设立医学高等教育入学考试、规范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医生多路径晋升制度、提高医生待遇、增强社会认可、促进医疗人文环境建设、为医生提供安全执业空间等提案，在政协会议上展开充分讨论。

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美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医疗美容行业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社会资本投入增加，肖萼在这一发展前提下，又提出了关于建立整形外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加强外国医师来华行医管理、整治医美行业乱象等与时俱进的提案，对医教协同完善我国医师培养体系、整体提升临床医疗水平和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打造健康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除医学发展方面的问题外，肖萼还十分关注医疗保险等民生问题。作为救命钱，医保基金的安全问题始终牵动着老百姓的心，构建统一高效的医保监管体系也是新时代医改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提案中，她认识到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双重影响，呼吁大家关注医保大数据的安全，建设医保大数据引用人才队伍，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医保服务。

战“疫”力量

2020年，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海内外侨界以不同方式积极投入战“疫”，肖萼也不例外。

作为北京协和医学院侨联委员，肖萼以“医者仁心”诠释“履职担当”。在疫情刚刚出现时，肖萼同其他几位政协委员在了解到北京医院赴武汉医疗队王建业委员反映的医疗队医护人员吃不饱、夜班室温度低等情况后迅速行动，自发组织筹集相关物资驰援一线，购买30箱五香



肖苒参加会议

鸡蛋、107箱火腿肠和3箱速食鸡腿，总重421公斤。这些物资在稍后便发往北京医院医疗队和中日友好医院医疗队驻地武汉马哥孛罗酒店。“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在民族危难之时，越会涌现出无数勇于担当的中华儿女，越能表现出中华儿女对于

这片土地的深深热爱。

今年的两会上，肖苒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大会发言稿中写道，“我们要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将这些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齐奋斗的人物事迹定格史册，彪炳千秋”，她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个人的时代责任连接起来，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与个人追求联系起来，表现出对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三者优势的充分肯定与赞扬，彰显对新时代民族精神有着非同寻常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在二十多年的工作学习中，肖苒时时刻刻保持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论是求学、做科研还是承担社会责任，事事都做到全力以赴、精益求精。肖苒说，“愿我们永葆赤子之心，以诚待己待人，不负光阴，无问西东”。肖苒教授在“博学之，审问之，慎行之，明辨之，笃行之”的道路上不断踏实前进，达到了新的人生高度。

（作者：高鑫宇）



解江冰，男，1972年生，美国归侨，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第三届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获得者。

创造中国一流晶体 承载国人复明事业

——记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解江冰

解江冰说，“我们要为中国人制作出自己的一流晶体。”作为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首席科学家，他带领着团队一路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自主研发出多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可折叠非球面屈光性人工晶状体，打破了跨国企业在高端人工晶状

体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垄断局面，为千百万白内障患者带来了福音，堪称科研领域的“光明使者”。

怀揣“中国梦”归故土

二十多年前，解江冰踏上了赴美求学之路，他先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完成博士后研究，还在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获得了MBA学位。他曾在世界五百强之一美国雅培公司任首席科学家，在生物医用材料和高分子材料领域发表了50多篇论文和专利。

由于长期在眼科领域工作，解江冰时刻关注国内相关领域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白内障手术率排在全球100多位，低于很多非洲国家。”他深深地为国内白内障手术的落后情况痛心，也察觉到其中蕴藏的巨大机遇。

2010年，解江冰毅然放弃已经获得的高薪职位和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决定回国创业。他认为如果错过中国千年一遇的发展机会，自己将终生遗憾。这一次归来，解江冰的目的很明确，他要“研制代表中国智慧的高端晶体，降低价格，让伴随人口老龄化日益增长的白内障患者都能重见光明”，实现他的“中国梦”——用“中国晶体”回报祖国。

“中国晶体”的诞生

白内障是世界范围内致盲类疾病中的头号杀手，根据国际防盲协会（IAPB）2019年发布的《World report on vision》，一项基于我国人口特征的研究估计，2020年我国患白内障人群（45-89岁）预计达到1.32亿人。国内外医学界公认，目前，通过手术植入人工晶状体以取代已变浑浊的天然晶状体是治疗白内障唯一有效的手段。

由于技术壁垒，国内仍然在生产和使用发达国家已经淘汰的硬晶

体，可折叠人工晶状体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技术和市场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解决白内障患者“用硬晶体痛苦，用软晶体贵”的棘手问题，让国人用上性价比更高的国产晶体，2010年解江冰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创办了爱博诺德公司。2014年，他带领团队研发生产的国内首款非球面可折叠人工晶状体——普诺明®A1-UV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注册上市。以普诺明®为代表的国产可折叠人工晶状体上市后，带动同类白内障手术耗材逐步降价，极大地降低了患者负担和国家医保支出，打破了跨国医疗企业在人工晶状体领域的技术壁垒和市场垄断。

“相对于国外同类产品，‘中国晶体’致力于完善三点：生物相容性更好，视觉质量更好，更适合于中国患者人群。”解江冰用三个“更”概括他和团队创新成果。这背后，承载的是疏水性丙烯酸酯材质、高次非球面设计、基于中国人眼模型设计等一系列自主研发成果，“我希望‘中国晶体’植入后，能让老百姓稳稳地用上20年”。

一枚“比小拇指甲盖还小”的晶体，重量仅有0.02克，却凝聚着近百项专利的“加持”，不仅让无数白内障患者获得了光明的希望，还可以同时矫正散光、老花和近视等屈光不正，让植入多功能人工晶状体的患者得到更好的视觉体验和更高的生活质量。从公司第一款人工晶状体上市至今，六年时间，爱博诺德公司研发生产的系列可折叠人工晶状体已经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进入一千多家医院，累计植入百万例，成为中国白内障患者的福音。

十年磨一剑，出鞘天下惊，科研领域的“光明使者”解江冰也正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本土化”科研团队坚持自主创新

解江冰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大型企业中少有的集研发、管理经验于一身的中国海外留学人才，在世界五百强企业长达7年的眼科生物材料研

发经历，让他熟练掌握医疗器械行业规范、产品注册流程、GMP生产规范和国际检测标准等技术路径。创业之初，他没有选择与掌握关键技术的海外人才合伙经营的捷径，而是大量招聘国内高校培养的各个学科的博士和硕士人才。他希望用自己的智慧和管理经验带出一支“中国化”的科研团队，获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形成医用高分子材料技术、眼科透镜光学设计、眼科植入物的功能性结构设计和超精密加工技术及配套工艺等技术平台，未来实现产品和技术覆盖“全眼科”的设想。



2020年7月，爱博医疗（688050）股票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创业之初，全公司只有七个人，面临着资金短缺、人手不足等困难。解江冰与北京同仁医院合作筹建了“国家眼科诊断与治疗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眼科生物材料研究实验室”，在公司建立“眼科生物材料与诊疗技术”北京市工程实验室，通过申

报和完成国家、北京市科研课题集聚人才和锻炼队伍。经过多年的努力，解江冰组建了一支包括化学、机械设计、光学多学科组合的本土化研发团队。

一枚仅有0.02克重的人工晶体，从材料合成到光学设计再到精密加工，国外企业通过专利保护已经形成了密不透风的壁垒，产品的研发工作就如同在迷宫中摸索道路，有时候似乎看到了光明，却走进了死胡同。解江冰用严谨的研发管理制度和鼓励创新的“容错机制”激励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解江冰经常在研发团队刚刚提出大胆设想时就跟大家一起论证讨论，同时为了验证这一设想，优先采购必要的材料和设备。十年来，公司积累了上百项专利，并且开始为公司的核心技术构建国际专利布局。

如今，爱博诺德的人工晶状体已经走出了国门，出口到了德国、法国、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家。2015年至今，公司产品密集入选中国政府对非洲和“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光明行”医疗援助项目，为20多个国家的数万名患者带来光明，打破了中国对外医疗援助项目白内障手术使用外国品牌人工晶状体的局面。

政策环境为华人华侨创新创业提供沃壤

“中国晶体”的诞生，与国家鼓励支持海外人才创新创业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他说：“我们确实赶上了中国创新创业的好环境。政府很重视，在各方面都有制度化的支持政策。”其中，国家和北京市政府对华人华侨创新创业的大力支持，让解江冰没有了后顾之忧，在创业之路上有了勇往直前和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底气。

公司创立之初，解江冰就获得了包括“留学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在内的北京市多项创业人才奖励支持政策的资金支持。解江冰先后入选国家和北京市特聘专家，还被破格评为教授级高工，他和创业团队一起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政府授予个人和企业的荣誉和奖项为企业的创新实力做了充分背书。这些强有力的支持，像一颗定心丸，保障了解江冰敢于从高起点起步，在人工晶状体的产品研发方面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

从最初的困难重重到今天的硕果累累，国产人工晶状体从只能生产低端淘汰产品，到与国际先进企业技术同步，局部领先，折射出来的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一个中国民营企业不断拼搏、迎难而上，坚持自主创新从而成就“中国骄傲”的自豪历程。解江冰真诚地希望，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能够投身技术创新的大潮，投身于中国梦的建设和实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海外侨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是炎黄子孙共同的愿景，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共创辉煌。在新

时代波澜壮阔的进程中，广大侨胞响应党和人民的号召，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积极发挥独特优势，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8年，解江冰获得第三届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从北京市主要领导手里接过“京华奖”证书，他倍受鼓舞。“京华奖是荣誉，更是责任。”他表示，作为新一代归侨，将继续努力，把公司经营好，尽快做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回报祖国和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助力祖国发展，早日同圆共享中国梦。

（作者：姜桐桐）



许俊泉，男，1975年生，美国归侨，格物致和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第七届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

百舸争流 奋楫者先

——记格物致和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许俊泉

正如许俊泉所说的“科研是企业立身之本”，秉持着对科研的追求，对市场动向的及时把握，以多组学平台开发为核心，他带领着格物致和公司快速发展，吸引了众多投资人的目光，同时也为我国生物芯片产业的发展贡献着一份来自侨界的力量。

“芯”理念 “芯”模式

许俊泉，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学士，清华大学生物科学技术硕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MBA，曾历任美国 AVIVA Biosciences 公司工程师、美国 ACEA Biosciences 公司资深工程师、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暨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总裁、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北京博奥晶典公司 CEO，拥有生物医药行业近 20 年的科技研发及企业管理经验，主要从事以生物芯片、微流控技术为主的分子检测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其相关技术成果在科研服务、重大疾病诊断、HLA 分型、分子育种、中药鉴定、食品安全、动物疫病及细胞免疫治疗等行业市场的推广应用。

从技术创新到产品研发，再到产业化、市场化、管理化的成长历程，都为他日后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期间在美国进修 MBA 课程，接受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培训，同时摸索并开拓国际市场，为其拓展国际业务、提升中国生物芯片行业在国际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许俊泉曾经任职的博奥晶典公司是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暨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旗下核心产业化平台，拥有生物芯片和仪器设备的生产、研发基地和营销、运营中心，形成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品生产、国内营销、国际营销、运营管理和资本运作的完整产业链和事业集群，是典型的智力、科技和资本混合密集型高新技术企业。

据了解，生物行业的很多国产仪器是不被国外用户接受的，而博奥产品却能够出口北美、欧洲、亚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世界用户的青睐。许俊泉认为生物产品核心优势是性能和性价比，这是它能够走出国门的重要因素。产品在刚推出的时候，大多会面临不被用户接受的困境，因为是新产品，难免会被用户打个折扣。但随着与客户的慢慢接触、交流，产品的性能和优势慢慢地得到了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我们也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其实，任何一个新产品在刚推出的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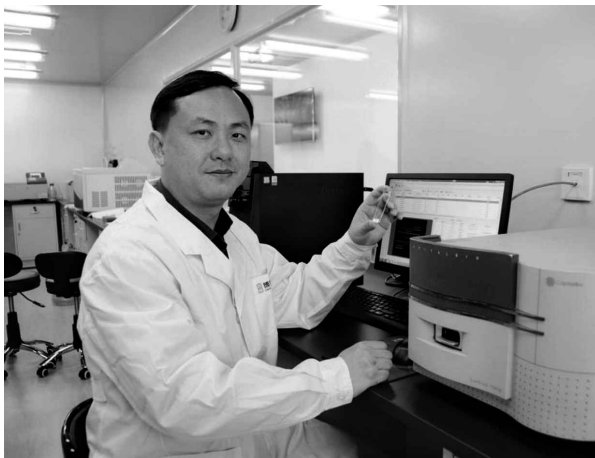
候，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关键是你怎么去解决它。

任职期间，许俊泉用了短短数年时间就带领博奥晶典实现了从几千万到过10亿元的年度销售额，年平均销售收入增长率高达200%。凭借这样的业绩，博奥晶典获得了“2015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第六名和亚太地区500强第十名的荣誉，还获得“2016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及“2016德勤-亦庄高科技高成长”第一名。

科技发展和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如何利用科研成果解决民生问题，为社会服务。作为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高新技术企业，博奥晶典立足自有产品研发平台，着眼亟需解决的民生问题，整合优势资源，确立了包括耳聋基因筛查项目、HLA基因分型项目、传染性疾病预防项目、无创产前诊断等几大重点研究及产业化领域，在预防出生缺陷、防控疾病传染、提高人口素质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新时代 新领域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期间，人类全基因组的解析、基于微流控的生物芯片技术的快速发展，新一代测序技术的突破，以及大数据分析等多学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交叉融合，有效的推动了基因组学的研究和产业化。近阶段基因组学的发展已经催生出一个千亿级别的基因检测大产业，而由此带动的精准医学概念的出现，更是对临床医学和大健康产业带来了巨



许俊泉在实验室进行实验工作

大的影响。

2015年以来,“精准医疗”已成为生物医药最热的领域,我国目前也已启动精准医疗计划。精准医疗是精准诊断与精准治疗的总和。有了精准地诊断,才能精准地治疗。生物芯片在精准医疗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的发展不断推动着我国精准医疗事业的快速进步。

生命的中心法则告诉我们,基因水平的信息反映的是疾病发生的概率,而蛋白、细胞等做为生命活动的最终执行者,其状态的改变更为直接的反映了疾病的发生、发展状况。相对于基因来说,蛋白、代谢、细胞等更适合做为一种动态指标,为疾病的早期发现和诊断,疗效监测和预后判断等提供更可靠的信息。随着这几年质谱技术,基于微流控的数字化单分子检测等技术的不断创新,进一步推动了蛋白质组学和细胞组学产业的迅猛发展,短短两三年内在Nasdaq已经出现数家十亿甚至百亿美元市值的创新企业,正逐步形成下一个千亿级的大产业。

许俊泉看到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于2019年11月组建格物致和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全面进军这一新领域。格物致和专注于生命科学临床医学领域,以微流控技术为核心,结合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致力于细胞组学、蛋白组学、基因组学等多组学平台技术研究。团队目前已经拥有微阵列芯片、微流控芯片等各种各样的芯片技术平台,可以实现对疾病的精确诊断。公司致力于开发基于组学分析的系列化液体活检产品,用于分析细胞组、蛋白组、代谢组、基因组及其他健康信息,将对疾病的早期预警预防,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等提供全流程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战疫时刻 初心不忘

2020年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悄然肆虐神州大地。新冠疫情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也给相关行业带来了极大影响。冠状病毒属于冠状病毒科,可能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迄今为止,

已鉴定出六种人类冠状病毒（HCoV），分别为 HCoV-229E，HCoV-HKU1，HCoV-OC43，HCoV-NL63，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

虽然国家在公共医疗保健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是对抗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的出现挑战了全球公共卫生系统应对新型传染病的防线，而分子诊断作为诊断技术的最先进力量在新冠检测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面对疫情，我国医疗器械和诊断试剂企业克服了重重困难，展现了最快的产能与最高效的研发速度。在临床诊断和公共卫生领域，国家需要更加自动化和集成化的平台产品以实现快速及大规模的筛查，同时还需要更高灵敏度的分子检测平台以实现疾病的早筛和早诊，这样才能更好的应对这类突发事件。由此可见，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是“国之重器”。

许俊泉依托自己在分子检测产业界里近 20 年的积累，以及快速的技术集成及市场转化能力，带领格物致和团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完成了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申报，进一步通过并购及技术授权引进等方式，快速部署相关分子检测技术。目前公司已完成数款产品的研发和引进，即将启动产品临床申报工作，将创新产品快速带入市场，为新冠疫情的防治作出更多贡献。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第十二届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在未来会有更多政策出台来推动和扶持创业创新及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许俊泉认为，只有坚持技术创新，才能不断开发出新产品，这也是他一直坚持和投入的事情。相信格物致和在未来必定能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努力承担起肩负的使命与责任，成为中国医疗诊断领域的先行探索者，让中国生物科技迈出更稳健有力的步伐！

（作者：汪之岸）



易卫东，男，1959 年生，美国归侨，国科物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第六届中国侨界创新奖获得者。

习于智长 优与心成

——记国科物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易卫东

“在科学研究领域，‘差不多就行’的想法和做法是致命的问题！国内一些项目最终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问题就在于不注重科研的过程与细节，缺少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满足于‘差不多’的结果，因为这一点点的差距，往往导致整个项目功亏一溃。”易卫东铿锵

有力的话语掷地有声，也正是因为这种严谨的科研作风，他于2005年入选中国科学院海外杰出人才“百人计划”。从美国归来后，易卫东成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电子电气与通信工程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技术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易卫东始终认为，科研应该为国家的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科技攻关和生产实践要有效衔接。科技人员应该把科研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写在产学研的结合当中。因此，他努力将研究成果与产业相结合，促进科研成果向市场化，做科研和成果转化的领头羊。他在做好教授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担任了国科物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通过这个平台，他针对智慧旅游的需要开发了物联网组播导游系统原型及其产品，用以提升文化旅游的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改变现有的导游系统的商业运营和管理模式；针对物联网在智慧农业方面的应用需求，应用实验室研究多年的双电层理论和高品质数低通滤技术，成功研发了国内首款用于农业物联网的超低功耗高性能土壤水分传感器核心芯片并实现量产。其主要性能经由著名国际企业日本欧姆龙公司鉴定达到国际水平，获得国内外同行的认可，为物联网在智慧农业中的应用与推广提供了一款关键核心产品，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的空白。

易卫东认为，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的科技成果无疑是一种资源浪费，这也不符合科研的根本要义。因此，科研人员要努力做一个了解市场需求并能和企业家积极沟通的技术专家。

精益求精 研以致用

在美国布朗大学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时，易卫东一直期待学成之后重回祖国，为国效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物联网主要核心支撑技术无线传感网理论与技术的研究中心，这里汇聚了全世界该领域研究的顶尖专家学者和顶级研发中心，如微机系统之父穆勒教授、物联网节点架构与操作系统奠基人卡勒教授、英特尔伯克利研发中心等。求学

期间，易卫东积极与这些大师学习交流，先后获得博士学和博士后学位，学成后将所学所得带回国内。

回国以后该如何开展工作？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怎么才能与国情和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这是所有有志报国的海归学子面临的重要选择。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急需先进的信息技术提升农业现代化的水平，易卫东选择了农业作为切入点，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适用于农田环境的物联网组网的通信协议 C-Mesh 通信协议及其搭载该协议的物联网节点平台。在国家 863 高科技项目资金支持下，与中国科学院遥感



易卫东在实验室做实验研究

所、中国农科院及北师大等单位联合研发了 WSN-AG 无线陆基农田参数监测网络系统，主要用于对农业微环境气象及农作物生长环境进行实时无人值守连续监控。该系统还可与星基卫星遥感数据信息相结合，协同精确反演地面

大面积农田墒情，用于支撑现代农业的生产管理与决策，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及产业发展。自 2009 年 12 月以来，系统在北京、廊坊等实验场展开了不同尺度的多期观测试验，取得了充分的实验数据和宝贵的实践经验。该项目还在河南省鹤壁市万亩粮食高产核心示范区建立了试验与示范工程区，试验面积达到 200 平方公里，是目前国内外相关项目最大尺度的示范工程。这些信息的实时获取和处理可用于现代农业灌区智慧灌溉的控制决策系统，为优化农业水利资源，节水灌溉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2011 年 1 月 22 日时任总理温家宝在河南省考察工作时视察了该示范工程，并高度评价该工程——“很好！是国际上同类实验区中最大、最精”。

十多年前易卫东刚回国时，21 世纪十大国际前沿技术之一的物联

网在国内还鲜为人知。正是在易卫东和其同事的努力推动下，国家相关部门把物联网的核心技术研发写入了国家《中长期科技产业规划纲要》，这使得物联网成为国家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千教万教 教人求真

师者也，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除了科研之外，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也是易卫东的一项重要本职工作。在指导学生科研时，易卫东特别注重科研方法与职业道德的培养，强化学生在科研过程中实验能力、观察能力及综合分析能力。易卫东认为，做科研要平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能言过其实，要对得起国家给的科研经费。他把这种严谨的科研作风带进自己的科研和教学中，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榜样。有学生做研究遇到问题绕着走，糊弄结果，只想混学历到时拿文凭的，对此易卫东从来都是严格把关，坚持严谨的科研作风，他会劝这样的学生先工作，不用在学校里混日子浪费时间，等研究成果合格后再来拿学位。

在科研选题方面，易卫东会鼓励学生选择其中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旦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课题，便会产生良好的心境和饱满的热情，这样才有助于思维的创造性发挥。对于国内学术界把发表文章数量作为成果评价标准的做法，易卫东认为，这往往会使人忽视科研的本质所在。他常常对学生们讲，在科研中最有意义的是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过程。只要学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写论文自然是水到渠成。反之，为了论文而写论文，不免有无病呻吟之痛。努力读书学习，思考问题，体验生活，做适合做的学问，才是最重要的。

国之所需 萦绕于心

八十年代国门初开时，外边的世界激荡着青年学子的心。出国留学在当时是一种时代潮流，易卫东认为自己很幸运，改革开放给了他赴美

学习的机会。在美国期间，他不仅有机会进入像布朗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这样享有国际盛名的顶级学校，还有机会在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和 WindRiver 等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和公司工作。这些经历让易卫东学习了先进科学技术，同时也让这个年轻人获得许多难得的人生历练。

如果说出国是年轻时追求梦想的冲动，那么回国则是每个怀有赤子心的海外学生报效祖国和叶落归根的必然选择。易卫东始终坚信，回国是绝对正确的选择。“出去的目的就是想开眼界，把别人的好东西学会，回国后能回馈社会，有一番作为。”

九十年代后期，科教兴国成为基本国策，国家充分认识到教育和科技的重要性，对科研投入和引进人才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国科学院是国家最高科研机构，对海外回来的专家和科研人员设有专项资助计划，“百人计划”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项。“这是很好的回国机会，我们一定要顺应潮流。”易卫东这样说道。回国要把国家的需求和个人的情况结合起来，将个人的专长兴趣和国家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基于这样的认知和情怀，易卫东带着物联网的先进技术和研发成果回到祖国。

回国后，易卫东主持并完成百人计划项目“基于物联网的灾害监测预警和智能检测平台及其相关的核心理论与技术”、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无线传感器网络作为智能停车支撑关键技术”、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村镇环境无线传感网络监测技术研究”等重要课题研究，科研成果颇丰，收获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易卫东及其团队正和企业一起积极推进这些成果市场化和产业化，他们希望能国家每一分钱的科研投入都能产生出实实在在的效益，这是他们的愿望，更是孜孜以求的目标。易卫东深知，所有的一切才刚刚开始，物联网技术对国家产业发展及民生大有裨益，其潜力和价值不可估量，其发展前景必将广阔无限。

（作者：汪之岸）



张涛，男，1964年生，日本归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侨联原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攻科研硕果累累 育英才桃李芬芳

——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学教授张涛

“我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接受张老师的指导，从此以后就被张老师的人格魅力和科研成果折服，后来又抱着崇拜的心情成为张老师的博士生。张老师在科研上一直培养我们独立自立的能力，在生活上也告诉我们如何去做人、做事，给了我们很多帮助，非常感谢张老师对

我的教育。”在读博士生陈辰口中的“张老师”，正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涛。如学生所言，他是科研大家也是良师益友。他曾留日深造，学成后归国。攻科研硕果累累，育英才桃李芬芳。

英“才”铸好“材”

1964年，张涛在河南省永城县出生。1982年，他顺利完成高中学业，从永城市高级中学考入郑州工学院（今郑州大学），继续求学生涯。1987年，他作为公派留学生，跨越海峡，奔赴异乡，于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他顺利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并担任该研究所的助手，从事块状非晶合金、纳米晶等非平衡材料的开发、制备、物性、原子结构和非晶合金纳米晶化的机制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开拓了块状非晶合金研究的新领域。青年才俊，意气风发。2000年，他晋升为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的副教授。2003年至2008年，他受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副院长、院长。时至今日他仍坚守教师岗位，垦一方材料学沃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除此之外，自2008年8月至今，他还是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他是孕育桃李的良师益友，更是深耕学术、力克难关的领军人物。

他的学生在媒体面前坦言“为他的科研成果所折服”，这并非妄言。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便开始从事非晶合金等非平衡金属材料的开发、制备、物性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非晶合金的块体非晶合金新思路，探索发现了具有高非晶形成能力的合金。这些合金具有高度稳定的过冷液体状态，在较缓冷却的条件下也能从液体转变成非晶态合金。在理论研究成果的支撑下，他用熔体铸造法成功地制成了块体非晶合金。这一发现突破了已有的超快速凝固制备非晶合金的理论约束，解决

了长期存在的非晶合金块体化的难题，受到了国际材料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块体非晶态合金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他再接再厉，勇攀学术高峰。在日本工作期间，他发现了块状非晶合金在过冷液体区间具有超塑性。回国后他又发现了一系列新的块体非晶合金体系，如具有优良力学性能的Zr、Ti、Ni、Cu、Fe和稀土基块体非晶合金，具有优良软磁性和耐腐蚀性能的Fe基和Co基块体非晶合金，具有优良相容性的生物医用非晶合金。他研究了材料生物相容性以及细胞毒性，与企业合作开发出多种产品，进一步推动了非晶合金研究及应用的发展。他还开发了一系列具有高强度、高韧性、高耐蚀、拥有良好的软磁性及硬磁性的块状非晶合金。材料是工业的基石，张涛的研究成果不仅拔高了学界认知的天花板，更打开了新实际应用场景的大门。

数据不会说谎，它们证实了张涛高强的学术能力。到目前为止，张涛共发表论文120余篇，发表的论文中被SCI（科学引文索引，系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有300余篇。被引用次数总计为15000多次，多篇论文单篇被引用次数超过300次。曾被ISI Highly Cited.com收录为高引用频次研究者，在世界材料科学领域的论文引用次数排名中位居全世界材料科学领域华人科学工作者前列。除此之外，他作为专利发明人的国内外专利有100项。成绩斐然、成果丰硕，大抵如是。荣誉纷至沓来，张涛获得了包括日本金属学会论文奖在内的多项学术奖励。2011年获得世界华人协会颁发的世界华人杰出成就奖，2019年获产学研合作创新奖及国际绿色设计奖。

血脉相连 命运相系

“我的求学生涯非常幸运。在童年时不太重视课堂教育，是一种自然状态，没有太多作业和考试。到了上中学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高考制度改革，我开始接受正规学习。正好国门开放时，我出国了。更主要的是，该回来时我又回来了。这也是我们六十年代的人比较

幸运的事，学习生涯总体上是比较理想的，自己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回顾自己的求学生涯，张涛深有感触。他始终没有忘记将个人命运的坐标放置在祖国发展事业的大局中。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他得以通过高考接受高等教育。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他肩负祖国的希望，乘长风破万里浪，远赴异国深造。进入新世纪，祖国的发展驶上了快车道，对人才的需求也不断膨胀。他在用人之际回到祖国，让个人发展的轨道与祖国发展的轨道重合。少年勤学，学成担纲，国之栋梁，国土无双。

传道授业 春风化雨

他是学生们敬爱的张老师，致力于为学生创造最佳的发展空间。他的学生杨洋曾告诉前来采访的媒体：“张老师的实验资源非常丰富，实验平台非常完善，我们利用这些平台可以自由地发挥。”他的研究经历和科研精神指引、鼓舞着他的学生。曾有记者在周末采访他，意外地发现他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仍在刻苦学习。

他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他强调，要培养学生们的兴趣，要引导学生树立明确目标。他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如果你非常喜欢的话，即使遇到困难，能够坚持做



2009年，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张涛做客CRI，畅谈自己的经历

下去，也容易产生解决问题的灵感。他还说过，一个人如果想要事业成功，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只要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到达理想的彼岸。他认为：“观念和目标引领方向的，方向错了做

事将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有正确的目标才能带领你走上一个又一个高度，走到更远的地方。在教育方面也一样，不能说比别人学的更多就一定更有成就，学多不如少，学少不如好，学好才能用，学多了不一定管用，说不定还成为负担。”由此可见，他不仅深耕学术、醉心科研。当身份从学者切换为教师时，他也在积极思考和探索，如何更高质量地完成教师的使命。

攻科研硕果累累，育英才桃李芬芳。不管是搞科研还是当老师，张涛为我们展示了多种报效祖国的方式。而他的故事还在继续，还将感召更多的侨胞一同为“中国梦”奔跑，为新时代出力。

（作者：叶靖怡）



赵磊，男，1968年生，美国归侨，新博医疗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第七届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赤子丹心终报国情

——记新博医疗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磊

尚处于知天命之年的赵磊拥有诸多身份和漂亮的履历：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及电子工程双学士，美国波士顿大学及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曾发表国际学术论文百余篇，学术著作6部、国内外专利20余项，并是多家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审稿专家；

曾获中国侨联侨界贡献奖、北京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国家特聘专家和中国侨联特聘专家等多个奖项和荣誉称号；先后牵头并承担了包括国家科技部重大支撑项目、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做我国高端医疗产业化的拓荒者

在过去的许多年间，赵磊一直致力于高端创新医疗设备的开发及产业化，区域医疗信息化、健康管理和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化。他主持领导开发了包括磁共振成像系统、磁共振导航微创治疗平台、光子漫散射乳腺功能影像设备、荧光PET双模式分子影像设备、家庭及可穿戴健康医疗设备、区域医疗信息化系统、手术机器人等多款医疗器械产品，多款产品技术水平达国际领先水平，并获得包括我国CFDA、欧洲CE、美国FDA等相应医疗资质和认证。此外，他还带领创新发展基于中医和现代医学技术的用于疾病预防、亚健康/慢病管理和康复养护等的现代健康管理体系，同时开发了互联网医疗平台。

新博医疗在赵磊主持下研制开发的“磁共振兼容多影像融合导航系统”不仅能与CT和PET-CT一同工作获得影像，还可以与从开放式低场到3T高场磁共振兼容，即在实时磁共振成像同时同步导航。本导航系统集成实时三维成像、实时三维导航及实时控制技术为一体，提供精准微创治疗。

“在保障手术安全性的基础上，可以大幅度提高手术成功率，极大地降低手术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和伤害，是国际上首台投入市场的可实现术中实时精确导航且与各类磁共振成像系统兼容的手术导航系统。”哈佛医学院多影像引导手术室里唯一一台中国制造的设备就是新博医疗研发的“磁共振兼容多影像融合导航系统”，这项技术现在仍保持着国际最先进的水平。

乳腺癌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治愈率可以达到近100%。新博医疗公司还有另外一个创新产品——“超声光散射乳腺诊断系统”。目前广泛应

用在体检中的钼钯X光乳腺机和超声技术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新博医疗研发的乳光超产品是通过超声成像技术获得乳腺病变形态和位置等结构信息，再利用光散射断层成像技术获得病变组织局部血供情况的三维断层功能影像，得出的结果更加准确，能够做到乳腺癌的早期发现，这就可以极大促进乳腺癌的早期发现和尽快治愈。新博医疗的乳光超产品于2015年12月获得了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出具的官方推荐函，推荐新博医疗的乳光超产品做为我国乳癌筛查的新方法，并纳入国家乳癌筛查规范。

诸多的名誉和成就让人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但光鲜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勤奋与努力，每一个传奇背后，都隐藏着坚守与执着。

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

和制造业、电子信息等行业相比，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和国际水准还有不小的差距，尖端医疗设备更是依赖进口产品。但在亦庄，一支由海归精英团队创办的高新医疗设备研发企业——新博医疗技术有限公司打破了这种尴尬，公司的领头羊就是赵磊。

在别人眼里，能让自己研发的产品在哈佛医学院装机等于得到了一个业内的权威认可，在赵磊看来，这更是团队一路走来的成果，也是他们继续打开市场的基础。

和大多数的创业者一样，赵磊在这条追梦的路上也曾经遇到许多挫



赵磊在他的办公室

折。归国后，赵磊和几位博士朋友共同创办了一家公司，靠着先进的技术理念和艰苦的攻关，经过几年的艰辛，他们的新产品终于问世了，这就是世界首创的磁共振导航微创诊疗系统。这种产品在肿瘤治疗中如同给医生戴上了一副可透视

的眼镜并配备了一台精准制导的GPS导航仪，有了这个设备，医生就可以准确地确定病灶范围和位置，大幅度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和安全性。然而，他们的成功却无人问津，甚至经常被当成医药代表被医院拒之门外。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家医院对他们的产品产生兴趣，赵磊多次往返，给院长、主任和专家们介绍产品的优势，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获得了这家医院的信任。

万事开头难，在这之后，他们的品牌逐步获得了业界的认可，并一鼓作气，开发了多种国际领先的医疗产品，他们的产品进入了哈佛医学院世界最尖端的手术室，成为那里唯一的“中国创造”。

如今，赵磊的公司已经从当初的8个人快速成长为拥有几家分公司的大型企业，还建起了自己的研发、生产大楼。现在，新博医疗已经拥有多项国际领先技术和产品，先后推出早期乳腺癌检测系统、磁共振导航微创诊疗平台、多影像融合导航系统、智能康复设备等高新技术产品。公司70人的团队在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方面都在快速发展，也已经与哈佛大学、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总医院等国内外知名学府与著名机构建立了密切合作伙伴关系。

谈起对行业前景的看法，赵磊说：“目前国内的医疗设备技术和国际标准还有差距，尤其是高端领域，国内起步更晚，但我想，如果踏下心来搞研发，应该很快就能追上。”接下来，赵磊还将带领新博医疗，在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下功夫，让更多人用上价格更低廉、质量过关的国产医疗产品。

大国良材尽显忠义

从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和电子工程专业学士毕业，1994年出国深造，取得美国波士顿大学及哈佛大学联合培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并任哈佛附属BWH医院研究员……赵磊有着让人钦羡的人生

轨迹。虽然在美国的学习和工作生活很顺利，但和很多在外求学、打拼的人一样，祖国总是赵磊心中的避风港，“美国超市里的商品，凡是写着 Made in China 的价格都非常低，人家买了你的便宜产品还看不起你，主要还是因为产品的技术含量低。”赵磊对此感触颇深，中国要发展，一定要有真正能与国外竞争的高科技产品。

在国外学习期间，他和其他有同样抱负的留学生们一起创业，一直热心寻求报效祖国的机会，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可谓顺风顺水，然而祖国一直是他心中最深的羁绊与牵挂。回国的想法与国外优质的实验条件，曾让赵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然而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国。

“中国人研究的高端产品，外国人看不上。甭管你技术多先进，一说是中国的人家先开始质疑。”看到这种现象，赵磊的心里是难受的。现在，很多优质外企的研究员都是中国人，优质的设备也是中国人研究出来的，可是最终拿到声誉的却是外国人，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仅仅是中国医疗设备发展比别人晚了一步。美国很多企业的研究员是中国人，优质的设备也是中国人研究出来的，可为何最终拿到声誉的却是外国人？赵磊不服气，也同样是这股不服气的心思让他选择了回国闯出一番事业。于是，怀着科技创新、矢志报国的强烈愿望，赵磊带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归国创业。

回国后，在他的带领下，新博医疗先后研发出 OPTIMUS 超声光散射乳腺成像系统和基于磁共振、CT 等多影像模态精准术中导航系统等国际领先的产品，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了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腾飞、跨越。

推动中国医疗设备行业发展是他一生所求，开发具有国际水平核心技术的医疗设备是他永恒的梦想，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对中国医疗设备行业的爱。热爱祖国，燃烧自己，赵磊的事迹充分彰显了国人的责任感和落叶归根，牢记初心使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这是每个中国人的爱国心。

（作者：王思蕴）



赵伟，男，1961年生，日本归侨，安进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第七届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

留学报国情 十年苦创业

——记安进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伟

2020年，是安进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简称“安进医疗”）成立十周年，也是赵伟回中国创业的第十个年头。十年前，赵伟放弃了在日本的一切，选择回国。在日本生活工作的十年间，赵伟积累了很多的技术经验，研发多种世界首创产品和技术，其中电磁刀技术产品的发

明打破了长达90年的高频电刀技术原理，填补了国内外的技术空白，开创电磁式手术治疗设备的新领域，获得了学界和业界的认可，成绩斐然。

厚积薄发 “电磁刀第一人”

1991年，赵伟辞去北京邮电大学的工作，前往日本从事图像技术分析工作，在研究所工作了两年后，他放弃多年学习的图像专业，转身投入到医疗设备领域，从普通研发工程师开始做起。在基层工作的积累中，赵伟通过核磁共振研究，尝试将“电磁场辐射能量”应用到脑肿瘤的治疗中，为了减轻传统手术设备对人体组织的损伤，开始了“电磁刀”微创手术技术的前期基础研究工作。

经过多次反复的实验设计和成果验证，他成功用“电磁场进场生物效应”技术代替了当时已应用了长达90年的“大功率高频电流作用”的传统外科手术技术。与此同时，他与日本神经外科专家共同发表的论文——“电磁场近场生物效应”技术及临床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神经外科领域的广泛关注。

世界上使用的主要手术设备高频电刀、激光刀及超声手术设备等在技术性能上的局限性，不能完全满足目前医疗技术和临床发展的需求，电磁刀产品为外科手术提供了一种创新、安全、有效的手术手段，与其他外科手术设备相比，电磁刀产品具有安全性高、电刺激小、创伤及热损伤小的特点，为微创手术和内窥镜手术这两个领域带来了新的可能，市场规模巨大，具有几十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由此，赵伟成为世界上电磁刀微创手术设备研发的第一人，并获得了日本、加拿大、中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发明专利。国际学术会议上有关电磁刀技术、产品和临床评价的论文发表了近百篇，获得国际神经外科领域的高度评价。由于电磁刀在外科手术设备传统技术上所作的突破及对临床上的贡献，2007年赵伟获得了日本以发明划时代技术为评选对

象的日本医科器械最高技术奖，也是日本医科器械年度评选的唯一的医疗技术奖。

2010年回国之后，赵伟仍然没有停止他在医疗设备领域技术创新的步伐，带领安进医疗专注高端技术产品开发，坚持在国产高端自主创新产品领域深耕新作，不断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端医疗产品，填补世界技术和产品空白。

2010年至今，赵伟负责北京市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目，开始电磁刀第二代技术nEMF研究和产业化工作。研制成功新一代蒸散汽化技术，减少了手术的热损伤副作用，使得一些无法手术的脑、脊柱肿瘤病例得以手术治疗；研发成功世界首创的新型双极切开和凝固技术，改善了手术中组织粘连的临床难题，给手术操作带来很大方便；研发成功世界唯一可在内窥镜下液体中凝血技术，解决了至今为止无法在液体中手术的临床难题；研发成功基于毫米波多普勒原理的人体呼吸脉搏检测技术，研发成功非接触式人体呼吸脉搏传感器及远程健康监护系统，无需接触人体可检测人体呼吸、脉搏数据，实现了远程全天候患者重要体征的监护，为移动医疗远程监护、养老监护，解决了家庭或养老设施无盲点检测问题，克服了可穿戴设备的缺点。

栉风沐雨 与时代同发展

赵伟的成功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78年，在新疆的赵伟参加了恢复高考后全国大学第一届统一招生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邮电大学无线电通讯专业。1991年，赵伟辞去稳定的高校工作，告别家人，只身前往日本某图像技术研究所。

初到日本，语言不通是他面临的第一道挑战。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赵伟几乎利用了所有的空余时间来学习日语，走路、吃饭、坐地铁都在背单词，每天一到家，赵伟都会打开NHK频道来练习自己的听说能力。

随着在日本工作的开展，赵伟也面临着第二道挑战：与国内全然不同的研究方法。与别人沟通困难，他就一个人包揽下全部工作。从硬件到软件、从模拟到数字、从低频到高频，从设计到测试，他的“全能”让同事大为惊讶，同事还戏称他为“赵伟大”。刚到日本半年，赵伟体重就掉了7公斤。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再加班到深夜，是赵伟的生活常态。回忆起那段拼命的时光，他说：“当时，开车回家的路上都想着工作，有好几次竟然不记得回家途中有没有遇到红绿灯，投入工作的状态真是到了痴迷和疯狂的地步。”

转职到医疗设备公司后，赵伟逐渐摸索出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从事的医疗设备行业，是一个多学科跨界融合的领域，需要打通医学、工科等多学科连接障碍，才可能有创新和突破。”得益于深厚的工科基础，加上异于常人的努力勤奋，赵伟成功研发出几项世界首创新技术医疗产品，其中就包括“电磁刀”。而在技术创新得到突破的同时，赵伟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日本公司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经验，向公司建议进行试点改革，应对管理制度上出现的漏洞，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作为少有日本上市企业的“华人董事”，赵伟可以凭借高额的年薪过着优越的生活，但2008年，47岁的赵伟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回国。谈及回国创业的原因，赵伟表示，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益强盛，给了他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北京的创业环境也深深吸引着他；另一方面，中国的医疗设备技术相对落后，依赖进口，他想改变这个局面，用自己的发明技术在中国生产出能够走向国际的高端医疗设备。2010年，他开启了人生的新一段旅程，回到中关村，创立安进医疗，开始了第二代电磁刀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

归国10年，赵伟取得了累累硕果。作为北京市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技术成果，基于电磁刀技术开发的nEMF AJ-200、UniPoint AJ-10系列产品，先后获得了国内外临床专家的高度评价。UniPoint AJ-10系列产品更是成为在日本首款注册成功的中国原创技术、制造的高端手术设备。在国际巨头公司垄断的高端医疗领域、在外科手术最复杂、尖端

的神经外科领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时代与个人的共振下的结果。

赤子之心 与祖国共命运

在2018年的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专场的总决赛中，赵伟带来的项目荣获优秀奖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赵伟有了更深的体会：世界上伟大的企业，不会走别人走过的道路，都是走自己的路，在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上做创新。创新的背后是一整套创新标准的建立，要保证工作有效性和可靠性，做到研发和生产的严谨性，这套标准的确立有助于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

回国的几年里，赵伟及其团队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建立一套完整的质量控制系统。赵伟不厌其烦地与团队沟通，在公司内部树立严格的质量意识，有问题及时记录，修正，然后检查实施结果，打通每个质量的关键点，并做到一切



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一行莅临“安进医疗”指导工作

皆可追溯。“如果没有很好的产品意识，很难做好产品，如果没有做好‘Made in China’，想做好 creation in China，怎么可能？”

赵伟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他们心中伟大企业潜心而行，不仅仅是做好自己，他也在培养自己手下的团队与员工建立使命感和信念。赵伟以已故专家黄大年為榜样，“不管在国外生活多长时间，我们的心从未和祖国分开。”当年49岁的他已经错过创业的最好年纪，但他仍然抱着拳拳爱国之心回到中关村创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他的发明与专利，也将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变成造福社会造福人类的工具，除了为医疗事业奉献力量，改善患者的就医环境和医生的从业环境，还试图改变国内医疗设备依赖进口的局面，提高中国在世界医疗事业中的地位和竞争力。这种使命感与奉献精神，是归国华侨身上共同的特质。

（作者：王思蕴）

后 记

金秋十月，《侨之梦》第二辑终于与各位读者见面了。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严重影响下，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面对编撰70位侨界人物的故事的繁重任务，实属不易。

在编撰此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北京市各区侨联、局总公司、高校侨联和侨界社团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他们为本书推荐了许多侨界代表人物，并提供了许多背景材料和写作素材；部分基层侨联组织也为采访对象的联系、沟通、核对等做了大量工作；本书还得到了收录其中的各位侨界代表人物的全力配合，他们或手书或口述，提供了生动详实的第一手材料；为做好采写、校对、审核等各项工作，北京师范大学侨联、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和同学倾注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在此一并向所有帮助支持我们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并受资料和篇幅限制，难以一一详述70位侨界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对于书中不足之处敬请原谅。

我们期望这些鲜活的故事能够保留下来，传播开来，不仅是为纪念北京市侨联成立70周年，而且要通过书中的人物故事，不断激励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以及各界人士，共同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侨之梦》第二辑编委会

2020年10月